

郭沫若年譜

(上)

王繼叔 童煒鋼 編

江苏人民出版社

女神

中國現代社會研究

洪波曲

革命春秋

屈原

天地玄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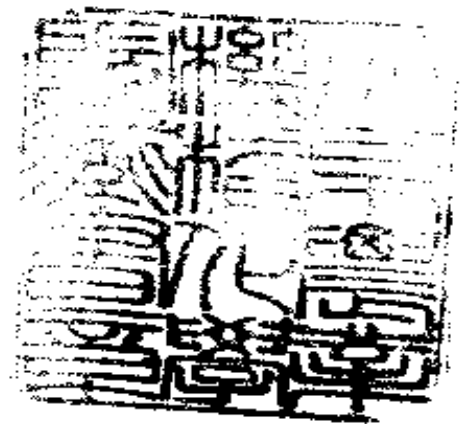
創造季刊

N 5.6
10

王維欽
童炜鋼
編

郭沫若年譜

(上)



江苏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年谱(上)

王继权 童炜钢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9.75 插页 4 字数 450,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600 册

书号: 11100·076 定价: 1.75 元



1897年，摄于四川乐山沙湾镇老家住地。前排左起：郭沫若、三哥、大哥、二哥。后排左起第二人郭母，第三人郭父。
(新华社供稿)



1940年春，郭沫若在重庆电影制片厂（手中小儿是郭汉英）。

（新华社供稿）



1940 年左右，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 （新华社供稿）



1946年秋，郭沫若在上海住所。
(新华社供稿)

前 言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几十年来，他以惊人的智慧，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创造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书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学习和研究郭沫若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是研究我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增添一砖半瓦，我们试编了这部年谱。

编写工作始于1977年夏，1978年6月以后，加快了工作步伐，1979年春完成初稿，但因平时教学任务较忙，工作时断时辍，历时数载，终至定稿。其间，我们阅读了他的著作，访问了他的生前友好，翻阅了许多报刊杂志，做了大量卡片和笔记。在收集材料和共同讨论的基础上，上册由王继权执笔，下册由童炜钢执笔，然后，交替修改，反复斟酌。由于郭沫若的活动时间长，涉及的面广，著作又浩如烟海，而我们力量单薄，才疏学浅，囿于见闻，海外和秘藏的资料无法搜觅，因此，舛错阙失在所难免，敬请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只想起一颗铺路石子的作用，殷切期望有更好的本子问世。

梅林在谈到马克思时说过：“我的赞美和我的批评——这两

者在任何好传记中必须有同等地位——都集中在一个伟大人物上”。我们编写这部“年谱”，也本着这种态度。不同的是年谱只许让事实来发言。

本书能够出版，得力于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各级领导和有关同志热情支持，为此书花了不少心血；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秦家琪、陆协新两同志以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我们统看全稿，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并帮助修改，对提高本书质量，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的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领导给予积极鼓励；校、系图书馆、资料室为我们提供资料；上海图书馆给我们提供方便；朱传贤、夏生元等同志协助誊抄稿件；其他有关单位和同志也都给我们种种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王维权 董炜钢

2049/07

凡 例

一、本书把郭沫若的生平事迹、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散文诗、杂文、文艺论文、古书今译、序跋、启事、广告、书信、日记、学术论著、翻译等等)结合时代背景,系年编写。时代背景与本事有关者,系入正谱,否则,附于月末或年末。

二、著译一般均按写作时间先后入谱,尽可能落实到日,无法考订确切日期者,则系入本月、本季或本年。写作时间不可考者,则按发表时间系入。

三、本书引用郭沫若的著译,系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沫若文集》和解放前、解放后有关出版社所出的单行本。至于出版时间、出版社名称,除第一见外,为避免烦琐,一般从略。未收集的单篇著译,均注明所载报刊的名称、卷期、日期等。同一篇著译,重收或重复刊载者,为简明起见,一般只注明一处。

四、本书所引其他资料,均注明出处,以便查找。

五、书中所引外国人名、书名的原文,一律从略。

一八九二年(一岁)

十一月

16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午时。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旧属嘉定府)沙湾镇一个中等的地主家庭里。乳名文豹，原名开贞，号尚武。沫若，是他到日本留学后所取的名字。

嘉定府城(今乐山)，位于大渡河(一名沫水)和岷江的汇合处。这一带，古时号称“海棠香国”，诗云：“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可见风景之优美。出府城的大西门，沿大渡河向西南约十里，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古亦称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府城七十五里处，即是沙湾镇。

沙湾镇“唐时名南林镇，前清道光时以水灾迁今地，位铜河西岸，二峨三峨两山之麓”〔《乐山县志》：“方輿”(二)〕，系当地重镇。镇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南面有一条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蜿蜒地流下。这里，山明水秀，风景宜人。从前，人们常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等字句，来形容乡土人物。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

在郭沫若出生前五十二年——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鸦片和廉价的商品，打开中国这一个封建帝国的大门，并和封建统治者相勾结，压迫、奴役中国人民。从此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前，中国在政治上独立自主，在经济上是以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战后，中国的领土被割裂，主权遭破坏，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瓦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和战后的形势，不但加深了中国人民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郭沫若的祖先，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因贫困离开故乡，背着两个麻布袋到四川。到他的曾祖父郭贤琳一代，开始积累起家产。祖父郭明德是个讲江湖义气的人，绰号叫“金脸大王”，曾与其弟一起执掌过沙湾码头。他疏财仗义，不顾家庭，因此，家业也就凋零了。父亲郭朝沛，字膏如，排行第三，因家业凋零，没有读书的余裕，十三岁时，就到五通桥王家——他外祖父家的盐井上当学徒。不到半年，又奉父命回来掌家管事，后以经商为业，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糶纳五谷，等等，成了一个中等地主。

郭沫若的母亲姓杜，生于1857年（丁巳咸丰七年），嘉定城东南十里的杜家场人。她的父亲叫杜琢璋，是个二甲进士，最初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升为贵州黄平州的州官。当年，苗族人民起来革命，攻破州城，杜琢璋自杀。那时，她只一周岁，由奶妈带领逃回四川。十五岁时嫁至郭家。郭沫若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在一生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母亲的资质很聪明，不怕她幼时就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

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有一首是：‘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这是一首唐诗，我始终能够记忆的”。(《我的童年》)

郭沫若出生时，已有两兄两姐，此外还死了二姐一兄，因为他排行第八，母亲又叫他八儿。

本年 8 月，沙俄出兵帕米尔地区，强占我萨雷阔勒岭以西领土两万多平方公里。

一八九七年(六岁)

春

足龄四岁半时，由父亲带领到家塾“绥山山馆”沈焕章先生处，拜他为师，发了蒙。沈焕章，是个廪生，嘉定府捷为县人，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忠于职守，是当时难得的“名宿”。拜师时用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郭沫若说：“我从此以后便穿上牛鼻了——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这是很有意义的譬语。”发蒙早是出于自己的要求，因为在这以前，母亲已教他念诗，象“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样有启发性的诗句，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他多么盼望能快些骑起竹马，抱着书本上学去！同时，又由于常常听善书，听五哥在灯下读书，也使他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所以，郭沫若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父母也就允许了。

发蒙时读的是《三字经》，后来是读司空图的《诗品》，《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再后来是读《诗经》、《书经》、《易经》、《春秋》和《古文观止》等。刚读书时，对《三字经》中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之类的很曖昧的哲学问题，既不懂，更没有兴趣，读不上三天，就逃起学来，父亲就用强制手段把他抱进学堂去。

按照家塾的规矩，白天是读经，晚上是读诗。他们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虽然不能全懂，但比起《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等，“总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关于读诗，据郭沫若自述：比较容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相反，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在唐诗中，郭沫若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本年 2月，夏瑞芳、鲍咸昌创办商务印书馆于上海，先设印刷所。

同年 2月22日，康有为(1858—1927)在澳门创办《知新报》，由他的弟弟康广仁和学生徐勤担任主编，成为当时华南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报刊。

同年 10月，严复(1853—1921)、夏曾佑(1865—1924)、王修直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后又发行《国闻汇编》(旬刊)，刊登《天演论》部分内容。《天演论》的木刻本于次年刊行。

同年 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邀请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唐才常(1867—1900)等人任教，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同年 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各国侵略势力接踵而来，沿海各地群众掀起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

同年 12月，康有为又给光绪(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上书(即第五上皇帝书)痛陈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再次强调变法维新的迫切性，要求光绪赶紧变法。

一八九八年(七岁)

本年 为了“铁盔”和五哥争执。那是发蒙以后一两年的事。家塾中施行的是封建教育，所谓“朴作教刑”就是自古以来的教育方针，教师教育儿童只有一个字：即“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塾师沈焕章先生当时颇有名望，教刑也很严，且爱用细竹子打学生。郭沫若的头上被打得都是疮块，晚上睡觉时痛得不能就枕，只好暗哭。母亲可怜儿子，寻出一顶硬壳的旧帽子。这顶帽子便成了抵御刑具的“铁盔”。有了它，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了。五哥与他争要这顶铁盔，于是，被先生发觉了这一“秘密”，以后先生要打脑壳时，就要揭去帽子再打了。除了这种刑罚外，还有罚站、罚跪等。

同年 因为成绩优良得到沈焕章老师赞扬。有一次先生和学童们钓鱼回来，先生评字的时候，在纸背上戏写了“钓鱼”两个字，便向他们索对。郭沫若那时候才看了《杨香打虎》的木人戏不久，便脱口叫出“打虎”。先生竟拍案叫绝。后来先生向他父亲称赞说，“此子出口不凡，将来必成大器。”（《批评与梦》）

本年 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第六书），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提出变法的三条措施。这些措施集中体现了维新派革新政治的要求。

同年 4月，参加会试的举人齐集北京，经过康有为等人

的积极奔走，12日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由于遭到顽固派的破坏，“保国会”的活动无法展开，终于夭折，但它的宗旨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会上的演说，在上海、天津等地的报纸上发表后，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年 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从本日起，至9月21日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反动政变废止新政止，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同年 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鼓吹保皇立宪的主张。1901年12月停刊，共出一百期。

同年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急先锋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次年，白话文运动的另一提倡者陈荣褒作《报章宜用浅说》，认为“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此后，白话报、白话小说、白话教科书渐次流行。

一八九九年(八岁)

本年 在家塾读书,开始学做诗。大约在发蒙后的两三年,先生便教做对子。起初是两个字,渐渐做到五个字,甚至七个字以上。这对幼小的儿童说来,真是一种刑罚。“因为连说话都怕还不能说条畅的小孩子,那里会能了解什么虚实平仄,更那里能够了解什么音律对仗呢?”到后来,又要做试帖诗,“什么赋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得‘楼’字,或是赋得‘漠漠水田飞白鹭’得‘飞’字之类的诗题”,更是令人莫名其妙。“每三天一回的诗课,早饭过后把应读的书读了,便对着课本子瞑坐。翻来复去地把前面改了的旧课拚命地观摩,想在油渣里面再榨点油出来。用陈了的老套头什么‘二月风光好’、‘三月风光好’、‘四月风光好’之类,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觉得难乎为情。起初是无聊的枯坐,后来渐渐变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来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来,那就只好逼得流泪了。”他们受这种“诗刑”足足有两三年,但为受“诗刑”而读了许多唐诗,是“得到过一点好处”的。

本年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分享侵略中国的利益。

同年 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保皇会”,在日本、加拿大、檀香山等地进行活动。

同年 章太炎(1869—1936)所著《馗书》木刻本出版。

同年 严复所译《自由论》(英 穆勒)出版,1903年改名《群己权界论》。

一九〇〇年(九岁)

本年 义和团于去年在山东起义。是年春起,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猛发展。

同年 7月,沙俄借口保护中东铁路的修筑,入侵我东北地区。10月,东北三省全部被沙俄侵占。

同年 8月,英、美、俄、法、日、德、意、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10月,清政府与侵略国议和,次年9月与十一国(除原来的八个侵略国外,又加了西、比、荷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同年 12月24日,列宁在德国莱比锡创办《火星报》。在创刊号上,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痛斥各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并号召俄国人民起来推翻沙皇统治。

同年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1844—1900)卒。

一九〇一年(十岁)

本年 郭沫若十岁时,大家庭分家。父亲为子女多,负担重而发愁。母亲把孩子们多年来保存下来的逢年过节所得的赏钱一封一封拆开,凑成三十几串钱。父亲又从一个亲戚处借了二百两马蹄银。靠这些钱做资本,去经商。从此,父亲又重新过起年青时代的经商生活。

同年 “庚子”过后,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有了些变革,原来是读《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和《古文观止》,现在是读《东莱博议》、《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和上海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了。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算数备旨》,根据这书来教学童们算术。

同年 夏,长兄郭开文(即郭橙坞)授以段玉裁《群经音韵表》及《说文》部首。

本年 8月,清政府下诏改变科举章程,废八股,改试策论,并把全国的书院改为学堂,从此以后,全国的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

同年 9月7日,清政府与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十一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同年 从本年起,派遣留学生的数字增加,去日本留学的尤多。留学生由于受形势刺激,许多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鼓吹推翻清朝专制统治。

一九〇二年(十一岁)

本年 塾中废除诗课、八股,改为学做策论。郭沫若得《三国演义》残本,读了颇感兴趣。

本年 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共出四卷,每卷24本,1907年11月停刊。

同年 4月26日,章太炎、陈犹龙等人在日本横滨举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会”,极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从此在留日学生中掀起了组织爱国团体和出版革命报刊的热潮。

同年 4月底,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与蔡元培(1868—1940)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救国。

同年 4月,沙俄在其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被迫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十八个月内分三批撤出东三省,但沙俄违约,至第2期届满时不再撤军,企图霸占我东北。

同年 6月17日,《大公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

同年 10月,严复所译《原富》(英 斯密·亚丹)出版。

同年 10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月刊),在创刊号上他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述小说的重要性,宣传小说界革命。吴趼人(1866—1910)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后亦发表于此。该刊第二年改在上海出版。共出二卷,至1905年12月停刊。

一九〇三年(十二岁)

本年 开始大量接触新书报。

1901年起,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设立学校。本年秋闱(乡试)以后,省城成都开办了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镇上也有了蒙学堂。家塾虽没有废除,但教学内容和方法有了很大革新。当时,郭沫若的大哥郭橙坞考入成都东文学堂,五哥郭开佐(翊新)进了武备学堂。“新的书籍”经大哥采集,源源不断地向家塾里涌来,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等,这些书刊中,《启蒙画报》对于少年郭沫若有莫大的影响。据他自述:“书中的纪事最使我感着趣味的是拿破仑、毕士麦的简单的传记。小时候崇拜他们两个人真是可以说到了极点。”除了这些书报外,上海出版的各种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等,都作为家塾里的课本。(《我的童年》)

本年 1月,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浙江潮》,月刊,共出十期,10月停刊。

同年 5月,李伯元(1867—1907)等在上海创办《绣像小说》,共出七十二期,1906年停刊。

同年 5月,邹容(1885—1905)发表《革命军》,以满腔的热情,积极鼓吹民主主义革命,深刻揭露清朝反动统治。在社会上影响极大。

同年 6 月，发生“苏报案”。《苏报》是爱国学社宣传革命的工具，因发表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爱国学社一起遭清政府查封，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后来，邹死于狱中，章被监禁三年。

一九〇四年(十三岁)

暑 期

初次接触日语。大哥郭橙坞同东文学堂的两位日本教习游峨眉山回来，邀请他们绕道到家里作客。日本人的名字一个叫服部操，一个叫河田喜八郎。郭沫若戏称他们为“佛菩萨”和“河田稀耙烂”。当时正值沈先生告假回去了，他为好奇心所驱遣，常常跑去找他们学说日本话，学了些什么“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朵”、“萨约那罗”^①。

本年 作诗《钓鱼》。云：“闲居无所事，散步宅前溪。钓竿衔了去，不知是何鱼？”这是他与侄子们去溪边钓鱼时即兴之作，是现在所能见到的郭沫若的最早的诗篇之一。（收入《潮汐集》时有改动）

又 作诗《邨居即景》。描写山村的美丽景色。这也是现在能见到的郭沫若的最早的诗篇之一。据郭沫若的大侄女回忆：“郭老在家塾‘绥山馆’读书期间，有一天，他带着弟妹侄女们到屋后的一条小沟边钓鱼，看到了乡村的美丽景色，顿生诗意，吟成此诗。”（乐山市文管所编《郭沫若少年诗稿》，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 日语“我”、“你”、“谢谢”、“再会”的音译。

又 作诗《早起》。（《郭沫若少年诗稿》）

本年 2月6日,日本和沙俄为争夺我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

同年 英国侵略我国西藏,与西藏地方官员签订《拉萨条约》。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拉萨条约》终未换文生效。

同年 冬,蔡元培、章太炎、徐锡麟(1873—1907)、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章当时虽在狱中,但仍是该会的重要发起人。

同年 3月11日,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这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第17卷起改半月刊,第44卷起又改月刊。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同年 陈天华(1875—1905)发表《警世钟》和《猛回头》,号召民众起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九〇五年(十四岁)

二 月

4日 阴历元旦,大哥教育郭沫若,要他长大以后学实业。当时对于什么是实业,他们都还模糊不清,但要富国强兵是很明确的。

7日 作诗《正月四日茶天岗扫墓中途遇雨口占一律》。记述春节期间,随同家人去茶天岗祭扫祖坟,途中遇雨的情况。

九、十月间

由父亲陪同,入城参加小学入学考试。自清政府下诏废止科举制度后,本年9、10月间,嘉定府的首县乐山县开办高等小学,招考学生。

由于科举初停,一切都还是按旧的习惯行事,考试的规矩差不多也和旧时的科举一样。考场就是从前的考棚,差不多有一二千学生拥集在考棚的仪门前应考。点了名进去后是左右两列很长很大的敞廊,夹着一个很宽很大的草地。敞廊里面横设着一排一排的案桌和板凳。案桌是在两边的面桩上放着一个长而厚的木板构成的,在最外面的一个面桩上编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字号。考题是一道国文题和几道数学,郭沫若很快就

交了卷。抢食了场中的面包之后，和一些小学生们把考案移在一个面桩上，一人骑着一头，便一上一下地闹起轩轻戏来。小学毕业的资格在当时是秀才，所以有不少的年老的童生也去投考，有的已有三四十岁。头场揭晓，郭沫若在近二百名考生中考了第二十七名，在同乡中，他是最年少的一个，但也最占上列。接着是复试，在正取的九十名中，据第十一名。平时不大肯笑的父亲非常高兴，这时也常带笑容了，还带领儿子去拜访几家亲戚。

在考试期间，郭沫若常去游览城内的高标山。山在城的西部，高于周围的一切，登山可以俯瞰城市，眺望四方的远景。在访问蒙学堂的刘先生家后，又登凌云山游玩。相传苏东坡当年曾在此山上做诗，其中有“载酒时作凌云游”的诗句，故傍山的岩壁上刻有“东坡先生载酒时游处”九个字。在题壁的附近，约略在登山的半途上，那伟大的石佛的颅顶从岩畔突兀了出来。石佛头顶的面积很大，可容下二三十人。大佛的顶上古时原有佛阁，明末时被张献忠烧毁。大佛寺就在石佛的背后不远，更朝山上走，在那最高峰上便是苏东坡的读书楼。（《我的童年》）

本年 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受到中国留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7月3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各革命团体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建立统一组织问题。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并于本年11月起创办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十六字纲领进一步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原则，这就是旧三民主义。《民报》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1905—1907年间，革命派以《民报》

为阵地，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次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同年 陈天华为抗议日本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在东京大森海岸投海自杀。

同年 日、俄两国在美国调停下，各派代表前往美国议和，双方于9月5日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将侵占中国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日、俄战争结束。12月，日本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南满侵占的权益，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掠夺。

一九〇六年(十五岁)

春

从乡下进城，入小学读书。据郭沫若回忆：嘉定的高等小学堂设在北门外的草堂寺内，学生的年龄、程度极不整齐，有三四十岁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岁天真无瑕的新少年。课程也极其零乱，凡是新式的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郭沫若在家塾里已经学过一些新的课程，故深感不能满足。他回忆说：“在小学堂里新的东西没有受到什么教益，但旧的东西如国文、讲经、地方掌故之类，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帅平均先生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帅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经书院出身的王任秋的门下。帅先生的讲义和我在家塾里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学》得到印证，因此特别感觉兴奋。”（《我的学生时代》）

初夏

作诗《苏溪弄筏口占》。描述在苏稽河上弄筏嬉游的欢乐情景。苏溪，即乐山市苏稽镇，相传唐代苏颋被谪后稽留于此，故名苏稽；一说苏东坡曾在此读书，故名。（诗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夏

学期考试时，成绩优秀，名列第一。因此引起了城里的学生和老学生们的嫉妒，发生撕榜风潮。他们还派出代表包围帅先生。帅先生在学生们的威迫下，以郭在端午节请过假回家探亲为理由，把他的总分扣去六分，降至第三名，重新改榜，一场风潮才算平息下去。这对郭沫若的刺激很大，后来他说，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我的学生时代》）

夏秋之间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学校进行分班考试，郭沫若因考了第三名，被编入甲班。这个班系由成绩优良的学生组成，准备让他们提前毕业，升入中学。

因为上学期受了侮辱，这学期起，郭沫若决心以反对教员为目的，学堂里的新旧先生没有一个没有被他反对过，甚至还反对最令人害怕的易曙辉校长。有一次，郭沫若与几个小同学一起，捉弄一个老学生，易校长竟无理打一个小同学的耳光，激起学生公愤。郭沫若指责道：“易先生，你这未免野蛮！”学生们齐声叫喊“野蛮，野蛮，野蛮校长！”易校长恼羞成怒，严惩学生，并以辞职相要挟，结果六个小同学被罚“禁足”两周（即禁止出校门），郭沫若被记大过一次。

由于反抗过校长，郭沫若在学生中间树立了威信，被大家看作是学堂里的一个小领袖。（《我的童年》）

又 第二学期时，从小订婚的未婚妻病逝。

本年 2月,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册出版。

同年 6月29日,章太炎监禁期满出狱,即赴日本,受到革命派热烈欢迎。章太炎到日本以后,主持《民报》编辑工作,参与对保皇派的激烈论战。

同年 9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假立宪开锣。

同年 9月,吴趼人创办《月月小说》,月刊,共出二十四期,1908年12月停刊。

一九〇七年(十六岁)

年 初

年假期间，在家读书。由于受了帅先生的启发，把家塾里的《皇清经解》拿来翻阅。最使郭沫若感到趣味的是阎百诗的《伪尚书考》，在阅读中，他把梅颐的古文《尚书》的伪撰之处，差不多一字一句地找了出来。

在假期中，把《史记》读了一遍。郭沫若很喜欢司马迁的笔调，特别喜欢读《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引起了无上同情。在读《伯夷列传》时，发现其中“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一句，古今注家都注错了，他们都解释为“其重道义，其轻富贵”。郭沫若认为此文的主旨是在论身后名的能传与否的缘由。何以伯夷、叔齐能传名于后世，而许由、务光独不传？原因在于一是取决于评论者对被评者的好恶；二是与被评者所处的时代的政治状况有关。（《我的童年》）

二、三月间

年假期满返校，学校公布上学期的成绩，郭沫若名列第二，这更增加了他的自负心理。骄傲、散漫、懒惰的行为有所发展。

学生们为了要求校方恢复星期六放假半天的制度，发动罢课，郭沫若被推为甲班的代表。校方采取高压政策，把郭沫若“斥退”（即开除），这是郭沫若第一次被挂牌斥退。当天，他把行李搬出学校，在城内一家客栈里面凄凄凉凉地过了一夜。他决心不回家而上成都去，他的好友张伯安、吴尚之为他筹划旅费。

第二天下午，父亲突然进城，正巧也投宿在这一家客栈里。他是接到学校的通知后，立刻赶来的。儿子被学校斥退，这在父亲看来，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斥退！这是最严重的刑罚，在当时就好象由秀才革成了白丁一样。”

第三日，父亲带着他去学校拜会易校长和陈先生，向他们道歉、赔不是。为了对儿子表示警戒，父亲还带着他去走访亲戚故旧，“就好象犯了罪的人要绑着街上示众的一样。”

当父亲领着郭沫若到流华溪文昌宫的公立小学校时，该小学的教师们听了郭沫若关于闹风潮的原因和遭斥退的经过的介绍之后，却认为系县官立小学校处理不当，他们还联名写信给官立小学校进行责难，认为“年青人不可使他太受耻辱了，阻止了他的竞争心、向上心”。信中还说：“年少的光阴绝不可任其虚掷，闻有收回成命之说究系何时？若尚迟迟无期”，便准备把他“收入文昌学校作为特别研究生，免使长久失学”云云。

这封信在嘉定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不久，回信来了。回信虽然仍坚持原先的做法，但事实上是屈服了，学校里要郭沫若立即返校。

停学两个星期以后，郭沫若在父亲陪同下，重返学校。校方取消了斥退牌，改换了一道“悔过自新准其复学”的牌示。这不过是为办事人敷衍一下面子而已。

据郭沫若回忆说：自从遭了一次斥退之后，“我的性情愈见有意识地反抗地向不良的一方面发展。”——“我纵横是破了脸

的，管他妈的！”“这样的想念怎么也离不掉我的心坎。”（以上均引自《我的童年》）

五 月

小学毕业了，郭沫若名列第三。县官亲自临场手授毕业文凭，大家都觉得很光荣。会后，大家在食堂里吃毕业的筵席，这些第一批高小毕业生们兴奋异常，猜拳的猜拳，射复的射复，真是不亦乐乎。

郭沫若带着几分醉意，跑到甲班的教室里，一年来郁积着的怒气涌上心来。他把鞋子脱下来套在两手上，提起全身的力量猛扑上去。打破了两扇玻璃，玻璃的碎片弹在手背上，渗出了血。（《我的童年》）

秋 季

从乐山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嘉定中学。

嘉定中学的校舍是由从前的考棚改建的，在高标山的东麓。考院的中堂改成了礼堂，左右的考棚，左边的改成讲堂，右边的改成自修室。自修室的右边是一带寝室。

这所新开设的中学充满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学校办得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位”。一位英文教师用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学生，几个拼音教了半年。郭沫若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他只想离开故乡，近则想跑成都，远则想跑北京、上海，更远则想跑日本或美国。但家里不让跑远，自己

也找不到那样远走高飞的机会，因而有一个时期便自暴自弃起来，打架闹事，喝酒赌博都有他的份。

又 作诗《晨发嘉州返乡舟中赋此》。秋，郭沫若在乐山高等小学毕业后，乘舟返乡度假，途中赋此诗。通过沿途景物的描写，抒发了诗人对故乡的深厚感情。（《郭沫若少年诗稿》）

又 作诗《夜泊嘉州》。暑假期满，自沙湾乘船返乐山，在舟中远望峨眉山，耳听寺庙鼓声，激发了他追慕当年苏东坡载酒赋诗的情怀，遂作此诗。（《郭沫若少年诗稿》）

7月 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殉难。同月13日，秋瑾（1875—1907）在绍兴准备响应，事泄，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

十 月

15日 作诗《九月九日赏菊咏怀》。作于重阳节。诗中追慕陶渊明的清高品格，以表达他对现时旧教育制度的不满与愤慨。

本年 12月，孙中山、黄兴、黄明堂等在镇南关起义失败。

同年 12月1—3日，春柳社欧阳予倩等在日本东京本乡园演出《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出话剧。

一九〇八年(十七岁)

第二学期开学后,嘉定中学的校长和全体教职员都更换了。新校长所聘的教职员虽然比第一学期稍为整齐一点,但也相差不多。郭沫若觉得学校里没有可学的东西,便向文学方面发展。这时候,他从《国粹学报》上看到了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国粹学报》创刊于1905年1月,邓实主编,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宣传反清思想。章太炎、陈去病等常为该刊撰稿。郭沫若说:“章太炎的文章我实在看不懂,不过我们很崇拜他,因为他是革命家的原故。”章太炎的言论为什么那样的难懂,他感到疑惑,有人告诉他:“难懂的是他论学的文章,他关于革命的言论是比较容易懂的”,可惜的是当时章太炎编的《民报》是禁书,他们不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但是,由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的文章是很容易看懂的,“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气象”。对于已成为保皇党的梁启超,郭沫若虽然鄙屑他,但却喜读他的著作。认为:“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还说:那时,林琴南译述的小说很流行,“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而且“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Ivanhoe》”,“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Lamb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

故事集》)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郭沫若感到无比的兴趣，给他以很大的影响。(《我的童年》)

秋

中秋过后几天，得了肠伤寒。开始是感到非常疲倦，头痛、下痢、咳嗽，时时流鼻血，食欲消失。一个星期后渐渐地不能支持了，便决定回家。因为所雇的轿子让给嫡堂的三哥坐了，在城里又耽搁了几天，病情更加重了。

回到家里，在厢房里的床上睡下后，便失掉了知觉。第二天吃了儒医宋相臣先生的一服大热药，病情变重。第四天请太平市的赵医生诊治，服了他开的凉药，病情转轻，逐渐好转。过了六、七个礼拜，才能从床上坐起，身体虽然逐渐复原，但遗留下了耳朵重听和腰椎不能久经劳动的后遗症。

又作诗《咏佛手柑》。通过歌咏佛手柑，对母亲表示赞颂。(《郭沫若少年诗稿》)

本年 6月，美帝国主义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在中国办学，实则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同年 8月，清政府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并于9月颁布宪法大纲，借立宪之名，行君主专制之实。

同年 11月14日光绪死，15日慈禧死。次年，溥仪接位，年号宣统，由溥仪之父载沣(1883—1952)摄政。

同年 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刊于《天义报》。

同年 严复译《名学浅说》(英 耶方斯)出版。

一九〇九年(十八岁)

三 月

一天，家里派轿子接郭沫若回家，参加大伯父的葬礼。正值学校举行临时测验，下午二时测验完毕，三时动身出城。走不上四十里路，天黑了，郭沫若心里非常着急，又见轿夫吃力，便下来让轿，一个人往前走。后来因为轿夫先到家，家里的人大吃一惊，以为他被轿夫倒在河里淹死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足足哭了两三个钟头。最后终于从邦都庙把他找回，真是一场虚惊。

次日，见到新五嫂，她是县视学王畏岩先生的次女。后来，在本年暑假期间，五嫂同他说起在她家里有一张小学堂甲班的毕业照，在这张照片中，郭沫若“人又小”却站在那最高的一层，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尽量提高身子，她认为这正是他好胜心的表现，“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听了她的评论，郭沫若佩服她观察力的敏锐。（《我的童年》）

夏

对监学丁平子无故开除学生表示不满。放暑假的前一天，郭

沫若酒醉后骂了丁平子，丁大发雷霆，一定要斥退郭，并扬言“郭某和我，势不两立，我在这儿斥退不了他，我要上省去告；我在省里告不了他，我要进京！”由于其他教职员和学生的反对，丁的目的未能达到。正好次日起学校放暑假，学生各自回家。又因为暑假中丁平子突然患白喉症暴死，斥退的事才不了了之。（《我的童年》）

十 月

中秋后的一星期，嘉定中学的一部分学生在萧公庙看戏时和士兵发生冲突，郭沫若虽然没有在场，但勇敢地代同学们向老师报告事件发生的经过。第二天，因校方未能妥善处理这事件，学生罢课。第四天，校长（监督）采取高压手段，把郭沫若等八名学生斥退；其余几十名学生被记大过。这是郭沫若第二次被学校挂牌斥退。中午，当学生们准备离校时，恰遇新任严监督来校上任。下午，学生派代表去见他，请他撤换一切压制学生的旧的教职员，召回被斥退的八个学生，严监督都一一答应。

第六天，旧监督秦某离职，学生要求新监督取消斥退牌。经查阅案卷，发现旧监督已把斥退学生的事呈文上报，通饬全省，这对全体学生，尤其是对被斥退的学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当时，学生倘被挂牌斥退并遭通饬，从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上学，甚至不能再在本省读书。

冬

作诗《咏蜡梅》。通过对蜡梅的咏赞，歌颂不畏严寒的高贵品德。（《郭沫若少年诗稿》）

同年 11月，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南社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发起人是陈去病、高旭、柳亚子，主要成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南社是同盟会的一个外围组织，该社社员（由成立之初的十七人，至辛亥革命后增至千人以上）分布全国各地，影响极大。高旭后来回忆说：“当胡虏猖獗时，不佞与友人柳亚子、陈巢南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因以文学革命为旗帜，而意识不在文字间也。盖柳、陈二子，深知乎往时人士，入同盟会者，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借南社以为沟通工具。”（《周实丹烈士遗集序》）南社成立后，每年出版几期社刊，登载社员诗文，宣传反清反袁思想，辛亥以后，内部发生分化，不久即无形解体。

同年 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印成，发行署周树人名义。《域外小说集》系用文言翻译，上下两册共收英、美、法、俄、波兰、芬兰等国作家的小说16篇。

一九一〇年(十九岁)

二月

与五哥郭翊新一起去成都。在嘉定读书时，由于学校和教职员的腐败，郭沫若的求知欲不能得到满足，迫切希望离开这一地方。他说：“嘉定那样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羁留的。能够的时候是跑欧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沪，更其次——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跑成都”，这些地方，象强有力的磁性，吸引着他。这是“一种不可遏抑的无名的憧憬”。至于到这些地方去应该学什么，究竟有什么好学，当时他是“毫无明确的意思”的。然而，父母却坚决不允许他外出，他只好在嘉定荏苒地住了四年。去年10月，突然遭到学校斥退，“这是多么可以欢迎的事！”这次，家里再也不能阻止他了，就这样，郭沫若于本月离开家乡到成都去。

第一天，与五哥一起离家去嘉定城，途中作诗《泛舟谣》，表达了万里求学的强烈愿望。（《郭沫若少年诗稿》）晚宿王畏岩先生家。王先生是五哥的岳父，曾在成都的分设中学当过两年的国文教员，刚卸任回来，他为郭沫若写了几封介绍信给分设中学的他的同事。

第二天，乘轿动身。

第三天，中午至眉山，晚宿彭山。

第五天，到达成都。先在离成都南门三四里处的“武侯祠”息肩。武侯祠的庭园中古柏参天，虽非汉时之物，但也有五六百年了。入内，有荷池、水榭、亭台、花圃，尤多题咏、对联。入城后，于旅舍遇到同被嘉定中学斥退的同班同学张伯安。

当时，各学堂都已陆续开学了。他们首先得考虑进什么学校。在提学使衙门做科长的杜绍裳先生是郭沫若小学时的老师，建议他们去报考中等工业学校，这样可以“实业救国”。而五哥和其他同乡不赞成，他们认为这是旁道，不是正道。所谓正道，就是要象从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一样，要由小学而高等而大学。郭沫若和张伯安也不想考中等工业学校，因为考这个学校的资格只要小学毕业就够了，而他们已有中学两年半的学历，最后决定去考分设中学。

分设中学在成都是久负盛名的，本来是高等学校的附属中学，因为前任校长刘士志不甘受“附属”的名义，才改为“分设”，成了一所半独立性的学校。这学校经费充足，设备完全，又加以刘士志的声望，所以很有点名气。

郭沫若和张伯安拿着介绍信去见该校现任监督都静阶，他们对他们在嘉定中学被斥退的事倒毫不介意，立即叫国文教员郑先生出题给他们举行入学考试，考题是“士先气质而后文艺”，限二小时完卷。郭沫若、张伯安两人就在会客厅的茶儿旁做试卷，文章写完后，经都监督阅看，表示满意，当场决定插入丙班（相当于三年级）学习。就这样，他们高高兴兴地搬入分设中学，开始了学习生活。

郭沫若满以为：“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学校，终究如愿相偿了。”但是，进校两星期后，却发现这里和嘉定中学差不多，一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骗文凭的学生。讲经学的虽然是成都的一位大名鼎鼎的名士，但只是

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历史差不多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这些就是国学方面的内容，有的教师还不及嘉定中学的。至于新学方面，也可怜得很，理化、数学教员连照本宣科的能力也没有，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英文教员是上海一所教会学堂出身，穿着时髦，进出是四人抬的大轿，还在提学使衙门任英文科长，可是他的英文程度很差，竟把课本上一个海岛的名字“Newfoundland”（即“纽芬兰”，属加拿大）望文生义地把它直译为“新大陆”。这些教员的水平实在低，真是误人子弟。对于这种现象，郭沫若是感到“非常悲愤的”。（《反正前后》）

有名的分设中学是这样，其他如成都府中学等学校均是腐败成风，整个教育界的状况是糟透了。这一切，使郭沫若感到“失望、焦躁、愤懑、烦恼”，而“这几条支流所汇合而成的自然是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于是，他象在嘉定时那样，经常喝酒，用酒来麻醉自己。张伯安喜欢数学，他还能够在那一方面求得满足，而郭沫若对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这样的自怨自艾，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不知道苦了自己多少。”（《反正前后》）

当时，四川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有一批人正在鼓吹君主立宪，他们以四川咨议局正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首，以《蜀报》为言论机关。对这一派，在郭沫若等青年人心中是“鄙屑他们的”，但又天真地认为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强国。他们崇拜的是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殒死了的邹容，是徐锡麟、秋瑾……等，“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他们在出过洋或者到过京沪的教员里找，在校役里面找，可是依然没有找着。（《反正前后》）

春

作诗《澡室狂吟》。表示对当时腐败社会的强烈不满。（《郭沫若少年诗稿》）

又作诗《落红》。通过对暮春景物的描绘，表达了惜春的感情。（《郭沫若少年诗稿》）

3月14日 作诗《同友人游怡园》。记述与友人同游怡园的情景，反映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情。（《郭沫若少年诗稿》）

夏

作诗《商业场竹枝词》三首。描绘成都商业场中形形色色的景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郭沫若少年诗稿》）

十二月至翌年一月

十一月间，天津三四千群众举行国会请愿，为首的温世霖等人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并计划发动全国学校总罢课。请愿运动终于为清廷镇压，温世霖被捕，流放新疆。一个月以后，这一运动才波及到四川。

一天，正当学校停课准备学年考试时，四川最高学府高等学堂通知各校派代表至教育总会开会。郭沫若作为分设中学丙班的代表出席这一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后决议：一、要求在明年便开设国会；二、要求四川总督代奏；三、一律罢课，不达目的，誓不复课。

第三天，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常务委员会成立后

的经过及今后的工作方针。郭沫若又出席了会议。

在学生罢课期间，提学使司发出严厉的通令，禁止学生借故生事，罢课要挟；假使有不听命的，要惩办各学校的办事人。本来各学校的办事人，对运动在表面上不能不采取放任的态度，待提学使司下了命令后，他们的态度也由放任而变为高压了。分设中学的都监督对学生软硬兼施，逼令学生参加学年考试。学生们团结一致，拒绝应试，都监督又对学生进行欺骗利诱，最后还声称要斥退郭沫若和张伯安，以此迫使学生就范。于是，郭沫若又一次遭到斥退。这是他第三次被学校斥退。郭沫若收拾好一切行李，搬出学校，住进了东大街那家嘉定人常住的旅馆。

恰巧，就在郭沫若等搬出学堂的那一天，大哥郭橙坞回省来了，他也住在这家旅馆。郭橙坞自从1905年出省后，去日本学了几年法政，回国后，在上海盛宣怀的商埠督办衙门工作。本年在北京考上法科举人，得了个七品小京官的头衔，分发在法部衙门里行走。他要回省的消息是早就听说的，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回来，兄弟俩六年不见了，再次相逢，自然是极高兴的事，一切不愉快的情绪也暂时克服了。当郭沫若把受学校斥退的事向大哥述说后，他倒不十分责备，反而安慰说：“斥退了也不要紧，明年好进官班法政学校。”原来他回成都是受了官班法政学堂的聘请的。法政是郭沫若等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那官班法政学堂。

大哥回省后，许多人来访问他，分设中学的都监督也来请他给该校甲班五年级学生每周上两点钟法制经济课。这两点钟的法制经济课就成了给郭沫若、张伯安复学的交换条件。原来都静阶那天虽然严厉地说要斥退郭沫若等，其实不过是使用了小小的权术，是“杀鸡给猴看”，为的是要在学生面前显示一番威风，好教别人震恐。当全体学生俯首帖耳地上了课堂去参加考

试,他的目的达到,也就算了,所以终究没有挂郭沫若等的斥退牌。在郭橙坞面前,都静阶还说这两个学生平时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但不该乘一时的感情为别人所利用。他答应让他们重新回到学堂去读书,并可以在下学期开始时,参加补考。这样,郭沫若等人又回到了分设中学,继续求学。(《反正前后》)

本年 作诗《有怀》。诗中反映了他刚到成都时纷乱的思想情绪;通过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表达了他的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郭沫若少年诗稿》)

又 作诗《寄吴君尚之》二首。表达了对友人的深厚感情,和自己愤世嫉俗的情绪。吴尚之是郭沫若在乐山小学读书时的笃友,他俩在成都相逢时,郭沫若作此二诗。(《郭沫若少年诗稿》)

又 作诗《和李大感怀》二首。郭沫若少年时代即憎恶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在这二首诗中,细腻地描绘了在封建礼教禁锢下的妇女的彷徨、苦闷的心情,也抒发了自己向往幸福自由的情怀。李大,即李鹤人,乐山牛华溪人,他是郭沫若在嘉定府中学读书时的同学。(《郭沫若少年诗稿》)

又 作诗《咏秋海棠》。通过对秋海棠的描绘,借物抒情,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势力压迫下的中国妇女的深切同情和关怀。(《郭沫若少年诗稿》)

本年 8月,《小说月报》创刊,恽铁樵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刊1921年以前是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之一,自第12卷1期起改刊,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1932年淞沪抗战时停刊,共出二十二卷。

一九一一年(二十岁)

四 月

27日 同盟会黄兴等在广州起义失败。死难烈士安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六 月

17日 参加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会后，与大家一起去藩台衙门请愿。

本年5月，清政府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实际上是把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这一行径，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四川的保路斗争尤其激烈、广泛和深入。本日，铁路公司召开第七次股东大会，讨论铁路国有问题。会上群情激昂，当即成立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并决定派员分四路去各地游说。会后，与会群众上街游行，至藩台衙门请愿。接着，各县保路同志会相继成立，运动在全省开展，声势十分浩大。

八月

24日 《申报》开辟《自由谈》文艺栏。

十月

中旬 一个礼拜天，郭沫若去铁路公司三哥处，三哥拿出一封家信，信上说母亲已给郭沫若订了婚。女方是苏溪场的张家，是叔母做的媒。这真有点突然，他的“心机象突然取去了称盘座的天平，两个称盘只是空空地动摇”。但是，“动摇了一会之后自然又归于平静了”。（《黑猫》）

本月 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瑞澂等清朝官吏仓皇潜逃，革命士兵一夜之间占领武昌，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各省人民纷起响应，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十一月

24日 晚，把象征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辫子剪了。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大家欣喜若狂，随着邻近各省纷纷独立，成都也准备于明天宣布独立。郭沫若等青少年最高兴的是等不到独立的宣布，在头一天晚上便把辫子剪了。接着，大家又拿着剪子去强迫一些怕事的学生和首鼠两端的老教员们，特别是那位都监督，学生们拿着四五把剪子把他包围起来，使他无处可逃，最后，终于在谈笑之间把他的辫子也剪了。一片“万岁”

“革命成功万岁！”的欢呼声，仿佛只要把头上的辫子剪了，从此以后，中国就可以一跃而为世界头等强国似的。（《反正前后》）

27日 参加革命党人在南校场召开的省民大会。25日，成都已宣布独立，由蒲殿俊等立宪党人成立了四川都督府，这引起了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张贴布告，宣布于本日上午召集省民大会以示反对。（《反正前后》）

十二月

上旬 成都独立后的十天（约4日或5日），士兵哗变，从午后开始，枪声四起，愈打愈多，全城都是枪声，及晚，又四处起火。郭沫若住在学校里不能出来，听了一夜的枪声，看到满城是火光。

次日，清晨，去东门堂姐处，又至青石桥街大哥处。在街上看到兵变后的情景，全城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流氓又趁火打劫；接着，同志军也被招进城，他们也有着破坏行为，因此，在兵变后的第二天，学生们发起组织志愿军运动，以维持秩序。

第三日，郭沫若自告奋勇地去参加学生志愿军，他把行李搬进了陆军小学，见睡床狭小，旋即退出，行李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反正前后》）

下旬 学校放假，由成都回乐山。途中作诗《舟中闻雁哭吴君耦遯》八首。吴耦遯，乐山牛华溪人，系郭的同学。本年，他去湖南避难，因父亲病危，由湘返川，途中，船只失事遇难。郭沫若作诗八首悼念之。诗中以真挚的感情表达了对亡友的深厚情谊，并竭力称颂他的才华、品格和志向，为他壮志未酬即早逝而惋惜。（《郭沫若少年诗稿》）

本年 12月,在武昌的代表决议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25日,孙中山回国,29日各省代表在上海开会,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二十一岁)

二月

本月 年假回家乡，为邻里写春联。当地风俗，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挂春联，而沙湾人的春联，尤喜编撰长句。由于街上一二百户人家中，能够编撰春联者寥寥，故这一工作往往为少数几个人包办，其中，郭家兄弟总要占一两位。在胞兄、堂兄们出了远门之后，郭沫若便承担了这一任务。由于今年已经是“革”过“命”了，所以，春联的内容，除了平常用惯了的“莺啼燕语”之外，又增添了无数的新材料，他最得意的两副是：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语武陵人，于今可改秦衣服。
铁马金戈回地轴，吟诗锦城客，此后休嗟蜀道难。

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砚池溟渤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澳，把地球员幅竟入版图。
(《黑猫》)

此外，现在已收集到的有十副，如：

诏书颁下九重来，国会缩短三年，要与列强争优胜。
峨眉耸立青天外，山势蜿蜒万里，飞临当户作画屏。

力挽狂澜，吁食宵衣新主业。
忧先天下，江湖廊庙小臣心。

国会短三年，流尽多少英雄泪。
奋摧过一载，怕闻月夜子规啼。

吾年已近古稀，唯愿后生中人，鏖驰千里。
今日竞行新政，私祝圣朝前路，雄长万邦。

（《郭沫若少年诗稿》）

这些对联，表现了郭沫若青少年时期的胸怀，他满怀爱国主义的热情，赞扬了辛亥革命。后来，他回顾当时的心情说：那时的青少年“有极浓重的民族感情，极葱茏的富国强兵的祈愿，而又有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他们以为只要把头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换，把非汉族的清政府一推倒，中国便立地可以成为‘醒狮’，便把英、美、德、法、意、奥、日、俄等当时的所谓‘八大强’，当成几个汤团，一口吞下”。（《黑猫》）

又作挽联十副，悼念亡友吴桐逊。这些挽联感情真挚，文字谨严，对仗工整。如：

死不足悲，后此寒食朝朝，剧怜子夏失明，颜路泣血。
魂无可返，已是山河渺渺，难禁向生邻笛，处仲酒炉。

以身殉学，死得英雄，问上下九千年，如此读书人几个。
扪腹无才，生殊惭愧，当俯仰三百拜，为酹招魂酒一杯。

（《郭沫若少年诗稿》）

同月 为防备乱兵，保卫乡里，参加沙湾镇保卫团，并任文牍。去年兵变后，嘉定也遭受了一次大劫。兵变的结果是枪枝流散，地方上极不安宁，为了保卫地方，镇上成立了保卫团，

一些在城里读书放假回乡的学生都担任了团里的文牍。

本月 12日，清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但在公布的诏书中，袁世凯加了如下的话：“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须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为窃取政权按下伏笔。

13日 袁世凯致电南京索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并表示不愿南下。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14日 南京参议院开会同意孙中山辞职。

15日 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三 月

2日 奉父母之命与苏溪张家姑娘(张琼华)结婚。结婚的仪式一切都依照旧式，第一天是男家打发花轿到女家去迎亲。第二天新娘到门，拜天地，拜祖宗，夫妻交拜，牵入洞房，吃交杯酒，等等，仪式进入高潮。原来说女方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待到花轿打开，大失所望，这给郭沫若在精神上以重大打击，美好的幻想破灭了。气得回到原来住的厢房里闷睡。经母亲再三劝说，才答应去岳父家回门。第三天去苏溪岳父家，第四天返家。

8日 结婚后的第五天离家转嘉定去成都，大嫂同行。母亲送至河岸边，嘱咐他不要远跑到外洋去。在船上作诗数首，题为《舟中偶成》。

其一曰：

阿耶提耳语，远行宜慎哉。
方舟虚自好，敬器满斯摧。
愁锁蒲编钥，悲缘桑落煤。
书绅长警惕，瞬睫敢离怀。

记述父亲对他远行的嘱咐。

其二曰：

老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
泪枯维拭眼，席挂未回头。
风笛声声恨，啼猿处处愁。
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

描绘他和母亲离别时的悲痛心情。在《十字架》（《漂流三部曲》之三）和《黑猫》中都曾引述此诗，但字句略有不同，全诗为：

阿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
泪枯惟刮眼，滩转未回头。
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
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

初见《十字架》（《漂流三部曲》之三），载1924年《创造周报》第47号。现收《潮汐集》，题作《休作异邦游》，篇末注写作时间为“1913年5月作于成都”，系误。

其三曰：

呜咽东流水，江头泣送行。
帆圆离恨满，柁转别愁萦。
对酒怀难畅，思家梦不成。
遥怜闺阁□^①，屈指计舟程。

抒写自己离乡时的悲伤情怀。（《郭沫若少年诗稿》）

① 原稿缺一字，下同。

本月 作诗《咏绣毬》，反映了他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心情。（《郭沫若少年诗稿》）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这给青年郭沫若带来莫大的喜悦，他说：“我们一般的人是怎样地欢欣鼓舞哟！特别是我们四川。因为它斗争的时间长，所以得到胜利也就分外地狂喜。”（《反正前后》）

本月 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为袁世凯窃取，北洋军阀黑暗的统治开始。

初 夏

作诗《咏牡丹》。通过对牡丹花的歌吟，赞颂辛亥革命使清朝覆灭，帝制取消，表达了他向往民主共和，要求富国强兵的愿望。（《郭沫若少年诗稿》）

秋

作诗《述怀》（和周二^①之作三首）。抒写了自己追求真理，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的伟大理想。决心要以“灼热终不冷”的精神，为战胜黑暗，争取光明而斗争。（见《郭沫若少年诗稿》）

九 月

9日 作诗《和王大九日登城之作》（原韵二首）。这段时间，边境上很不安宁，如8月19日蒙军袭击洮南府，20日又攻占科布

^① 周二系郭沫若在成都府中学堂的同学。

多。郭沫若借和友人诗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郭沫若少年诗稿》）

王大，即王维新，号伯恒，乐山牟子场人，他是郭沫若在乐山高等小学时的同学。

冬

作诗《感时》八首。有感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但没有兴盛起来，相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诗中，对黑暗现实进行猛烈抨击。如：“苦恨年年病作家”一首，写出了辛亥革命后民族危机加深，人民痛苦增大的情景。又如：“兔走鸟飞又一年”一首，则慨叹辛亥革命已如烟云，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并指出沙俄已经侵略进来，要执政者正视燃眉之急。（《郭沫若少年诗稿》）

年底

作诗《感李大和鄙作感时八章》。郭沫若把他的《感时》八首寄与李鹤人后，李作诗相和。郭沫若再作“赋诗以赠之”。（《郭沫若少年诗稿》）

本年 分设中学和成都府中学合并，郭沫若在该校又读了一年，至年底毕业，次年春进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

同年 作诗《代友人答舅氏劝阻留学之作》（次原韵）。反映出他对国事的见解，和立志出国留学、报效国家的意愿。（《郭沫若少年诗稿》）

又 作诗《锦里逢毛大醉后□号》（叠韵四首）。抒写同友人

别后重逢的悲喜心情，并猛烈抨击了辛亥革命后黑暗的政治局面。毛大，即毛常典，乐山牟子场人，系郭沫若在乐山小学时的同学。诗原为四首，现存三首，缺其四。诗云：

乌兔追随几隔年，依稀往事已如烟。
灯前共话巴山雨，总觉罗浮别有天。

秋月春风不计年，等闲诗酒醉霞烟。
那堪乱后重相见，怕听悲笳入暮天。

屈指韶华二十年，茫茫心绪总如烟。
故人相对无长物，一弹剑铗一呼天。

（《郭沫若少年诗稿》）

又 作诗《寄先夫愚》八首。回忆少年时的往事，抨击腐败政治，倾诉忧国忧民的情怀。先夫愚，即先玉泽，乐山人，住城区演武街，在乐山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系郭沫若在乐山高等小学时的同学。（《郭沫若少年诗稿》）

又 作诗《无题》（“欲把清流葬浊流”）。抨击混乱的政治局面，发出了拯救祖国的呼声。（《郭沫若少年诗稿》）

又 作诗《无题》五首，具体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其一，“贺兰山外动妖氛”，写边地战事。8月19日，蒙兵袭击洮南府，20日又侵占科布多，面对漠北洮南遭侵，诗人热血沸腾，以诗言志，决心为抵御外侮，血染沙场。其二，“江湖水涨急流滞”，鞭挞腐败的现实，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深表担忧。其三，“甲保街头夜鼓鞞”，揭露黑暗腐败的现实。其四，“汉祖虚传三侯爵”，无情地揭露了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对祖国的前途寄以深切的关怀。其五，“不怨萑苻转怨兵”，写成都兵变，诗中揭露乡校官衙的骄横，表达了他对人民深切的同情。（《郭沫若少年诗稿》）

一九一三年(二十二岁)

春

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学习。在匡伯伦编的英文教科书《二十世纪读本》中读到美国朗费罗的原文诗，深受启发。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他的诗反映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乐观情绪，赞美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同情人民的疾苦。主要诗集有《夜吟》、《奴隶之歌》、《候鸟集》、《伊凡吉琳》、《迈尔斯·斯丹狄士的求婚》和长篇叙事诗《海华沙之歌》等。

夏

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本年6月，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在全国各省招生，四川招收六名，郭沫若前往应试，7月中旬揭晓，被录取，定于8月10日在重庆集合。

七月

中旬 回故乡沙湾镇向父母亲属告别。

下旬 由嘉定乘船赴重庆，五哥郭翊新同行，在途中宿了

两夜，第三天清晨至宜宾。

本月 “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举兵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

八月

3日 至重庆，向护送员报到。护送员传达上级电报通知，谓因“二次革命”爆发，各省学生可缓送，何时出发等候通知。由于“二次革命”的影响，四川境内有点风声鹤唳，重庆形势也比较紧张，因此，护送员要他们赶快离开重庆。

4日 和一起考上军医的一位姓胡的同学，由东大路（陆路）返回成都。路上花了十天时间。

中旬 回到成都，仍住入高等学校。这里原是旧尊经书院，藏有很多古书，暑假期间，图书馆是开放的，郭沫若就去图书馆翻阅古书。他回忆说：“那时是喜欢骈四俪六的文体的，爱读南北朝人的著作，尤其是庾子山的《哀江南赋》——那在《离骚》以后的第一首可以感动人的长诗。我觉得他那‘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的几句，真真是切中目前的时弊，每天总要返它几遍。返起来总不免要一唱三叹地感慨系之。”（《少年时代·初出夔门》）

十月

8日 9月中旬，天津来电，嘱去报到。本日和胞兄郭开佐、乡人王祚堂等由成都出发北上天津。

10日 至乐至县。

11日 至遂宁县。12日暂息。

13日 晨，换舟续行，抵东安县。

14日 抵合川县。15日小歇。

16日 晨，换舟续行。

17日 舟抵重庆。在重庆致函父母双亲，禀报初出夔门之经过。（全简见《郭沫若早年家书》，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又见《樱花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31日 抵宜昌。夜登大亨轮船。

十一月

1日 夜，开发。

3日 抵汉口。在汉口发家书报安。（全简见《郭沫若早年家书》，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又见《樱花书简》。）

5日 抵保定。

6日 搭火车抵天津。在天津发家书报安。（残简见《郭沫若早年家书》，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又见《樱花书简》。）

7日 至军医学校报到。

9日 军医学校举行复试。

在复试前，郭沫若对学校的情形略略作了调查。据说该校在革命前，教习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革命后，大多用的是本校毕业生和少数留学生，这些先生们在医学界是没有名望的。郭沫若“本来没有学医的意志”，并不想借医业来医人，也不想借医业来糊口。当时，考军医学校，只是想借以离开四川。所以，在复试之前，就已发生了离开天津的念头。

复试的国文题目极怪，曰：“拓都与么匿”，真使人感到莫名

其妙。后来据他的一位同学说这是 total and unit (社会与个人) 的音译, 出自严几道翻译的《群学肄言》。试题之怪和先前就存在的对于学校的不满意, 使郭沫若更坚定了离开天津的想法。

10日 赴北京, 知道大哥已离京到日本、朝鲜等地游历去了。郭沫若就住在一位担任小京官的同乡家里。

十二月

本月 抵京后的第五个星期日的夜晚(旧历十一月初)作五言古体诗《即兴》(“天寒苦昼短, 读书未肯辍”)一首。初见《现代》月刊1934年第4卷第4期, 收《潮汐集·汐集》。

中旬 一天晚上, 大哥郭橙坞突然从国外归来。当他得知郭沫若放弃了军医学校后, 大不以为然。尽管大哥的责备并不严厉, 但已使郭沫若感到自己太孟浪了。

郭橙坞所代表的川边经略使尹昌衡于本月初到北京后已被袁世凯软禁。因此, 他不仅无力负担郭沫若的求学费用, 而且, 连兄弟两人的生活都很难维持。这时, 郭沫若也“深自怨艾”, “把什么梦想, 什么野心, 什么自负的念头, 都消掉了”。

27日 大哥决定让他去日本留学。本日晚上, 大哥的同学国会议员张次瑜来访, 谈及郭沫若的求学问题, 张建议郭沫若去日本考官费, 只要考上官费, 一切供给都解决了。然而官费的学校是很难考的, 何况只有半年的准备时间。虽然大哥一再询问是否有把握, 郭沫若对此却难以作答。最后, 还是大哥下决心: “你去罢!” 当即决定, 第二天晚上就动身。大哥给了他一条六两多重的金条, 作为他去日本的旅费和在日本的短期费用。这时候, 郭沫若雄心勃勃, 精神为之大振。能够去日本留学, 对于他今后的发展将有着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

28日 晚，和张次瑜自北京车站乘京奉铁路火车出发。

29日 清晨，过山海关。晚至奉天(沈阳)，宿日本客栈。

30日 清晨，换乘安奉铁路火车，傍晚，至安东。换车，入朝鲜境。

31日 清晨，过朝鲜旧京汉城，傍晚，抵釜山。宿中国驻釜山领事馆。领事柯荣阶系大哥郭橙坞的同学。

本年 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月刊》，鼓吹尊孔，维护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

同年 3月20日，袁世凯指使亲信，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6月，袁世凯通令“尊孔祀圣”。10月，袁世凯以军警包围国会，迫使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

一九一四年(二十三岁)

一月

元旦 在朝鲜的釜山迎来了1914年的新年。在釜山住了约一星期后，乘船去日本。

发家书一封。(据1914年3月14日致父母信，见《樱花书简》。)

13日 抵日本东京，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到达东京后，立即准备投考官费学校。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五所学校有官费的契约，即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葉的医学专门学校和山口的高等商业学校。凡考入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因此它们成为留学生的竞争目标，极难考，有的考了八九年都还没有考上。郭沫若要半年或一年的工夫争取考上，确是没有把握的事。但是，大哥只能供给他半年或一年的费用，如考不上官费，将来的学费是很难接济的。因此当时郭沫若“是拚了命，拚命地学日文，拚命地补习科学”，为暑假中的考试积极作准备。(《我的学生时代》)

本月 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后移上海，此谓前甲寅。

二 月

13日 发家书并照相一张。家书中详尽地叙述了来日本一月余的生活情况及感受，也谈到对国内政治事件的看法，表示自己将勤俭刻苦地攻读。他说：“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饱思暖逸，势所必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业”。照相一张是特为父亲寿辰而照，并有亲笔题辞：“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春酒介寿无疆之休”。（全简见《郭沫若早年家书》，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又见《樱花书简》。）

三 月

11日 得家书一束。

14日 发家书一封。叙述了自己来日本留学的志向，表示为争取官费留学，“无论年限如何，只期学业有成”。虽不能近侍双亲膝下，但学成业就，将报答“亲恩国恩”，届时，则更有乐趣。（全简见《郭沫若早年家书》，载《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又见《樱花书简》。）

本月 徐枕亚所作的《玉梨魂》出版。《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影响极大，流传甚广。6月，《礼拜六》杂志出版，共出二百期，1923年停刊。

五 月

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临时约法》被废除。

六 月

6日 发家书一封，告知拟投考东京高等工业学堂，未能如愿，因而，“七月内将应考东京第一高等……及千叶医校。”（全简见《郭沫若早年家书》，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又见《樱花书简》。）

本月 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为此高兴万分。他说：“以半年工夫，考上第一高等学校。这在当年听说是没有比我更快的了。”（《我的学生时代》）考上官费生“实在是再欢喜也没有的，我觉得一生中只有那时候最快活了”。（《自然之追怀》）日本的高等学校约等于中国的高中，是为升入大学作预备的。当时分为三部，第一部是学文哲、法政、经济等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在应考时便要分科，这就发生了选业问题。据郭沫若自己说：“因为我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不屑学；文哲觉得无补于实际，不愿学；理工科是最切实的了，然而因为数学成了畏途，又不敢学；于是乎便选择了医科，应考第三部”。之所以考医科，“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我的学生时代》）

本月 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召开第一次大会，积极开展反袁斗争。

八 月

29日 第一次领到留学生官费（每月33元，按月领取），立即去房州休假，往房州北条洗海水浴。北条的镜之浦，在无风的

天气如明镜一样清澈平静，给郭沫若以极大的喜悦。他说：“这对于生在四川深壑的峨眉山下被家规禁止涉入一尺深水的我，一跃而扑向海中，真是有再生般的快感。”（《自然之追怀》）

因此作五言绝句三首（一、“镜浦真如镜”，二、“飞来何处峰”，三、“自日照天地”），歌颂大自然之美。初见《自然之追怀》（济之译），载《现代》月刊1934年4月1日第4卷第4期；现见《关于早年作诗的回憶》，收《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郭沫若留学日本初期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九 月

第一高等学校开学，郭沫若在预科学习，与郁达夫、张资平等同学。

本年开始接触泰戈爾的诗，并为泰戈爾的诗所吸引：“成了泰戈爾的崇拜者。”泰戈爾（1861—1941）印度的伟大诗人，诗集有《吉檀迦里》、《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他的诗歌格调清新，富有民族特色，影响很大。郭沫若进入一高预科之时，正值泰戈爾的文名风靡日本之际。有一天，他同寢室的一位本科三年级的同学拿了几张英文的油印的泰戈爾的诗回来，诗题是“Baby's Way”（《婴儿的路》），“Sleep Stealer”（《睡眠的偷儿》），“Clouds and Waves”（《云与波》），郭沫若读后感到极大惊异：第一是诗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鲜永。从此泰戈爾的名字便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文艺论集·泰戈儿来华的我见》）感到读泰戈爾的诗“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文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

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创造十年》)后来他把泰戈尔早期的诗集和戏剧差不多都找来读了。

十一月

9日 “始记日记，自誓终身不辍也。”因日记“于心身上最有补益”。(《郭沫若早年家书·1914年11月27日简》，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又见《樱花书简》。)

十二月

24日 本日学期结束，假日开始。发家书一封。(全简见《郭沫若早年家书》，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又见《樱花书简》。)

本月 袁世凯自封为终身总统。

本年 6月21日、7月28日、8月1日、8月29日、9月6日、9月29日、10月22日、10月28日、11月16日、11月27日、12月2日、12月24日均有致父母、兄弟信。(详见《樱花书简》)

一九一五年(二十四岁)

五 月

7日 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于本日返国。但是在上海的客栈里呆了三天，毫无结果，只好再回日本。当时曾作七律一首，表明自己的态度：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创造十年》）

夏

从一高预科毕业，被分配到冈山的六高医科继续学习。在冈山六高，结识了成仿吾。成仿吾，湖南新化人，当时亦怀着富国强兵的目的留学日本。他比郭沫若小五岁，但却比郭沫若高一个年级。两人在冈山同住了将近两年，从此结成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友谊。在冈山时，曾作诗《月下》，及词《蔗红词》各一首。见《离沪之前》，载1933年11月《现代》月刊第4卷第4期；现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

又作诗《晚眺》，抒发了思念祖国之情。初见《自然之追怀》，载1934年《现代》月刊第4卷第6期；现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

又作诗《新月》，写一弯新月和月光映照下的婆娑树影。见《儿童文学之管见》，载1921年2月15日《民铎》第2号；现收《潮汐集·汐集》。

九月

中旬 在东京的旧书店里偶然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据郭沫若自己说：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不久萌起了静坐的念头，于是……“我每天清晨起来静坐三十分，每晚临睡时也静坐三十分，每日读《王文成公全集》十页。如此以为常”。不到两礼拜时间，原来所患的极度的神经衰弱症渐渐地好起来了，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而“在我的精神上更使我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从前在我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画，到这时候才活了起来，才成了立体，我能看得它如象水晶石一样彻底玲珑。我素来喜欢读《庄子》，但我只是玩赏他的文辞，我闲却了他的意义，我也不能了解他的意义。到这时候，我看透他了。我知道‘道’是什么，‘化’是什么了。我从此更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皮诺若(Spinoza)。我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文艺论集》：《王阳明礼赞》)

本月 15日，综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主编，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们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

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主张。同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按：即民主）并重”，实际上已包含着后来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内容。《新青年》创办后，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知识，宣传民主与科学。成为发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十二月

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次年为洪宪元年。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成立护国军，开展护国运动，随后各省响应，纷纷宣布独立。

本年 译诗《归乡集·第十六首》（德·海涅），见《三叶集》，1920年3月3日《致宗白华书》；收《沫若译诗集》。

同年 3月3日、3月17日、4月12日、5月5日、5月×日、6月1日、6月25日、7月1日、7月5日、7月20日、9月7日、10月21日、12月10日均有信致父母和元弟（郭开运）。（详见《樱花书简》）

本年 日本帝国主义趁欧战爆发、西方各帝国主义先后卷入的机会，加紧对中国侵略。先是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取而代之。又于今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包括五个项目的二十一条要求，企图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一九一六年(二十五岁)

春

春假期间,和成仿吾同游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并作“清晨入栗林”诗一首。初见《离沪之前》,载1933年11月《现代》月刊第4卷第4期,现收《潮汐集·汐集》。

三 月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

夏

暑假期间,在东京和日本少女佐藤富子(即安娜)相识,两人开始恋爱,作日文通信。郭沫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和安娜最初的相遇是在东京,那是1916年的暑间,我已经把第六高等的一年级读完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得了肺病,在美国人办的东京的京桥医院里治疗,我趁着暑假,由冈山往东京去看他。那时候,安娜在那医院里服务。她本是仙台(Sendai)人,才从教会学校里毕业,到东京想学习产科的。我们偶然地在那儿会面了,因而相爱,在那年的年底便在冈山同居。”安娜的娘家佐藤,是仙

台藩的“剑道指南番”，就是教导击剑的老师，直到他祖父的一代，还在充任着这个职守。（《跨着东海》）

又 于暑假期间，去一高校园内，凭吊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的墓址。并作诗“一碣立孤冢”一首，以表悼念。初见《自然之追怀》，载1934年4月10日《现代》月刊第4卷第6期，现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

六 月

6日 袁世凯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唾弃下死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

秋

在冈山图书馆中突然找到了泰戈尔的《吉檀伽里》、《园丁集》、《暗室王》、《伽毗百吟》等集子，为他的作品所吸引：“我真好象探得了我‘生命之生命’，探得了我‘生命之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读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净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象这样的光景从午后二三时起一直要绵延到黄色的电灯光发光的时候，才慢慢走回我自己的岑寂的寓所去。”（《文艺论集·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九 月

16日 发家书一封，中云：“想古时夏禹治水，九年在外，三

过家门不入；苏武使匈奴，牧羊十九年，馑餓冰雪。男……质虽鲁钝，终非干国栋家之器，要思习一技，长一艺，以期自糊口腹，并藉报效国家……敢不深自刻勉，直收厥成，宁敢歧路忘羊，捷径窘步，中道辍足，以贻父母羞，为家国蠹耶！”（《樱花书简》）

本月 《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李大钊在本期上发表《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创造新的中国而奋斗。

十 月

一天黄昏，郭沫若去校园后的操山散步，在薄暗的夜色中，独自绕山道漫行。山顶上巨石嶙峋，千姿百态，使他好象闯进了熟睡的猛兽的王国。这时，太阳正西坠，殷红的晚霞弥漫天边。他的“因士披利纯（注：inspiration，灵感）给这瑰丽的晚景打动了”，他疯狂地奔跳着，信口吟出了古风“怪石疑群虎”一首，诗中描写操山傍晚的壮丽景色，抒发了自己的浩气豪情。初见《自然之追怀》，载1934年4月10日《现代》月刊第4卷第6期，现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

十二月

25日 用英文写散文诗一首，献给安娜。此诗后改成中文，即《辛夷集》开首的《题辞》。

27日 在家信中对元弟谈读书的事，说：“国家积弱，振刷须材，年少光阴，瞬间即逝，殊为可惜也。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少

不奋力，老大徒悲……任重而道远，能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樱花书简》)

本月 安娜从东京来到冈山，与郭沫若开始同居。当时安娜和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贸然结合，是没有得到她的家族的同意的。

本月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当时，他主张“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聘请一些提倡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前往该校任教，这对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本年 作五言古体诗《寻死》，抒发自己寄身异国处境艰难，理想无法实现而引起的苦闷。载1920年2月1日《时事新报·学灯》致宗白华书(1920年1月18日)内，现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诗《残月黄金梳》(即《别离》原作)，表现了送别情人后的怀念。此诗原为古体，后于1919年3、4月间，被作者改译为白话诗，题《别离》，收《女神》。

同年 2月11日、2月19日、4月30日、10月14日、11月19日、12月23日均有信致父母。(详见《樱花书简》)

本年 陈独秀作《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1916年10月第2卷第2号)、《宪法与孔教》(《新青年》1916年11月第2卷第3号)、《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1916年12月第2卷第4号)等文，针对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请以孔教为国教，写入宪法等谬论予以驳斥。次年1月，李大钊也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等文，驳斥康有为。稍后，吴虞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儒家

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第3卷第4号)等文,猛烈批判旧礼教、旧制度。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热潮,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一九一七年(二十六岁)

一月

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文学改革。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倡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封建文学的“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同期的《新青年》上还首次刊登了胡适等写的白话诗八首。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出后，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积极响应。文学革命运动逐渐开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影响极为深远。

三月

本月 安娜去东京读书。5月又回到冈山。

六月

12日 发家信一封。信中说：“吾慨乎打战者尽是神仙，而

遭灭者唯我百姓耳。然而盛衰治乱，一切皆有天数存焉，风云紧迫，正酝酿豪杰之时，新国少年，皆当存揽辔澄清之志气也。”对国内军阀战争深感痛恶。（见《郭沫若早年家书》，载《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又见《樱花书简》。）

七 月

张勋复辟，遭到全国人民激烈反对。历时仅十二天，复辟丑剧结束。

八 月

25日 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举行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元帅，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

八、九月间

译泰戈尔的诗。郭沫若“为面包问题所迫”，在泰戈尔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里》三部诗集中选译了一本《泰戈尔诗选》。但他写信去询问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时，对方均表示不要。他于是感到：“我和太戈儿的精神的连络从此便遭了打击。我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秋

由于学习德文，开始接触了歌德（1749—1832）和海涅（1797

—1856)的作品。在高等学校为了准备学医,郭沫若把德语作为第一外语,而日本教师又多是一些文学士,往往选用外国文学名著为教材。如三年级学习时,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梅里克的小说《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他回忆说:“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学习期间,郭沫若先后接触了泰戈尔和歌德,并由此接受了哲学上的泛神论的影响。他说:“因为喜欢太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我由太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1440—1518),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1632—1677),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象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我在中学的时候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恣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贯通’的程度。”当时,“曾经起过一个野心,想做一部《庄周评论》,把想论述的详细目的,写给北京的长兄,但同样遭了他的斥责。”(《创造十年》)

本年 作诗《夜哭》。抒发在异邦思念父母兄妹,担忧祖国命运的情怀。载1920年2月1日《时事新报·学灯》,致宗白华书(1920年1月18日)内,初收《沫若书信集》。现收《潮汐集·汐集》,收入《潮汐集》时,误注为“1916年作”。

十二月

12日 长子郭和夫生(当时取名和生)。

本年 1月12日、1月15日、1月19日、2月24日、4月11日、5月4日、5月23日、6月23日、7月16日、8月14日、11月7日均有致父母和元弟信。(详见《樱花书简》)

本年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11月10日、11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时报》、北京《晨钟报》相继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也有伟大而深刻影响。

一九一八年(二十七岁)

一月

李大钊、鲁迅开始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活动。《新青年》自本月起(第4卷第1号)全部改用白话文,采用标点符号。

三月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化名王敬轩,发表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模拟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复古派的种种谬论,攻击文学革命。然后,由刘半农以公开信的方式对“王敬轩”的谬论痛加驳斥,狠煞了复古派的气焰。这就是新文学运动史上有名的“双簧信”。

本月《时事新报》副刊之一《学灯》创刊。张东荪、李石岑等曾任主编。

四月

《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辟《随感录》栏,发表抨击封建复古思想言论的短评,陈独秀、钱玄同等轮流撰稿,鲁迅为这个专栏撰写了二十多篇短小、犀利、富有战斗力的杂文。

五 月

由于日本与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订立具有反苏性质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决定举行罢课，以示抗议。“全体罢课支持了有两个礼拜的光景，……又产生了全体回国的决议。这一决议下来，凡是有钱在手里的人回了国的也就不少”。郭沫若因已和安娜同居并有了小孩，“每月所领的三十二元的官费是要养三个人口的，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更那有什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但无法回国却引起了同学们的误解，被目为“汉奸”。这使郭沫若很感委屈：“没有钱便失掉了‘爱国’的资格，……当年我受着这样的懊恼，在无人的地方真不知道流过多少的眼泪。”（《创造十年》）

本月 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狂人日记》。作品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吃人本质，表现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初 夏

在冈山，作新诗《死的诱惑》，流露出消极出世的情绪，收《女神》。作者早在国内中学读书时，就受到庄子的影响。在日本“六高”学习时，又接触了王阳明、泰戈尔、歌德、斯宾诺莎的作品，加以寄居异乡和个人生活上的失意，时时被消极思想所缠绕，他说：“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但，“毕竟

是这个世界的诱力太大”，自杀没有杀成，和尚没有做成，而且在1917年的年底还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不过消极出世的思想并未完全消除。此诗1919年9月29日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参见1919年9月条），后来，大阪的一家日文报纸曾译载过此诗。东京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称赞这首诗，说是“中国的诗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创造十年》）。

本年在冈山时，还曾作诗《新月与白云》、《别离》等，后一首系过去所作的旧体诗的改译。两诗分别载于1919年10月2日、1920年1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均收《女神》。

六、七月间

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由冈山转到福冈，结束了在冈山整整三年的学习生活。后来，他回忆说：“那儿有我和芳坞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同住过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去划船的旭川，那儿有我每天清早上学、每晚放学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火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山中杂记·卖书》）

为了专攻医学，他决心和文学“断缘”，先后把自己的藏书分送给朋友，最后只剩下《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两部书。离冈山的前一天，因为经济拮据，曾想把这两部书卖去，但终因遭到书贾的白眼而没有舍得卖去。在回寓的路上，经过冈山图书馆，他决定把这两部书无偿地赠给图书馆，使它们放到一个恰当的地方。他认为即使不遇知音，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好得多。特别是这冈山图书馆，对郭沫

若说来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处所，他说：“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诺莎、太戈尔、伽比儿、歌德、海涅、尼采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把书交付了之后，他感到无比的快意。（《山中杂记·卖书》）

6月 《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介绍易卜生。载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易振英的《易卜生传》等介绍文字及罗家伦、胡适合译的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和陶履恭译的剧本《国民之敌》等。

七 月

本月 赴东京，向四川经理员绰号叫张麻子的预支7、8两个月的官费，以备交大学第一学期的学费和购买参考书。

八 月

本月 在福冈。大学官费每月从四十八元增至七十二元，但四川经理员却不按通例逐月扣还借款，而是从本月起，整扣下来，所以郭沫若在8月底算就仅仅得到二十四元的增加额。写信去质问并请求通融，对方不予答复。于是只好将自学参考书押进当铺。在9月将近一个月中，连吃饭都需要节省。（《创造十年》）

下旬 一天中午，在福冈市东头的风景区“千代松原”遇见一高预科时的同学张资平。张资平，广东梅县人，当时亦在日本留学，学地质，比郭沫若小三岁。那时候，郭沫若住在乡下，对国内的新闻杂志很少有机会看到，即使看到，在郭沫若看来

也是“不屑于看的”，他“最不高兴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认为“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真是“乱七八糟”。在和张交谈中，感到应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以提倡新文学。酝酿合作者时，“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是只有四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后来郭沫若回忆说：“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谈话，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可以说是“创造社”的“受胎期”。（《创造十年》）

九 月

下旬 一天，成仿吾、陈君哲、徐诵明等来访。本年5月，日本留学界为反对“中日军事协约”，全体罢课约两周，并作出全体回国的决议，成仿吾也是因为风潮而回国的，最近，刚从国内回到日本。为了减轻郭的经济负担，成仿吾邀郭沫若一家租房同住，正在为生活所愁的郭沫若，听到这一提议真是喜出望外，安娜也欢喜得几乎流出了眼泪。

次日，搬至新居，和成仿吾以及随他由国内来日本治眼病的陈老先生同住。于是，安娜“便成为陈老一门的家政妇，我自己便成为听差。但我当时是怎样的感激的呵！”后来郭沫若还到医院为陈老先生陪夜。

郭沫若和成仿吾住在一起，曾把8月间同张资平的拟议向他谈过，成很赞成，但感到人手太少，“主张慢慢地征集同志，不要着急。”（《创造十年》）

十、十一月间

作小说《骷髅》，这是郭沫若写作的第一篇小说。作品的情节是日本渔师斋藤寅吉盗奸一名门之女滨田爱子的尸体，最后被侦探破获处以绞刑。在写法上，采用欧洲旧式的小说体裁，全系第一人称，最后以“我”梦见一架“骷髅”而惊醒作为结尾。这是作者最初的习作，曾“苦心惨淡地推敲了又推敲”，草稿也更易过两三次，对这作品他自己“是很得意的”，读给别人听，也受到称赞，认为落尾的一个梦收得最好。但把小说投寄给《东方杂志》，却未能发表，于是在收到退稿后，“把它火葬了”。促使郭沫若创作这一小说的起因是解剖实习。医科大学人体解剖课一个礼拜有三次，八个人解剖一架尸体，尸体分成八部分，头部，胸部连上肢，腹部连大腿，胫连脚，左右各一人。第一学期解剖筋肉系统，第二学期解剖神经系统，在约略四个月的期间要把这全身的两项系统解剖完。因为左右是对称的，所以一个人便须解剖八架尸体。把尸体陈列在锌板制的长桌上，“就象围着吃西餐的一样，拿着刀子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碎了。最后是象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时间久了，药水浸过的尸体也发起霉来，甚至腐化，但当“清理出了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在这样奇怪的氛围气中，“创作欲活动了起来”，终于写成了这篇小说。（《创造十年》）

10月 《新青年》第5卷第5、6号先后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文中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初步宣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十二月

31日 因成仿吾10月间回东京继续学业，陈老先生亦于11月中旬回国，郭沫若全家遂迁至附近临海的一处小房子里居住。搬家的夜晚，颇伤感，作绝句“松原十里负稚行”等数首，叹祖国的不幸，悲自身的遭遇，表现了作者当时的矛盾心境：“自己好象很超脱，但在事实上却很矜持。自己觉得是很热心的爱国志士，但又被人认为了‘汉奸’。在无可如何之中便只好得过且过”。初见《创造十年》。现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作诗《春节记实》。共三首，第一首即《十里松原》的第二首（“除夕都门去国年”）。第二首即《十里松原》的第三首（“回首中原叹路穷”）。第三首为《十里松原》中所未见，云：“身居海外偷寻乐，心实依然念故乡。想到家中鸡与肉，口水流来万丈长。”（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第88期）

本月 《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提出新文学应是“人的文学”，反对封建专制的“非人的文学”。要求把人从封建的“兽道、鬼道”这种“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

同月 《每周评论》创刊。此系报纸型的周刊，与《新青年》相配合，着重宣传新思想，把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和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共出三十七期。26期后，由胡适主编。

本年 译诗《悄静的海滨》(德 海涅)。见《三叶集·致宗白华书(3月30日)》。收《沫若译诗集》。

同年 又译《海涅诗选集》，因联系出版问题未获结果而作罢。

同年 作诗《咏博多湾》，描写博多湾的明朗和宁静。见《自然之追怀》一文，载1934年4月10日《现代》月刊第4卷第6期；现收《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

又 作七绝《无题》二首，咏太宰府。郭沫若回忆道：“太宰府在福冈的近处，为菅原道真(注：菅原道真，845—903，曾为日本首相，被谪贬后，有汉诗与和歌等遣怀之作)的谪居所，又是梅花的名胜地。当梅花盛开时节，游人非常杂沓，所以如果要到那儿去做一日的清游，还是择个秋日或冬天更为适当。由于地址离福冈市较远，所以不大到那儿去玩。然而在福冈居住的五年间，每年也有去徘徊一二次的。”见《自然之追怀》一文，载1934年4月10日《现代》月刊第4卷第6期；现见《中国现代资料丛刊》第3辑。

同年 3月1日、3月31日、5月25日、7月2日、8月24日、11月均有致父母和元弟信。(《樱花书简》)

一九一九年(二十八岁)

一月

作诗《新月与晴海》，抒写幼儿的天真，自然的美丽，载1920年2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致宗白华书(2月16日)内，初收《沫若诗集》。

本月 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方面举行的“和平会议”在法国巴黎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七个国家，但会议被美、英、法等国所操纵，所谓“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出要求：废除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时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并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如放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但美、英、法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至4月底，最后决定，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且决定把德国的在华特权让日本接管。这样，中国不但没有收回任何权利，相反，遭到了帝国主义更沉重的压迫，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同月 《新潮》月刊在北京创刊，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主编。刊物一开始，就以“文艺复兴”相标榜，反对封建文化思

想,宣传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提倡文学革命。发表了不少新文艺作品,是新文学史上较早出现而很有影响的刊物。

二、三月间

作小说《牧羊哀话》,通过叙述朝鲜少年男女的恋爱悲剧,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小说虽有“概念的描写,科白式的对话”(《牧羊哀话》文后附志,见《沫若文集》第5卷)的缺点,但感情丰富,真切动人,其中的几首牧羊歌和《怨日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作者回忆说:1919年,“从正月起,在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且尘上来了。我的第二篇的创作《牧羊哀话》便是在这时候产生的。”小说“在结构上和火葬了的《骷髅》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只利用了我在1914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铁路渡日本时,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小说写成后,“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险”,但仍想找机会发表,就寄给在司法部里做事的大哥,请他改削,帮助发表。结果受到大哥的责备,说求学期间“不应该沾染文墨上的事情”,并一字不易地又给寄回来了。后来,在《学灯》附刊上看见了有一种《新中国》杂志在北京刊行,看那广告上也登载着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的翻译,就大着胆子投寄去了。编辑回信称赞小说“笔酣墨饱,情节动人,决于本志第7期登载”。但自从接到那封信以后便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隔了许久,经去信询问才得到了两本杂志的报酬。小说载《新中国》1919年11月第1卷第7期,初收《星空》第3辑。收入《星空》时作过校订,并附跋语。

2月 林纾继《论古文之不当废》之后,又作《论古文白话之

相消长》，大肆鼓吹文言文，极力反对提倡白话文的运动。3月初，林纾又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后又发表《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

他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指责北京大学放纵师生“覆孔孟，铲伦常”，并恣意攻击白话文。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即蔡鹤卿）在《公言报》上发表《答林琴南书》，拒绝林纾的指责。

三、四月间

作诗《春愁》。诗系文言，五言十句。收《女神》。

3月 3日、4日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批判封建复古主义者。

同月 刘师培、黄侃等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

同月 世界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作了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报告和《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选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执行机关。

四月

本月 译小说《蜜柑》（日本 芥川龙之介），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同月 30日,日本掠夺我山东的权益,被“巴黎和会”明文规定下来,北洋政府准备签字,对此,全国人民无比愤怒,纷纷集会抗议。

同月 《每周评论》刊载《共产党宣言》的节译。

同月 胡适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发表《实验主义》一文,鼓吹杜威的实验主义。

同月 日本《改造》杂志创刊。

五 月

本月 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的直接起因是“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主权的蔑视。本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惩办签订二十一条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冲击曹宅,痛打了章宗祥。五四运动,又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各地群众纷纷结社集会,罢课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6月3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罢工,加入抗议运动,就使五四运动具有了新的性质,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

同月 《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同月 日本《解放》杂志创刊。

同月 1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头目杜威来华,在中国作了两年零两个月的巡回讲演,遍历十一省,宣传其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学说。他的讲演录被译成中文广泛地登载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觉悟》等著名报刊上。

六 月

本月 和福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进步团体，名叫夏社。郭沫若回忆说：“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几个人自由的捐献，买了一架油印机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团体让郭沫若和陈君哲写文章，但陈只做了一篇文章，便于暑假期中回国，于是只剩下郭沫若一个人做了油印机的保管者和使用者，在假期中发过几次稿子。

同月 译小说《马粪面》（日本 葛西善藏），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暑 假

因学医枯燥无味，加以两耳重听听课困难，想改入文科，为佐藤富子所反对。此事使郭沫若十分反感，他说：“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与此同时，却对歌德的《浮士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造十年》）

开始零碎地翻译《浮士德》，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共鸣。他说：翻译它，“也就好象我自己在做文章”，“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象出自我自己的心境”。（《创造十年》）

7月 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刊《少年中国》(月刊)，学会成员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刊物上观点很不一致，但做了不少宣传新文化的工作。

同月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研究问题”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

针对胡适的论点，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告诉人们无论反动派叫嚷什么过激主义、洪水猛兽、异端邪说，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主义，进行我们的宣传。

同月 《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主编。

八月

25日 作诗《箱崎吊古》。载《黑潮》1920年1月第1卷第3号。

夏秋之间

作诗《鹭鸶》。载1919年9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九月

本月 为了做通讯宣传工作，订阅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

那时，正值五四运动以后，《时事新报》很有革新气象，它的文艺副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

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什么人往欧洲。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①郭沫若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于是便把1918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去了。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创造十年》）

11日 发表新诗《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

儿呀！你快看那海上的银波，
夕阳光里的大海如被新磨。
儿呀！你看那西方山影罩着纱罗，
儿呀！我愿你的身心象海一样的光洁，
象山一样的青疏！

这是郭沫若最早发表的诗，写作时间待考，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首次署名沫若。《女神》、《沫若诗集》中均未收，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

作品的发表，给郭沫若以很大鼓舞，他说“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这便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创造十年》）

本月 作诗《浴海》。赞美海洋，赞美太阳，并表示自身沐浴在大海中，要“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为建设新的社

^① 此即康白情《送慕韩往巴黎》，载1919年8月29日《时事新报·学灯》。

会而努力奋斗。载1919年10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本月 《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张东荪、俞颂华、梁启超编辑，中华书局出版。

九、十月间

作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歌颂“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表现了诗人改造旧世界，迎接革命洪涛的宏伟气魄。载1920年1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十月

10日 发表杂文《同文同种辨》。载《黑潮》1919年第2期，署名郭开贞，文末有七绝一首：“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神州。”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情绪。

同日 发表诗《风》。载《黑潮》1919年第2期，署名开贞。

同日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中老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苦诉学枷智梏束缚的那一场独白。题为《Faust 诗钞》。

18日 发表诗《两对儿女》，抒发了受到日本少年歧视后的不平心情。虽然此事已隔了三年，但那个日本少年的“针一样的眼光，还刺着我的髓。”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现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20日 发表诗《某礼拜日》，共四节，抒写和成仿吾同游郊

外的情景和相互间的友爱，他们“坐在草地儿上，戴着头上的阳光，望着濑户内海的海岸。海上的山，天上的云，同在那光明中灿烂。望不断的一片稻禾，戴着嫩黄的金珠，学着那海潮儿在动颤。”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署名沫若，未收集。现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23日 发表诗《火葬场》、《晚步》。均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同日 发表诗《梦》。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

本月 发表专论《抵制日货之究竟》，署名夏社。载上海太平洋学社出版的《黑潮》（月刊）第1卷第2期。

十一月

6日 作诗《一个破了的玻璃茶杯》。有感于插养在一只破玻璃杯中的花草的枯萎而作，抒发自己“饱尝着——忏悔底清羹，寂寥底滋味，悲哀底烹调”的思绪。载1920年2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署沫若，未收集。现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9日 致陆友白书。载《黑潮》1920年1月第1卷第3期通讯栏。

14日 发表诗剧《黎明》。剧作中塑造了某先觉的儿女形象，这是对促使祖国新生的先锋战士的诗意写照。他们“要涤荡去一些尘垢秕糠”“要创造出一些明耀辉光”。同时，他们没有忘记“还坐着囚笼”，“还藏在幽宫”的兄弟姊妹们，唤起他们来共同创造新生活。为了这新生，儿女们向太阳高唱，请太阳“放射你的金翦，射尽那些天狼！射尽那些天狼！”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署沫若，未收集。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

〈女神〉集外佚文》。

24日 发表诗《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十二月

3日 发表译诗《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美 惠特曼)。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新诗集》，1920年新诗集社编印。

郭沫若接触惠特曼是在本年9月以后。正当他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看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其中介绍了三位艺术家：法国的雕刻家罗丹、画家米勒、美国的诗人惠特曼，因此又使他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说：惠特曼“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创造十年》）这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第二段时期，这“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高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创造十年》）

12日 为和儿二周岁作诗一首。初录于1920年2月15日致田寿昌信中，收《三叶集》。

20日 发表诗《夜步十里松原》，写松原夜景。赞美太空是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清寥”，那无数的古松，象高擎着双手在赞美天宇。载《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本月 作诗《雪朝——读Carlyle: 〈The Hero as Poet〉的时候》。卡莱尔(1795—1881)，英国十九世纪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作为诗人的英雄》是他的一篇论文。郭沫若在诗中赞美大自然，赞美“英雄诗人”，赞美“无产阶级诗人”。收《女神》。这首

诗使成仿吾很喜欢，他尤其喜欢“我全身心好象要化为了光明流去”那一句，还把它引在自己的处女作《流浪人的新年》开首。（《创造十年》）

同月 月末，作诗《地球，我的母亲》。诗人颂扬“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裸母”、“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载1920年1月6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本月 李大钊在成都《星期日》“社会问题号”周刊发表《什么是新文学》，提出真正的新文学必须做到革命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相结合，光是用白话作文，并不算新文学。

本年 作诗《夜》。赞美“黑暗的夜”，歌颂它那拥抱全人类，淹没一切“贫富、贵贱、美恶、贤愚”的差别的自然力。载1920年1月13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又 作诗《死》。把死看作是寻求“真正的解脱”的路，想见它而又怕它，反映了作者受消极思想影响的矛盾心情。载1920年1月13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又 作诗《Venus》。通过对罗马神话中的Venus女神的咏吟，表现了对美与爱的赞颂。但诗中坟墓的比喻是诗人低沉的情绪的流露。载1920年1月13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又 在福冈，作五言古体诗《春寒》，写在异乡的凄凉悲苦生活。初录于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中。载1920年2月13日《时事新报·学灯》。收《三叶集》。后又收于《潮汐集·汐集》。

同年 年底，作诗《电火光中》三首（一，怀古——贝加尔湖畔之苏子卿；二，观画——Millet的《牧羊少女》；三，赞像——Beethoven的肖像）。载1920年4月26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1928年2月1日曾作过修改。

同年 年末，作诗《匪徒颂》，以强烈的反抗精神，热情歌颂了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表现出“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这首诗是“对日本新闻界的愤慨，日本记者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为抗议‘学匪’的诬蔑”，诗人写了这首颂歌，针锋相对地热情讴歌了一切古今中外的“匪徒”。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歌颂了“实行‘波尔显微克’的列宁”，表现了对俄国的向往。《匪徒颂》等诗明显地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载 1920 年 1 月 23 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同年 1 月 2 日、11 月 9 日均有致父母信。（详见《樱花书简》）

一九二〇年(二十九岁)

一月

4日 发表诗《晨安》。这是诗人对祖国的颂词，诗中以激动的心情，向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南方的扬子江、北方的黄河，向万里长城，向畏敬的Pioneer（先驱者）致以热烈的问候。诗歌气势磅礴，感情激昂，一连喊出了二十七“晨安”。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5日 发表《三个Pantheism》（即《三个泛神论者》），赞美泛神论者庄子、斯宾诺莎、加皮尔。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6日 夜，作小说《他》。载1920年1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现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10日 作短篇小说《鼠灾》。以作者和安娜勃谿了一场的生活事件为题材，描写穷留学生的遭遇。全篇采用心理描写，色调比较暗淡。载1920年1月26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现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18日 致宗白华书。宗于本月3日来信称赞了郭沫若的诗作，并把当时正在日本的田寿昌（田汉）介绍给郭沫若。郭沫若在信中谈到对艺术的看法，主张写诗要有真情实感：“我想我们

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信中还谈论了孔子、歌德的哲学思想，最后认为，歌德的著作，应多多介绍和研究，“因为他处的时代——‘狂飙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我们应该接受他的经验的地方很多！”载1920年2月1日《时事新报·学灯》。初收《三叶集》。经删节后收于《文艺论集》，题作《论诗(二)》。

同日 译唐代诗人李白的《日出入行》诗，见本日《致宗白华书》，载1920年2月1日《时事新报·学灯》。收《三叶集》。

20日 作长诗《凤凰涅槃》(一名《菲尼克司的科美体》)，借凤凰集香木自焚而后再生的故事，象征旧中国必然毁灭，新中国必然诞生。诗中，通过凤凰自焚前的歌，深刻地揭露了黑暗的现实。指出：“生在这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这样的旧世界必须毁灭，这样的旧世界必须埋葬！

诗人向往光明，追求理想，迫切要求创造新世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凤凰死而复生，正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我的作诗的经过》；又见《创造十年》)。诗人以满腔的热情，赞美一切美好的、新的事物；并以辛辣的讽刺对庸俗、丑恶的事进行了有力鞭挞。

长诗以神话为题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对新生活的向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朦胧的革命理想，虽然这种理想还不够明确，但他的热烈追求、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与“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一致的，此诗发表后，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凤凰涅槃》和《女神》中其他一些诗篇，气势澎湃，风格粗犷豪放，明显地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参见本谱1919年12月3日条)。诗载1920年1月30日、31日《时事新报·学灯》。

收《女神》，1928年1月3日改削，后又收《沫若诗集》。

中旬 作诗一首（《读〈少年中国〉第1、2期感怀》）。见1月18日《致宗白华书》，载1920年2月1日《时事新报·学灯》。收《三叶集》。

22日 发表诗《解剖室中》。以尸骸隐喻死了的腐朽的社会人生，要求“快把那陈腐了的皮毛分开！快把那皮中用的筋骨离解！快把那污秽了的血液驱除！快把那死了的心肝打坏！快把那没感觉的神经宰离！快把那腐败了的脑筋粉碎！”快唱新生命的欢迎歌！迎接医国医人的新黄岐的诞生。最后，向新生命、新少年、新中华三呼“万岁”。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现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25日 作诗《心灯》。表现了努力向上，追求光明的思想。载1920年2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26日 致宗白华书，对已发表的《凤凰涅槃》一诗的《小引》的内容作了个别更正，载1920年2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

29日 作诗《芬陀利华》（白莲花），“为赞颂天王星发现者赫里尔氏（Herschel）之妹伽罗琳（Caroline）而作”，因为她帮助哥哥完成了科学上的发现。载1920年2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现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30日 作诗《天狗》。诗人以天狗自喻，吞吐月、日、星球，以至全宇宙；以光自比，称自己是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X光线底光、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诗中的“我”，气魄宏伟，心胸开阔，热情奔放。这个“我”，是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化，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载1920年2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本月 作诗《岸》。载1920年2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改题《沙上的脚印》。

又 作诗《登临——独游太宰府》，表现同妻儿登山游玩时的情趣。载1920年3月6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此诗最初见2月25日《致田寿昌书》内。

又 作诗《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诗中，他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而把自己比作活埋在地底多年的煤，他怀着深情对祖国唱出了“恋歌”：“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这首诗，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正如诗人所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创造十年》）载1920年2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本月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国社会思想问题。

二 月

13日 给田寿昌（即田汉）写信。这是郭沫若接田9日来信后首次同田的通信，此信本日未写完。

14日 作诗《叹逝》。载1920年2月26日《时事新报·学灯》。收《沫若诗集》。最初见1920年2月15日致田寿昌信中。现收《沫若文集》第1卷集外（一）。

15日 续写致田寿昌书。收《三叶集》。信中介绍了自己与安娜恋爱同居的经过。

同日 致宗白华书。收《三叶集》。

同日 译诗《献诗》（德 歌德）。见本日《致宗白华书》，收《三叶集》；又收《德国诗选》。

16日 致宗白华书，论诗歌创作。作者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他又说，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那种“矫揉造作”，“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关于诗歌的形式，郭沫若说：“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反对因袭他人已成的形式。结尾时更指出：“诗的创作是要创造‘人’”。初收《三叶集》。后收《文艺论集》，有删节。题作《诗论（三）》。

23日 发表文艺短论《生命底文学》。文中表现了“一切物质皆有生命”的泛神论思想；提出了追求真、善、美的文学、“个性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创造”，要求“破除一切的虚伪、顾忌、希图、因袭”的愿望。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现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25日 复田寿昌18日来函。信中建议“组织个‘歌德研究会’”“把全部的歌德，移植到我们中国来的主张”^①。收《三叶集》。

29日 作诗《日出》，赞美物质文明，歌咏现代都市。载1920年3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春

经宗白华的劝说，继续翻译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开首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载1920年3月20日

^① 此仅为设想，后来未付诸实施。

《时事新报·学灯》，初收《浮士德》。早在去年夏天，郭沫若曾零碎地翻译过《浮士德》，“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象出自我自己的心境。我翻译它，也就好象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场独白的译文在那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发表过。”（《创造十年》）

三 月

5日、6日 致田寿昌书。谈自己的家庭情况，并讨论有岛武郎的《三部曲》。收《三叶集》。

15日 发表《〈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附白》，载本日《少年中国》（月刊）第1卷第9期。

又 发表译诗《暮色》、《掘宝者》、《艺术家的夕暮之歌》（德 歌德）。载本日《少年中国》（月刊）第1卷第9期《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一文中；现收《沫若译诗集》。《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一文系田寿昌所译，文中所引录的歌德的诗歌大多是郭沫若代译的。

同日 二儿博孙诞生。因经济困难，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均自己动手。

19日 发表诗《光海》。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同日 田寿昌由东京来福冈访问。郭陪同他游博多湾。田在谈话时说，“将来要做一个 dramatist，要做一个 critic”，还邀请郭沫若一起翻译介绍海涅。

20日 与田寿昌同读《浮士德》。

21日 与田寿昌同读海涅诗集。

22日 和田一起将同宗白华之间的通信编成一集，取名《三叶集》。又，陪同田赴附近名胜地太宰府游览，途中诗兴葱茏，

“触景生情，即兴占吐”。在山麓合影一张。田称郭象席勒，又象歌德。

同日 在太宰府梅花树下放歌一首，题《梅花树下醉歌——偕田寿昌兄再游太宰府》。赞美自然，“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宇宙的本体”，高喊“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初见本月30日致宗白华信中，收《女神》。

23日 陪田寿昌游览福冈市中的名胜。在参观“工业博览馆”时，见有“朝鲜馆”、“台湾馆”、“满蒙馆”的排列，十分愤慨，禁不住眼泪往肚子里吞，暗自怒问：“怎么不更建设些‘曹家馆’‘段家馆’呢？”田寿昌则说“不忍再见”。当晚，田离去。

30日 致宗白华书，详尽地描述了本月同田寿昌一起外出畅游的情景和兴趣。收《三叶集》。

又 译诗《云鸟曲》（英 雪莱）。初见本日致宗白华书，收《三叶集》。后经作者修改润色，重新发表于《创造》季刊1923年第1卷第4期雪莱纪念专栏。收《雪莱诗选》。

本月 作诗《泪之祈祷》，为《浮士德》中葛泪卿而作。初见本月30日致宗白华信中。收《三叶集》。

同月 有致父母信。（见《樱花书简》）

本月 27日《申报》突破层层封锁，刊登了苏维埃政府在去年7月25日发布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中苏友好关系的宣言（《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3、4月间，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发电致谢，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二次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中的精神。

同月 胡适的《尝试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白话诗集。

四 月

18日 作诗《巨炮之教训》。诗人从放在“博多湾的海岸上，十里松原的林边”的日俄战争时期留下的“两尊俄罗斯的巨炮”得到联想，同情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对美、日帝国主义国家出兵西伯利亚表示强烈的抗议。诗人把托尔斯泰和列宁作对比，同情托尔斯泰，但更倾向于列宁，诗中具体地描述了这位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向人们发出号召：“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哟！为正义而战哟！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载1920年4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后在1928年出版的《女神》中，将该诗中的“自由”、“人道”、“正义”等词改为“阶级消灭”、“民族解放”、“社会改造”。

四、五月间

作诗《新阳关三叠》。诗人赞美大自然，把大自然作为生命的泉源，宇宙的自我表现。诗人赞美太阳，要从太阳身上汲取力量：“太阳哟！你便是颗热烈的榴弹哟！我要看你‘自我’的爆裂，开出血红的花朵。”载1920年7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此诗发表时副题为《宗白华兄砚右》；诗前有序：“白华，你走了之后，我沉默多时了。此诗文是我破默底第一声”。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爆发期”，他曾说：“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但到1920年的4、5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创造十年》）

又 此时，郭沫若曾想回国。他后来回忆说：“就在宗白华往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自己却是想跑回中国。……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我那时候想回国去，也并没有多么大的野心。就象泰戈尔的《园丁集》里那个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园丁一样，我是只想跑回中国去，在那儿的中、小学校里当一名国文教员”便心满意足了。（《创造十年》）

五、六月间

作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声称自己是个偶像崇拜者，崇拜自然界的一切伟大现象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伟大创造。但又大胆宣告：“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要破坏、摧毁一切旧事物的热烈情绪。诗中有着明显的泛神论思想。他是以泛神论为武器，否定一切权威和偶像，否定一切旧事物和旧制度，要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奋斗。载1921年2月14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5月 和田寿昌、宗白华的三人通信集《三叶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集中收郭沫若的信七封，是作者最早的文艺论文。正文前引《浮士德》中的一节译诗作为代序。又据郭沫若回忆说：“《三叶集》出版之后颇受一时的欢迎，寿昌便又食指欲动起来，又曾约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叶集》。这个提议是由我拒绝了。”（《创造十年》）

5月 我国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上海等地纷纷举行集会。本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刊登工人生活照像三十三幅，发表李大钊同志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各国劳工运动的情况和全国各地劳动状况，显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的扩大和深入。

同月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出版，为《新青年》向读者推荐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

同月 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地相继出现了同样性质的小组。

六 月

本月 作诗《笔立山头展望》。歌咏了日本工业大都会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和快速的生活节奏。载1920年7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六、七月间

因宗白华自德国法兰克福寄来金字塔画片两张，遂作二诗以致谢，题为《金字塔》。通过对金字塔的描写，歌颂人类巨大的创造力量。载1921年2月13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七 月

10日 因归国心切，别离妻儿，从福冈到门司。想乘船回上海，后因遇到在门司养病的友人贺君，约定7月底一起回国，因

此，又折回福冈。

11日 发表诗《无烟煤》。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19日 自门司回到福冈。

同日 收到《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信，谓共学社拟介绍各国名著，约郭沫若全译《浮士德》。接信后他与安娜均异常高兴，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并决定暂不回国。接着，以四个星期的工夫译完了《浮士德》的第一部，又工整地誊写了一遍，花去了将近一个暑假的时间。原计划再译第二部的，但因第二部更长，更难译，其中游戏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剧的构成过于支离，而那里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对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与现代的不同），使他难忍耐。因此便改变了初志，只译出第一部来印行，第二部暂没有译。8、9月间，曾写信给共学社，建议只译第一部但未获回信。不久，学校也开课了，郭沫若只好把译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等有机会时再来译第二部。后来因遇着了“鼠灾”，三分之一以上的原稿被老鼠咬得粉碎。在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以后，由于受了歌德的影响，此后，陆续写出了一些诗剧，如《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等。他回忆说：“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妥勒尔的《转变》，凯惹尔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赏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些是崇拜歌德的，特别把歌德的‘由内而外’（‘Von I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话做为了标语。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译过了之后的我，更感觉着了骨肉般的亲热。但这一个影响却把我限制着了，我在后来要摆脱它，却费了不小的努力。”（《创造十年》）

26日 作诗《春蚕》。载上海新潮社《新的小说》(月刊)1920年9月10日第2卷第1期通讯栏。收《女神》。编入《沫若文集》时有削改。

26日、27日、29日 分别作诗《岸上》“其一”、“其二”和“其三”。载1920年8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本月 译小说《南京之基督》(日本 芥川龙之介)。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又 译小说《前鹤》(日本 志贺直哉)。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八 月

24日 作评论《论诗》。载上海新潮社《新的小说》(月刊)1920年10月1日第2卷第2期通讯栏《给建雷的信》。

本月 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湖南等地也陆续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同月 《分类白话诗选》出版。该书收集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主要诗作，是初期新诗最完备的选集，共收诗二百三十多首。许德郝编辑，刘半农作序。

九 月

7日 发表诗《霁月》、《晴朝》。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又 发表诗《香午》。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现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又 发表诗《雷雨》。歌颂于雷雨中辟开黑暗、倒坏地狱的一声霹雳闪电。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11日 发表致张东荪、俞颂华、舒新城三先生书。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

23日 历史诗剧《棠棣之花》脱稿。诗剧取材于战国时代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通过聂政、聂莹姊弟在母亲墓前诀别的描写，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诗剧也影射了“苍生久涂炭，十室无一完”的现实社会；控诉了强者欺弱，富者欺贫的不合理现象；对“诛锄恶人”的聂政进行了歌颂。此剧原计划写三幕五场，这是第一幕中的第二场：聂母墓前姊弟诀别。但这“三幕五场”的计划后来并未完成，“最后完成的是五幕剧，此为第一幕，但内容略有不同”（参见《棠棣之花》“附白”和“注②”）。作者回忆说：“我开始做诗剧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仅仅发表了一幕，就是后来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一幕，其余的通成了废稿。”“在《棠棣之花》里面我表示过一些歌颂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诛锄恶人的思想，很浓重地带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创造十年》）诗剧载1920年10月9日《时事新报·学灯》双十节增刊。收《女神》。

30日 作诗《葬鸡》。载1920年10月16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本月 《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1号起）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每期设“俄罗斯研究”专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深入。

十月

2日 作诗《鸣蝉》。载1920年10月17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10日 作政治抒情诗《狼群中一只白羊》并“序”。1920年10月5日，世界日曜学校第五次大会在日本东京开幕。会上当朝鲜老牧师白氏叙述朝鲜沦于外国侵略者手中，人民呻吟于水火之中时，会议主席竟摇铃宣告闭会，对此，郭沫若表示愤慨。他在诗中，向白牧师指出：“世间上哪有什么圣徒？哪有什么宗教？哪有什么自由？哪有什么人道？哪有什么平等？哪有什么同胞？”那些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人是“披着羊皮的狼群”、“敛着利爪的鸷鸟”，对他们不必“悲号”、“祈祷”，需要的是“利剑”、“手枪”、“炸弹”。表现了诗人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痛恨和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全诗集中体现了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坚强的斗争意志。载1920年10月20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13日、22日、24日、27日 分别作诗《胜利的死》（其一、其二、其三、其四），歌颂马克司威尼。马克司威尼是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员，本年8月中旬，被英政府逮捕，囚禁于剥里克士通监狱。他以绝食相抗议，“耻不食英粟者七十有三日，终以一千九百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死于狱”（诗前“小引”）。作者在诗中热情地讴歌了马克司威尼为争取民族自由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并怒斥英政府的暴行。写第一首诗时，马克司威尼正被囚五十余日，写第四首诗时，马克司威尼已被迫害致死。作者在“附白”中说：“这四节诗是我数日间热泪的结晶体。”“如今希腊、波兰均已更生，而拜伦、康沫尔均已逝世；然而西方有第二之波兰，东

方有第二之希腊，我希望拜伦、康沫尔之精神‘Once again to freedom’s cause return!’（请为自由之故而再生！）”四首均载1920年11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此诗原题《胜利之死》。

17日 发表诗《司健康的女神》。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本月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来华讲学，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数理逻辑学讲师，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因公开反对战争而两度被捕入狱。大战结束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表示不满、失望，鼓吹社会改革，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于本月来华，次年7月离开，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新青年》在第8卷第2号、3号曾以主要篇幅介绍其生平和学说，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轰动一时的影响。但由于他当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宣传和平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因此，也使得当时的研究系分子如张东荪之流得以利用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大肆反对社会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接着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等文，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于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续发表了《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和《再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予以驳斥。陈独秀也连续发出了给罗素的信和给张东荪的两封信，批驳他们的论点，并把这些文章和信件连同张东荪等人的文章编辑在一起，题名《社会主义讨论》，刊登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上。由此，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是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

义道路，是用革命的方法还是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大论战。论战持续至1921年。

十一月

23日 作诗《密桑索罗普之夜歌》^①。二子博孙诞生后的第四天，出寿昌来访，郭沫若陪他游玩福冈附近各名胜，以至产后五、六日的安娜因无人照顾，弄得断了奶，而人工哺养的不当又使婴儿发生了食饵中毒症，只得送进大学的病院就医。一家人只好白天、黑夜整日里在病房中守护着一个发高热、因饥饿与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婴儿。据郭沫若自述：这首“《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里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这首诗，“后来因为寿昌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写寄了给他。”（《创造十年》）载《少年中国》1921年3月15日第2卷第9期田汉所译《沙乐美》译文之前。收《女神》。

本月 译小说《阳伞》（日本 藤森成吉）。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本月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出版了《共产党》月刊，刊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的动态。

^① 密桑索罗普 (Misanthrope)，厌世者。

十二月

20日 作诗剧《女神之再生》。借神话传说揭露和控诉当时南北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苦难，以炼石补天的女神作为自己理想的化身，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郭沫若说：“《女神之再生》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创造十年》）女神们所唱的正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她们要“创造些新的光明”、“创造些新的温热”，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让“新造的太阳”去“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并要“时常创造新的光明、新的温热去供给她”。剧末，诗人借舞台监督之口，号召人们：“你们要望新生的太阳出现吗？还是请去自行创造来！”

《女神之再生》、《湘累》和《棠棣之花》都是以神话或历史故事为题材的诗剧，一般合称之谓“女神三部曲”。

郭沫若自己说过：“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下写成的”。这时候，他的诗歌，在内容上仍继续发扬着原有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但诗的风格有所变化。这是他作诗的第三阶段，自称是“歌德式”。那惠特曼式的“第二期的热情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这是诗人的自谦之词，他的诗仍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只是诗歌的形式及其风格有所不同。

《女神之再生》，载《民铎》1921年第2卷第5号。收《女神》。作者回忆说：“这篇诗剧的初稿我寄给郑伯奇看过，又由伯奇转寄了给达夫。达夫用德文做过一首诗给我，我把它寄到《民铎》

杂志去一同发表过”，郁达夫的诗共两节，每节四行。（均见《创造十年》）

此篇原系散文体，后按成仿吾的意见改为诗剧，在《女神》和《文集》中均未署写作时间，《沫若诗集》注明本年12月初稿于日本，1928年1月30日改削于上海。

同日 致李石岑书，就《民铎》杂志第3号胡怀琛的《诗与诗人》一文提出批评。郭沫若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这种内在的韵律，不是“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不是“双声叠韵”等；“内在的韵律”是指“情绪的自然消涨”。并说：“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诗亦对人们的人格发生影响。文章还批评了“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的现象，积极提倡创作。载1921年1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收《文艺论集》，题名《论诗》（一）。1929年7月版改名为《由诗的韵律说到其他》。收入《沫若文集》时题名《论诗三札》（一）。

同日 发表散文诗《我的散文诗》四则——《冬》、《她与他》、《女尸》、《大地的驍》。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27日 作历史诗剧《湘累》。描写爱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后的一个生活片断，表现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现实的反抗精神。作者说《湘累》“是把屈原姊弟优孟化了的”（1921年1月18日致田寿昌信），诗剧中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当时郭沫若生活清苦、身体不好，个人的苦痛加上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使他的积怨通过屈原喊了出来。（均见《创造十年》）载中华学艺社《学艺》（月刊）1921年4月1日第2卷第10期。收《女神》。

本月 胡适对《新青年》大量刊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表示不满，认为“《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写信要求在刊物上“声明不谈政治”。李大钊、鲁迅都反对他的意见。《新青年》开始分化。

本年 暑假，成仿吾在房州避暑，做了不少诗寄给郭沫若，由郭替他集成《海上吟》，后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

同年 下半年，起草一部长篇小说，完成序幕部分。后于1922年9月18日将已完成的这部分改为短篇小说，题为《未央》，发表于当年12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收《沫若文集》第5卷。其余未完成。

本年 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学校予以采用。

一九二一年(三十岁)

一月

11日 作论文《儿童文学之管见》。论述儿童文学的本质和儿童文学的建设。文内还引译了泰戈尔《新月集》中《婴儿的世界》一诗。载《民铎》(月刊)1921年1月15日第2卷第4号。收《文艺论集》。

18日 接成仿吾来信,知成仿吾已和田寿昌商量过办“纯文艺杂志”的事。

又 续写昨日未写完的给田寿昌的信。信中说:成仿吾“去年有信来,说有几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种纯文艺杂志,要约你和我加入”,接着,转述了成当时的意见:“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对于成仿吾的意见,郭沫若说:“我很具同感,所以创刊的建议,我也非常赞成,不消说我们创刊杂志另外还有更大的目的和使命”。载《南国月刊》1930年3月20日第2卷第1期。收《沫若书信集》。又见《创造十年》。

19日 作《屠尔格涅甫之散文诗·序》。载1921年2月16日《时事新报·学灯》。

24日 致张资平书，谈为丙辰学会(中华学艺会)写稿事，并提到戏剧《湘累》的创作情况。载《学艺》1921年4月1日第2卷第10号，题为《郭沫若先生来函》。

本月 周恩来、李富春、蔡畅、陈延年、向警予等同志在巴黎组织少年共产团。

同月 鲁迅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发表著名小说《故乡》。

同月 4日，由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绍钧、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耿济之、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据沈雁冰回忆：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起进行全面革新，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行机关刊物，由沈雁冰主编。至第14卷时改由郑振铎、叶绍钧等主编，直到1932年停刊，是新文学运动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刊物。

二 月

1日 发表诗《太阳礼赞》。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25日 作文艺论文《艺术的象征》。载《学艺》(月刊)1921年5月30日第3卷第1号。未收集。

26日 作诗《春之胎动》。收《女神》。

28日 作诗《日暮的婚筵》。收《女神》。

本月 曾拟往京都，想转入文科大学，后因成仿吾反对而

作罢。

本月 《新青年》杂志因受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的迫害，第8卷第9号延期出版。为逃避敌人的检查，封面上印作“广州新青年社”。1922年新青年社迁至广州，1923年并入上海书店。

二、三月间

听从成仿吾的劝告，终于取消了转学至京大的念头，但是，“烦闷并没有因而打消”。在这段时间里，郭沫若“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踞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这一时期，他读了“佛罗贝尔的《波娃丽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斯华绥的戏剧。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又抬起了头来。”安娜见郭沫若象成了狂人一样，呆在家里几月不进学校，也就同意他弃医回国，另找出路。（《创造十年》）

三 月

31日 正当郭沫若准备动身回国的时候，屋主以要修理、改建房屋为借口，限其一家在一周内搬迁，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几乎动摇了他回国的决心，幸而安娜性格坚强，鼓励他按既定计划行事。

晚，安娜按照日本民间的风俗习惯，煮了红豆饭，烧了一尾红鲷鱼替郭沫若饯行。为了怕白天离家，两个孩子会啼哭，所以选在晚上动身。郭沫若想到今后“丢着一妻二子在后边，虽说

是回国，实际是等于外出漂泊”，尤其放心不下的是“家里人在一礼拜之内不能不另寻巢穴”，为此洒下了悲伤的眼泪。就这样，和在一起生活了四年三个月的安娜，作第一次长久的分离，在雨夜中，从箱崎车站搭车去门司，“心中的感慨就好象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漂泊的前途，凶吉莫卜”。（《创造十年》）

四 月

1日 从门司上船，与神户坐船来的仿吾会合，同船回国。旅途中，为晴明的自然景色所激动。“我那时候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创造十年》）

同日 作诗《归国吟》。以高昂的情调，唱出了新生的欢歌。载1921年4月23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收集时改题作《新生》。

船出海后，遇风雨，因容易晕船，只得躺在三等舱中，趁机阅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等作品。

3日 晨，船到上海海面，忍着眩晕，跑上甲板看海中日出。

同日 作诗《海舟中望日出》，载1921年4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又 作诗《黄浦江口》。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感情：“和平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船进了黄浦江口，两岸的风光的确是迷人的。时节是春天，又是风雨之后晴朗的清晨，黄浦江中的淡黄色的水，象海鸥一样的游船，一望无际的大陆，漾着青翠的柳

波，真是一副活的荷兰画家的风景画。几年来所渴望着的故乡，所焦想着的爱人，毕竟是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慰安的处所。”但是，这样一幅“美好的风景画被异族涂炭了”，帝国主义主宰着黄浦江两岸，“自己的同胞在异族的皮鞭之下呻吟着”。那时“我还没有阶级意识，我只有民族意识”。（《创造十年》）诗载1921年4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同日 抵上海。与成仿吾一起去马霍路（现黄陂北路）泰东书局的编辑所。泰东书局原拟改组编辑部，请成仿吾任文学主任。但从谈话中知道，所谓改组编辑部的事，不过是一场空话，文学主任已由一位姓王的担任，成仿吾等于落进了一个骗局。（《创造十年》）

4日 作诗《上海印象》。写出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旧上海的光怪陆离的景象：“游闲的尸，淫猥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诗人从美好的“梦中惊醒了”，产生了幻灭的悲哀。后来在回忆这段印象时写道：“到了上海了。这儿我虽然是再度刘郎，但等于是到了外国。那时候，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长大的毛线披肩，披在肩头象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却又有极长的袖管，长得快要躲过膝头。那些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带着一个营养不良、栖栖遑遑的面孔，在街头窜来窜去。我在‘走肉行尸’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感觉。街上跑着的汽车、电车、黄包车、货车，怎么也好象是一些灵柩。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时候索性又以不同的意义流出来了”。诗载1921年4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8日 傍晚，与成仿吾乘火车往杭州游玩。在赴杭车上，几个中国的“马路政客”，带着两名妓女在大吃大喝，又闹又笑；而几个西洋人，“都沉默着在拿着一些文件校阅，在他们心目中似

乎除掉自己之外，没有身外的世界”。又有几个日本人“在高谈阔论，时而带着极轻蔑的眼光望着那一群吃喝赌博着的中国人取笑。”“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里又汹涌起来。我愤恨的自然是我们的贵同胞太不争气，同时是连想到中国的政局和国际上的形势；车中的情景便是这时局的一幅缩写图。凡是自己不能够抱一个妓女在怀里的中国人，想来是谁都会痛哭流涕的罢。”（《创造十年》）半夜抵杭州，住清泰旅馆。

同日 作诗《西湖纪游·沪杭车中》（四首）。记在车上的印象和自己的感慨。载1921年4月25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9日 游西湖。并作诗《西湖纪游·雷锋塔下》（二首），抒发了对劳动人民无限崇敬的激情。愿意“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上黄泥舔个干净。”载1921年4月26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10日 继续游西湖，至孤山、湖滨公园等处。作诗《西湖纪游·赵公祠畔》、《西湖纪游·三潭印月》、《西湖纪游·雨中望湖（湖畔公园小御碑亭上）》。分别载1921年4月28日、30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11日 乘火车回上海，在车中作诗《西湖纪游·司春的女神歌》。载1921年5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中旬 译诗《墓畔哀吟》（英 葛雷）。载《创造》季刊1924年2月第2卷第2期。收《沫若译诗集》。1928年乐华图书公司出版。此诗本年曾被人盗刊在泰东书局出版的《新晓》杂志上。（参见本谱本年7月2日条）

本月 游西湖归来的某一星期日，应郑振铎邀，往半淞园公园，同郑振铎、沈雁冰、柯一岑等会面。在此以前，文学研究会组织过程中曾有信致当时尚在日本的田寿昌，提到过请郭

沫若等参加文学研究会的事，田未予回复也未通知郭沫若等，故对郑此次邀请，郭沫若只好答以“现在我又来加入，觉得对不住朋友，所以我看最好是在会外来帮助你们了。”后来，郑振铎还到郭沫若的住所来过几次，同来的有叶圣陶、朱谦之等。（《创造十年》）

同月 发表评论《日本之煤铁问题》。载本月《少年世界》（月刊）日本号增刊。发稿后，因对文章并不满意，想抽回，因已印好而作罢。

本月 国会议员在广州开会，制定政府组织大纲，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于5月5日正式就任。

五 月

2日 作论文《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载《西厢》（歌剧本，元代王实甫原著，郭沫若改作），1921年9月泰东图书局出版。收《文艺论集》。关于改写《西厢记》的事，郭沫若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上海滩上正是旧书新式标点流行的时候，亚东标点的《红楼梦》、《水浒传》等书很风行一时，泰东看了眼红也想照办。我便劝他们标点《元曲》。这个提议立地也就见诸实行起来，但把那位王先生难着了，他把那词曲中的文句标点不断。我自己为填塞提议的责任起见，照着西洋歌剧的形式改窜了一部《西厢》。”（《创造十年》）

26日 作《女神》集的《序诗》，诗中公开宣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表现了他对无产阶级的敬仰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后来他说：那时，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一种内容，并不甚了解。日本人在当时把布尔什维克

叫做‘过激派’。但我当时却想做无产者、想做个共产主义者，这种思想表现在1921年写的《女神·序诗》中。我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了不起的人物，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内容，却很茫然。”（《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见《文学知识》1959年5月号），诗载1921年8月26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女神》。

30日 发表《我国思想上的澎湃城》。载本日出版的《学艺》（月刊）第3卷第1号。此文系未完稿。未收集。

本月 编纂诗集《女神》。改译由钱君胥初译的小说《茵梦湖》（德 施笃谟）。

本月 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创刊，共出八十二期（自1921年5月10日—1923年8月6日），郑振铎等编辑。

六 月

14日 致郑西谛（振铎）信。载《文学旬刊》第9号。

30日 发表史剧《苏武与李陵》（未完稿）的序幕。载本日出版的《学艺》（月刊）第3卷第2号，未收集。

本月 下旬，又去日本。但在福冈仅停留一天，次日便动身往京都。在京都，访郑伯奇、李闪亭、张凤举、沈尹默、穆木天等人。然后，又至东京，访郁达夫、田寿昌、易漱瑜等。在将要离开东京的那天下午，与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在郁达夫的房间里聚谈了一次，议论创办杂志的事。“大家的意思也都赞成用‘创造’的名目，暂出季刊，将来能力充足时再用别的形式”。“这个会议或者可以说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创造十年》）这次赴日，前后大约一星期左右。

夏

作诗《暴虎辞》。诗中塑造了李禹这一宁死不屈、具有反抗性格的形象，并对汉武帝的残暴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收《前茅》，1928年创造社出版，出版时诗前“小序”说：这首诗是1921年夏间的旧诗，“这在形式上和内容与前面诸作均不相伦类，但因为它的精神是反抗既成的权威；我所以不能割爱，也把它收在这儿”。诗末注“1921年8月于日本”，系记忆有误，8月，郭已回国，不在日本。

七月

1日 发表与钱君胥合译的小说《茵梦湖》，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钱君胥是郭沫若的同学，小说的初稿是他译的。因他采用过去平话小说体的笔调翻译，失掉了原作的风格，因此由郭沫若用直译体进行改译。郭沫若后来说：“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我是靠着我自己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出来。”（《创造十年》）该书于1928年修改，改由创造社出版。又，书中收有译诗《林中》、《今朝》、《我的妈妈所主张》三首（施笃谟原作），后抽出收《沫若译诗集》。

同日 从日本回到上海。

2日 作《郭沫若启事》。有人趁郭沫若离沪赴日之机，将他的两篇旧稿取出发表了。一篇是他译的葛雷的《墓畔哀吟》，另一篇是随笔《Love Lane》，郭沫若大不愉快，于是，在回沪的第二天便登出启事，说：“沫若从事文学的述作两年于兹，所有

一切稿件，均署本名，不曾另用别号。今后亦永远抱此宗旨不放。恐有疑似之处，特此先行申明，有昭己责。”载本月3日、4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中旬 得李石岑信。信中转达郑振铎等再次邀请郭沫若等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意见，郭沫若如以前一样回绝了。

又 润改译诗《新月集》(印度 泰戈尔)。这是王独清从法国寄来的译稿，由于郑伯奇的劝说，郭沫若在炎热的夏天，替他润改，原译稿“除掉一些单语单字外，真可以说一钩新月”，残缺不全。(《创造十年》)

下旬 和郑伯奇一起去镇江，游金山、焦山。转至无锡，访朱谦之，在那儿住了一两个礼拜光景，工作不能做，太湖也未去。回沪前一天，和朱谦之、袁家骅等去运河，并一起游泳。(据《水平线下·到宜兴去》又见《创造十年》)。

本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在浙江嘉兴南湖结束。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湖南)、董必武、陈潭秋(湖北)、李达、李汉俊(上海)、刘仁静、张国焘(北京)、王烬美、邓恩铭(山东)、陈公博(广东)、周佛海(东京留学生小组)，还有包惠僧，共十三人，代表全国七十名党员。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党纲和有关的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陈独秀(总书记)、张国焘(组织委员)、李达(宣传委员)为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有了进行革命斗争的最高指挥部。

七、八月间

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系德国歌德所作的书信体小说。描写维特爱上姑娘绿蒂，但她已与别人订婚，爱情上的波折，使维特非常痛苦，最后终因绝望而自杀，表现了个性自由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冲突，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控诉。1774年作品问世后，在欧洲各国流行，影响极大。此书由郭沫若译成中文后，于1922年由泰东图书局初版，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至1932年8月，已印了十五版。

八月

中旬 一天，泰东图书局赵南公来访，要荐郭沫若去安庆法政学校任英文教习并遥领泰东图书局的编辑，郭沫若推荐了郁达夫，并决定即写信把郁由日本请回。自己则打算去日本继续读书。

23日 为朱谦之《革命哲学》一书作序诗，题为《宇宙革命底狂欢》。载《革命哲学》，1921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24日 作儿歌《孤寂的儿》。载1921年8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未收集。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

本月 商务印书馆高梦旦为侄赴日治病之事来访，未遇。

同月 发表诗《演奏会上》、《晨兴》。收《女神》。

同月 16日，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作者的第一部诗集，收诗五十七首，系“五四”前后的诗作，也有少部分

是早年的诗。解放后，经作者修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1卷。

《女神》，是五四时期最富于时代精神的新诗集，出版后，引起了新诗界和青年读者极大注意和好评。闻一多曾热情地作《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两文，热情推崇《女神》，他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并屡次对人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

从此，两人结下了友谊。1922年末，郭沫若从日本发信回国，称赞闻一多的《冬夜评论》等文稿，表示：看了文稿，“……如在沈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蹙然。”这一称赞使闻一多欣喜如狂，他在家书和致友人信中，一再提及此事对自己的鼓舞。当时，《密勒氏评论报》正在征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闻一多决意投郭沫若一票。（见《闻一多全集·三》，书信辑）

九 月

初旬 出席商务印书馆高梦旦举行的宴会，同席的有胡适、郑伯奇、何公敢等。

中旬 郁达夫回到上海后的四五天，郭沫若由上海去日本，郁达夫、郑伯奇、邓均吾、毕瑞生至汇山码头送行。临开船前，发现钱包被窃，达夫、毕瑞生等倾囊相助。郭离开上海时，请郁达夫继续筹办《创造》季刊。

26日 在郭沫若离开上海后的第三天，上海《时事新报》上登出了《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郭沫若是在日本福冈看到的。他感到“旗鼓一张便不能不有实质相副，我始终感觉着同人们

的力量实在并不充足。还有那‘垄断文坛’的话，我也觉得打草惊蛇，而且不免有些夸张”。所谓“还有那‘垄断文坛’的话”，是指郁达夫执笔的《创造》季刊出版广告中，有“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的话。（《创造十年》）

本月 标点改编的《西厢》（王实甫原著），由泰东图书局出版。

本月 党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出版马克思丛书、列宁丛书、Communist丛书。为逃避敌人的迫害，把社址假托在广州，1923年与《新青年》杂志合并。

十 月

4日 作诗《夕阳时分》。收《沫若诗集》。

6日 致郁达夫信。此信与其他二信一起，题名《海外归鸿》，此为第一信。内收5日所作《泪痕》、《重过旧居》，散文《夕阳》，译诗《放浪者的夜歌》（二）（德 歌德）、Seraphine第十六首^①（参见本谱1915年条）等。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沫若书信集》。其中《泪痕》收《沫若诗集》，散文《夕阳》收《辛夷集》，译诗《放浪者的夜歌》和 Seraphine第十六首收《沫若译诗集》。

8日 作诗《创造者》。这是《创造》季刊的发刊词之一，诗中热情地“高赞这最初的婴儿”，“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沫若诗集》。

10日 致郁达夫信。此即《海外归鸿》第三信，载《创造》季

^① Seraphine, 《归乡集》（德 海涅）。

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沫若书信集》。

同日 作诗《南风》。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星空》。

13日 作诗《白云》。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星空》。

14日 作诗《新月》。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星空》。

20日 作诗《雨后》。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星空》。

24日 作诗《天上的市街》。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星空》。

本月 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出版。《小说月报》自第12卷起，经常介绍俄国文学，东、北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对当时处于苦闷和挣扎中的中国知识青年起着一定的启蒙教育的作用，当时他们的这些工作曾受到“重创作”的初期创造社成员的批评。

同月 12日，《晨报》把第七版改为《晨报副镌》，又称《晨报附刊》。（1921年10月12日—1928年5月）

同月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最早出版的白话小说集。《沉沦》等小说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道德的大胆挑战，在当时的青年中起了极大的影响。

十一月

5日 译诗《对月》（德 海涅），见《海外归鸿》第二信。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沫若译诗集》。

6日 译诗《放浪者的夜歌》(一)(德 海涅),见《海外归鸿》第二信。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沫若译诗集》。

同日 致郁达夫信,此即《海外归鸿》第二信。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沫若书信集》。

本月 此前,在日本将准备于1922年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的所有稿件(除郁达夫的《茫茫夜》外),集成寄交郁达夫。在为《创造》季刊出版作准备的过程中,还要继续医科大学的学习,以接受学期终了的考试。“在试验准备和学课的余暇中”,又完成了替穆木天修改王尔德《童话集》的译本,译完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见《创造十年》)

本月 12日,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分割中国的会议。

十二月

8日 作诗《洪水时代》。赞美夏禹以宇宙为家,决心把洪水治平的伟大精神,并把他比喻为“近代的劳工”,说“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表现了诗人的思想正在向前迈进。载《学艺》1922年1月30日第3卷第8号。收《星空》。

15日 在家信中,对元弟谈自己对诗歌的见解,认为“要做旧诗,就要严守韵律,要做新诗,便要力求自然”,“要新就新,要旧就旧,不要新旧杂揉”。还说“诗是表情的文字,真情流露的文字自然成诗。新诗便是不假修饰,随情绪之纯真的表现而表现的文字”。他认为,“做诗——尤其是做新诗——总要力求‘醇化’、‘净化’”,“做新诗总不宜拘于押韵,须知没韵也能成诗,

近代的自由诗，散文诗，都是没有韵的抒情文字”，为了教他的弟弟写诗，还写下了“几则做诗的原则”：

一，要有纯真的感触，情动于中令自己不能不“写”。不要凭空白地去“做”。所以不是限题做诗，是诗成后才有题。

二，表现要力求真切，不许有一毫走眼。

三，要用自己所有的言词，不宜滥用陈套语和成语。

四，不要拘拘于押韵，总要自然。要全体都是韵。

五，作一诗时，须要存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心理。要使自家的诗之生命是一个新鲜鲜的产物，具有永恒不朽性。这么便是“创造”。

六，全体的关系须求严密，不得用暧昧语。……抒情的文字惟最自然者为最深邃，因为情之为物最是神奇不可思议的天机。

七，要有余韵，有含蓄。并谆谆嘱咐他的弟弟，不但要自己领会，而是要用这些原则去教孩子们读书作文。（见《樱花书简》）。

本月 4 日起，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以巴人的笔名开始在《晨报副镌》上陆续发表。作品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国内外有深远影响。

冬

始作诗《好象是但丁来了》等。《好象是但丁来了》、《暗夜》、《冬景》、《夕暮》、《春潮》、《新芽》、《大鹭》、《地震》、《两个大星》、《石佛》等十首。载《创造》季刊1923年2月第1卷第4期，发表时总题为《好象是但丁来了（诗十首）》。收《星空》。此十首诗系作者

本年冬至1922年春夏之交时所作，诗后有“附注”，乃1922年作。

本年 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在日本兴起。10月间《播种人》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开始。

一九二二年(三十一岁)

一月

11日 致父母信。(详见《樱花书简》)

22、23日 作论文《〈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说明翻译此书，是“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第一，是他的主情主义；第二，是他的泛神思想；第三，是他对于自然的赞美；第四，是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第五，是他对于小儿的尊崇。《序引》还介绍了歌德的生平和该小说出版后在青年中引起的强烈反响：“一般青年读者大起共鸣，追慕维特遗风而效学其装束。青衣黄裤的‘维特热’流行于一时。苦于恋爱不自由的青年读此书而实行自杀者有人，自杀之后在衣囊襟袋中每每有挟此小书以殉者”，等等。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收《少年维特之烦恼》。

本月 在列宁领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王烬美、瞿秋白等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

同月 13日，香港海员开始罢工，月底，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3月1日全市工人举行总罢工，人数达十余万人。以此为起点，出现了1922年至1923年的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

同月 《诗》月刊创刊，由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朱自清编，原用中国新诗社名义，后来改为“文学研究会刊物之一”，至1923年5月停刊，共出七期。

同月 “学衡派”的刊物《学衡》月刊创刊，由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吴宓、梅光迪主编。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封建复古主义。1933年7月出至79期停刊（第55期起改为双月刊）。鲁迅于本年2月，写了《估〈学衡〉》一文，给予复古主义者以猛烈的抨击与辛辣的讽刺。

二 月

4日 作诗《星空》。抒发眺望星空而引起的遐想。诗中始而赞美静夜中灿烂星空之美景，继而感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堕落”，禁不住“滔滔流泪”。结尾时诗人“仰望着星光祷告”，“祷告那青春时代再来！”“祷告那自由时代再来！”诗中感情由人间而天上，又从天上而人间，反映了诗人空虚、苦闷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心情。《星空》及这一诗集中的诗歌，写于“五四”以后的退潮期，与《女神》中大部分诗作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所变化，正如诗人自己所说：“要从技巧一方面来说吧，或许《女神》以后的东西要高明一些，但象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沸羹集·序我的诗》）载1922年9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收《星空》。

6日 作《〈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跋语》。载《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未收集。《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系成仿吾所写的短篇小说。

10日 游今津。今津在日本福冈市西，这里是六百四十年前，元军第二次东征时全军覆没的地点，筑有纪念碑、柱，为

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史迹。归来，作散文《今津纪游》，记述今津的景物及历史典故。载《创造》季刊1922年8月25日第1卷第2期，初收《星空》。后收《抱箭集》，现收《沫若文集》第7卷。

三 月

10日 作论文《歌德对于自然科学之贡献》。载1922年3月23日《时事新报·学灯》“歌德纪念号”。

本月 叶绍钧(圣陶)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隔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小市民和教育界生活为题材，主调是暴露和谴责，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同月 俞平伯诗集《冬夜》，康白情诗集《草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四 月

1日 作小说《残春》。写医科大学学生爱牟在医院访友时结识身患肺病的S姑娘的一段遭遇。载《创造》季刊1922年8月25日第1卷第2期，初收《星空》；现收《沫若文集》第5卷。关于这篇小说，1923年3月3日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一文(载《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收于《文艺论集》)中，针对摄生说读后“平淡无奇……没有Climax……没有深意”的批评(见1922年10月12日《学灯》)，指出：“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时的奢望。”“我在《残春》中做了一个梦，那梦便是《残春》中的顶点，便是全篇的中心点，便

是全篇的结穴处。”文中还详细论述了作品的结构。

2日 剧本《广寒宫》脱稿。描写月里嫦娥欢愉活泼的生活，对束缚她们自由的张果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载《创造》季刊1922年8月25日第1卷第2期。收《星空》。

本月 所译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列为“创造社世界名家小说”第三种和“创造社世界名家小说集”第一种。注释中有译诗《春祭颂歌》（德 克罗普遂妥克）一首，后抽出，另编《沫若译诗集》。

本月 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北伐，遣兵入湖南、江西。6月，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后，孙中山于8月中旬离开广州，转道香港，抵达上海。

同月 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等四人组成“湖畔诗社”，出版第一本诗集《湖畔》。

五月

1日 《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正式出版。

《创造》季刊原来预告本年元月1日出版，后来因为等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而愆期，至今日才出版。刊物上印的日期是3月15日，与实际不符。郁达夫2、3月间在上海把稿子发出后，回日本去参加大学的毕业考试，因此，稿件排印后没有亲自仔细校对，排错的字未能一一改正，据有人统计，“一册创刊号的错字在二千以上”。由于泰东书局校对的疏忽，还引起田寿昌的误会。怀疑是郁达夫窜改了他的原稿，使其难堪。后经郭沫若劝说，又查看原稿，系因作者涂抹添改甚多而排错，疑团才得以解除。（《创造十年》）《创造》季刊是大型的纯文艺刊物，

出至第2卷第2期，于1924年2月下旬停刊，共出六期。

《创造》季刊创刊号，署郁达夫编，实为郭沫若所编辑。郭在编辑时，曾作“补白”若干则，其中在张资平所作小说《上帝的儿女们》之后的一条“补白”为首次发表：

“蔷薇花本没有伤人的意志，
但她因为不愿受贪鄙者的攀折，
所以也带了全身的利刺了。”

同日 发表历史剧《棠棣之花》第二幕“濮阳桥畔”。载本日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棠棣之花》，原计划写成十幕，即“屠狗”、“别墓”、“邂逅”、“密谋”、“行刺”、“诀夫”、“误会”、“闻耗”、“哭尸”、“表扬”。1920年，写好前五幕后，因故停顿，“把写成十幕的计划，完全抛弃了”，因已“写成了的五幕中的第二幕（按，即‘别墓’）和第三幕（按，即‘邂逅’）觉得很有诗趣，未能割爱”，前者，发表在1920年10月9日《学灯》双十增刊上，后收入《女神》；后者，即本篇。

本月 1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从此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团结战斗的道路。

同月 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在第2期上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提出“好政府主义”的口号。该刊至1923年10月停刊，共出七十五期。

六 月

24日 作论文《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载《创造》季刊1922年8月25日第1卷第2期。《意门湖》(德 施笃谟)系唐性天译,即郭沫若、钱君胥合译的《茵梦湖》的另一译本。

本月 译《一个体操教员之死》(日本 藤森成吉)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七 月

2日 从日本回国,返抵上海。6月底学校放暑假,由于泰东书局寄来了一百块钱的路费,所以,暑假中又回到上海。首先在马霍路住所的楼上把《创造》季刊第1期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校勘一遍,并着手改版《创造》季刊第1期。不久,便把《创造》季刊的第2期编成。

同日 作诗《白鸥》,怀念成仿吾,见1922年7月10日致成仿吾信。载《创造》季刊1922年8月25日第1卷第2期。收《沫若诗集》。

3日 作《辛夷集·小引》,收《辛夷集》。此文原系英文稿,为无韵律诗,现改译,并作序。《辛夷集》“系现代名家之诗文精选集”,列为“辛夷小丛书”的第一种。正文前有《小引》,后有《编辑大意》,由郭沫若主编,内收他写的《小引》、《鹭鸶》、《岸上》、《“蜜桑索罗普”之夜歌》、《霁月》、《夕阳》、《夜步十里松原》、《牧羊少女》等八篇作品。

6日 为《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改版重印,在郁达夫所写的“编辑余谈”后面,补充说明改版的原委。《创造》季刊该期

重印版于8月上旬出版。

10日 编辑《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

作“补白”十则(缺“之八”，故实为九则)：

①宇宙的核心是悲哀，是寂寞；这是艺术家的幽栖。

②上帝是最悲苦不过的，因为他是绝对的孤独。但是他为消除他这悲苦，才从他的自身表现出这个当前的世界来。

世界是从无聊中产生的。

艺术也是从无聊中产生的。

——我心中的上帝向我如是说。

③美的底流是悲哀的情调。

④古人说：诗是穷而后工，据我想来，也怕是工而后穷。诗是一切艺术的精华，做到至工处是能除去得一切的繁赘，表现出内心中一点灵明的情髓。悟得到这步境地，做得到这步境地，谁还肯与扰攘尘俗争馒头！不欲穷，又何从而得呢？

⑤ 耶稣说：有钱的人想进天国，比象鼻穿过针眼还要难，有学问的人想进艺术之宫，也是如此。

⑥ 概念诗是做不得的，

批评家可以在诗里面去找哲学；

做作家不可把哲学的概念去做诗。

诗总当保得是真情的流露。

泰戈尔的短诗，有多少只是A Phorism，不是诗了。

⑦ 我说诗是写的不是做的。

有些人误解了，以为是言不由衷地乱写；或则把客观的世界反射地誊写。

啊，说话真不容易！

⑨ 龟鳖把脏秽的自己藏在—层坚甲里面，遇着裸体空肠的珊瑚，他们便嘲笑着骂道：

“你们这些不道德的，恶魔的弟子呀！”

⑩ 昨晚梦见泰戈尔

他向我说道：“你们中国诗人，都是些唱戏的猴子。”

我说：“怎么说呢？”

他说：“他们惯会摹仿。东—摹仿，西—摹仿，身上穿的一件花花衣裳，终竟捉襟见肘。”

“哼，笑话！”我愤恨着回答他，“其实你老先生也不过是一条老猴子。你比我们好点的，是西洋人多赏了你几个钱罢了！”

他用手杖来打了我—下，我醒了转来，失悔我毁坏了一个大偶像。

同日 致成仿吾信，信中引录二日所作诗《白鸥》—首。载《创造》季刊1922年8月25日第1卷第2期。

11日 夜，作《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的《编辑余谈》，表示：

“我们是厌恶团体之组织的：因为—个团体便是一种暴力，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末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吧！我们不要什么介绍，也不经什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块儿翱翔吧！”载《创造》季刊1922年8月25日第1卷第2期。

20日 在7月3日郑伯奇给王独清信上写“附言”数句。载《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郑伯奇《致王独清书》之后。

21日 作论文《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去年夏季，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一篇文艺杂谈：《盲目的翻译者》，认为翻译《浮士德》、《神曲》、《哈孟雷特》等书是不经济的事。今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上，万良浚在通信中赞成翻译这些作品，而沈雁冰在复函中则认为“个人研究与介绍给群众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件”，“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郭沫若针对郑、沈的论点而作此文，指出：“我以为凡为批评家对翻译品要下批评时，只能于译品成功之后，批评其动机之纯不纯，批评其译文之适不适，始能因而及其效果，决不能预断其结果之不良，而阻遏人的自由意志。”并认为：“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也不是完全两件事”，要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介绍，翻译则是研究的延续。好的翻译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起到指导读者的作用，这样的译作是“无论在甚么时代都是切要的，无论对于何项读者都是经济的”。最后，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浮士德》确有可以介绍的价值，表示即使出版困难，也准备待译完后自费印行。载1922年7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收《文艺论集》。

本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七、八月间

移居民厚南里。此时，郁达夫已由日本归国，他利用暑假

来到上海和郭沫若同住在民厚南里。而住在附近的张闻天、吴明、汪馥泉等差不多每天都要来一次，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创造十年》）

八 月

2日 作论文《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文中说：“批评如果是对于十恶不善的敌人，自当别论。如其不然，则应当生于一种渊深的同情”。批评家应以“博大的爱情以对待被批评者”，这样的批评“即使辞意峻严，形近攻击，但也可以问心无愧，可以放诸四海而无隐”。针对文学研究会当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说：“文艺如有真实生活的源泉流出”，“都是血与泪的文学。不必在纸面上定要有红色的字眼才算是血，不必在纸面上定要有三水旁边一个戾字的才算是泪。人生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主要的眼目，总要有生活的源泉。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对于所谓的“艺术派”与“人生派”的问题，他说“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和人生无关系的艺术不是艺术，和艺术无关系的人生是徒然的人生”。他反对“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说法，认为“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有大用存焉。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圣籙，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载1922年8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收《文艺论集》。关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后来郭沫若回忆说：那时“已经是有些隔阂了”。“所谓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创造社是艺术派、颓废派，便一时甚嚣尘上起来。”“就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有达夫的《血与泪》的那篇小说写出”，“我也有《论文学之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评坛》的两篇文章，在正式地和他们交

缓。”“我们当时的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文学研究会的人“也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创造十年》）

本月初，郁达夫发起举行“女神会”，纪念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一周年。郭沫若回忆说：“这种聚会在日本是常有的，好事的达夫要把它输入中国。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达夫拉着我到闸北去找振铎，请他们参加”，“振铎高兴地答应参加，并答应要多多邀约些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出席，想借这个机会来组织作家协会。”“女神会”在一品香举行，文学研究会同人中出席的有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黄卢隐等，日本帝大出身的同学也到了不少，席终后还拍照留念。但组织协会的事没有提起。（《创造十年》）

14日 作《卷耳集·序》。说明翻译《诗经》的原由、目的和方法。收《卷耳集》。

与此同时，选译《诗经·国风》四十首。因为第一首诗是《周南卷耳》，所以定名为《卷耳集》。郭沫若说：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在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像的木乃伊。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译这些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使这木乃伊的死像苏活转来。因此，“对于各诗的解释，是很大胆的”，并不囿于“古代的传统解释”。在译述的方法上，不采用逐字逐句的直译，而受泰戈尔所说的译诗“不必是字字直译——原文有时有被省略处，有时有被义释处”的暗示，译得非常自由。《卷耳集》是古诗今译的最初尝试。所译之四十首诗从

本年9月5日——9月26日在《中华新报·创造日》上发表以后，引起文学界的极大注意，《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晨报副刊》都曾发表了许多讨论、评论文章。

18日 发表诗《月下的Sphinx——赠陶晶孙》、《苦味之杯》、《静夜吟》、《偶成》。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收《星空》。文集题名《月下的司芬克司》、《静夜》。

19日 作诗剧《月光——此稿献于陈慎侯先生之灵》。载中华学艺社《学艺》(月刊)1922年10月1日第4卷第4期。收《星空》。《文集》未收。

同日 作散文诗《月下的故乡》。抒写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逆水行舟，搏击风浪的心境。收《沫若诗集》；现收《沫若文集》第1卷“集外”(一)。

28日 作诗《前进曲》。载《孤军》1922年9月15日创刊号。这是为国家主义的“孤军派”所作的一首歌，发表时题名为《孤军行》，代《孤军》发刊词。收于《前茅》。《孤军》月刊是国家主义派的刊物，1922年9月创刊，1925年11月停刊，共出三卷三十期，另附增刊一期。曾琦、何公敢主编，泰东图书局出版。关于和“孤军派”的关系，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政治问题发生了一些关心的，是在这个时候。那时商务编译所里有一批人，便是后来的‘孤军派’，集合起来要出一种政治性的刊物”，“杂志本可以在商务出版，因为不便说话，便托我介绍由泰东刊行，因此我也被视为了准同人之例。在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也列过几次席……我每次都是旁听，并没发言。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总是有点迂阔”。《孤军》出版时，“他们在第一期上请我做过一首歌，便是那首《前进曲》。”(《创造十年》)此后郭沫若在《孤军》上多次发表过作品。

本月 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出版。

九月

3日 离上海去日本。5日黎明抵门司，因检疫之故，在一孤岛上拘留一昼夜。6日登陆乘火车，从门司到福冈。

12日 作《通讯一则》（“给达夫的信”），报道旅途情景。载《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未收集。

18日 修改短篇小说《未央》，并作补记一条。（参见本谱1920年下半年条）

19日 作《哀时古调》九首。作者认为，这几首用古诗格调写出来的诗，“暗示出当时中国的大势和我自己的心理”，诗里“骂了政客、军阀、官僚、党人、教育家，却没有提到在这些傀儡之后牵着线子的人物；追慕了些 Lumpen-proletariat（流氓无产阶级——原注），一跃便想把中国赤化了。横陈在藤睡椅上想赤化，这便是我当时的一个如实的写照”。据作者自己解释：

第一首中的“阮嗣宗，刘伶，自然是夫子自道。对日抚琴的嵇康是在二楼的一室里弹着钢琴的陶晶孙”。第二首写出了在上海时受书店老板束缚、剥削的情景和愤慨的心情。第三首“指的是当时的一批政客，特别是那时的一位‘小徐’（徐树铮）”。第四首“指的自然是当时的军阀”。第五首中“所说的徐娘是指当时的徐世昌”。第六首“是在讽刺当时的国民党，因为一时在联络曹锟，一时又在联络张作霖。”第七首是讽刺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一群“叩头百拜地向北政府请发薪水”的人。第八首表现了除强去暴的愿望，“这仍然是做《棠棣之花》时的情绪。”第九首中“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帜满神州”句，“这儿明白地露出了一个

‘赤’字”。(《创造十年》)载《孤军》1922年11月15日第1卷第3期。收《前茅》。

20日 整理眷清诗十首,总题《榜徨》。这组诗包括《黄海中的哀歌》、《仰望》、《江湾即景》、《吴淞堤上》、《赠友》、《夜别》、《海上》、《灯台》、《拘留检疫所中》、《归来》等,约作于从上海返福冈途中。均载《创造》季刊1922年12月第1卷第3期。收入《星空》时,删去总题。

同日 作《〈木犀〉附白》。《木犀》是陶晶孙的短篇小说。载《创造》季刊1922年12月第1卷第3期。郭沫若在“附白”中说:

“我们在日本由几个朋友组织过一种小小的同人杂志,名叫‘Green’,同人是郁达夫、何畏、徐祖正、刘侗元、晶孙和我。晶孙这篇小说,便是‘Green’第二期中的作品;原名本叫‘Groire en destinee’(相信命运),原本本是日本文,我因为爱读此篇,所以我怂恿他把它译成了中文,改题为《木犀》。……”

23日 作诗《哀歌》。收《沫若诗集》。

30日 作《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①,此即为本月所译莪默伽亚谟《鲁拜集》的序文。论文和译诗一百零一首均载《创造》季刊1922年12月第1卷第3期,文后有“附白”一则。1923年译诗经修订后出单行本,题名《鲁拜集》,论文则写入译诗前的《导言》内。论文又收《文艺论集》。1958年11月23日论文收入《沫若文集》第10卷时作者在文前作了如下的说明:“这篇文章本是《鲁拜集》的序引,在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诗集》中,我已把

^① 莪默·伽亚谟(1048—1123),波斯大诗人,天文学家,著名的四行诗集《鲁拜集》否定来世和宗教信条,谴责僧侣的伪善,宣扬享乐和自由。诗中充满哲学意味,含有唯物主义因素,但不少诗篇带有悲观厌世色彩。

第一章删去了。这儿仍然保留着它，以表示我在三十几年前所
想不通的思想。”

本月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响导》周报创刊，蔡和森主
编。

同月 《读书杂志》(系《努力周报》增刊)出版，出至1924年
2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同月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新俄国游纪》)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1924年6月又出版了《赤都心史》。
这是我国最早反映十月革命后苏联情况的作品。

同月 周瘦鹃、王钝根等将《礼拜六》杂志复刊，发表艳情故
事。早期的代表作有《玉梨魂》、《美人福》，中期有《荒江女侠》，
后期主要是黑幕小说。

十 月

3日 评论《反响之反响》脱稿。包括：一答《努力周报》；
二答《文学旬刊》；三答一位未知的台湾青年；四答程宪钊君等四
则。答《努力周报》是针对胡适而发的。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
1卷第2期上发表《夕阳楼日记》，批评“国内新文学家的不真挚
的态度”及余家菊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的错误。接着，
胡适在9月17日《努力周报》第20号的“编辑余谈”《骂人》一文中
批评创造社“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尤其讽刺郁达夫，说郁达夫的
译文“几乎句句是大错”，甚至说还有“全不通”的地方。郭沫若
在本文中大量材料详细地论证了胡适的译文比郁达夫错得更
多，大煞了胡适的风景。答《文学旬刊》是回答沈雁冰和郑振铎
的。答一位未知的台湾青年中，随文赠诗一首，借日本海边被

伐倒的堆着的木头，抒发自己怀念祖国的心情。载《创造》季刊1922年12月第1卷第3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0卷“集外”。《文集》中无第四则。

9日 作散文《背着两个十字架》。希望拔去插在人民心中十字形的利剑，斩毁人民背上的十字架。载1923年10月10日《中华新报·创造日》。

十一月

11日 作《〈可怜的少女〉附白》。《可怜的少女》是赵邦杰的短篇小说。郭沫若在“附白”中说：“这篇处女作，我觉得她是很可爱的，他的描写的手法虽不免粗率，不免有流于概念的地方，但他的精神是很严肃的，他的态度是很真挚的，他对于旧礼制和习俗的批评很能使我们共鸣，篇中有些地方很能使我们读了不能不受感动。我因为爱这一篇，但为全篇统一上起见，有几处不免稍稍加了些添改，志此望真如君见谅。”载《创造》季刊1923年2月第1卷第4期。

12日 作诗《黄河与扬子江对话》。通过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以拟人化的手法，揭露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指出必须“施行大手术”和“毒菌”们作战，把那“菌队”们扫除得干干净净，中国才有希望。强调要以正义战争“反对那不义的战争”，诗的结尾号召中国人民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开展“中华民族大革命”，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载《孤军》1923年第4、5期合刊。收《前茅》。

23日 作诗剧《孤竹君之二子》，写孤竹国二王子伯夷、叔齐不愿继承王位，逃往首阳山上靠薇草生活的故事。作者虽然揭露现实是“铁狱铜笼”，到处是险狠、阴贼、贪婪；诅咒万恶不赦的

夏启，“在公有的天下中创下家天下的制度”，“种下了无穷无际的罪和不幸”，但是，诗人追怀太古，赞美“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表示要“离群索居，独善吾身”，到首阳山上“靠着自然的恩惠过活”。甚至认为人们“回到这自然中来”，过那“纯粹赤裸的野兽生涯，比在囚牢之中做人还胜”。这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矛盾和弱点。对于这一作品，作者自己曾有过论述，他说：“《孤竹君之二子》在初本想写达夫和我在四马路上醉酒^①的那一晚上的事情，是想用写实的手法写成小说的。”开始时，“本打算写出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挨饿时的心理”，同时“想借伯夷、叔齐的史影来暗射当世，因此在《孤竹君之二子》尚未构成之前，我却得着了《哀时古调九首》的副产物”。又说：“《孤竹君之二子》浓厚地带着虚无主义的色彩，记得邓中夏批评过，他希望我少做那一类的文章，多做《棠棣之花》一类的东西。其实两篇都是一种倾向，只多少有些消极和积极的不同罢了”（《创造十年》）。关于邓中夏的批评，见《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邓中夏说“郭沫若君颇喜用古事做新诗新剧，这是对的，有人讥消他‘迷恋骸骨’，那就未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了。不过郭君所作，如《孤竹君之二子》，如《女神》等等，命意为我所不赞成；假如他的作品，尽象《棠棣之花》，那就好了。所以我对于郭君技术上大体赞成，而思想上却希望他更进步。”（《中国青年》1923年12月22日第10期）诗剧载《创造》季刊1923年2月第1卷第4期，有“附白”一则。收《星空》。剧中伯夷的唱词以《伯夷这样歌唱》为题，后抽出，编入《沫若诗集》，并作了修改。

本月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改组国民党，发表宣

^① 系1921年夏季的事，参见《创造十年》。

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十二月

4日 译《雪莱的诗》毕，并作《小序》。所译诗包括《西风歌》、《欢乐的精灵》、《拿波里湾畔书怀》、《招“不幸”辞》、《转徙》二首、《死》、《云鸟曲》、《哀歌》等。其中《云鸟曲》系1920年的旧译，这次作了修改润色。《雪莱的诗》后有郭沫若编辑的《雪莱年谱》及“附白”。“附白”说：“这篇年谱大抵是根据内多精一氏的‘Shelley no Omokage’一书编成的，其中关于作品方面的梗概介绍及简单评语是我自己读后的印象。”诗、文均载《创造》季刊1923年2月第1卷第4期；现收《沫若译诗集》。

8日 作诗《〈诗十首〉附注》。载1923年2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未收集。

24日 作《献诗》。诗人自喻为是“一只带了箭的雁鹅”，象“受了伤的勇士”，“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仰望着星空的闪闪的幽光，从中感受“无穷的安慰”。此诗比较形象地反映了作者这一时期的思想，也最能表现《星空》这一诗集的特点。收《星空》。又，此诗1928年收入《沫若诗集》时，曾改名为《星影初现时》。

又 作《〈牧羊哀话〉附记》。收《星空》。

本月 上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出版。本期系由成仿吾编辑，郭沫若的译作有小说《未央》、诗《徬徨》（十首）、评论《反响之反响》、翻译《波斯诗人裴默伽亚谟》（译诗一百零一首及作者介绍）等，此外尚有“通信”一则，“附白”三则。

本月 《歌谣周刊》创刊，北大歌谣研究会编，出至1925年6

月停刊。1936年4月复刊，出至1937年6月止。

本年 文学研究会初期的新诗选集《雪朝》出版，选了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等早期诗作一百八十多首。

一九二三年(三十二岁)

一月

6日 作诗《上海的清晨》。深刻揭露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坐汽车的富儿们在中道驱驰，伸手求食的乞儿们在路旁徒倚。”诗中惊叹：“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面的是劳苦人的血汗与生命！”同时预示着革命的风暴必将来临：“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载1923年5月20日《创造周报》第2号。收《前茅》。

又 作诗《励失业的友人》，对失业者表现了深切的同情，要大家振作精神，把旧社会这“万恶的魔宫打坏！”载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3号。收《前茅》。

17日 致父母信(详见《樱花书简》)。

22日 三儿佛孙出生。

同日 致父母信，告以佛儿出世的消息，并说明取名的原由(详见《樱花书简》)。

二月

1日 《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出版，由成仿吾编辑。该期刊有郭沫若的译作《孤竹君之二子》、《好像是但丁来了》(诗十

首)、《雪莱的诗》、《雪莱年谱》等。此外，尚有署名“沫若”的“曼衍言”(——关于文艺批评上的思索——)数则：

曼衍言之一

奇花异木可以娱目畅怀而不能充饥果腹！欲求充饥果腹，人能求诸稻粱。

贪鄙的果品贩卖者哟！

不要骂牡丹为什么不结果实罢！

曼衍言之二

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何况不是毒草。

人们重腹不重目，毒草不为满足人们的饕餮而减其毒性，“自然”亦不为人们有误服毒草而致死者遂不生毒草。

“自然”不是浅薄的功利主义者，毒草不是矫漓媚世的伪善者。

曼衍言之三

世人有骂农夫田里不种花，园丁园里不种谷的吗？为什么说到文艺上来，偏会骂出一句“华而不实”？

其 四

小孩子不晓得天球的深厚，他以为只是一张白纸，他便说他浅薄。

小孩子除自己的玩意儿，自以为是有聊之外，看见大人所作的事体都觉得是无聊。

凭着自己浅薄的主观妄下批评的人，往往会堕入这种误区。

曼衍言之五

多与一人相待，或多读一种著述，我们就好象多游历了一个境地。

人们各把各的心境开示给你：

有的是明媚的花园，有的是未垦的荒地，有的是峻险的嵯岩，有的是虾蟆跳跃的清水粪坑，下藏杀人的洪水。

其 六

自然界中桃花是红的，杨柳是绿的。

人事界中桃花会变为碧绿，杨柳会变成猩红。

不怕你千变万化，桃还是桃，柳还是柳。

其 七

视官的色盲，有的辨不出红绿。

精神上也有许多色盲的人。

19日 夜，作诗《我们的花园》。纪念《创造》季刊创办一周年。诗中倾吐了对艺术生活的酷爱和对受社会环境压迫的愤懑，表示：

“虽说仍将不免有风霜雨雪，

不免有侵袭你，蹂躏你的杂草害虫，

但是它们的权威终不过是日出之前的焰火。

我们相信永远的阳春会有来时，

我们愿把 Muses 之神永远留伴着你！”

载 5 月上旬出版的《创造》季刊第 2 卷第 1 期卷首，未收集。

28日 作三幕历史剧《卓文君》毕。通过对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描写，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热情地

歌颂了妇女的觉醒和反抗。卓文君私奔相如的传说，由于违背了“从一而终”与“在家从父”的封建教条而为历来的封建卫道者视为是不道德的事。剧中把卓文君处理成公开出走，从正面来肯定她的行为是有道德的。而写这一剧本的重要的动机，更在于表彰卓文君“不从父”的反抗行为，赞美她是“不从父”的“很好的标本”。这是向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大胆挑战。剧本发表后，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的欢迎，但也遭到封建卫道者的攻击。例如，当时浙江绍兴的女子师范学校因上演这个剧本，竟闹起了很大的风潮。县议会的议员老爷们，以为大伤风化，竟扬言要开除学校的校长。此事闹到省里，“经许多教育大家审定，以为本剧确有不道德的地方”，并作出“决议”，禁止中学以上的学生演出这一剧目。但是，卫道者们的禁令没有能起到作用，相反，有更多的学校上演《卓文君》。（见《后记》，收《沫若文集》第3卷。）剧本原载《创造》季刊1923年5月第2卷第1期。内有“附白”一则，说明“此剧本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并摘录了有关文字。又说：“以相如文君事谱为戏曲，余所见则有清人黄韵珊著《当炉镪》传奇一部，对于词曲有趣味的人可读。”初收《三个叛逆的女性》。此剧后曾作过修改，载1931年8月北京《晨报》副刊。

本月 封建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镇压举行大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屠杀革命烈士林祥谦、施洋等，是为“二七惨案”。

三 月

3日 作论文《批评与梦》，谈文艺批评。认为文艺批评家应

深切的了解作者与作品。如果说“文艺是天才的创作”，那么，“批评也是天才的创作”。又说，“文艺的创作譬如在做梦。梦时的境地是忘却肉体、离去物界的心的活动。”而“文艺的批评譬如在做梦的分析，这是要有极深厚的同情或注意，极锐敏的观察或感受，在作家以上或与作家同等的学殖才能做到。”文章针对摄生对小说《残春》的批评，提出了反批评。（参见本谱1922年4月1日条）载《创造》季刊1923年5月第2卷第1期，收《文艺论集》。

本月 从日本九州帝国医科大学毕业。他回忆说：“一九二三年三月，在福冈足足住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我，算把医科大学弄毕业了。但终因自己的听觉的不灵，做医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抛弃的。”郭沫若决心回国从事文学活动。（《创造十年》）

四 月

1日 初次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动身回国。

同日 作诗《留别日本》。把日本比作是“一座文明监狱”，表现了终将“把这座世界的铁牢打倒”的决心。载《孤军》1923年5月9日第1卷第8、9期合刊《五九纪念号》。收《前茅》。

2日 到达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里。成仿吾移住至亭子间而把前楼让给郭沫若。不久，郁达夫也带着夫人和龙儿由安庆回到上海。

12日 作论文《讨论注译运动及其它》。针对吴稚晖在《就批评而运动注译》（连载于4月1日至4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一文中主张用注释进行翻译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从一国文字之中通晓得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专靠认识他的字面便能成功的。一种文字有它的一种气势”。“理想的翻译对于

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载《创造》季刊1923年5月第2卷第1期，文前有“小引”。现收《沫若文集》第10卷“集外”。

15日 复闻一多信，感谢闻一多对自己译文的指正。载5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闻一多所作《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一文之后。

18日 致成仿吾书。收《沫若书信集》。

本月 与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共同署名发表《创造社启事》，揭露“赵某假本志编辑员之名，在南通及商务印书馆小说界社方面，招摇撞骗”的行为。

本月 《辛夷集》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列入《辛夷小丛书》第一种，由郭沫若主编，内收作者诗、散文、译文等八篇，正文前有《小引》，后附《编辑大意》。

四、五月间

作论文《生活的艺术化》，这是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讲演。主张“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养成一个美的灵魂。艺术家应置“功名、富贵、成败、利害于不顾，以忘我的精神从事创作”，这样，“他的作品自然会成为伟大的艺术，他的自身自然会成为一位天才”。讲稿由柳亚藩等记录。载1925年4月12日《时事新报·艺术》第98期。

五月

1日 与成仿吾着手筹备《创造周报》。4月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三人曾“在谈笑之间决定了一个路线”；不托人找

工作而情愿过“笼城生活”，从事文学活动。接着，又在泰东书局编辑所楼上商议出版《创造周报》。此事酝酿已久，只是担心人手不足，不敢贸然行动。对于出周刊，三个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没有决定一个发刊的日期。本日清晨，郭沫若从外边回来，对成仿吾说“喂，我们的周报干起来罢：我在电车上得了一首诗，倒可以当发刊词”。就这样没等郁达夫回来^①，就干起来了。以此来纪念《创造》季刊出版一周年。在出版的广告中说：“画家Millet是没有礼拜日的。我们也是没有礼拜日的，我们没有可以礼拜的偶像。我们在犹太人的安息日上只有努力创造。朋友哟，我们只有努力创造。请看我们创出的这个新的创世纪！”（据成仿吾：《一年的回顾》，见《创造周报》第52期，又参见《创造十年》）

同日 作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上做起”。此诗是《创造周报》的发刊词，载《创造周报》1923年5月13日第1号。未收集。

同日 起译《查拉图司屈拉》（德 尼采），并作译者《附识》。《附识》说：尼采的思想前几年已喧传于国内，但他的著作还不曾有一部完整的译出，现在准备从德文原文来翻译。译文自本月13日起分期载于《创造周报》1923年5月至1924年1月第1—6，11—14，16—19，21—28，31，33—34，39号，每期一节，登至第2部第4节止，共二十六节，未译完，后于1928年6月由创造社汇集出版单行本。（参见本谱本年11月29日条）

2日 在上海大学讲演，题为《文艺之社会的使命》。认为

^① 郁于四月下旬回富阳。

“文艺是社会现象之一，势必发生影响于全社会”，但又认为“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讲稿由李伯昌、孟超合记。载1925年5月1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收《文艺论集》。

3日 译诗《迷娘歌》(德 歌德)。摘译自歌德的长篇小说《回廉迈司特游学时代》。载《创造周报》1923年5月13日第1号。收《沫若译诗集》。

上旬 《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出版。此期由成仿吾编辑。载有郭沫若的诗《我们的花园》、历史剧《卓文君》、论文《批评与梦》、《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及“附白”等。此外，还有署名“沫若”的“曼衍言”十则。

①垂钓者呀！

无知的鱼儿虽然容易受欺，
但是潮水是不循情的；
注意着你自己的脚跟罢！

②潮水来了的时候，

沿河的木杵都在点头，点头，
潮水退了，木杵睡了，——
鞠躬尽瘁的木杵哟！
可怜你被人们利用了！

③弄潮儿！

你看看超在你头上的月亮罢！
她的一圆一缺才是潮水的一涨一落。

⑤顾名思义是中国人特别可夸的天赋：

自然主义的一个名词在中国人的脑精中，

你以为起的是一种什么感应？

他们在默念着陶渊明的诗起——

诗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⑥“中”之一字误尽了中国。

蝙蝠主义的中国人，妥协主义的中国人，
他们惯会执两用中，于中取利。

从容中道的骆驼们哟！

你们的负担太重，你们的架子太大了！

⑦要冷就冷如冰，要热就热如火，

我最恨的是半冷不热自诩温柔者流！

⑧人类原是造物的最劣等的创作，

掩护自己短处如象掩盖粪坑一样的人们呀！

不怕你们就是西施，我也要掩鼻而过了。

⑨中国人爱用现成语。

看见别人的作品中多悲凉的情绪，他不
讨究其悲戚的来源，破口一句批评便
是“无病呻吟”。

看见甲乙两文人在辩论一种事理，他不
考察谁是谁非谁曲谁直，破口一句批
评便是“文人相轻”。

老气横秋的中国人哟！

你们在说话之先，请先把你们鼻梁上的
那副古式眼睛取下！！

⑩人生只是一场悲剧，

你们应该悲不胜悲的媚妓们！

不要把佯欢假笑来做买卖罢！

⑪朋友！

无病呻吟的人，
比倚门卖笑的娼妓如何？

17日 复胡适函。胡15日致函郭沫若、郁达夫，提到与创造社同人一年余来的纠纷，表示“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的旧有的或新的友谊”。郭即以此函作答〔《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他后来回忆道：“……《周报》发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里面有我的《卓文君》，达夫的《采石矶》，不期然地同时刻薄了考据家，把胡博士骂我们‘浅薄无聊’的话来发挥过一下。就在那时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对于我们的反攻采取出了一一种求和的态度。他由亚东书局送了一封写给我和达夫的信。”“我们得了他的信，同时也就回了他一封。我是劝他把提倡白话文时的精神恢复起来提倡气节”。（《创造十年》）

18日 译所作论文《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宣告：“中国的政治局面已到了破产的地位。”“我们现在对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们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要把资产阶级的“恶根性和盘推翻”。最后，响亮地喊出：

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我们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们反抗藩篱人生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们反抗由以上种种所产生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们反抗盛容那种情趣的奴隶根性的文学。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
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

文后的作者“附白”说：“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在本月25日要出一次英文的《支那介绍专号》，该报驻沪记者村田氏日前来访，要我做一篇关于我国新文学的趋向的文章。我得仿吾的帮助做了一篇‘Our New Movement in Literature’的短论寄去。我现在把他自译成中文，把初稿中意有未尽处稍补正以发表于此，我想凡为我们社内的同志必能赞成我们这种主张，便是社外的友人我们也望能多来参加我们的运动”。载《创造周报》1923年5月27日第3号。收《文艺论集续集》。郭沫若后来曾把本文称为“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特的文艺论”，并说：“不过自从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日本的新闻界也就不敢再找我了”。（《创造十年》）

20日 论文《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经成仿吾译成中文发表。载《创造周报》1923年5月20日第2号。收《文艺论集》。原稿为日文。

同日 作《论中德文化书——致宗白华书》，载《创造周报》1923年6月第5号。收《文艺论集》。

又 译诗《五月歌》（德 歌德）。载7月26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收《沫若译诗集》。

25日 致戈乐天信，驳斥戈对创造社的攻击。戈乐天是仙台二高学生，后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去年11月他在《批评翻译的批评》一文中攻击创造社“勉强借创造之名，发表未成熟的作品”，其实，他连《创造》杂志都没有看过。载1923年5月30日《时事新报·学灯》。

27日 作诗《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唱出“你厚颜无耻的自然哟，你只是在谄媚富豪！我从前对于你的赞美，我如今要一笔勾消。”表现了诗人对泛神论的否定。收《前茅》。

又 作诗《力的追求者》，表现了诗人与过去所喜爱和追求的情趣宣告决裂：“别了，低回的情趣！”“别了，纤巧的花针！我

要左手拿着‘可兰经’，右手拿着剑刀一柄；”载《创造周报》1923年6月3日第4号。收《前茅》。

又作诗《枪恼的葡萄》。表示今后“不再迷恋”“矛盾万端的自然”，宣告和旧的决裂。载1923年7月23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收《前茅》。

又作诗《朋友们枪聚在囚牢里》。对囚牢般的社会表现了无比愤慨，发出了“我们到兵间去吧！我们到民间去吧！”的呼声。载《创造周报》1923年6月30日第8号。收《前茅》。

六 月

8日 作《论翻译的标准》。批评张东荪在翻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载《创造周报》1923年7月14日第10号。未收集。

9日 作诗《黑魃魃的文字窟中》，对排字工人的痛苦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载《创造周报》1923年6月16日第6号。收《前茅》。

又发表致钱蔚华信，驳斥钱为戈乐天《批评翻译的批评》一文所作的辩解。载本日《时事新报·学灯》。

13日 作论文《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对梁启超、胡适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载《创造周报》1923年6月23日第7号。收《文艺论集》。

14日 作《向卫天霖为〈创造〉季刊封面作画致谢》。载《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改版本。

16日 作《暗无天日的世界》。以致成仿吾信的形式，驳斥张东荪对创造社的攻击。指出张东荪利用手中掌握的“印刷机关”和“新闻纸”，不但“广告自己”，而且，以“‘莫须有’的文艺批评诬人欺世”，是个“暗无天日的世界”。载《创造周报》1923

年6月23日第7号。现收《沫若文集》第10卷“集外”。

同日 发表《〈唯一者与其所有〉序》(德 斯迭纳)。载《创造周报》第6号郁达夫所作《Max Stirner 的生涯及其哲学》之后,篇名题《我的分内事不放在什么上面》。

22日 作历史小说《鸕鹚》(即《漆园吏游梁》)。本篇取材于《庄子》的《秋水篇》,通过庄周游梁的故事,赞扬了庄子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精神,对惠施主张实利主义,重视利禄的观念进行了讽刺。载《创造周报》1923年7月7日第9号。收《塔》。1936年收入《历史小品》时题名《庄周去宋》。1947年收入《地下的笑声》时,改题《漆园吏游梁》。

24日 作《〈关于各列果良历之计算〉附白》,载《创造周报》1923年7月7日第9号。《关于各列果良历之计算》系张资平所作。

本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讨论了和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

同月 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出版。从本期起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主编。本期为《共产国际号》,并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卷首,刊登了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

上半年

作《无抵抗主义者》,讽刺林谿修谈“恢复约法”鼓吹“裁兵”的滥调。林谿,又名植夫、灵光,福建人,日本东大农科毕业生,原是安那其主义者,后转为国家主义派。《创造周报》创刊后,他以灵光之名曾在该刊连续发表过几篇给青年的信,由于

后来的稿件中颇多“要求恢复约法，要求裁兵的滥调”，故把稿子退还给他；他于是在《孤军》杂志上撰文攻击郭沫若。郭因作这一篇“笑剧式的短品”，予以反击。载《洪水》半月刊1926年3月1日第1卷第12期。收《沫若自选集》，现收《沫若文集》第10卷“集外”。发表时文后有“附记”。“附记”作于1925年2月24日。《沫若文集》第10卷文后注作1924年2月24日，误。

七 月

3日 作寓言《寄生树与细草》。讽刺那些依附于军阀的无耻文人。载《创造周报》1923年7月14日第10期。收《沫若创作集》。

又 作论文《论道德与良心》。载《创造周报》1923年7月7日第9号。未收集。

12日 作三幕历史剧《王昭君》毕。剧中描写了王昭君鄙视宫廷的荣华富贵，憎恨皇帝的骄奢淫逸，不愿受封，宁愿出塞和亲的叛逆性格，热情歌颂了这一具有反抗精神的妇女形象。载《创造》季刊1924年2月第2卷第2期。收《三个叛逆的女性》。

中旬 应《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之请，决定为该报编一文艺副刊，定名为《创造日》。初时，郭沫若意欲拒绝，因为该报政治上属于政学系，后因成仿吾、郁达夫极想有一种日刊来和文学研究会竞争，并望能发表一些外稿，于是便同意了。刊名系郭沫若所提，“那标题画的木板画在黑暗之中闪出了一些电光的”，也是郭沫若所画。（《创造十年》）在本月14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10号上，创造社刊出“特别启事”，宣告了《创造日》即将诞生。

14日 作《背着两个十字架》。这是《创造日》的“代卷头语”。

文中，对民国以来的国家状况表示不满，形容国民身上如背着两个十字架，“国家的存在已经是人民的一个十字架了，我们人民的心上还如受苦圣母一样插着一柄十字形的利剑，这是我们的国民所特有的双料的十字架。”他希望民众起来，“把插在心中的利剑抽了出来，把你背上的一个十字架斩毁！”载1923年7月21日《中华新报·创造日》。

20日 应邀赴高梦旦的二女高君箴与郑振铎的订婚宴会。

22日 译诗《牧羊的哀歌》（德 歌德）。载1923年7月24日《中华新报·创造日》，收《沫若译诗集》。

23日 作《〈卷耳集〉自跋》。强调研究文学必须重视原著，要“从作品本身去求生命”。收《卷耳集》。

30日 发表译诗《无限的悲哀》（英 道生）。载本日《中华新报·创造日》。收《沫若译诗集》。

31日 发表译诗《湖上》（德 歌德）。载本日《中华新报·创造日》。收《沫若译诗集》。

本月 1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之一《前锋》月刊创刊。

同月 21日《创造日》创刊。该刊作为《中华新报》的副刊，由创造社编辑，主持者是郁达夫、成仿吾和邓均吾。

八月

10日 作历史小说《函谷关》毕。通过老子入关的故事，揭示他虚伪、卑鄙、欺诈的本性。载《创造周报》1923年8月19日第15号，收《塔》。后改作《老聃入关》、《柱下史入关》。

12日 发表诗《自然》、《瘦死的春兰》。表现自己回国后的悲凉心情。载本日《创造周报》第14号，题作《诗二首》。收《沫若

诗集》。

21日 作论文《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所说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儿子，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虽是“尊重描写而贱视摹仿”，但仍未“脱掉摹仿的畛域”；十九世纪的自然派、象征派、印象派等，也都是摹仿的文艺，他们都不提“创造”。作者认为“二十世纪是文艺再生的时代；是文艺再解放的时代”，“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并对德意志的表现派“寄以无穷的希冀”。载《创造周报》1923年8月26日第16号。收《文艺论集》。

23日 作《〈茵梦湖〉出版改版序》。收《茵梦湖》第6版，1923年10月泰东书局出版。

24日 译诗《森林之声》（德 希莱）。载1923年8月24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收《沫若译诗集》。

26日 复孙铭传信。答复孙铭传对自己所译雪莱的诗提出的批评。郭沫若在复信中说：“我对于翻译素来是不赞成逐字逐句的直译”，原文中的字句“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载1923年8月31日《中华新报·创造日》，题作《答孙铭传君》。文后有“附识”。

27日 作论文《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文章节译了未来派关于诗歌的宣言并介绍其有关文艺的主张，指出未来派和自然主义一样，“已经是属于过去的了”，认为现实的一切，我们不但不能全盘接受，而且要以最高的理想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进人类的幸福。载《创造周报》1923年9月2日第17号。收《文艺论集》。

28日 夜，作小说《月蚀》。作品通过“我”带妻儿观看月蚀的描写，表现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强烈反抗，

对黑暗现实的无比痛恨和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抒情气氛。载《创造周报》1923年9月2日、9日第17号、第18号。收《星空》。

本月 《卷耳集》由泰东图书局出版，收《诗经》今译四十首，前有《序》，后有《自跋》，这是我国第一部《诗经》今译的集子。

本月 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新潮社出版，列入“新潮社文艺丛书”。

夏秋之间

作诗《失巢的瓦雀》。通过两儿捉雀的描写，触景生情，感叹自己也如“失却了巢穴”，飘泊在异乡，在这“冷酷的人寰”无处安身。收《沫若诗集》。

九月

4日 作论文《艺术家与革命家》。论述革命和艺术的关系。认为“任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艺术家以他的作品来宣传革命，也就和实行家拿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的贡献”。最后要求青年“做自己的艺术的殉教者，同时也正是人类社会的改造者”。载《创造周报》1923年9月9日第18号。收《文艺论集》。

9日 发表译诗《月明》（法 维尔莱尼）。载本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18号《论译诗》文内。《论译诗》系成仿吾所作。收《沫若译诗集》。

12日 作随笔《文艺上的节产》。谈艺术作品的创作规律，

强调艺术作品的产生“需要有适当的酝酿”，“有一定的怀胎期”；艺术不是照相，艺术是“由内部自然发生的”，只有经充分的酝酿，才能产生出好作品。文中还特别引用与推崇列宁的“宁可少些，总要好些”的思想。载《创造周报》1923年9月16日第19号，收《文艺论集》，收集时改题《文艺的生产过程》。

24日 作散文《味爽》。写天将明未明之时被臭虫咬醒的情景。文章以臭虫喝了人血还诡称自己是“爱和平的族类”来暗喻社会现实。载《创造周报》1923年9月30日第21号。收《沫若创作集》。

25日 译诗《秋》（印度 伽里达若）。译诗前附有关于作者的简介。载《创造周报》1923年9月30日第21号成仿吾所作《秋的介绍》一文内。收《沫若译诗集》。

26日 译诗《北门》（诗经·国风·邶风）。载1923年10月12日《中华新报·创造日》。

本月 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出版。

同月 日本关中大地震。

同月 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逝世。

秋

作《中华全国艺术协会宣言》。在“宣言”中，愤怒地指出：“世运的杌隉，国度的倾邪，是制度不良所致”，并公开宣称“二十世纪的今日已经是不许私产制度保存的时候了。二十世纪的今日的艺术已经是不许特权阶级独占的时候了。我们要把艺术救回，交还民众！”载《创造周报》1923年10月7日第22号。文末有作者附识：“这篇宣言是朋友们托我做的。虽然已在报章上发表过几

次，但仍不免有错落，现在把它改正了转录于此。”收《文艺论集》，题名《一个宣言》（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作）。

十 月

3日 作论文《天才与教育》。载《创造周报》1923年10月7日第22号。收《文艺论集》。

11日 作论文《太戈儿来华的我见》。表明自己对请泰戈儿来华演说的看法。认为聘请一位名人来演讲，不能“只是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如“乡下人办神会，抬起神像”在街上走一阵，事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抬神像的人，因此而“得了不少的利益”。文章详述了自己接触泰戈儿的作品的过程，对泰戈儿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泰戈儿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太戈儿的思想的全部。”作者认为现在世界上根本的病因在于“私产制度的束缚”；按唯物史观的见解，改革经济制度，“是解决世局的唯一道路”。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载《创造周报》1923年10月14日第23号。收《文艺论集》。泰戈儿于翌年4月来华。

14日 午后，同刚从东京回来的F君谈论东京地震的情景，对日本当局在地震后迫害朝鲜人和本国劳动人民的暴行深表愤慨。C君（即周全平）来访，他是农业学校毕业的青年，在东大农场当小伙计，因投稿而相识。

同日 作《沫若白事》一篇。告“赠我《告赈日灾者》一文的朋友”。载《创造周报》1923年10月14日第23号。未收集。

15日 周全平又来访，成仿吾在座。周、成谈起自身婚姻的“失意”，三人颇有同感。（参见《百合与蕃茄》）20日左右，周再次来访。

18日 作论文《国家的与超国家的》。载《创造周报》1923年10月20日第24号。收《文艺论集》，1925年光华书局出版。1930年6月《文艺论集》重新编订改版时删去，《沫若文集》亦未收入。作者在《文集》第10卷的《前记》中说：“《国家的与超国家的》则因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太浓厚了（年轻时，我有一个时期也曾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故不愿意再使谬种流传”。

20日 发表诗《白玫瑰》。载本日《中华新报·创造日》。

23日 发表译诗《屠勒国王》（德 歌德）。载本日《中华新报·创造日》。

24日 作论文《批评——欣赏——检察》。载《创造周报》1923年10月28日第25号。现收《沫若文集》第10卷“集外”。

下旬 一天清晨，《中华新报》总理殷柱夫来访，说“报馆的经费支绌”，希望“把《创造日》结束”，郭与成仿吾商量后欣然赞成。

30日 作论文《我对于〈卷耳〉一诗的解释》。谈自己对该诗的理解，并就其中的两处解释，答复曹聚仁在《读卷耳》一文中的指摘。载1923年11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收《文艺论集》。

31日 作《〈创造日〉停刊布告》。内称：

“我们的《创造日》本来是在荒漠中出生的一株小花，自开自谢，本来少人过问，本来无所关心，但我们深恨没有力量可以使荒漠成为良田，我们也没有力量可以使他独立以至于永远；我们只好忍心，我们只好听他在荒漠中萎谢。

但是，朋友们哟！一种潜在在宇宙中发为事功以后，永远有消灭的时期。我们的创造日虽只有这一百余日的生涯，但我们

相信在我们小部分的关系者心中，在我们小部分的爱读者心中，他如象种子中含的胎芽一样，他是依然活存，而且必有一日迸出地层，奋发参天的时候。朋友哟！我们请暂抑着悲哀，同声唱他的薤露。

凤凰虽已化成灰，
 凤凰不曾死。
秋菊虽已凋残尽，
 花已成种子。
创造日哟！创造日哟！
你是不死，不死。
 永远不死！

这儿摇着的葬钟，
 唱着的悼诗，
是你复活的预期，
 再生的颂词。
创造日哟！创造日哟！
你是不死，不死，
 永远不死！

此文于两天后载于11月2日《中华新报·创造日》，宣告了《创造日》的结刊。又载《创造周报》11月4日第26号。

《创造日》自本年7月21日创刊以来，共出一百期，历时一百零四天。

本月 诗歌散文集《星空》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内收作者1921年至1923年间所作的诗歌、诗剧和散文，共分三辑，第一辑收诗三十一首，第二辑收诗剧三篇，第三辑收散文四篇，另有献诗一首，书前引康德“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一节作为题

词。编入《文集》时，只收诗和诗剧共三十四篇（包括献诗），散文另编入散文部分。

本月 20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由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编辑。1927 年 2 月停刊，共出一百五十期。

十一月

1 日 作论文《瓦特·裴德的批评论》。介绍英国文艺批评家瓦特·裴德（1839—1894）文艺批评的理论，文中节译了他的《文艺复兴》的序论。载《创造周报》1923 年 11 月 4 日第 26 号。收《文艺论集》。

3 日 至吴淞路访周全平，顺道至北四川路伊文思书店浏览书籍。归后，写散文《百合与蕃茄》，至 12 月 4 日脱稿。文中记述了和周全平的相识经过与交往。载《创造周报》1923 年 12 月 2 日、9 日、16 日第 30、31、32 号。收《水平线下》。

7 日 作论文《神话的世界》。论述神话的起源和各国古代神话传说大抵相同的原因。载《创造周报》1923 年 11 月 11 日第 27 号。收《文艺论集》。

9 日 作论文《释玄黄——答曹聚仁》。继续就《卷耳》一诗中“玄黄”一词的解释，答复曹聚仁在《读卷耳》一文中的指摘。载 1923 年 11 月 11 日《民国日报·觉悟》。收《文艺论集》。

23 日 作论文《艺术的评价》。评价托尔斯泰的艺术观，认为他是“把艺术活动完全认为教化的工具，甚至是传教的工具”，“把人类的感受性隐隐假定为一律平等而且无发展之可能”。郭沫若则认为，“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

感情，并一定不在乎能使人得到共感与否。”“纯粹的艺术”使一般民众难以接近的原因，“在乎社会制度使民众的智慧停滞，并限制其享受的机会”，故不能责怪于艺术和艺术家。载《创造周报》1923年11月25日第29号。收《文艺论集》。

29日 作《雅言与自力》。说明自己所以没有对《查拉图斯屈拉》的译文加注释和对尼采的生平思想作概括的介绍，是为了希望读者“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尼采的作品。载《创造周报》1923年12月2日第30号。收《文艺论集》。1958年11月21日，在该文“附记”中说：“《查拉图斯屈拉》结果没有译下去，我事实上是‘拒绝’了它。中国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把我向上看的眼睛拉到向下看，使我和尼采发生了很大的距离。鲁迅曾译此书的序言而没有译出全书，恐怕也是出于同一理由。”（《沫若文集》第10卷）

本月 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同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上海书店”。

十二月

4日 为所译英国诗人葛雷的《墓畔哀歌》一诗作“小引”。载《创造季刊》1924年2月第2卷第2期。收《沫若译诗集》，题为《葛雷特一首题解》。

5日 作诗《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载本月出版的《孤军》（月刊）第2卷第1期，收《前茅》。

10日 作《惠施的性格与思想》。将庄子与惠施作了比较，认为两人在对现实的看法和研究学问的态度上，都完全两样。在介绍了惠施思想的若干特点后，指出胡适“不仅没有懂到庄子，

而且没有懂到惠施。”载《创造周报》1923年12月16日第32号。收《文艺论集》。

13日 作《通信一则》，即复梁实秋书。载《创造周报》1923年12月16日第32号。

18日 作散文《梦与现实》，写梦与现实的矛盾。认为梦境是“多么适意”，而现实又是这样黑暗与残酷。载《创造周报》1923年12月23日第33号。收《沫若创作集》。

本月 在上海美专自由讲座讲演，题为《印象与表现》。载1923年12月30日上海《时事新报·艺术》。

本月 曾琦、李璜等在法国成立国家主义组织青年党，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一般称“国家主义派”。1924年创办《醒狮周报》，故又称“醒狮派”。

同月 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7期（12月1日）、第10期（12月22日）上发表《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二文，批评“新浪漫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不注意研究社会问题”的青年。要求新诗人“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

同月 8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8期发表《八股》一文，认为新文学应“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

邓中夏、恽代英等的文章，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

同月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由新潮社出版。

同月 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

同月 沈雁冰在《文学周报》第103期上发表《大转变时期何

时来呢?》批评文坛上的唯美主义文学。

同月 胡适、徐志摩等在北京成立“新月社”，以《现代评论》（周刊）、《晨报副刊》为阵地，发表诗文。

本年 上海大学成立，邓中夏、任弼时、蔡和森、张太雷、肖楚女等同志在该校任教。

一九二四年(三十三岁)

一月

4日 作《编辑余谈》。解释本期《创造》季刊延期出版的原因，并大力提倡“批评的精神”，恳切征求对创造社所出书刊之批评意见。载《创造》季刊1924年2月第2卷第2期。

9日 作《整理国故的评价》，批评胡适鼓吹的“整理国故”运动，指出他们“不问社会的需要如何”，把“研究国学”作为“唯一要事”，必然会“招人厌弃”。同时，指出“国学”也“总有些可取”之处，可以让一部分人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重新作出估评。载《创造周报》1925年1月13日第36号，收《文艺论集》。

10日 作《古书今译的问题》。提倡古书今译，指出整理中国古籍，除考证、研究、标点、索隐外，“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这样能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它和“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文中还以自己翻译《国风》的体会谈如何翻译古诗。载《创造周报》1925年1月第37号。收《文艺论集》。

中旬 为张伯符的《〈乌鸦〉译诗的莒言》一文作“附白”。认为“此诗译文^①真是荒唐已极，译者和文学编辑者竟公然发表，读后只令人慨叹。伯符君改正处大抵无误，唯第九节似尚有斟酌

① 《乌鸦》系美国爱伦坡所作，子岩翻译。

余地。乌鸦乃不祥之鸟，东西民间的俗见相同。原诗意是反语，不识张君以为如何”。载本月《创造周报》第37号。

25日 作诗《太阳没了——闻列宁死耗作此》。诗人把列宁比作太阳，他的逝世，使“弥天的暗云也暂时混却了它的嘲笑，消沉的万象都象随以消亡，四海的潮音都在同声哀悼”。诗中赞颂列宁“荡尽天魔”，“冲破冰堞”，给“无衣无业的穷困的兄弟们”带来“炎炎圣火”。表示要高举列宁传给我们的革命火炬，继续前进。后来，作者回忆说：“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象失掉了太阳的一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要想把握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创造十年》）诗载《创造周报》1924年第38号。收《前茅》。

本月 所译《鲁拜集》（波斯 莪默伽亚谟）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列为创造社《辛夷小丛书》第三种。

本月 田汉脱离创造社后，在上海创办《南国》半月刊，出至第4期停刊。

同月 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同月 21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1870—1924）逝世，北京、广州等地群众举行追悼会。

二 月

17日 作小说《歧路》，为《歧路三部曲》（即《漂流三部曲》）之一。作品描写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

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主人公爱牟这一形象，是“五四”以后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作者谈到这部作品时说：“在那时我自己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我把妻子送走了之后，写了那《歧路三部曲》，尽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冑统统剥脱了。人到下了决心，唯物地说时，人到了不要面孔，那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读了我那《三部曲》的人听说有好些人为我流了眼泪。就是我们的达夫也受了感动，他把我们的旧谊又恢复了转来。他从北京寄来了他那篇《北国的微音》，那是他去上海以后①在《周报》上所发表的唯一的作品”。（《创造十年》）载《创造周报》1924年2月24日第41号。收《橄榄》。

又作通信《〈乌鸦〉译诗的讨论》（即致露明书）。自1月中旬郭沫若为张伯符《〈乌鸦〉译诗的莒言》作《附白》后，本月1日，有读者露明②致书《创造周报》，参加关于《乌鸦》一诗翻译的讨论，郭沫若在复信中再次表示支持张伯符的意见。露明的信和郭沫若的复信均载《创造周报》3月24日第45号，副标题为通信二则。

22日 作小说《圣者》。赞美童心的纯洁，批评现实世界的肮脏。载《创造周报》1924年3月2日第42号。收《沫若创作集》。

25日 致田楚侨信。答复田对所译雪莱诗的批评。郭沫若翻译的雪莱诗发表后，田楚侨于本月22日自东大来信，对译文提出批评，郭沫若在复信中对田的指责表示感谢，并就某些问题作了说明。载《创造周报》1924年4月5日第47号田楚侨《雪莱译诗之商榷》一文之后。

① 指郁达夫1923年夏秋之际应邀赴北大执教而离沪。参见《创造十年》。

② 即赵景深。

28日 《创造》季刊第2卷第2号出版。此期稿件原系成仿吾筹集，后由郭沫若编辑。这一期上载郭沫若的著译除《玉昭君》（戏剧）、《英国诗人葛雷的〈墓畔哀歌〉》、《白玫瑰》（诗）、《编辑余谈》外，还有署名“沫若”的《补白》数则。

本月 郭沫若把妻儿四人托郑伯奇送回日本福冈，自己则准备“待把《周报》办满了一年之后再往日本”。（《创造十年》）

三月

7日 作小说《炼狱》，为《歧路三部曲》（即《漂流三部曲》）之二。写爱牟与妻儿分别后，一个人留在国内过着炼狱般的生活。载《创造周报》1924年3月16日第44号。收《橄榄》。

上旬 曾应袁家骅、顾绶昌的邀请，与成仿吾等同游无锡。

18日 作小说《十字架》，为《歧路三部曲》（即《漂流三部曲》）之三。载《创造周报》1924年4月5日第47号。收《橄榄》。

中旬 星期日清晨乘早车赴杭州参加中华学艺社年会。上午，由学艺社干事、日本高等学校的同班同学范允臧陪同游览西湖。次日（星期一）上午，仍由范陪同游览，下午参加大会。会上由周颂久作了《相对论》的讲演，郭沫若作了《文艺之社会的使命》^①的讲演，内容“不外是从拉斯金的《艺术经济论》、葛罗舍的《艺术原始》、居约的《由社会学上所见到的艺术》那一类书上所生吞活剥地记下来的一些理论和实例，更加上一些半生不熟的精神分析派的见解。”（《创造十年续篇》）会后，又至蚕桑讲习所讲演。

^① 这篇讲稿未见刊布，收于《文艺论集》中的《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一文系另一次讲演记录。

20日 致施蛰存信。说明稿件收到,请示地址。载《创造周报》1924年3月28日第46号。

又 致王瑞麟信。感谢他关于拜伦死期的指正。载《创造周报》1924年3月28日第46号。

四 月

1日 离开上海,东渡日本。

18日 致成仿吾信,告以“半月以来只在译读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怕还要三个礼拜才能完工”。又说“我现在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我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郭沫若再度跑向福冈的意愿,是比较复杂的,他“早就有志研究生理学”,但又对社会科学有兴趣,因此,“想一方面研究生理学,而同时学习着社会科学。”因此,他曾“和四川经理员接洽,希图入大学院,继续领取官费”,但交涉没有成功。更重要的是,这时他对社会革命和文艺有了新的认识,这使他产生了“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并决心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决定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实活动。(《创造十年续篇》,8月9日致成仿吾的信)载《创造周报》1924年5月第52号(即终刊号),原题为《通信一则》,署名爱牟,收《沫若书信集》。

本月至5月 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河上肇是当时日本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本书是他的论文集,曾陆续发表在他主办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此书对郭沫若的思想发展起过重大的影响。他说:“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又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

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均见致成仿吾信)“使我前期的糊涂思想澄清了，从此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见《文学知识》1959年5月号)“从此更加注意社会活动了”。(《郭沫若选集》自序)在翻译时，郭沫若对河上肇的理论也感到不够满足，因为他“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翻译这书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寓中没有桌椅，也没有置办日本式的矮桌，把一口中国式的皮箱拿来作了代替。砚台是没有的，随便捡了块砖头磨平，便当成了砚台。就那样坐在草席上，从清早起来写到深夜，写了有五十天的光景，终究把那部二十万字以上的大著译完了。”(《创造十年续篇》)译文中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社会政策》等篇曾分别发表于《学艺》杂志1924年8月、12月出版的第6卷第4期、第6期上，全书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5月出版。

本月 印度著名诗人、哲学家泰戈尔来华访问。

同月 苏联影片开始介绍到中国。列宁逝世后，北京、天津党组织举行的追悼会上放映了苏联记录片《列宁的葬礼》，不久，天津光明电影院公开放映此片。

五 月

中旬 接上海寄来的《创造周报》终刊号和预告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将合编一种周刊(即后来的《现代评论》)的通告，同时收到郁达夫来信告知合伙的事。

30日 致梁俊青信。载1924年6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

文学》。

本月 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31期上发表《文学与革命》。

六 月

8日 作散文《菩提树下》。记述在福冈寓所养鸡的生活。载1925年4月12日《晨报副刊》第81号。收《橄欖》。

本月 作杂感《盲肠炎与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比作是社会的盲肠，资本家“榨取劳动者的体力以获取剩余价值”，他们“对于社会是并没有什么贡献的”；指出“社会的健康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才能显现。”载《洪水》半月刊1924年8月20日第一次创刊号；1925年10月，复刊之《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2期又重新揭载一次。收小说散文集《水平线下全集》。编入《沫若文集》第10卷时，题作《盲肠炎》。

同月 作《〈王阳明全集〉序》。收泰东图书局版《王阳明全集》。说：“我有过一个时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那是1915年至1917年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的时期。那时候因为沾染了泛神论的思想，崇拜着斯宾诺莎，歌德，耽读太戈尔的诗，在中国的古人中则崇拜着庄子和王阳明。”（《创造十年续篇》）

本月 16日，黄埔军校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代表。稍后，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等也在该校任职。

同月 瞿秋白的《赤都心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一种。

七 月

1日 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附白》。收1925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2日 致《文学》编辑信。载1924年7月21日《时事新报·文学》。

月初 开始从德文转译小说《新的一代》^①（俄 屠格涅甫），至8月8日译毕。郭沫若第一次读《新的一代》是1921年4月从日本回上海的轮船上。1923年在上海时，又一次与成仿吾共读这本书，他们自比书中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都嗜好文学但又都轻视文学；都想亲近民众，但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倦怠、怀疑、缺少执行的勇气，是“中国的‘罕牟雷特’”。这次因为“穷得没法了，做小说没有心绪，而且也没有时间”，更因为“喜欢这本书”，从这书中可以照出“自己的面影”，所以，决心把它翻译出来。（参见本年8月9日致成仿吾的信）该书1925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新时代》，署郭鼎堂译。

22日 致《孤军》主编何公敢信。表明自己通过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益见坚固了”，“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是“必然的路径”；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要讨论或者实行的是如何推倒政府以攫取政权。对河上肇关于社会革命时机尚早的说法，表示异议。此信后于1926年1月19日全文引入《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一文。载《洪水》半月刊1926年2月5日第1卷第10、11期合刊。现收《沫若文集》第10卷。

^① 即《新时代》，俄文原名为《处女地》。

本月 肖楚女在《中国青年》第38期上发表《艺术与生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针对当时流行的某些唯心主义观点，正确指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是上层建筑。

八月

8日 晚，译毕《新一代》。

9日 作《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这是郭沫若从日本寄给在广州的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向好友详细叙述四个月来自己的生活、工作状况和思想的变迁。在日本，他没有分文收入，生活无着落，一家五口，靠一点归国费和典当衣物勉强糊口。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仍坚持译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称赞列宁有“致密的头脑”，是“真挚的思想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坚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终久会到来”；表示“我们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见”这种社会，但也要“努力促使它的实现”，由于政治思想的变化，使他的文艺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信中他批判了“纯文艺”的主张，认为“昨日的文艺”是“贵族们的消闲圣品”，而“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载《创造月刊》1926年4月16日第1卷第2期，初刊时副标题为《给芳坞的一封信》。收《沫若书信集》。

12日 作《〈新时代〉题解》。收《新时代》。

14日 作散文《路畔的蔷薇》。载1924年12月28日北京《晨报副刊》，题名《小品六章（一）·路畔的蔷薇》。收《橄榄》。

又 作小说《三诗人之死》。描写缺乏抵抗能力的三只兔子惨遭厄运先后死去的故事。载1925年3月4日至6日北京《晨报副刊》。收《橄榄》。

15日 作小说《阳春别》。通过对一个比利时美术教授和一个中国留日青年的生活经历的描写，揭露了旧中国的腐败，讽刺了所谓的“东方文明”，对革命后的俄国表示向往。载《孤军》(月刊)1925年第2卷第8期。收《塔》。

17日 作《夕暮》(小品六章之二)。写夕暮时的景物和家庭生活的情趣。载1924年12月29日北京《晨报副刊》，题名《小品六章(二)·夕暮》。收《橄榄》。

18日 作小说《喀尔美萝姑娘》。写一个留日的中国学生对一日本少女的爱慕之情。作品通过主人公病态心理的描写，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和痛苦心情。载《东方杂志》(月刊)1925年2月25日第22卷第4号。收《塔》，原题为《Donna Karmela》。

20日 作散文《芭蕉花》。回忆儿时为了医治母亲的病去摘取芭蕉花而被母亲教育的故事，抒发了“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和思念母亲的心绪。载1925年4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第72号。收《橄榄》。

21日 作散文《铁盔》。描写童年书塾生活的片断，揭露封建教育对儿童身心的摧残。载1925年3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收《橄榄》。

26日 作小说《Löbenicht 的塔》。塑造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形象。本年为康德诞生二百周年，“作这篇文章的用意，与其说为了纪念康德，倒是想借以讽谕哲学家。尽管哲学家或思想家是怎样的冷静，超然，过着如冰霜、如机械的理智生活，但是人生的情趣终不免要来萦绕，而且在暗默中还要给他以助力。恶魔说过：‘灰色是一切的理论，只有人生的金树长青。’这意思可惜没有表现十足。”(《创造十年续篇》)载《学艺》(月刊)1924年11月30日第6卷第5号。收《塔》。

本月 武昌师大校长写信给郭沫若，聘他去做文科教授，他

回忆说：“那次我倒很想去，但因为学校的手续没有十分周到——未下正式聘书，未寄旅费来，而屡次催我去上课——弄得我不很高兴，我又谢却了。”（《创造十年续篇》）

同月 20日，《洪水》半月刊第一次创刊，出版一期后即停刊。第2期预告目录中有郭沫若的《养兔记》。

本月 蒋光慈以“蒋侠僧”的名字在《新青年》季刊第3期上发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提倡革命文学，说明在阶级社会中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都具有阶级性及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必然性。

九 月

10日 作散文《鸡雏》。写老鼠咬死鸡雏，表现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残暴者的痛恨。载1925年7月12日北京《晨报副刊》。收《橄榄》。

12日 作小说《人力以上》。描述某建筑公司的三等技师S的不幸生活，感叹社会的黑暗与不平等。载1925年4月27、28日北京《晨报副刊》。收《橄榄》。

18日 夜，作小说《万引》。通过失业知识分子松野偶尔窃书的事件，表现了对旧制度的反抗精神。作品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刻划了主人公的复杂性格。载1925年1月31日《学艺》（月刊）第6卷第7号，收《塔》。

28日 作散文《水墨画》。载12月30日《晨报副刊》，题名《小品六章（三）·水墨画》，收《橄榄》。

本月 3日，皖系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军阀齐燮元在江苏、

浙江交界的宜兴一带开战，至10月结束，史称“江浙战争”或“齐卢战争”。

同月 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同月 24日，孙中山颁布《建国大纲》。

十月

12日 作散文《山茶花》。载1925年12月31日《晨报副刊》，题名《小品六章(四)·山茶花》，收《橄榄》。

又 作散文《墓》。表示要与旧我决裂。载1926年1月6日北京《晨报副刊》，题名《小品六章(五)·墓》。收《橄榄》。

15日 作小说《行路难》。载1925年4月10日、25日《东方杂志》(半月刊)第22卷第7、8号，收《橄榄》。此篇分上中下三篇，曾于1933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16日 作小说《叶罗提之墓》。写叶罗提从小恋着他的堂嫂，最后以身殉情。收《塔》。

17日 作散文《卖书》。追述六年前离开冈山前夕卖书的事。载1925年3月20日北京《晨报副刊》，收《橄榄》。

同日 作小说《曼陀罗华》。载1926年6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收《橄榄》。

20日 作散文《白发》，载1925年1月7日北京《晨报副刊》，题名《小品六章(六)·白发》，收《橄榄》。《沫若文集》第7卷，文末后注作于1925年10月20日，误。

本月 “在福冈与长崎间的佐贺县的山中住过一个月”。不少散文和小说均于此时所作。(《创造十年续篇》)

本月 23日，冯玉祥从前线回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

改组内阁，并把自己的部队改称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

十一月

16日 携妻儿由福冈回到上海，住环龙路四十四号。

25日 应朋友的邀请，决定参加江浙战争的情况调查。郭沫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的第十天，朋友们发起了一个组织，调查此次的江浙战祸。他们因为我是闲着的人，便找我担任调查宜兴的一路”（《到宜兴去》）。“那次的调查使我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雕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创造十年续篇》）

本月 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电请，启程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

同月 冯玉祥命部将鹿钟麟驱逐清废帝溥仪出故宫。

同月 鲁迅于北京发起组织“语丝社”，并创办了《语丝》周刊。《语丝》1927年10月遭张作霖封闭，移至上海出版，一直延续到1930年3月，共出五卷二百六十期。

十二月

1日 午后三时许，和周全平一起，由上海赴宜兴调查“江浙战祸”。晚宿无锡。

2日 坐运河轮去宜兴。船中，用讽刺的笔法写《一个疑问》、《没有洒尿的机会》、《四个铜板》、《两种人情的滋味》等几篇短文。并表示：“这类东西我以后想多写一点。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

变了,我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到宜兴去》)收《水平线下》。

3日 上午参观宜兴市容。

中午和周全平、周的同学H、北京朝阳大学学生Z、蜀山绅士P,同船往蜀山。

晚至蜀山,宿“东坡书院”中的小学校里。

5日 郭沫若等一行自湖汭过悬脚岭到浙江长兴的尚儒村调查战祸。在尚儒村了解到一位浙军薛振兴连长为力劝村民撤退不幸饮弹毙命的事迹,不禁肃然起敬,因而,去凭吊了他的坟墓,并作诗一首悼之。这次调查历时一星期,结束后,曾草有调查报告之一部分,题为《到宜兴去》,载《孤军》月刊1925年8月20日、9月25日、10月25日第3卷第3至5期。收《水平线下》。全稿未完成。(参见本谱1927年11月20日条)

20日 作《〈小品六章〉序引》。载1924年12月28日北京《晨报副刊》,收阮无名(阿英)编《中国新文坛秘录·郭著〈小品六章〉序》。

本月 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出刊。

同月 《现代评论》(周刊)在北京创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后被称为“现代评论派”。

同月 田汉的戏剧集《咖啡店之一夜》由中华书局出版;朱自清的诗与散文合集《踪迹》出版;王统照的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出版。

本年 被聘请担任中华学艺大学筹备委员。当时上海流行办私立大学,中华学艺社的人也打算办一所学艺大学,所以郭沫若“一回沪,便被指派为筹备委员之一,并被预定为大学的未

来教授”(《创造十年续篇》)。

同年 在日本,作诗《采栗谣》。收《潮汐集·汐集》。

同年 曾拟翻译《资本论》,预定五年完成。这个计划,得到朋友们的赞成,尤其是在商务担任庶务主任的何公敢还从东方图书馆把参考书都借出来了,当时“以为这事是不成问题的,只须在编审会上通过便可以定下契约”,不料“商务的编审会上却没有通过”,他们认为“译其他任何名作都可以,《资本论》却有不便”。因此这一计划未能实现。郭沫若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这事情在现在想起来都不免是一桩遗憾。不过我也偶尔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我是得到了商务的慨诺,那我的精力,即使不是全部,也会有一大部分,是被用在翻译上的,我定然是被钉在了上海。一九二六年往广东以及其后的事情便不会发生。一个人的生活路线,有时可以为外来的偶然的契机所左右,确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小小的真理。”(《创造十年续篇》)

同年 女儿淑子生。

本年 林纾(字琴南,1852—1924)逝世。曾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后称“林译小说”,译笔较流畅,影响颇大。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同年 6月1日,日本左翼文学的刊物《文艺战线》创刊。10月新感觉派的刊物《文艺时代》创刊。

一九二五年(三十四岁)

一月

初 接武昌师大聘书和旅费,请担任文学系主任,因已答应任中华学艺大学之职,故退还聘书和旅费。武昌师大前后曾三次邀聘郭沫若任教,第一次是1921年9月;第二次是1924年8月;这是第三次,均因故未就。

7日 作小说《亭子间中的文士》。反映了旧社会知识分子生活的困苦和没有出路。载《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1月31日第1卷第8期,收《水平线下》,篇名题《亭子间中》。这篇小说是“受不过达夫的敦促,勉强寄去的,同时还写了一封怕比那篇文章更长的信给达夫”,直率地谈了对郁达夫去年丢下创造社的刊物,去北京供职的不满。(《创造十年续篇》)

14日至20日 14日,接署名为“余抱节”的陌生人的信,约往杭州观梅花。17日,经踌躇,复信杭州“余漪筠小姐”,答以19日动身赴杭。20日,坐火车赴杭州,竟无“余抱节”、“余漪筠”其人,即返上海。

本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22日闭幕。

同月 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召开，30日闭幕。

同月 蒋光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指出：“谁个能够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同月，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由上海书店出版，这是他旅居苏联时的诗作汇集。

二 月

1日 作小说《湖心亭》。作品从一个日本回国的知识分子的悲苦境遇，表现了作者为祖国“沦成为混浊之场”而产生的极大愤懑，指出要解救中国，创建一个新世界，必须“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载《学艺》（月刊）1925年8月15日第7卷第1期。收《水平线下》。1934年1月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沫若自选集》注写作时间为1924年12月30日，误。

11日 作《〈塔〉序引》。说明作者由彷徨徘徊到积极参加现实斗争这一转变时期的思想状况：“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十字街头，象这样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怕再没有来顾我的机会了。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收《塔》。

13日 作《通讯》（致勉己的信）。载1925年2月28日北京《晨报副刊》。

18日—3月30日 作组诗《瓶》。《瓶》是一部歌唱爱情的抒情诗，由四十二首短诗组成，另有“献诗”一首。诗人以热情而又细腻的感情描写了对一个少女的爱恋，整个诗集充满着浪漫主义的遐想和浓郁的诗情。在艺术上，也独具一格，诗行比较整齐，

格律比较严谨。在3月9日作的《献诗》中，诗人唱道：“我攀折了你这枝梅花，虔诚地在瓶中供养，我做了个巡礼的蜂儿，吮吸着你的清香”。“啊，人如要说我痴迷，我也有我的针刺”。表明了这一诗集的特点。郁达夫在这诗集的“附记”中说：“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诗载《创造月刊》1926年4月1日第1卷第2期，1927年由创造社出版单行本《瓶》。

24日 作《〈无抵抗主义者〉附记》。载《洪水》半月刊1926年3月1日第1卷第12期《无抵抗主义者》文后。收《沫若自选集》。

三 月

13日 作散文《哀感》。对孙中山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认为“象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人始终是值得尊敬的”，人们对他的“思慕是会永远不灭的了！”并对某些国民党人对孙中山逝世所采取的冷漠态度表示愤慨。载《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3月28日第1卷第16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0卷“集外”。

18日 作散文《孤山的梅花》。记本年1月间去杭州的经过。载1925年4月3、4、7日北京《晨报副刊》，见阮无名（阿英）编《中国新文坛秘录》，1932年南强书局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7卷。

28日 作通信《笑脱牙齿》（致勉己的信）。载1925年4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

本月 12日，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1866—1925)在北京病逝。

四 月

1日 作散文《一位军神》。记述为调查江浙战祸途经浙江省长兴县尚儒村的情景。文中揭露了军阀的罪恶，对其中个别关心群众疾苦的下级军人表示敬意，并作诗一首以示哀悼。载《孤军》1925年4月第2卷《临时增刊》。收《水平线下》，题名《尚儒村》。

2日 为已写就的中篇小说《落叶》作《前言》。《落叶》通过四十一封情书，表现了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热情歌颂了青年们为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所作的斗争。小说和《前言》载《东方杂志》1925年9月25日至11月10日(月刊)第22卷第18号至21号。1926年4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单行本。现收《沫若文集》第5卷。

6日 为所译俄国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新时代》(即《处女地》)作《序》。收《新时代》。

26日 作论文《一个伟大的教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渐趋衰颓的事实中，得出一个“伟大的教训”：中国不可能发展个人资本主义。指出中国“假使不想永远做人奴隶，不想永做世界的资本国家的附庸”，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劳农俄国的道路”，并大声疾呼“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临到了穷途，为什么还不走！”载1925年5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劳动节纪念号，发表时另有《附白》一则。收《水平线下》。

本月 鲁迅与韦素园等组成莽原社并出版《莽原》周刊。该

刊附《京报》发行，所刊文章大多是对旧社会、旧文化的批判。后改出《莽原》半月刊，独立发行，仍由鲁迅主编。

四、五月间

4月至5月底，在大夏大学任讲师，讲《文学概论》，每周两小时，至“五卅”运动发生时止。后来郭沫若回忆说：“我那时对于文学，已经起了一种野心，很想独自树立一个文艺论的基础”。他利用“关于近代医学，尤其生理学的知识”来解释文艺现象，认为文艺的创作过程，也“不外是由于外在条件所激起的情绪”，“更进则由情绪的领域跨入观照的领域”，“由条件之反射成为条件之再现”，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条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感情，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根据上述原则讲授文艺总论，然后“再就诗歌、小说、戏剧等以作分论”。因为需要很多参考书，当时，他没有藏书，学校也无图书馆，于是，只好跑到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去借阅或者立读。为了预备这每周两点钟的课，“总要牺牲好几天的工夫”，但报酬极微，待遇极低。后因“五卅”事变，学校全体罢课，就于无形中和大夏大学断绝了关系。虽然暑假过后，学校一再送聘书给郭沫若，但终因该校对教师怠慢，便把聘书退了回去。（《创造十年续篇》）

五月

2日 作《关于创造周报的消息》（给LT的信），信后有作者附白。载1925年5月12日北京《晨报副刊》。

26日 为所译《约翰沁孤的戏曲集》写《译后》。约翰沁孤（1871—1909）是爱尔兰剧作家，一生创作的六个剧本均收于此

集中,计有:《悲哀之戴黛儿》、《西域的健儿》、《补锅匠的婚礼》、《圣泉》、《骑马下海的人》、《谷中的暗影》。译文及后记均收于《约翰沁孤的戏曲集》,署名郭鼎堂。

30日 目睹“五卅”惨案现场。午后三时许,与C君去南京路,正值惨案发生。他们“在浙江路上,朝北,向大马路(按,即南京路)走去,照例是那样乱杂而又悠长的街。走到交叉路口的近处,街旁步道上的行人就象潮水一样从前面簇拥来了。承头的多是学生,都呈着一个苍黄的面孔。”一位大夏大学的学生喘着气对郭沫若说:“他们开了枪了,不要往前进!危险!”“工部局门前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好些人!交通断了。”人潮愈拥愈汹,他们想往工部局走去,但无法突破那人的漩涡,好容易到了先施公司的门口。他们走上三楼,在楼上,从“玻璃窗口俯瞰下去,惨剧发生处的情景一目了然地展开了出来”。本来就是阴沉沉的工部局,“把铁门紧闭着,愈见表示得阴沉”,门前和街心“有些水渍”,“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商店都已关闭了。马路的十字路口,“红头巡捕和山东大汉在那儿堵塞着行人”,“有的端起步枪来威骇,有的举起木棍来乱打”,尤其是几个“没穿制服的外国巡捕,两手都握着手枪,鹰隼视地东奔西突”,巡捕的木棍、步枪、手枪,都对着人潮。他们“在先施公司里面被关闭了几个钟头。等到街上的人潮平静了,又才被解放了出来。街上已经上了电灯,大马路上的电车和黄包车绝了迹,时而有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外国兵飞速地往来奔驰”,马路上还有外国兵如临大敌地在那儿站岗。(《创造十年续篇》)

本月 译《冰结的跳舞场》(日 中河与一)。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同月 所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日 河上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月 15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开枪打死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广大人民纷纷抗议；30日，二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工人斗争，又遭到帝国主义枪杀，造成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北京、汉口等地纷纷集会游行，掀起了反帝爱国热潮。从6月19日开始的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

同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同月 丁西林的《一只马蜂》(独幕喜剧)由现代评论社出版。

六 月

11日 改作话剧《聂婪》(二幕剧)毕。经历了“五卅”惨案，郭沫若打算把自己在“五卅”事件中的感受，用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想写一个三幕剧，表现一对在“五卅”事件中奋斗的姐弟：“第一幕 慰问顾正红的家族；第二幕 南京路上的惨剧；第三幕 病院中的死别。”后来，因为“画鬼容易画人难”，终于“在构想的途中便把方向转换了”。现实生活中一对姐弟的事迹使以前未能完成的历史剧《棠棣之花》的构想又复活了。郭沫若费了两礼拜光景的工夫把两幕剧的《聂婪》写出了。剧本写成后，由上海美专学生演了三天，收入几百元，捐献给当时的上海总工会。作者对写出此剧感到满意，“尤其得意的是那第一幕里面的盲叟。那盲目的流浪艺人所吐露出的情绪是我的心理之最深奥处的表白”，而这种心理之得以具体化，都是受了爱尔兰作家约翰沁孤的影响(《创造十年续篇》)。该剧于1925年9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单行本，1929年6月10日修改后，收《女神及叛逆的女性》，1941年11月整理改写成为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的第四幕、第五幕。

16日 作《四川旅沪学界同学会五卅案宣言》。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指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已经快要满一世纪了”。“五卅”的警钟，“使我们翻然醒悟了起来”。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加强团结；监督外交；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件；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的持久战。载1925年7月13日北京《晨报副刊》，题名《五卅的反响》，收《水平线下》。现收《沫若文集》第10卷。收入文集时，改题为《为“五卅”惨案怒吼》。

17日 论文《王阳明礼赞》脱稿。此文原作于1921年6月17日，今日改定，收《文艺论集》。1925年光华书局出版，题名为《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1929年光华版删去《附录》，改名为《儒家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1947年起改题今名。

本月 所译长篇小说《新时代》（俄 屠格涅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郭鼎堂译。书的扉页上题“献给我的朋友仿吾”。

本月 广州、香港二十五万工人为抗议帝国主义在“五卅”运动中对中国工人的血腥镇压，开始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史称“省港大罢工”。

七 月

8日 作论文《文学的本质》。认为“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诗是情绪的直写，小说和戏剧是构成情绪的素材的再现。”载《学艺》（月刊）1925年8月15日第7卷第1号。收《文艺论集》。

中旬 作论文《论节奏》。认为节奏是诗的外形，也是诗的

生命，“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节奏是情绪波动的形式，“或者先抑后扬，或者先扬而后抑，或者抑扬相间，这发现出来便成了诗的节奏”。载《创造月刊》1926年3月16日第1卷第1期，收《文艺论集》，1929年7月光华书局改版本。文内录有译诗《白玫瑰》（德 赛德尔）一首，后曾单独抽出，收《沫若译诗集》。

30日 为漆树芬（南薰）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作《序》。收《经济侵略下之中国》，1925年10月上海独立青年杂志社出版。

本月 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7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同月 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年创刊）复刊，宣传复古思想，反对新文化运动和革命群众运动，至1927年2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鲁迅8月20日在《答K S君》一文中指出，该刊“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八 月

15日 在美专演讲，题为《国际阶级斗争之序幕》，肖韵记录。载1925年8月23日、24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未收集。

本月 革命民主主义者廖仲恺（1877—1925）遭国民党右派暗杀。

暑假

任中华学艺大学文科主任。暑假期间，中华学艺大学在报上登出招生广告，校长王兆荣(宏实)，预科主任兼教务长范允臧，文科主任郭沫若。

九月

14日 译《异端》(德 霍普斯曼)毕，并作《序》。1926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郭鼎堂译，《序》收于《异端》。

本月 出席中华学艺大学开学典礼并讲演，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中华学艺大学设在静安寺路西头的一座公馆里，学生不多，教员有方光焘、常云涓、李剑华等，还有兼课的何鲁和曾琦。学校的董事、教职员、学生，综合起来，不上五十人。郭沫若在该校任课一学期，至本年底为止。(《创造十年续篇》)

同月 《聂荄》(二幕剧)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同月 《洪水》半月刊第二次创刊。郭沫若回忆说：“《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创造社的事实上的开始。(注意：以后还有第三期。)这个开始可以说是创造社的第二代，因为参加这一期活动的人，都是由国内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这次创刊的时间是“五卅”以后，其实是“《洪水》的复活”。刊名是周全平取的，原先的意思是“上帝要用洪水来洗荡人间的罪恶”，而不是当时顽固派斥骂激进思想为“洪水猛兽”之“洪水”。后来，是郭沫若“从旁把舵轮捉着，把那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兽’的一方面逆转了过来”。他不但自己为该刊积极写文章，而且，还“把漆南薰和蒋光慈也拉来参加了”。郭沫若说：漆、蒋

的参加，不仅使《洪水》，也“使整个创造社改涂了一番面貌”。《洪水》，共出三卷三十六期。（《创造十年续篇》）

本月 鲁迅与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等组成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介绍外国文学。1928年1月又创办《未名半月刊》，1930年4月出至2卷12期停刊。

九、十月间

与郁达夫往法大马路（按，今淮海路）明德里访问蒋光慈。蒋光慈正在用俄文原版认真校读郭所译的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按，即《处女地》）。郭沫若对蒋光慈的印象很好，后来，他回忆说：“他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是很可亲爱的”，“可惜太死早了一点。假如再多活得几年，以他那开朗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炼”，是可以写出大家所希望的伟大作品的。他佩服蒋光慈，在“‘浪漫’受着围骂”的时候，却敢于说自己便是浪漫派。（《创造十年续篇》）

十月

1日 再次发表论文《盲肠炎》。载《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时题为《盲肠炎与资本主义》。收《水平线下》。

16日 发表译诗《弹琴者之歌》（德歌德）。载《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3期。

19日 作杂感《穷汉的穷谈》。批驳灵光（即林植夫）对共产主义的诬蔑，并从正面论述了共产主义，以澄清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种种模糊认识。后来，灵光又在《孤军》杂志上发表《论什么

的什么，以质问共产党，兼质问郭沫若》，说什么“一个人每月坐拿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怕也不配说是‘穷汉’罢”。林当时任学艺大学董事，此话意似“我董事老爷每月赏你百五十块钱的大洋，你这不识抬举的小瘪三还要吵‘穷’吗！”郭沫若正苦于脱不了身，便趁机向校长辞了职。（《创造十年续篇》）文载《洪水》半月刊1925年11月1日第1卷第4期。收《水平线下》。

22日 作杂文《共产与共管》，斥孤军派。驳斥灵光在《独立党出现的要求》（《孤军》杂志第3卷第4期）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揭穿灵光替帝国主义张目的丑恶嘴脸，并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早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共管”了，目前的要务是从帝国主义的“共管”下摆脱出来，而只有中国的共产革命成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共管”才能消灭。载《洪水》半月刊1925年11月16日第1卷第5期。收《水平线下》，改题为《双声叠韵》。

25日 发表《到宜兴去》（续完）。载本日《孤军》第3卷第5期，文后有该刊记者所作的附记，内有作者给《孤军》编辑部的信的摘录。

本月 陈翔鹤、冯至、杨晦等组成“沉钟社”，创办《沉钟》周刊，共出十期；1926年后出半月刊，陆续出了十二期，至1934年止。鲁迅说他们是当时“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十一月

17日 作杂文《马克思进文庙》毕。载《洪水》半月刊1925年12月16日第1卷第7期。初收《水平线下》，后收《沫若自选集》，题为《马氏进文庙》。

29日 作《〈文艺论集〉序》。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说自己

的思想、生活和作风“在最近一两年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过去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但由于接触了“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现在“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并认为，为了“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他把这本集子，看作是埋葬“残骸”的“坟”，以表示和过去决裂，并展望新的未来。载《洪水》半月刊1925年12月16日第1卷第7期。收《文艺论集》。

本月 鲁迅的杂文集《热风》由北新书局出版，收1918—1924年所作杂文。这是鲁迅最早的杂文集。

十二月

20日 作杂文《新国家的创造》。指出国家主义者歪曲马克思所说“工人无祖国”的本意，胡说“共产主义否认国家”。文章揭露了国家主义者的本质是反对共产主义，保护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载《洪水》半月刊1926年1月1日第1卷第8期。收《水平线下》，题名《不读书好求甚解》。

27日 作《讨论马克思进文庙——我的答复》。载《洪水》半月刊1926年1月16日第1卷第9期。收1933年拂晓书室版《矛盾集》。

本月 所著《文艺论集》由光华书局出版，收1920年至1925年间所写的文艺论文四十一篇（连《序》）。该书1929年7月光华书局印行第4版时，增加三篇，又将《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一文改题为《儒教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并删去附录。1930年

6月从新编订改版,删去五篇,即《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王阳明礼赞》、《国家的与超国家的》、《论诗三札》的第二和第三札;而增加了《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书末附《跋语》。1958年编入《沫若文集》第10卷。

本月 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成立。

本年 年底至1926年年初的一天,蒋光慈陪同瞿秋白来访。秋白因生肺病刚出院不久,“才吐了一阵血”,所以“面孔很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使郭沫若感到吃惊。那时,郭的“意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正和“孤军派”、“醒狮派”等国家主义者进行论战,“目的总是想怎样地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的迷信和其催眠力”,所以和他们谈了一些自己的政治见解。瞿秋白认为郭的意见是正确的,并鼓励他“趁早把它写出来”。(《创造十年续篇》)

本年 徐志摩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朱湘的第一部诗集《夏天》出版;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和落华生(许地山)的第一本小说集《缀网劳蛛》分别出版。

一九二六年（三十五岁）

一月

1日 与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等共同发起的中国济难会成立，发表《中国济难会宣言》。“五卅”运动以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恐怖政策变本加厉，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更加剧烈。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被难的革命者，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济难会，营救、保护、支援被难的同志。该会于1929年12月更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

同日 发表为廖仲恺被害题词的手迹：“舍生取义”。载本日出版的《济难月刊》创刊号。

月初 与周全平、常云湄往江苏吴县角直参加严良才的婚礼。新娘与另一位“小娘子”是郭沫若和创造社的崇拜者，她们建议创造社募股办出版部，“小娘子”还当即拿出一百元钱，这一百块钱可说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最初的基金”。傍晚，在周全平的引导下参观了唐代开元年间著名的雕塑家杨惠之所作的罗汉塑像。第二天回上海。（《创造十年续篇》）

19日 作论文《社会革命的时机》。继续与灵光就社会革命问题展开论战。郭沫若发表《穷汉的穷谈》和《共产与共管》等文以后，灵光在《独立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即“双声迭韵”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

一文,申明他是“不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但“不赞成共产革命”,认为“只须采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而不变更现经济制度,已达到共产的目的,且可免除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的危险”。郭沫若认为“社会革命之成败并不专在乎时机之早迟,而在乎企图的方策之完备与否”。“在私人资本主义未到破产之前,早早企图有计画有目的的社会革命,以‘缩短’而且‘缓和’大多数无产阶级的痛苦,岂不是于理当然,而且事实上亦不见得是不可能的事”,“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只要企图得法,不见得便是定要失败的事情”。载《洪水》半月刊2月5日第1卷第10、11期合刊。收《水平线下》,题名为《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水平线下》文末注写作日期为1925年2月19日,《沫若文集》注为本年2月19日,均误。

28日 为所译剧本《争斗》(英 戈斯华士)作《序》。收《争斗》,本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7年又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本月 小说戏剧集《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郭鼎堂,收小说七篇,历史剧三个,其中《鸕鹚》一篇后改名为《漆园吏游梁》,《函谷关》一篇后改名为《柱下史入关》;“Donna Karmela”一篇后改名为《喀尔美萝姑娘》。1957年4月将《塔》的小说部分编入《沫若文集》第5卷,剧作部分编入《沫若文集》第3卷。

本月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9日闭幕。会上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占优势,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七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邓颖超、夏曦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二 月

21日 作小说《后悔》。通过作家爱牟夫妇去公司买物找进假银圆，受骗上当这一事实，揭露了社会上尔虞我诈的罪恶行为，同时，也反映了旧社会知识分子生活的贫困。载《创造月刊》1927年2月1日第1卷第6期。收《水平线下》。

本月 为上海同文书院的中国学生讲演。内容即后来写的《革命与文学》。郭沫若认为“革命文学”就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普罗文学”或“无产文学”。文中还说明，“表同情”一词，并非“哀怜”之意，倘译成英文“应该是to coincide而不是to have sympathy（怜悯）”。（《创造十年续篇》）

月底 接广东大学来信，请任文科院长。郭沫若回忆说：“后来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接信后，即去四马路振华旅馆找郁达夫商量，决定一道南下。又找常云湄、蒋光慈、田汉等，但他们三人因故不能同去。王独清则表示愿意同去。即复信广东大学，嘱寄旅费。（《创造十年续篇》）

月底 所译《约翰沁孤的戏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郭鼎堂。译本包括剧作六部：《悲哀的戴黛儿》、《西域的健儿》、《补锅匠的婚礼》、《圣泉》、《骑马下海的人》、《谷中的暗影》。

本月 创造社北京分部成立。

三 月

2日 作论文《艺术家的觉悟》。对作家与现实，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不可能“不受社会的影响”。现在是“第四阶级革命的时代”，在斗争中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提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载《洪水》半月刊1926年5月1日第2卷第16期。收《文艺论集续集》。

7日 作《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收《三个叛逆的女性》。《沫若文集》第3卷中摘取其中片断，题名《〈王昭君〉后记》、《〈卓文君〉后记》。

8日 参加“三八妇女节”集会并演说。

9日 作论文《卖淫妇的饶舌》。回答李芾甘(巴金)和郭心崧关于“国家问题”的责难，重申《不读书好求甚解》一文中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如果到了完成的时候，……国家这个制度的确是有消灭的可能性的。然而在共产主义未完成之前，共产主义者正须以无产阶级为中心而组织新国家”。载《洪水》半月刊1926年4月1日第2卷第14期。收《水平线下全集》。

又 作《我的再答——讨论马克思进文庙》。载《洪水》半月刊4月1日第2卷第14期。收1933年拂晓书店出版的《矛盾集》。

10日 左右 接广东大学信，同意增聘郁达夫、王独清二人，并告聘书和旅费由林祖涵(伯渠)之弟林祖同带往上海。

12日 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上演说，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创造十年续篇》)。

11—16日之间的某一天 领到旅费六百元，自己留下两百

元，分别付郁达夫和王独清各两百元。当晚，楼建南和湖畔诗社的几个人在一家宁波馆子为郭饯行，席间，“还讨论过要组织一个小刊物的计划”，刊物定名为《野火》，但后来却没有出版。次日，王独清来，传郁达夫言，请郭“先去看看形势”，他们二人后去。原因是怕“广东的政局不大安定”。郭对郁、王这一提议甚感不满，经说服，仍维持原议。（《创造十年续篇》）

18日 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启程赴广州，到码头送行的有楼建南、应修人、周全平等。郭把家眷留在上海。后来郭沫若回忆到此日活动时说：“日期碰得那样凑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刚刚碰着了‘三一八’！这是一个世界的纪念日^①，已经就足够名贵。谁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还在天安门用青年学生的血来把它更染红过一次，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纪念日呢？”（《创造十年续篇》）

20日 作诗《着了火的桔原》。载《洪水》1926年12月1日周年增刊。收《沫若文选》。

23日 晨，抵广州，成仿吾来码头迎接，把书籍、行李运至旅社。

上午，访林祖涵，在林的书房里先后与毛泽东和林会面。（《创造十年续篇》）

午后，去广东大学。

28日 搬入广东大学。关于这段时期的生活，郭沫若回忆说：“在未到广东以前，我自己虽然也在干着别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 and 意识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到了广东以后，这种情形便逐渐改变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郑伯奇，在几个月后也都先后到了广东，虽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过创造社的分社，

^① 指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纪念日。

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但自己的意识是和它渐渐疏远了。”又说：“在广州的一段生活”是和“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蝉联着的。（《创造十年续篇》）据徐彬如（文雅）回忆，当时广东大学斗争很激烈，“学生要求文学院改组，聘请郭沫若当院长”，因为“文学院的教授、讲师中，右派力量仍大，他们反对郭沫若当院长。由于左派学生的积极斗争，代理校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不敢不支持，郭沫若还是当了文学院院长，创造社的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也来了”。“郭沫若来后，文学院进行了大整顿，腐败的清朝翰林都给清除了出去”。这时，“郭沫若住在广大宿舍，提出要求入党，由毕磊反映到陈延年处（当时我们总支是不公开的，只有毕磊是公开的党员，支部派他做公开工作）。陈延年和恽代英商量让郭再参加一下实际工作锻炼，于是区委派恽代英和郭谈话，建议他去参军，到黄埔做宣传工作。郭沫若很高兴。这时正要北伐，组织政治部，遂决定郭沫若到邓演达为主任的政治部去当宣传科长。”（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同月 所译《雪莱诗选》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本月 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并在广州举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

同月 18日，北京群众数千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遭段祺瑞政府枪杀，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人，此即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同月 20日，蒋介石经密谋策划，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同月 16日，《创造月刊》创刊。至1929年1月10日停刊，共出二卷（合计十八期）。

同月 创造社广州分部成立。

四 月

1日 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地点在上海闸北三德里,当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均在广东。出版部的经费“是由五元一股的青年股东们凑合起来的”。“成立虽然仅仅一年半光景,因受青年们的爱护,业务的发展蒸蒸日上。而出版部本身,差不多就是一个文学俱乐部,每顿开饭,连主带客常常是两大圆桌。但这盛况并不是春和景明的繁花,而是在暴风雨激荡中的海燕。”(《海涛集·跨着东海》)

13日 作论文《革命与文学》。论述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及革命文学的涵义。认为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而且是“互为因果”的。指出:“每逢革命的时期,在一个社会里面,至少是有两个阶级的对立”,“在这样的时候,一个阶级当然有一个阶级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那一个阶级说话。”文章还从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论证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它是现代“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表现了作者文艺观的重大变化。文末还提出,革命的文艺家要“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载《创造月刊》1926年5月16日第1卷第3期。收《文艺论集续集》。

本月 在广州青年会观看何香凝领导的血花剧社演的《棠棣之花》。剧社把《聂婪》和以前发表过的两幕合并起来,作为四幕剧而演出。郭沫若认为“那是有点不合理的,因为那样的凑合使第二幕和第三幕完全是一个景,假如作为一幕的两场在结构上也够累赘。但就是那样的演出时也公然得到了相当的好

评。”(《我怎样写〈棠棣之花〉》)

本月 戏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内收《卓文君》、《王昭君》、《聂荃》三个剧本。

同月 中篇小说《落叶》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本月 北京《晨报》的《诗刊》创刊。由徐志摩、闻一多、饶梦侃、朱湘等主办，该刊每周一期，共出十一期。

五 月

5日 出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举行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八周年大会，并发表讲演。(据侯枫：《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载《广西文艺》1978年第6期)

中旬 安娜和孩子们从上海来到广州。

本月 发表论文《周秦以前古代思想之蠡测》。收本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故论丛》。

同月 所译剧本《异端》(德·霍普特曼)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月 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会上，蒋介石窃踞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职务。

六 月

1日 发表小说《红瓜》。载本日出版的《洪水》半月刊第2卷

第18期。收《橄榄》。

4日 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增订本后序》。载《洪水》半月刊1926年7月1日第2卷第20期。收1926年7月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增订本。

25日 作《〈毋忘台湾〉序》。原为张秀哲(又名张月澄)的《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一文而作。后该文与杨成志的《看了〈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以后》合编成册,题名《毋忘台湾》,此篇乃改为该书的序。1926年6月广州丁卜图书馆出版。(《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本月 所译剧本《争斗》(英 戈斯华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七 月

24日 从广州出发参加北伐,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行营秘书长(后又任政治部副主任)。本日乘火车往韶关。

此前,在决定参加北伐时,郭沫若曾邀约了一些人,如当时在广州市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关良等,准备从戎北上。

25日 至韶关曲江河畔待舟,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俄国顾问铁罗尼在一起摄影留念。相片见《沫若文集》第8卷卷首。

本月 发表《〈西洋美术史提要〉序》。收本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美术史提要》,该书系郭沫若参照日本矢代幸雄的《西洋美术史讲话》译编。

本月 1日,广东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12日,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占领长沙等地。

八 月

24日 在长沙。下午四时，正当大家为第二天举行岳州克服的祝捷大会作准备时，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下达出发的命令。晚七时半，随政治部先遣队北上，同行的有邓演达、铁罗尼、翻译纪德甫、秘书李德谟（即一氓、民治）等。车至汨罗，露宿。

25日 晨渡汨罗江。在马上作旧诗一首：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

诗见《北伐途次》，后收《潮汐集·汐集》。

26至27日 继续行军。

28日 夜宿石城矶（离崇阳不远）。夜半过后得邓演达自前方来信，命即刻出发。

29日 凌晨二点左右，和纪德甫、李德谟从石城矶出发，八时至崇阳，邓演达、铁罗尼已往蒲圻。

在崇阳的旅馆里发信给广州的成仿吾，告以长沙出发后的情形。并附言给留在广州的安娜说：“二十四日离开长沙，今晨八时顷到达此地。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今闻已进展到离武昌仅中国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约在三日内便可以攻进武昌。攻进武昌之后便万事都顺利了。”（《北伐途次》）

随后从崇阳往蒲圻，晚宿蒲圻附近的小村庄。

30日 晨至蒲圻。在车站遇代参谋总长白崇禧，闻邓演达已赴前线。

从蒲圻坐火车赶赴咸宁。在咸宁和步行来的纪德甫、李德

摸会合，继续赶往前线。步行途中，遇李汉俊、詹大悲，遂同行。

傍晚，至贺胜桥，战事已结束，晚宿农民家中。

31日 整日赶路，傍晚至离武昌十五里的纸坊，夜宿纸坊车站。

本月 27日，叶挺率领的独立团攻占汀泗桥。30日又在贺胜桥激战取胜。

同月 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收1924—1925年所作小说《祝福》《伤逝》等十一篇。

九 月

1日 由纸坊去武昌。途中，见有老百姓因仇恨军阀而殴打一名“北兵”，即上前宣传，要大家了解当兵的虽然也做过坏事，但罪恶的根源是军阀头子。在武昌城下见到邓演达、铁罗尼和第四军第一师师长陈铭枢。下午，组织宣传工作，作入城准备。

2日夜至3日凌晨 部队准备攻城，郭沫若自告奋勇也要求去，邓演达没有同意。当夜，攻城计划失败。

3日 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宣传小队长周恩寿（周恩来同志之弟）上前线，遇见独立团团团长叶挺，又找到邓演达、铁罗尼。仍无法攻入武昌城，战争处于僵持状态，归途遇蒋介石、加伦顾问及第四军第三师师长张发奎。周恩寿中弹受伤。

4日 战争继续处于僵持状态。

晚，和铁罗尼交谈如何在理论上战胜国家主义派（醒狮派、孤军派）。

5日 晚,第二次绑扎梯子,准备再次攻城。在操场上首次遇见第四军第三师第一团团团长黄琪翔,并和翻译纪德甫告别。纪上阵前对郭沫若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

部队整夜攻城。“当晚留守着的人,特别是政治部,要准备第二天进城的工作,大家都没有睡觉。”(《北伐途次》)

6日 闻武昌已攻下,即率政治部人员进城,途中遇抬下的纪德甫遗体。晚作诗四首,哀悼纪德甫: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清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诗见《北伐途次》,后收《潮汐集·汐集》。

7日 和邓演达、铁罗尼等参加纪德甫灵柩停放仪式。

9日 和朱代杰一起带部分成员至汉口主持政治部办事处工作。当时的汉口还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我们跳进这样的环境里去,所负的使命便是要扩充革命的认识和革命的气势,来镇压周围的敌人。”(《北伐途次》)

10日 积极开展工作。以后,查封两家反动报纸,组织新闻检查委员会,组织民众团体。郭沫若这几天所过的生活是“最

紧张、最有趣味的的生活，晚上睡觉的时间很少，多不过三四个钟头，甚至连熬几个穿夜的事都有”。（《北伐途次》）

13日 汉口码头工人捉了工贼郭聘伯，送交政治部，郭沫若决定将其扣留，并派人去武昌向邓演达请示，要求把他枪毙以镇压反革命势力。

14日 邓演达命令郭沫若把郭聘伯解往武昌，郭只得服从。他后来回忆说：“事实是这样。在我们的请示到达武昌之前，郭聘伯的神通已经先到了彼岸。他的党羽在总司令部告了状，说码头工人任意捕人。……就在第二天便由总司令部出过一张布告，对于民众团体任意捕人的事严加禁止。一有我的请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经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们又主张枪决。这是很把邓主任作难了一下的。他还有更严厉的他的上司。^①因此，他也比我的请示还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过江去了。”（《北伐途次》）

18日 总司令部秘书处蒋先云在给宣传科副科长朱代杰的信中，责备汉口办事处处理郭聘伯的事是“不懂策略”，并说邓演达对他说郭沫若是“一位感情家”，还说政治部中有所谓四川派和广东派等等。郭沫若知道后，当晚就写了辞职信。

19日 清早，派人把辞职信送往武昌城下，交邓演达。晚，邓演达来汉口政治部办事处，郭沫若有意回避，没有见面。

20日 清晨，应邓演达之请到他留宿的旅馆里谈话。邓对郭沫若的辞职表示挽留。郭沫若当面表示“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说：“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后经邓演达再三劝说，才答应

^① 指蒋介石。

继续留任。(《北伐途次》)

下旬 总司令部委任郭沫若为湖北省政府教育科长，郭沫若坚辞不就，他对邓演达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做官的，受你的指挥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员们的意旨我却办不到。”李汉俊、詹大悲来相劝，也未果。李汉俊提议郭沫若任拟议中的教育编制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也坚决谢绝不就，因为他对湖北省政府不满：“湖北省政府在当时真正是一种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那个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品都有。有的昨天还是罪该万死的旧军阀，而今天便一跃而成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勋。”(《北伐途次》)

本月 小说散文集《橄榄》由创造社出版。全书共四辑：《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山中杂记》、《路畔的蔷薇》。

十 月

10日 上午参加在汉口北郊华商跑马场召开的国庆纪念会。大会进行时，传来攻克武昌城的消息，民情沸腾，立即举行庆祝大游行。

参加庆祝大会后，去汉口公会堂出席湖北总工会成立大会。

11日 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对邓演达要政治部迁往武昌表示异议。

下午渡江去武昌，在省议会同被俘的北军武昌守将刘玉春谈话。

12日 随政治部由汉口迁往武昌。同日，《革命军日报》刊登郭沫若和刘玉春的谈话内容。

13日 带副官和勤务兵察看攻城时的战场。

本月 23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

十一月

7日 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会上传来昨日攻克九江的消息，武汉三镇为之轰动。

晚，接邓演达自汉口打来的电话，为了适应军事进展的需要，命令郭沫若迅速去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

8日 晚，带李德谟等六人，穿便衣乘英国轮船去九江。郭沫若说：“总政治部派我们到九江去做工作，本来预定的是两个礼拜，但一到了九江，老蒋就不肯放我们回来了。从此便在他的形同监视之下，做了半年的秘密工作，他始终是不肯放我们回来的，尤其是对我个人。”（《脱离蒋介石以后》）

十二月

本月 《中国青年》第144期译载列宁的《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即《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

同月 有声电影（系从美国运来的特福莱有声短片若干种）首次在上海试放。

本年 作散文《矛盾的调和》。载《洪水》1926年12月1日增刊。收《水平线下》。收入《沫若文集》时题名《矛盾的统一》。

同年 作散文《五月三十日》。收《现代百科文化》（上），1935年3月上海经纬书局出版。

同年 作诗《题刘海粟山水画》。见《美术》（双月刊）1978年

7月第4期绍龙:《胸中激浪笔底波澜——忆郭老对美术事业的关怀》一文。

本年 刘半农的诗集《瓦釜集》、《扬鞭集》，李金发的诗集《为幸福而歌》，周作人的散文集《雨天的书》，沈从文的文集《鸭子》等分别出版。

一九二七年(三十六岁)

一月

中、下旬 在武汉，往第七军李宗仁处劝说反蒋。据李宗仁回忆说：“他们反蒋的理由不外数端：一是说，蒋在制造军事独裁。……再则说，蒋氏个性偏私狭隘，北伐各军待遇悬殊。……还有就是说，蒋氏想以军力扶持党和政府于南昌，破坏党纪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蒋脱离群众，走向反革命途径，和旧军阀、官僚相勾结等等。”（《李宗仁回忆录》，广西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30日 应邓演达电邀，由南昌至庐山。当时，郭沫若正以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领导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也正是“蒋介石和武昌政府酝酿着分裂的时候”，邓演达是代表武汉方面派到庐山见蒋介石的，蒋则企图用调虎离山之计把邓留下，要他到南昌任总司令行营代理参谋长，这是武汉方面和邓本人所不能同意的，但蒋是上司，邓找不出抗命的理由，于是，邓演达和郭沫若在旅馆里商议对策。（《海涛集·南昌之一夜》、《脱离蒋介石以后》）

二月

1日 旧历除夕，早晨至庐山疗养院见蒋介石。郭沫若原拟

和邓演达、张静江一起下山去南昌，但蒋介石留下张静江。郭沫若便与邓演达和褚民谊一起下山，由九江乘火车赴南昌，刚进南昌城即遇“兵变”。事后，郭沫若认为，这次兵变是蒋介石秘密策划的，企图“在乱军中把邓演达打死”。（《海涛集·南昌之一夜》、《脱离蒋介石以后》）

晚，与邓演达同宿南昌总司令部。

3日 清晨，回到在东湖的政治部。九时左右，接邓演达从南门外来电话，告知他将回武汉，决定与蒋介石分手，并要郭多加小心。

同日 接刚从庐山回南昌的蒋介石的电话，要郭沫若去总司令部。蒋一见面就打听邓演达的下落，郭沫若巧妙地瞒过了蒋。

上旬 致郁达夫信，对郁于1月16日发表的《广州事情》（载《洪水》第3卷第25期）提出批评。郁根据他在广州时耳闻目睹的种种腐败现象，在文中猛烈地攻击广州政府，并失望地认为，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已为新军阀新官僚们所败坏。此文发表后，引起正在武汉的郭沫若的极大不满，于是在给郁的信中对他提出批评。后郭又在致成仿吾信中，提及此事。成也去信责备郁，并发表了《读〈广州事情〉》短文。于是引起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其他创造社朋友的间阂，后终导致郁达夫退出创造社。

对这段纠葛，郁达夫在《日记九种》中写道：（2月12日）“接到了郭沫若的一封信，是因为《洪水》上的一篇广州事情责备我倾向太坏的，我怕他要为右倾所笼络了”。“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郭沫若在1930年1月26日写的《文学革命之回顾》中则这样认为：正在“五卅”前后，创造社内部出现了

立，“郁达夫在郭沫若参加了实际革命的时期中，他把创造社改组了，把一批年青人逐出社外，实际上就是这个对立的表示。一方面郭在参加革命，另一方面郁偏在孙传芳的统治期中骂‘广州事情’。一方面郭在做‘文学与革命’，另一方面郁便在骂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投机分子。”

三 月

12日 为赣州陈赞贤惨案^①找蒋介石，要求惩办凶手倪弼。蒋批示：“免职查办”，但只让登报，不让打电报去赣州。郭认为这是“欺骗民众”的行为。他说：“赣州事件的起初是在正月尾间，……我当时便拟了一个办法呈报给他，请他将倪弼调开，然后赣州的事情才有办法，但他没有批发下来。后来我又当面向他说过两次，两次他都答应了我要把倪弼调开，但总不见他实行。”终于酿成杀害陈赞贤事件。（《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14日 蒋介石秘密委任郭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②，意在拉拢郭沫若，要郭和武汉脱离关系。本日，由总参议张群亲手把委任状交给郭。郭沫若在得知蒋介石意图之初，即密电武汉中央。他回忆说：对于蒋介石的叛逆，“在那时候我已经得着了确实的证据，我们那时候早就可以离开他了。但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叫我‘虚与委蛇’，好到长江下游去再做秘密工作”，这样我“做了一个秘密的政治部主任；因为老蒋那时还在掩耳盗铃，他这个命令要到南京之后才能够公开。”（《脱离蒋介石》）

^① 陈赞贤，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任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3月6日被反动派杀害。

^② 委任状写的是3月1日。（《脱离蒋介石以后》）

石以后》)

15日 参加南昌近二十万人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大会。会上，因“蒋介石的声音不能传遍，他便叫我用传话筒替他传达”，“他说一句，我传达一句，传到后来他的演说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论调”，“我真想把传话筒来打得他一个半死”，但迫于情势，只得忍耐着。（《脱离蒋介石以后》）

晚，“听说省党部有解决南昌市党部的消息”，即去找将离南昌的蒋介石，蒋当即写一信给段锡明，说“江西党务以后事事须与总政治部接洽，对于市党部事宜缓和为是”，但随后段锡明、周利生仍强行解散市党部，并企图屠杀人民。（《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16日 由南昌到九江。

17日 奉命上庐山视察阵亡将士墓的工程，下午三时回九江，目睹暴徒行暴刚毕，许多人被打死打伤。^①即去见蒋介石，要求弹压制造惨案的暴徒。蒋介石却派兵弹压工人，占领总工会，多方保护暴徒。（《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18日 自九江赴安庆。

19日 抵安庆。郭沫若以为只要离开了蒋介石，“在安庆还可以做些工作，所以又决心赶到安庆，但是结果是我们前脚到，他后脚就来，来就发生了‘三·二三’惨案”。（参见《脱离蒋介石以后》、《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同日 下午，和朱克靖同往李宗仁处，将武汉国民政府颁发的安徽省主席委任状交李，要他就职，李坚辞不就。（据《李宗

^① 蒋介石在九江派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群众多人，当工人纠察队准备解除暴徒武装时，蒋又派军队镇压，保护暴徒，占领市党部和总工会。

仁回忆录》)

22日 下午，出席安徽省党部召开的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典礼。典礼毕，得悉当日受总政治部命令停止职权听候审查的鲁班阁的伪总工会的暴徒们，在总司令行营前闹事，殴伤省党部常委光明甫。即赶赴现场，闻蒋介石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便去见蒋。蒋介石假惺惺地要政治部“调查”，其实，这一事件正是他亲手策划的。

晚，得安庆反动团体明日举行欢迎蒋介石的“请单”，“预算着他们是定会有一番大规模的暴动”，即派人调查，“又亲自跑去见蒋介石”。

当晚，又接到武汉政府电令，命郭到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以后》）

23日 晨，去见蒋介石，以武汉来电事告蒋。蒋介石要郭沫若到上海后，把“总司令行营政治部”的招牌打出来，还说“你是要跟着我同去的，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郭听了，心里暗笑。“我老早就想不顾一切，丢了就跑；但是我一人跑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跑了，我们那里的几十个同志不免就要大受冤屈，要带着几十个人同跑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了”，所以只得暂时忍耐，以便见机行事。（《脱离蒋介石以后》）

同日 得知暗中指使安庆反动集团闹事的是总司令部某人。为此，再次去找蒋介石。于无意中，从安徽电报局长（反动分子）口中探明是杨虎等人在指挥反动分子暴乱。又从交通处长陈福庭处知道，真正的指使人是蒋介石本人。郭沫若佯作不知，要蒋派兵保护省、市党部。蒋用谎言相欺骗，说：“好吗，你去向陈调元讲吧”，“他是维护这里治安的。”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我平生最感趣味的，莫过于这一段对话。他以为我是全不知情，在把我当成了小孩子一样欺骗呵。蒋介石，你要掩盖些什么，你

的肺肝我已经看得透明，你真可谓心劳日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当日，安庆又发生流氓行凶暴乱事件，省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均被捣毁，许多革命同志被打受重伤，暴徒们高呼“新军阀神圣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拥蒋反共口号，气焰甚为嚣张。

当晚，为暴徒行凶事，又去找蒋介石，他仍然是老调子：“好啦，你去调查一下好啦，唉，唉”。他最后还对郭沫若说：“你去把他们各项的执行委员找出来吧，我们好保护他们”。郭沫若意识到这是一项阴谋：“好保护他们？哼，找出来好让你一网打尽吗？”这是郭和蒋的最后一次谈话。（《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24日 清晨，接蒋介石离安庆前亲笔信，说“等候不及”“先赶赴下游”。这“可以说是蒋介石放走了我们”，为此，甚感庆幸。虽然，算是“脱离了他的虎口”，但“仍然是在他的虎肘中”，蒋的总参谋长朱一民仍旧“监视”着郭沫若等的行动。蒋介石走后，“安庆的左派分子都集中到总政治部的周围，总政治部和他们总司令部形成了两个对垒。青红帮的流氓们天天造出谣言，要来捣毁总政治部，并且要用暗杀手段来对付我们。”（《脱离蒋介石以后》）

晚，蔡文彬派人来接洽，言可举兵反陈（调元），但怕李宗仁伤害他，想得到保障。

25日 上午十时，和辛焕文去江左军总指挥部见李宗仁，鼓动其起兵反蒋，未果，这样，“自己便感觉着危险了。无论上行也好，下行也好，那时候我急于想离开安庆，但是不凑巧地那几天都没有船”，焦急万分。郭沫若后来说：“我最痛心的，就是总政治部的武力只有两支驳壳枪，那时我们假如真有一连人，把一切反革命派都可以扫除干净了”。（《脱离蒋介石以后》）

26日 留安庆的总参谋长朱一民下令所有总部人员乘船赴

南京，后因船小容纳不下未成行，于是改装移居安庆城外候船。

28日 杨正宗和政治部留在南昌的人员坐船来安庆，郭沫若等拟乘此船去上海，后因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有重要任务，便与朱同去九江。

29日 抵九江，陪朱克靖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报告安庆的情形。并派辛焕文等往武汉，带一信给邓演达表明自己反蒋的态度，决定去南昌，“把蒋的罪状宣布出来”。（《脱离蒋介石以后》）

30日 化名高浩然，假充是第三军的参谋，与朱克靖乘火车赴南昌，在南昌东湖边朱玉阶（朱德）的家里住了四天。（《脱离蒋介石以后》）

同日 去见王治平副军长，报告安庆的情况。

31日 在朱德家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房间里，用将近一天的工夫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稿后便拿去付印”。文章全面地揭露了蒋介石制造赣州、九江、安庆惨案，叛变革命的罪行，指出蒋介石已经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还要狠毒，还要狡诈的刽子手”。本文原题为《我离开蒋介石以后》，1927年南昌总政治部出版。

四 月

1日 作《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并决定次日离开南昌。（《脱离蒋介石以后》）

同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促进下，和鲁迅等联合发表《中国文

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痛斥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暴行。载《洪水》第3卷第30期。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发表时郭沫若未署名，署名者有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沈鹏年：《郭沫若、茅盾、丰子恺谈鲁迅的未刊文献》，载《书林》1981年第4期）

2日 下午赴赣江边乘火车，因车已开，不得不改日动身。此日正值南昌民众团体解散伪省党部，就往总工会观看被捉之反动分子伪省党部宣传部长、伪省府教育厅长程天放等。

晚，带了两个同志去捉伪财政厅长周雍能，未获。（《脱离蒋介石以后》）

3日 自南昌回到九江。

晚，接邓演达武汉来电，意欲令郭等去上海。这事使郭沫若进退维谷，后决定先回武汉，请示行止。

4日 上午代江西省政府起草一篇宣言。中午写了如下的一段日记：“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脱离蒋介石以后》）

5日 辛焕文从武汉来，传达“中央”的意见，仍要郭沫若赶赴长江下游。其实辛在武汉只见过邓演达一面，而邓曾三次电催郭回武汉，但郭均未接到。

6日 清晨，和辛焕文乘轮离九江赴下游。途中，曾作诗一首，抒写坚定向前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渴望“一片赤色的洪涛涤荡乾坤”。（《脱离蒋介石以后》）

8日 上午到浦口，傍晚渡江，在下关车站和辛焕文搭兵车离南京。阅7日上海报，知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已被蒋介石查封。

9日 到苏州下车，改装后住在胥门外一家破旧的客栈里。

看沪报，知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工作人员被捕，疑李民治与龚文彬等在内，万分不安。郭沫若派辛焕文往上海调查情况，自己在苏州旅馆里度过了“最痛苦”的五天。（《脱离蒋介石以后》）。

10日 去阊门，在市党部第四区分部阅报，打听侯绍裘与张曙时的消息，无结果。晚，为上海的总政治部工作人员担忧，也思念妻子儿女，作诗一首。诗见《脱离蒋介石以后》。

11日 疑在上海的十九位同志均已被捕，为营救他们，决心牺牲自己。遂拟就一份电报稿，准备发往南京告诉蒋介石：“一切责任由沫若个人负担”，要求“迅予释放”被捕同志。同时，发一信给在武汉的蔡畅，报告自己的行踪，并告李富春已到上海。同日，又写了遗言，准备坐牢、牺牲。

晚，辛焕文由沪返苏，带来李民治信，知李民治、龚文彬等均未被捕。

12、13日 因没有去上海的车与船，仍留在苏州。这时，他曾想写一篇叫作《未完成的悲剧》的小说，“把这场滑稽的悲剧写出来”，但没有完成。（《脱离蒋介石以后》）

14日 由苏州乘火车至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发生，上海“白色的恐怖正是达到高潮的时候，闸北的市面真是惨淡。”街上的行人“每行一步都好象提防着要触地雷的一样”，一片恐怖景象。郭沫若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受到内山完造夫妇的殷勤款待。不久，李民治、龚文彬、辛焕文用汽车把郭接到静安寺路李民治家中。（《脱离蒋介石以后》）

下旬 乘一只英国轮船，由上海回武汉。“船到南京城下，正遇着孙传芳反攻，两军隔江炮轰，船只好停在江心五天。”（《海涛集·涂家埠》）

本月 诗集《瓶》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本月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葬送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同月 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杀害。

四、五月间

郭沫若回到武汉后，曾出席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欢迎大会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北伐军的总司令部，已经变成屠杀人民的屠场了！”台下报以一片掌声。

此后，郭沫若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一起，不时去军政学校作政治演讲。臧克家回忆道：“在北伐^①誓师大会上，郭沫若同志对着十万大军讲话。他说：帝国主义、封建地主，欺侮我们，剥削我们，从我们身上剥去我们的长衫，又进一步，剥去我们的背心，使我们饥无食，寒无衣，我们要夺回我们的长衫呵，我们要夺回我们的背心呵！”（均见臧克家《奔向武汉——光明的结穴处》，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六 月

月初 以总政治部副主任身份，赴河南慰劳张发奎部将士。

22日 作《蒋先云的诗》。悼念5月28日在北伐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蒋先云。载武汉《革命军副刊》第10期。

① 指从1927年4月19日开始的第二次北伐。

本月 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杀。

七 月

8日 作《一个重要的更正》(即致孙伏园信)。载7月11日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

本月 被任命为第四方面军国民党党代表,兼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该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是张发奎。

同月 作《脱离蒋介石以后》。文章详细记述了脱离蒋介石以后的全部经历,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有关史实,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反革命面目,是继《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的又一篇战斗檄文,发表于本年武汉《中央日报》。收《沫若文集》第8卷。

同月 所译剧本《银匣》(英 高尔斯华绥)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本月 15日,武汉的国民党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叛变革命,从此“宁汉合流”。

八 月

1日 中共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时在九江,仍被推举为由周恩来、朱德等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以及由宋庆龄、贺龙、恽代英等七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并任起义军政治部主任。

2日 与李一氓一起在庐山住了一夜。

3日 清晨，与李一氓从庐山下来，应第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张发奎邀请，去指挥部商谈“八一”南昌起义后，处理政治部的善后办法。张主张解散，郭沫若表示同意，但要求“人员一律以礼遣散，不作留难”。

张发奎要郭沫若同去日本，郭谢辞。

晚，与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乘手摇车离九江去南昌。

4日 凌晨，至德安车站，八时，入城见守军的营长，得通行路条后，继续前进。车至涂家埠，为了阻止在南昌起义中被缴了械的士兵所乘的列车开往九江，被散兵们包围殴打，随身的手枪和带往南昌的二十七枝驳壳枪均被劫走。

下午三时至牛行车站，赣江已封江，乘收拾军用电线的船只过江至南昌。在贺龙军部受到贺龙、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的热烈欢迎。

当晚，即至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

5日 随部队出发南下。

本月 在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见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收《悼念郭老》）

同月 所译剧本《法网》（英 高尔斯华绥）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本月 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撤销了陈独秀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九月

30日 夜随起义部队撤出汕头，在汤坑遇敌，作战失利。

本月 抵汕头后，在岭东《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宣告：“红军进入了汕头市”。（据方殷：《忆郭老二三事》，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十月

3日 抵普宁县所属的流沙。

4日 小说《一只手——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脱稿。写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直至建立自己政权的故事。连载于《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3月1日、5月1日第1卷第8、第9、第10期，署麦克昂。1933年4月由上海大东书店出版单行本。收《沫若文集》第5卷。

6日 和贺龙、叶挺等参加在流沙天后庙召开的首脑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报告。

会后，继续南行。部队在深夜行军时，被敌人打散，遂与大部队脱离而掉队，与安琳、易君、傅君等结伴同路。

7日 四个人在盐酸寮地区的瓦窑墟商议决定从海口往香港。由一农会青年会员作向导至盐酸寮镇，住农会主席家中。

8日 隐居在盐酸寮农会主席家的草仓中，共六天。这段时间内，农会主席为郭沫若等去香港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14日 由农会主席带领，冒大雨步行了一百二十里，至神泉，住在陈洽和老板的碗店楼上。为等顺风，在此地又滞留了十天。

郭沫若为答谢农会主席和陈老板对他们的热忱接待和周密安排，曾为陈老板写下一些字条留作纪念，其中有一首是：“夜雨落临川，将军匹马还；一声传令笛，铁骑满江山。”（参见王金生：《郭老自己也忘记了了的诗》，载1959年12月1日《羊城晚报》）

24日 与安琳、傅君（易君因病留在盐酸寮）一起上船出海。

下旬 从神泉乘帆船至香港。在香港住了将近一个月，转道至上海。

本月 所译《打渔的姑娘》（德 海涅）发表。收《德国诗选》。

同月 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德国诗选》，内收郭沫若译诗多首。

十一月

20日 作《到宜兴去》一文的《作者补记》，附于《到宜兴去》文后。收《水平线下》。

30日 在上海，补译和整理《浮士德》第一部毕。《浮士德》开译于1919至1920年间，这次“潜伏在赛乐安路的一座亭子里”，“把损失了的补译起来，把残存的旧稿，也彻底润色了一遍”，花了十天功夫“把这项工作完成了”。（《跨着东海》）第一部于1928年2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本月 由于“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因此，曾打算全家都去苏联。（《跨着东海》）

同月 月底，桂毓泰和夫人斋藤花子由广州来上海，留宿一夜。花子夫人在船上传染上了斑疹伤寒（于次年2月死去），郭沫若也因此被传染，于十余天后发病。

本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瞿

秋白同志主持中央工作。

同月 国际无产阶级作家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组成“世界革命文学国际局”。

同月 蒋光慈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十二月

5日 得通知,去海参威的最后一只轮船将于明天开航。

6日 全家等待动身赴苏联。晚接通知,船又延期启航。

8日 晚,突患重病,“头痛,四十度的高热,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确诊为斑疹伤寒。(《跨着东海》)

10日 住入北四川路日本人石井勇办的医院。郭回忆说:“入院后在开始的两个礼拜当中,我完全失掉了知觉。不断地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在最严重的时候,医生已关照安娜“准备后事了”。(《跨着东海》)

最后一艘苏联轮船于12日开出,郭沫若由于病危而失去了去苏联的机会。他后来说:“我时常在这样作想,假使我不发病,我当然决不会有此后十年间陷在日本的局促的生活。更假使发病得迟几天,我已经上了船,由于海浪的颠簸及车船的劳顿,我可能死在旅途上。”(《跨着东海》)

本月 译《小儿病》(日 片冈铁兵),收《日本短篇小说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高汝鸿。

同月 作《英雄树》。载《创造月刊》1928年1月1日第1卷第8期,首次署麦克昂的笔名。“我这‘麦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译,‘昂’者我也,所以麦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跨着东海》)收《文艺论集续集》。

一九二八年(三十七岁)

一月

1日 以麦克昂的署名与鲁迅、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三十余人联名发表《创造周报复活宣言》，声明今后要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向旧社会进攻。载本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此宣言最早刊于1927年12月3日的《时事新报》。关于这件事，郭沫若回忆说：“当在一九二七年的年末，那时鲁迅先生在上海，我也从广东回到了上海。郑伯奇、蒋光慈诸人打算恢复《创造周报》，请鲁迅先生合作，这个提议我是首先赞成的。记得在报上还登载过启事，以鲁迅先生为首名。我当时并曾对伯奇不止说过一次，有机会是很想和鲁迅先生面谈；但不久我病了，所以这件事情竟没有实现。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在另一处也谈及酝酿与鲁迅合作的事，因为“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回国了，他们以新进气锐的姿态加入阵线，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种‘退让’的办法，认为《创造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没有恢复的必要，要重新另起炉灶。结果我退让了”。（《沫若文集》第12卷《鲁迅和王国维》）因此，这一计划未能实现。郑伯奇回忆说：那时，许多进步作家和革命知识青年从各地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蒋光

慈、段可情、黄白薇等先后都来了，不久，鲁迅、郭沫若也到了上海。“我们觉得这么多进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一定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蒋光慈和段可情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同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思，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并且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我们都很高兴。沫若也表示非常欢迎。我为此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先生。这计划曾由鲁迅和沫若领衔发表过启事。后来因为仿吾和在日的创造社同人另有主张，这计划没有实现”（《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后来，创造社另行创刊《文化批判》，发表一系列文章，由此引起了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

3日 改削诗《凤凰涅槃》。（参见本谱1920年1月20日条）。

4日 出医院，仍和妻儿们住在赛乐安路寓所。

5日 作诗《Reconvalescence（恢复）》。这是他在病床上所写的二十四首诗的第一首，不但表现了他病体的“恢复”，更表现了他在大革命洪流中颠波以后革命精神的“恢复”。收《恢复》。

又 作诗《述怀》。表述自己的歌喉将继续为无产阶级歌唱。收《恢复》。

又 将《诗经》中的《关雎》译成现代文。收《恢复》，题为《〈关雎〉的翻译》。

又 作诗《Hysterie（歇司迭里）》。收《恢复》。

又 作诗《怀亡友》。以真挚的感情怀念在革命中牺牲的孙炳文烈士。收《恢复》。（参阅王廷芳：《光辉的一生 深切的怀念》，载《郭沫若研究专刊》第1辑）

6日 作诗《黑夜和我对话》。斥资本主义及其走狗。收《恢复》。

又 作诗《归来》。抒发从病院归家时的心情，诗中充满了对妻子儿女们的爱，也表现了对祖国和人民的忠心。收《恢复》。

又 作诗《得了安息》。收《恢复》。

7日 作诗《诗的宣言》。表明自己“爱的是那些工人和农人”，“仇视那富有的阶级”，明确宣告：“我的阶级是属于无产”，希望有一天“如暴风一样怒吼”。收《恢复》。

又 作诗《对月》。收《恢复》。

又 作诗《我想起了陈涉吴广》。歌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的领袖陈涉吴广，并指出只有“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才能解救中国，改造世界。收《恢复》。

又 作诗《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指出，中国人民“应该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和亲”，“应该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相信有了工农这支巨大的队伍，一定会使整个旧世界“平地分崩”。收《恢复》。

又 作诗《传闻》。对帝国主义和新军阀表示蔑视并坚信工农必然会取得胜利。收《恢复》。

又 作诗《如火如荼的恐怖》。表明自己不怕白色恐怖，不怕牺牲，决心以“视死如归”的态度对付敌人的迫害：“杀了一个要警惕百个”。收《恢复》。

8日 作诗《外国兵》。指出帝国主义的士兵，是外国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呼吁这些士兵“掉转手中的枪身”，去对准那真正的敌人。收《恢复》。

又 作诗《梦醒》。怀念在家乡的亲人，并记述了去年8月4日在涂家埠被溃兵抢劫、殴打的情景。收《恢复》。(此诗未注明日期，但其前后都是8日所作，故系于此)

又 作《峨嵋山上的白雪》。怀念故乡。收《恢复》。

又 作《巫峡的回忆》。回忆十五年前初出夔门的情景，表示：“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收《恢复》。

又 作诗《诗和睡眠争夕》。收《恢复》。

9日 作诗《我看见那资本杀人》。收《恢复》。

10日 作诗《金钱的魔力》。诅咒金钱吃人的现状。收《恢复》。

又 作诗《血的幻影》。追念“昨日”战斗的生活，感叹当前革命处于低潮，号召“快举起我们的火炬”把“一切的耻辱、因循、怀疑、苦闷……投向大火中，不然，我们是永远不能再生！”收《恢复》。

同日 作文艺杂谈《桌子的跳舞》(1—10)。批评文坛上存在的种种弊病，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载1928年《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收《文艺论集续集》。

11日 为《前茅》作《序诗》。认为“这几首诗或许未免粗暴，这可是革命时代的前茅。”“在当时是应者寥寥，还听着许多冷落的嘲笑。但我现在可以大胆地宣言：我的友人已经不少。”收《前茅》。

又 作《暴虎辞》的《附白》，说明“它的精神是反抗既成的权威”。收《前茅》。(参见本谱1921年夏季条)

15日 清早将《恢复》誊写完毕。下午，成仿吾来，“将《恢复》交了他。”(《离沪之前》)

同日 始作日记《离沪之前》，至2月23日毕。连载于《现代》月刊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第4卷第1期至第3期。1936年今代书店出版单行本。作者后来回忆说：“……记日记的事情我是素无恒心的，忙的时候没工夫记，闲的时候没事情记，在那样的病后记下了整整一个月以上的生活的纪录在我却是很稀

罕的事。”(《离沪之前》前言)

16日 读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安娜买回高阜译的《资本论》二册,读《商品与价值》一章终,又读列宁的《党对于宗教的态度》。

同日 夜,读《文化批判》杂志,作诗《战取》。收《恢复》。

17日 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并把其中关于唯物史观的一段重要结论译出记录在日记上。

18日 继续读《资本论》。

同日 作完文艺杂谈《天才病治疗》,改题为《桌子的跳舞》(11—12)。第11则谈艺术的政治性,认为“不革命的作品还勉强可以宽恕。反革命的作品是断乎不能宽恕的。”在第12则中指出,“文艺是阶级的勇猛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它只有愤怒,没有感伤。它只有叫喊,没有呻吟。它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徊。它只有镰刀斧头,没有绣花针。它只有流血,没有流泪”。载1928年《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收《文艺论集续集》。

同日 将《桌子的跳舞》(11)中的主要观点和引文摘录于日记中。

19日 中午李一氓来,交来周恩来的回信。此时周也在上海,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联系。(参阅王廷芳:《光辉的一生 深切的怀念》,载《郭沫若研究专刊》第2辑。)

又 读托勒尔的《Masse Mensch》(《人民大众》),郭沫若觉得:“毫无意趣。前五六年对于托勒尔之心醉神驰,对于表现派之盲目的礼赞,回想起来,真是觉得幼稚。”

午后,蔡畅来访,她“打扮得象一位女工”。晚读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离沪之前》)

同日 作文艺杂谈《桌子的跳舞》(13—16)。第13则指出感伤主义是一条歧路,并认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反对感伤主义的态度

度和出发点是不同的。第14则指出“拜金主义派的群小是我们当前的敌人。”第15则引述列宁《左派幼稚病》中关于尽可能联合同盟者的一段话，认为这一“伟大的战略”，也可以用在我们的“文艺战上”，“我们应该组织一个反拜金主义的艺术家的大同盟”。第16则为结尾。载1928年《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收《文艺论集续集》。

20日 李一氓和成仿吾来访。

21日 “午前读秋白译的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中《艺术与唯物史观》一章。”（《离沪之前》）

22日 郑伯奇和成仿吾来访。

23日 旧历元旦，傍午，编好《水平线下》。午后，成仿吾来。又写了一段小品《一个对话》。

24日 作对话《两颗煤炭》（未完稿），批判弃贫爱富的市侩思想。

28日 作诗《夜歌》。载1932年11月《现代》月刊第2卷第1期。

又 改作诗《牧歌》。载1932年11月《现代》月刊第2卷第1期。

同日 作诗一首，写在日记中。见《离沪之前》。

29日 读完《资本论》第一卷。成仿吾来，交来《浮士德》的校样，晚上校对至一时过后。

又 在《日记》中写道：“威特林与蒲鲁东均工人出身，但均逃入了小资产阶级的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工人出身，却成了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导师。谁说无产政党不要知识阶级？谁说非工人不能做无产阶级的文艺？”又认为“中国现势很象1848年的欧洲”。“法兰西二月革命影响及于全欧，但德、奥、比、法均相继失败，白色恐怖弥漫，马、恩都只得向海外亡命。”（《离沪之前》）

30日 李一氓带来《布尔什维克》杂志几本。成仿吾来访。

31日 午前成仿吾送来《洪水》二册。校正《盲肠炎》。（《离沪之前》）

晚，成仿吾又送来《女神》和《星空》各一册。校读《女神》。（《离沪之前》）

本月 作诗《电车复了工》。咏赞上海工人坚持罢工的英勇行为。

本月 《未名》半月刊在北京出版，由鲁迅指导，台静农、李霁野等具体负责，出至1929年5月停刊。

同月 太阳社在上海成立，并创刊《太阳月刊》，同年7月停刊。太阳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学团体之一，发起人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成员有林伯修（杜国庠）、沈端先（夏衍）、洪灵菲、楼建南（适夷）、杨邨人、殷夫、森堡（任钧）等。

同月 创造社的《文化批判》月刊创刊，同年5月停刊。《文化批判》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刊物，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是主要撰稿人。

同月 创造社在《文化批判》、《创造月刊》上发表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太阳月刊》也发表了蒋光慈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等文章，提出作家“转变方向”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并和鲁迅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论争持续到翌年下半年，各方面发表文章大约一百多篇。通过论争，革命文艺队伍中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解更为正确、深刻，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为

1930年“左联”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同月 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出版。

同月 郑伯奇的《抗争》在《创造月刊》上发表。

二 月

1日 所译《浮士德》第一部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同日 晚成仿吾来访，“安娜为祝《浮士德》出版，特购‘寿司’（日本制的冷饭团）一大盘，儿辈皆大欢喜”。郑伯奇来，“言独昏（按：指王独清）终究做了野鸡大学的野鸡委员。”（《离沪之前》）

深夜遭窃，放在楼下铁箱里的皮外套和皮靴均被偷去，这是去年年底为去苏联而准备的。

2日 编《沫若诗集》目次。安娜往学艺大学索取1925年所欠的薪水。

晚赴内山书店，赠内山以《浮士德》一册；又赴创造社。

阅罗伯特·修士作《华盛顿传》，认为该书“称华盛顿为一流氓无赖，牛皮大王，赌博大王，好色大王。这或者近于事实，中国历史上所谓创业的帝王多是这样的人物，一被偶像化了便神圣了起来。偶像的本质原来是泥塑木雕的。”（《离沪之前》）

3日 丘某送来邓演达所撰政治宣言，阅过便交还给他。

《沫若诗集》第一种编成，计剧四篇，诗百首以上。

内山送来葡萄酒两瓶，祝贺《浮士德》出版。（均见《离沪之前》）

4日 偕安娜访郑心南，赠《浮士德》一册，郑赠以《小说月报》的特刊《中国文学研究》一册。

编就《水平线下》，并作《序引》，说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以

‘五卅’为分水岭”。该书第一部是“五卅”以前1924年与1925年之交的私人生活和“对社会的一些清淡的但很痛切的反映”；“第二部的《盲肠炎》便大多是‘五卅’以后的关于社会思想的论争。”又说，在这部书里，反映了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路，“这是一个私人的赤裸裸的方向转换。”“从这一个私人的变革应该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的变革”。“这儿是飞跃的准备。飞跃罢！我们飞向自由的王国！”收《水平线下》。

5日 赴创造社编改《文艺论集》和《译诗集》。晚，李初梨邀往谈话，为李初梨、成仿吾、郑伯奇、彭康、朱盘、冯乃超等“谈说南昌‘八一’革命”。（《离沪之前》）

6日 赴创造社，校《文艺论集》、《前茅》。又，参加社中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听郑伯奇讲列宁的《马克思的价值论》。（《离沪之前》）

冠杰、董琴、桂毓泰、费鸿年、成仿吾等先后来访。

晚校《文艺论集》毕。

8日 读旧译《查拉图斯屈拉》，“有好些地方连自己也不甚明了。着想和措辞的确有很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他的所谓超人哲学结局是夸大了的个人主义”。（《离沪之前》）

斯啸平来。晚赴创造社，与郑伯奇、王独清晤谈。

9日 读托尔斯泰《黑暗之力》毕。认为此书“也没有怎么大的逼人的力”，并说：“使尼奇德犯罪的根本原因是财产，是一切的私产关系。”（《离沪之前》）

成仿吾来访。

初定11日去日本，为“又要登上飘流的路”而“觉得不安”，“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郭沫若在去日本前一定要见到周恩来

同志，这“说明他之去日本，是在周恩来同志指示下安排的”。（见王廷芳：《光辉的一生 深切的怀念》）

10日 “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离沪之前》）“聆听了周总理的指示”。（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收《悼念郭老》）。成仿吾亦来，约了李初梨等来谈话。在与周恩来同志会见后，郭沫若“决延期乘十八号的‘坎拿大皇后’”赴日本。打算经日本再去苏联。晚年，他曾对秘书王廷芳谈及那时的情况，当时，周恩来同志要资助他一部分钱，但他坚决不要，因为“组织上现在也很困难”。（见王廷芳：《光辉的一生 深切的怀念》）

11日 午后，“民治与继修同来，谈及刊行周刊事。”（《离沪之前》）

12日 为去日本问题而苦闷，“究竟往东京呢？还是往长崎？”“到日本去靠着什么生活？”等等。

午后去出版部，读了彭康的《评人生观之论战》，认为“甚精彩，这是早就应该有的文章。”与“胡适辈的无聊浅薄”相比，“真是相去天渊”。（《离沪之前》）

13日 赴创造社出版部，与成仿吾等晤谈半日。

14日 民治、继修又来谈周刊事，后仿吾、伯奇亦来，经商议，决定出周刊，由郭提名为《流沙》，“这不单是包含沙漠的意义，汕头附近有这样一个地名，在我们是很可警惕的一个地方”。（《离沪之前》）后来，由郭沫若题了刊头，于3月间出版半月刊，至5月30日第6期停刊。

15日 打算写小说，并在《日记》中记下了篇名：“（1）酒家女（2）党红会（3）三月初二（4）未完成的恋爱（5）新的五月歌（6）安琳（7）病了的百合花”。（《离沪之前》）后来除第5篇外，其余都没有写出。

16日 读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认为康德的所谓“永远

和平”，其实是“求资产阶级的安定的说法”，并且指出“有了个人的财富”，是不可能“平等”的。

偕安娜、仿吾出席民治夫妇、继修夫妇、叔薰夫妇、公冕、啸平、安琳等为郭举行的饯别宴。

决定“改乘廿四号的卢山丸”赴日，“家眷于同日乘上海丸。”（《离沪之前》）

晚赴赵心南家，谈今后与商务印书馆相约卖稿事。

18日 草拟《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提纲：

一、诗的修养时代

唐诗——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韩退之（不喜欢）、白居易。

《水浒传》、《西游记》、《石头记》、《三国演义》都不曾读完，读完且至两遍的只一部《儒林外史》。喜欢《西厢》。喜欢林纾译的小说。

二、诗的觉醒期

泰戈尔、海涅。

三、诗的爆发

惠迭曼、雪莱。

四、向戏剧的发展

歌德、瓦格纳。

五、向小说的发展

福楼伯尔、屠格涅甫、斐理普、柔尔·鲁纳尔。

六、思想的转换

（《离沪之前》）

又忆出1913年、1915年、1916年等年所作旧诗二十多首。有四首录于《离沪之前》中。（参见本谱作诗日期相关条目）

19日 “仍追忆旧诗”。始作《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

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郑伯奇送来《前茅》及《文化批判》。

20日 续作《留声机的回音》毕。进一步论述《英雄树》中关于“当一个留声机器”的提法，以答李初梨。①署名麦克昂，载《文化批判》1928年3月15日第3号。收《文艺论集续集》。

21日 午后仿吾来，把《回音》一文交给他。

22日 读徐祖正《拜伦的精神》。郭说“有人说我象拜伦，其实我平生没有受过拜伦的影响。我可以说没有读过他的诗。”（《离沪之前》）

晚，访李初梨。

23日 船票已买定，明日动身。“心里异常的不安。……感觉着好象去进监狱。”（《离沪之前》）

晚郑伯奇来，传达李一氓送来的消息，谓“寓所已由卫戍司令部探悉，明早要来拿人”，即与成仿吾、王独清离家。夜，由内山完造带领宿于八代旅馆。

《离沪之前》日记至本日中辍。

24日 因一家人同船走，目标太大，有被扣留的危险，只得与妻儿分坐两船同日启程赴日本。仅内山一人赴汇山码头送行。“我真个是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着的祖国，悄悄地流下了眼泪。”为了躲避反动派的检查，郭沫若化名吴诚，假称是“南昌大学的教授，目的是往东京考察教育”。在船上，只得呆在房舱里，“连饮食都是叫用人搬进舱里来吃的。一直呆了三天。”赴日后的生活问题，成仿吾等在郭沫若行前商定，以后由创造社每个月汇寄一百元。（《跨着东海》）

① 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曾对郭沫若“当一个留声机器”的提法有不同意见。

关于此事,吴奚如回忆说:“郭老去日本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那是经过当年党中央决定,保留党籍,完成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的。”“党中央为了爱护象郭老这样在社会上、在学术界有名望的党员,决定派他们到国外去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成为有声誉的专家,以期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回国成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石。当年,合乎这个条件的党员,除了郭老外,还有钱亦石同志和董老等。当时,党中央这一决定,无疑是开明而正确的。”抗战爆发,“郭老一从日本平安回到上海,他的党籍就恢复了”(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郭沫若“在日本期间,周总理又一直关怀着他”。(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收《悼念郭老》)

27日 上午抵神户,与安娜和孩子们会合。乘火车赴东京。

29日 在东京附近的品川驿下车,至花子夫人的父母斋藤家,受到两位老人的热情接待。

第二天,偕安娜访作家村松梢风,商量居留日本的事。

本月 诗集《前茅》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连序诗共十五首,系1921年至1928年的作品。

三 月

月初 一个星期天,由村松梢风陪同去市川访横田兵左卫门,托请照顾,承他允诺。(《跨着东海》)

上旬 访横田后的第三天,全家搬至市川居住。

郭沫若回忆说:“在市川住定之后,我和国内的朋友通起了信来。东京有些熟朋友的地址我也知道了,我也时而往东京去。我会见过钱介磐和杨贤江,他们也都是到日本来亡命的,都改换

了姓名。”(《跨着东海》)

本月 译小说《铁窗之花》(日 林房雄)。收《日本短篇小说集》，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高汝鸿。

同月 诗集《恢复》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收本年所作诗二十四首。

本月 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成立，并于5月创办了《战旗》杂志。

同月 15日，日本发生“三·一五”事件，日本反动政府大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派革命团体。“当时正是日本的思想统治开始走向极端反动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的左翼文学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逐渐受着摧残。”(《跨着东海》)

同月 新月派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徐志摩、罗隆基等任编辑。创刊号上发表由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提出文艺创作的“健康”和“尊严”的原则，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接着梁实秋又发表《文学与革命》等文章，鼓吹“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对此，鲁迅、创造社、太阳社均给予批判。该刊出至1933年6月停刊。

同月 钱杏邨、蒋光慈合编的《海燕周刊》在上海创刊。出至十七期停刊。

四、五月间

作自传《我的幼年》。这书是“在养病期中的随时的记述，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后话》)。该书于1929年4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后曾因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先后改名为《幼年时代》和《童年时代》。收

《沫若文集》第6卷时题名《我的童年》。（《反正前后》的《发端》说作于四五月间故系于此。）

五 月

25日 所译诗《死殇不足伤我神》（俄 杜勃罗留波夫）、《睡眠》、《即兴》、《齐尔西时》、《爱之歌》、《遗言》（俄 屠格涅夫）发表，载《沫若译诗集》。

本月 《沫若译诗集》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同月 《水平线下》由联合书店和创造社出版部分别出版，包括《水平线下》和《盲肠炎》二部分。由于国民党查禁书刊，《盲肠炎》未能收入，仅收散文《到宜兴去》、《尚儒村》、《百合与番茄》、《亭子间中》、《后悔》、《湖心亭》、《矛盾的调和》七篇及出版说明，列入创造社丛书第二十六种。

本月 林伯修、洪灵菲、戴平万等组成“我们社”，创刊《我们》月刊，出至第3期停刊。

同月 魏金枝的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出版。

同月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画室（冯雪峰）发表《革命与知识阶级》，对鲁迅作了比较公平正确的评价。

六 月

18日 译小说《抹杀不了的情景》（日 德永直）。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本月 所译《查拉图司屈拉钞》（德 尼采）由上海创造社出

版部出版。包括：《三种的变形》、《道德之讲坛》、《遁世者流》、《肉体之侮蔑者》、《快乐与热狂》、《苍白的犯罪者》、《读书与著作》、《山上树》、《死之说教者》、《战争与战士》、《新偶像》、《市蝇》、《贞操》、《朋友》、《千有一个的目标》、《邻人爱》、《创造者之路》、《老妇与少女》、《蝮蛇之啮》、《儿女与结婚》、《自由的死》、《赠贻的道德》。

同月 《沫若诗集》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列入创造社丛书第二十一号。包括：《女神三部曲》、《凤凰涅槃》（诗一篇）、《天狗》（诗十篇）、《偶像崇拜》（诗九篇）、《星空》（诗十篇）、《春蚕》（诗二十八篇童话剧一篇）、《彷徨》（诗四篇）。

本月 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文艺月刊创刊。该刊以刊登翻译作品为主。这是鲁迅有计划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开始。该刊出至1929年2月停刊，共十五期。

六、七月间

成仿吾自国内赴日本访郭沫若。郭沫若后来回忆说：“他在市川的寓里住过几天。据他说，就在那‘三一五’事件之后，国内又流布过这样的谣传，以为我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已经遭了大辟。北平的报纸上还登载了这样的消息，标题是《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这便激起了很多年青朋友的悲哀，有的人还做过很长的诗来追悼过我的。”（《跨着东海》）

在成仿吾赴日期间，一些日本的“左翼朋友”经常来访。一次，日本“战旗社”的藤枝丈夫等二人来，谈话中，郭沫若曾提及国内文艺运动的现状。后《战旗》7月号上发表了郭的谈话纪录，其中有“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算”的话。郭看到后担心地说：

“我知道这是要出岔子的。果然在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上，不久便生出了反应①……”（《跨着东海》）

31日 论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完稿。连载于《东方杂志》（半月刊）1928年11月10日、25日第25卷第21、22号，发表时题名为《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署名杜衍。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者在谈到本文的写作经过时说：“到了7月底，离开祖国已经快半年，我的写作的欲望动了”，“想把小时候背得烂熟的《易经》来作一番研究”。一天下午在东京本乡三丁目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费了六天工夫”，写成了此文。“文章写好后的第二天，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是8月1号。”对于《易经》，郭沫若认为尽管它有神秘的外衣，并且仅限于对自然界的粗糙的观察、想象，但其中“所包含的宇宙观是符合于辩证式的与唯物论的。它把自然界看成为一种流动的过程，是一种‘变化不居，周流六虚’的东西。而且它还探索到了那变化的原因是矛盾的对立”。（《跨着东海》）

本月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指出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大会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制订了基本正确的革命路线。

同月 茅盾写成论文《从牯岭到东京》。这是“革命文学”论争中较重要的一篇文章。

① 鲁迅在《文坛的掌故》（收《三闲集》）中谈到《战旗》7月号中报道的事。

八 月

1日 因京华堂店主人小原荣次郎拘留事涉嫌^①，被东京警视厅的便衣警察带往东京桥区的警察局，审讯履历和来日本的经过等等，最后被拘留。郭沫若的住宅也遭搜查，成仿吾自柏林写来的一封信也被搜去。（《跨着东海》）

3日 被释放。归家途中往访京华堂店主小原荣次郎和骚人社的村松梢风，受到冷遇，即退出，雇车回寓。

中旬 释放后仍受刑士、宪兵的监视。安娜受不了邻居们的“轻视的眼光”，便移居市川真间山下不远的一所房子里。“这是一座相当僻静的家”。它有一间书房，一间正室，一间侧室，附有玄关间、厨房和浴室。背着真间山，坐北向南。大门内有一片园地。这园地在房屋的东头，可接受全面的阳光，小小的书斋便是面临着这片园地的。书斋在东南两面开窗，窗外有回栏可凭眺，的确称得上小巧玲珑。郭沫若特别喜欢这书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就是在这儿写出的。（《我是中国人》）

25日 作论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初稿），同年10月25日改作。据郭沫若说：“初稿的写出至改作足足隔了两个整月，……这表示着在我的研究程序上，起了一个大转变。”此后他从研究古籍到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均从第一手资料入手，使古代史的研究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我是中国人》）载《东方杂志》1929年4月至6月第26卷第8、9、11、12

^① 小原荣次郎曾作为上海每月寄给郭沫若生活费的中介，当时因警方怀疑走私而被押。

号，署名杜衍。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本月 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冯乃超等编辑的《思想》月刊创刊，共出五期。

八月底九月初

为研究古代历史，往东京上野图书馆查阅第一手资料，查到了《殷虚书契前编》。书的内容，除掉书前编著者罗振玉的一篇简略的序文之外，纯粹是一些拓片。初时，郭沫若尚一窍不通，见上面“除掉有些白色的线纹，我也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感到需要“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于是，又去找“文求堂”（一家卖中国古书的书店），经该店主人田中庆大郎的指点，又经左翼作家藤村的介绍，郭沫若得以利用东洋文库的藏书，从事中国历史和古文字的研究。通过王国维的《殷虚书契考释》，对那墨黑的拓片，“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接着，在一两个月之内，读完了库藏的全部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我是中国人》）

9月底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月刊创刊，1930年6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

十月

28日 作论文《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载《思想》

1928年第4期，署名杜顽庶。后作为《导论》，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本月 草就论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其后，“牵于人事，屡作屡辍，稿成全部更易者亦四五次”，于1929年9月20日改定脱稿。收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本月 朱自清散文集《背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同月 蒋光慈主编的《时代文艺》月刊创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十一月

30日 作《〈浮士德〉译后》，收《浮士德》。

本月 所译《石炭王》（美 辛克莱）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署名坎人。

十二月

12日 作《〈我的幼年〉前言》。说：“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书中写的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收《我的幼年》。

本月 中国著作者协会在上海成立，参加大会的有郑振铎、郑伯奇、沈端先、李初梨、钱杏邨等九十余人。

同月 《朝花》周刊出版，由鲁迅领导，柔石编辑。周刊出至1929年5月止。1929年6月起改为旬刊，同年9月停刊。

同月 创造社刊物《文艺生活》周刊创刊，共出四期。

本年 译《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 1931年12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同年 《革命精神人类机巧自然》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题郭沫若著, 书脊上为《人类机巧自然》, 全书共十二章, 并附图。

同年 所译小说《草枕》(日 夏目漱石) 由丽华书店出版, 文前有《译者序》。

本年 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出版。

同年 《苏曼殊全集》第1至第5集陆续由上海北新书店出版。

一九二九年(三十八岁)

一月

10日 作《浮士德》第1部《校读后记》。收《浮士德》。

12日 校阅《我的幼年》毕。并作《后语》。收《我的幼年》。

本月 《创造月刊》停刊，共出二卷(第1卷出十二期，第2卷出六期)。

本月 太阳社刊物《海风周报》创刊，由蒋光慈主编。共出十七期。

二月

7日 创造社遭国民党查封。创造社被查封以后，郭沫若原来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就断绝了。为了生活，只得更多地写作和翻译，以济日用。

25日 作《〈新俄诗选〉小序》。《新俄诗选》选录俄国十月革命后布洛克等所作的诗二十四首，由李一氓初译，郭沫若根据英译本校读改译，于1929年10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署L(李一氓)、郭沫若译。1936年7月上海大光书局再版时改书名为《我们的进行曲》。

本月 作《反正前后》，记述辛亥革命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1929年8月由现代书局出版，后因国民党查禁，改名为《划时代的转变》。

本月 国民党政府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实施“党治文化”，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扼杀进步作品。

本月 《新流月刊》创刊，蒋光慈主编，出至第4期停刊，后改名《拓荒者》。

四 月

自传《我的幼年》由上海光华书店出版。

本月 叶绍钧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五 月

3日 作《〈草枕〉译者序》。收《草枕》。

本月 为改版的《文艺论集》写《献诗》一首。收1929年5月上海创造社出版的《文艺论集》。

同月 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在上海创刊，这是以戏剧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930年7月出至2卷4期停刊。

六 月

10日 改作《聂婪》。收《沫若小说戏曲集》中《女神及叛逆

的女性》。

20日 作文艺论文《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载《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3期。

本月 鲁迅所译卢那卡斯基《艺术论》一书出版。

七 月

5日 所译《美术考古发现史》(德 米海里司)，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这是根据日本滨田博士的译本重译的。此书原名《第十九世纪考古学的发见》，后改名为《美术考古学发见之一世纪》。

30日 译毕小说《屠场》(美 辛克莱)，并作《译后》。收《屠场》。

八 月

1日 《甲骨文字研究》全书脱稿，并作《序》及《序录》。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出版。

27日 致希伯信。希伯又称希白，即容庚，时为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研究古文字学的青年学者。郭沫若在《我是中国人》中曾详细记述了与他的交往。从1929年起，至1933年止，郭沫若给容庚的信至少有五十八封，1978年《学术研究》编辑部从中选出十二封，发表在该刊第4期上，题为《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本信是其中的第一封，为询问《金文编》中若干不明之处而写。信末署“未知友郭沫若”。

本月 自传《反正前后》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同月 所译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小说《屠场》由上海南强书店出版。署名易坎人。

九 月

19日 致容庚信。托觅《殷虚书契》，并告以《甲骨文字十五释》将草就，问愿否审核。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20日 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认为“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编”，是学习恩格斯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他所“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文中强调自己研究历史是为了未来，即古人所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同日 《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脱稿。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21日 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解题》，对本书所收的各篇论文作一概要提挈。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十 月

3日 致容庚信。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25日 译小说《色彩》（日 武田麟太郎）。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31日 致容庚信。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本月 和李一氓合译的《新俄诗选》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本月 高尔基的《母亲》第一个中译本由夏衍根据日文翻译出版，书名作《母》。

同月 鲁迅所译卢那卡斯基《文艺与批评》出版。

同月 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十一月

7日 《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完稿。本篇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四篇。篇末《附记》中，曾提及完稿时的心情：“一个人坐在斗室之中，心里纪念着一件事情”。解放后，郭沫若修订此书时加补注曰：“一件事情”指“十月革命纪念日”，“当时在日本亡命，文成后拟在国内发表，不便明言，故作此隐语”。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8日 致容庚信。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本月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

同月 《新思潮》月刊在上海创刊。这是综合性理论刊物，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撰稿人有李一氓、朱镜我、吴黎平、彭康等。1930年7月出至第7期停刊。

同月 夏衍、郑伯奇等组成上海艺术剧社。这是我国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戏剧团体，最早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曾演出进步戏剧，出版《艺术月刊》和《戏剧论文集》。1930年4月被查禁。

十二月

29日 致容庚信。托觅王引之的《太岁考》和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二书，提议“殷周乃青铜器时代，金文自以专编为宜”。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本月 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以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的红军第七军。

同月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本年 作散文《黑猫》。记1912年和“张姑娘”（张琼华）结婚的事。载上海《现代小说》（月刊）1929年10月15日、11月15日第3卷第1、第2期。收《黑猫与塔》。

本年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1873—1929）逝世。

同年 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一九三〇年(三十九岁)

一月

12日 作论文《普罗文艺的大众化》，署名麦克昂。载上海北新书局《艺术月刊》1930年3月第1卷第1期。

26日 作论文《文学革命之回顾》。追溯自清末梁启超开始，中经“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以来的“文学革命”的历史，认为“这个文化运动其实就是资本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上的斗争”。并对创造社从一开始“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在替资产阶级做喉舌”，直到最近“蜕变”为“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的历史，也作了回顾和自我批评。全文表现了严峻的批判精神。署名麦克昂，载《文艺讲座》第一册，1930年4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收《文艺论集续集》。

本月 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在上海创刊。刊物着重介绍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左联”成立后，《萌芽》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出至第5期被查禁。从第6期起改为《新地》月刊，只出一期。

同月 蒋光慈、钱杏邨主编的《拓荒者》月刊在上海创刊。着重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后亦为“左联”机关刊物。出至4、5期合刊被查禁，遂将最后一期部分封面改为《海

燕》发行。

二 月

1日 致容庚信,请其展示出土之矢令殷铭文。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同日 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补记一篇,即《附庸土田之另一解》。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

4日 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追记》。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6日 致容庚信,谈关于《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出版事宜。载《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据容庚回忆,该书经他介绍后,准备出版,但“当时主事者考虑到诸种关系,虽同意出版,但以改用笔名发表为条件。这当然是郭沫若所不能同意的,因为那将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系用本名,而该书屡次征引《甲骨文字研究》之说,此书若用笔名,‘徒贴世人以掩耳盗铃之诮’,所以他说:‘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后来由于朋友之介绍,这部书终于在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容庚:《怀念郭沫若同志》。载《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

7日 作《夏禹的问题》。对夏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收5月上海联合书店三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版书后》。

10日 作论文《我们的文化》。批判了“在反动、正动的两种力量中主张第三种的不动”文化的谬论。载《拓荒者》第1卷第2期,收《文艺论集续集》。

本月 15日,上海进步文化界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由鲁

迅等五十一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通过宣言，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同月 16日，由鲁迅、柔石、钱杏邨、阳翰笙、冯雪峰、夏衍、冯乃超等十二人，在上海召开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为主题的讨论会，回顾、分析了革命文学论争中有关的问题，明确了今后任务，准备成立左翼作家联盟。

三 月

2日 与鲁迅、茅盾、冯雪峰、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汉、李初黎等四十九人共同具名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本日，“左联”召开成立大会，郭沫若因远在日本，未能出席。

4日 作论文《关于艺术的不朽性》。回顾自己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变化过程，并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有关论述为依据，指出：“承认艺术‘在某种关系之内’有其不朽性，与辩证法的理论并不矛盾（辩证法的本身便有不朽性），同时也并不便是承认他是超阶级的”。文章还联系现实斗争，强调“无产大众的当前的急务是在夺回自由的生命，夺回一切社会的成果——艺术品也包含在内”，用艺术手段形象地反映这种斗争的，“便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它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收《文艺论集续集》。

20日 致容庚信。谈古器花纹研究问题。

本月 《殷虚之发掘》、《由矢彝考释论到其他》发表。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又收《沫若文集》第14卷。

同月 古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

版。署名郭沫若。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历史论著，共辑入论文四篇及《自序》、《题解》、《导论》、《附录》等十篇。这部著作是我国史学史上一部重要著作。

本月 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会上，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选出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通过了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十七项提案。“左联”的成立，标志了中国革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文艺事业领导的加强。“左联”成立后，陆续创办、出版了许多文艺刊物，还在北京、日本东京等地设立了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了小组，有力地促进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

同月 夏衍主编的《艺术》月刊在上海创刊。这是以戏剧电影为主的综合性刊物，仅出一期即遭查禁，后改名《沙仑》月刊续出一期，又被查禁。

同月 左联成立后，在鲁迅、瞿秋白的关注下，展开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至1934年底，先后共讨论过三次。文艺大众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几次讨论涉及到大众文艺的内容、形式、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以及大众语、通俗化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马列主义水平及历史条件的限制，理论上存在着某些偏颇与不足之处。

同月 《田汉戏曲集》1至5卷陆续出版。

四 月

5日 完成《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初稿，7月16日改作。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又收《沫若文集》第14卷。

6日 致容庚信。认为古器研究中“花纹形式之研究最为切要”。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23日 作《“矢令簋”考释》，并作《追记》。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又收《沫若文集》第14卷。

本月 鲁迅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巴尔底山》旬刊在上海创刊。第4期起，改由朱镜我、李一氓等编辑，同年5月21日被迫停刊。

同月 “左联”主办的《文艺讲座》创刊，仅出一期。

五 月

1日 发表短评《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建议该刊慎重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载本日出版的《大众文艺》(月刊)第2卷第4期“新兴文学专号”(下册)。

3日 作《〈草枕〉译后述》。收《草枕》。

7日 译小说《煤油》(美 辛克莱)毕，并作《写在〈煤油〉前面》。该书于本年6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署名易坎人。

10日 发表《眼中钉》。此文系对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提及“创造社派……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一节之答辩。文章回顾了前后期创造社与鲁迅的关系，认为“创

造社的几个人并不曾“将语丝派的几个人看成眼中钉”，并说原来的“小团体”现在“已经失掉了它的存在”，创造社和鲁迅“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了。载《拓荒者》第4、5期合刊（该期部分刊物题名《海燕》）。收《文艺论集续集》。

17日 作《旧玉忆有百万》。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

本月 译小说《替市民》（日 小林多喜二）。收《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

同月 发表《明保之又一证》、《古金文中有称男之二例》、《古代用牲之最高记录》、《殷虚中无铁的发现》四篇。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本月 田汉发表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总结了“南国运动”的历史教训，清算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伤感倾向，标志田汉和南国社政治方向和艺术方向的转变。

同月 茅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蚀》（包括《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由开明书店出版。

同月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左联”派柔石、胡也频、冯铿为代表参加大会并致祝词，会后向“左联”作了报告。会后，与会代表还写了《一个伟大的印象》（柔石作）、《同居》（胡也频作）和《红的日记》（冯铿作）等最早反映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文学作品。

同月 普罗诗社在上海成立。

六 月

11日 作《〈文艺论集〉跋尾》。收光华书局改版本《文艺论集》。改版本删去初版本中四篇，改动一篇，另新增两篇。

本月 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新的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领导机关。

同月 陈立夫、陈果夫纠集文化特务傅彦长、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潘公展、黄震遐等发起了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先后出版《前锋周刊》、《前锋月刊》等刊物。鲁迅、瞿秋白、茅盾等都撰文予以痛斥。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指出，他们“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宠犬”，他们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流尸文学”。

七 月

5日 作《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7日 作《戊辰彝考释》、《大丰殷韵读》。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12日 作《“令彝”“令殷”与其他诸器物之综合研究》。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13日 作《公伐郟钟之鉴别与其时代》、《鲁侯肉释文》。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前一篇在收入1954年8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时作了删改，题名《杂说林钟、句斝、镇、铎》。

14日 作《者盨钟韵读》。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17日 作《晋邦罍韵读》、《秦公殷韵读》。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19日 作《齐侯壶释文》。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20日 作《国差繪韵读》。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22日 作《释丹桥》。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24日 作《戈珣戠𠄎必彤沙说》。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28日 作《说𠄎》。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29日 作《跋丁卯斧》。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又 作《〈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30日 释汉雄𠄎。见《说𠄎》一文。

本月 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在上海成立。先后参加的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世界语联盟等团体。

八 月

10日 作《一年以后之跋辞》。这是作者对考古论文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所写的跋语。该书目录上标题为此名,在正文中则题为《一年以后之自跋》,但与本年9月另一篇同名跋语内容不同。收《甲骨文字研究》。

又 作《甲骨文研究附录》。收《甲骨文字研究》。

本月 《沫若诗集》改名《沫若诗全集》,取消丛书名称,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增加《前茅》(诗十四首),《恢复》(诗二十四首)。

本月 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文化“围剿”,先后查禁《萌芽》、

《拓荒者》等进步刊物。9月底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下令“取缔”“左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并下令通缉鲁迅等人。

九 月

1日 作《一年以后之自跋》。收《甲骨文字研究》。

19日 作《臣辰盃铭考释》。载北平燕京大学《燕京学报》1931年6月第9期，署名郭鼎堂。收《金文丛考》。

23日 作《〈臣辰盃铭考释〉补记（一）》。载北平燕京大学1931年6月《燕京学报》第9期，署名郭鼎堂。

26日 致容庚信。表示从事古文字研究，系“为人类社会多少作些善事”，然苦于资料太少。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27日 作《〈金文韵读补遗〉序》初稿，1932年3月30日写定。收《金文丛考》。

本月 瞿秋白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

同月 “左联”主编的《世界文化》创刊。仅出一期，即遭查封。

十 月

1日 作论文《谥法之起源》。载日本《支那学》1932年1月第6卷第1号。

7日 作《〈甲骨文字研究〉后记》。收《甲骨文字研究》。

本月 《沫若小说戏曲集》由光华书局出版。包括：《塔》、《落叶》、《漂流三部曲》、《后悔》(原名《水平线下》)、《山中杂记》、《女神及叛逆的女性》。

十一月

25日 作《“毛公鼎”之年代》。载《东方杂志》(半月刊)1931年28卷第13号。收《金文丛考》，署名鼎堂。

26日 作《〈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追记四则》。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编入《沫若文集》第14卷时改题《关于新郑古物补记》。

本月 所作《水平线下》被国民党以“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

本月 国民党政府公布《电影检查法》，两月后又公布《电影检查法实施细则》和《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扼杀进步电影。

十二月

12日 作《〈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收《美术考古学发现史》。

本月 蒋介石调兵十万向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开始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

同月 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文化“围剿”，颁布《国民政府之出版法》四十四条，限制进步报刊、书籍等出版自由，查禁书

刊、封闭书店，逮捕暗杀革命文艺工作者，扼杀进步的文化活动。翌年又颁布《出版法实施细则》，1932年又颁发《宣传品审查标准》，加剧推行法西斯文化统制。

本年 作小说《克拉凡左的骑士》(原名《武汉时代》，《五十年简谱》中作《武汉之五月》)。后分期发表于1936年10月、11月上海《质文》杂志第2卷第1、2期，改题为《克拉凡左的骑士》(未完稿)，又因《质文》遭禁，未能继续刊登。1937年郭沫若回国时，将原稿随身带回。不久，郭沫若离开上海，转道香港去大后方，曾把原稿托友人保管，后遗失。已发表的部分编入《沫若代表作》，1946年11月全球书店出版，题名《武汉时代》。1947年收入《地下的笑声》，定题名为《骑士》，现收《沫若文集》第5卷。

本年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中译本由昆仑书店出版。

一九三一年（四十岁）

一月

14日 作《〈臣辰盃铭考释〉补记(二)》。载北平燕京大学《燕京学报》本年6月第9期附录(二)，署名郭鼎堂。

本月 《黑猫与羔羊》由上海国光书局出版。

本月 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同月 17日，共产党员、“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左联”于4月创刊《前哨》(月刊)，出“纪念战死者专号”，追悼死难烈士，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二月

15日 作《〈汤盘〉〈孔鼎〉之扬榷》。本年6月北平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第9期单行本，署名郭鼎堂。收《金文丛考》。

本月 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三 月

12日 译《生命之科学》(英 威尔斯)第一册毕,并作《〈生命之科学〉译者弁言》。署名石沱,1934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4日 校改《毛公鼎之年代》。(参见本谱1930年11月25日条)。载《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3号。收《金文丛考》。

本月 《文艺新闻》在上海创刊,同年5月接受“左联”领导,为综合性文艺周刊,内容以报道进步文艺运动和批判反动思想为主,“左联五烈士”被害的消息,即由该刊首次披露。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都曾为该刊撰稿。1932年6月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停刊,共出六十期。

四 月

29日 作诗《夜半》(外一首)。载《现代》(月刊)1932年11月第2卷第1期。收《郭沫若文集》(普及本)。

本月 《今津纪游》由上海爱丽书店出版。

本月 “左联”开除叛变革命、为民族主义文学奔走的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等人的会籍。

五 月

本月 《甲骨文字研究》由上海大东书局根据作者手迹影印

出版，共二册，线装。此书于1928年底开始写作，费了将近一年工夫完成初稿，曾寄给燕京大学容庚教授求教，容庚写信给郭沫若说傅斯年希望此书在《集刊》上连载，然后由研究院出单行本。但郭沫若“因为研究院是官办的”，便拒绝了这一提议，回信说“耻不食周粟”。尔后曾向商务印书馆联系，但遭拒绝。后经李一氓奔走，由大东书局答应承印《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并且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征求预约。郭沫若回忆说：“这可替我发泄了不少的精神上的郁积”。那大幅广告，好象“替我在这样作吼：本国的市侩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前卫们，你们请看，你们所不要的东西，依然是有人要的！”（《我是中国人》）

本月 瞿秋白与“左联”开始发生联系，并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

六 月

1日 作《〈沫若文选〉绪言》。收《沫若文选》（清秘馆主编）。

本月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由大东书局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分上下二册。线装。此书系用文言写成，共辑入作者上年所著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等十六篇。稿子写成后，郭把原稿交给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千之助，希望东洋文库印行出版。石田要郭把稿子留下，请专家看后再作答复。一个月后，石田回答说：因为稿子“太难懂了，在日本方面恐怕没有办法出书”，才作罢。由于李一氓的努力，大东书局答应石印出版《甲骨文字研究》与《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二书出版后，书局把样书各二十部寄给郭沫若，他接到这些书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安娜也特

地煮了红豆饭，表示庆祝。当晚，他把书每种留下两部，其余的用一张大包袱包着，和十四岁的大儿子和夫扛到电车站，坐电车去东京，以七折卖给文求堂。

同年 所著《桌子的跳舞》由仙岛书店出版。内收自传小说《黑猫》及其他小说散文七篇；文艺论文《眼中钉》、《桌子跳舞》两篇。

七 月

17日 致容庚信。询问“沈殷是否出自山东或其附近”，并商讨有关“彝器”研究的问题。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八 月

5日 所译小说《战争与和平》（俄·托尔斯泰）第一分册（上）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大约1925年底或1926年初的一天，蒋光慈陪同瞿秋白访问郭沫若，当时瞿秋白曾劝郭翻译《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伯主义（按：反拿破仑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郭沫若回忆说：对于瞿秋白的劝说“我在三年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创造十年续篇》）抗日战争时期，又与高植重新合译，另行出版。

25日 作《〈毛公鼎之研究〉追记》。载《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6号，署名鼎堂，收《两周金文辞大系》（影印本）。

本月 31日，革命作家、太阳社主要成员蒋光慈（1901—

1931)病逝于上海。

九 月

9日 《两周金文辞大系》录成。同日，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序》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解题》，均收《两周金文辞大系》(影印本)。

又 作《周代彝铭进化观》。此文是“纂集《两周金文辞大系》时所拟序说之一节，因嫌蛇足，未及印入”。收《古代铭刻汇考》(三册)，后收于《青铜时代》“附录”。

27日 致容庚信。商借庐江刘氏藏器之图象及拓片。信中说：“近颇欲于年内或开春返国，届时或能来旧都奉访”。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抗日形势高涨，郭沫若准备回国，但后来这一愿望未能实现。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本月 所作童话《一只手》与所译小说《煤油》等，被国民党明令查禁(见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所编《工作报告书》)。

同月 《文艺论集续集》由光华书局出版，内收1923年至1930年所写文艺论文十一篇。

本月 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全境迅速沦陷。

同月 “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北斗》创刊，由丁玲主编，1932年7月被查禁停刊。

同月 “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在南京趁飞机去北平时，途中遇雾，机坠身亡。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等。

十二月

本月 所译《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同月 《黑猫》单行本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本月 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艺术非至下》(即《阿狗文艺论》的第一节)。文中,胡秋原在批判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的同时,将攻击矛头指向左翼文艺运动,声称“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不久,他又写了《勿侵略文艺》,继续宣传其“自由论”的观点,以反对“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来攻击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左联”以《文艺新闻》为阵地,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回击,如瞿秋白写了《“自由人”的文艺运动》,洛扬(冯雪峰)写了《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正当革命作家批判胡秋原的论点时,苏汶(杜衡)以“第三种人”自居,出来为其声援,先后以《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以反对政治对于文学的“干涉”为借口,继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鲁迅、瞿秋白、周扬等均撰文进行驳斥,同“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本年 译《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毕,并作译者弁言。

同年 所译《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德 米哈力斯)由湖风书局再版,这是1929年乐群书店版的修订本。正文前有《译者序》,

1947年译者又将译文及序校订，改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由群益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二年(四十一岁)

一月

本月 《两周金文辞大系》由日本东京文求堂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

同月 所译《战争与和平》(俄 托尔斯泰)第一分册(下)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

五月

本月 《金文丛考》集成，共四册。

本月 文艺刊物《现代》月刊创刊，由施蛰存、苏汶主编。提倡“现代语”的诗作，也刊登少许左翼作家的作品。1935年2月改为综合性期刊，至该年5月停刊。

六月

6日 作《〈金文丛考〉跋尾》。收《金文丛考》。

23日 作《〈金文丛考〉追记之一》。收《金文丛考》。

本月 “左联”主办之刊物《文学月报》创刊，先由姚蓬子主编，第3期起由周扬主编。出至第五、六期合刊时被查禁。

七 月

21日 作《〈金文丛考〉追记之二》。收《金文丛考》。

22日 致叶灵凤信。（又于23日、8月29日、9月25日续作《致叶灵凤函》三通）。载于上海生活书店版1936年5月《现代作家书简》（除本年四函外，尚有从1933年3月至1935年9月之六函，共称《致叶灵凤十函》），现见《百花洲》1981年第1期《郭沫若书信十二封》（孔海珠辑注）。

八 月

1日 《金文丛考》由日本东京文求堂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共四册，线装。《金文丛考》和《两周金文辞大系》是姐妹篇，而以《两周金文辞大系》为主，《金文丛考》为辅。

本月 所作《划时代的转变》（即《反正前后》）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攻击本党”罪名查禁。

九 月

11日 作《〈创造十年〉作者附白》。收《创造十年》。

本月 《创造十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本月 在“左联”领导下，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由穆木天、森堡（任钧）、杨骚、蒲风、白曙、杜谈等人发起。其旨宗为

积极提倡诗歌大众化，反映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推进现实主义的新诗歌运动。

同月 《论语》半月刊创刊，提倡“幽默”与“闲适”之小品文。代表人物有林语堂、周作人等。继而，又于1934年创办《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创办《宇宙风》，均系小品文刊物，显示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特色。

十月

6日 所译《风靡世界的爵士音乐》发表，署安娜译。

本月 所作《反正前后》被国民党反动派以“诋毁本党”的罪名查禁。

同月 作《〈金文余释之余〉小引》(手书)。收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本《金文余释之余》。

十一月

本月 《金文余释之余》由日本东京文求堂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线装，一册。

本年 作《祭母文》。载本年天津《庸报》。

又 作《“石鼓文”研究》。收《石鼓文研究》，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 作《再论“石鼓文”之年代》。收《石鼓文研究》。

同年 四子鸿儿(郭志鸿)生。

本年 黄人影所编《创造社论》由光华书局出版，内收郭沫

若所作《创造社的自我批判》、《〈创造十年〉发端》、《眼中钉》三篇。

一九三三年(四十二岁)

一月

月初 作《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毕。

11日 作《〈卜辞通纂〉序》。收《卜辞通纂》影印本。

16日 作《〈卜辞通纂〉述例》。收《卜辞通纂》影印本。

本月 作杂文《奔流》。收《模范小品文读本》，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本月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同月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第一部《家》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二月

8日 作《〈卜辞通纂〉后记》。收《卜辞通纂》影印本。

本月 日本的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反动政府杀害，世界各国进步文艺界纷纷抗议。

三 月

17日 作《〈卜辞通纂考释〉书后》。收《卜辞通纂》影印本。

29日 又作《〈卜辞通纂考释〉书后》。收《卜辞通纂》影印本。

四 月

本月 所作童话《一只手》由大光书店出版。此篇原载《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9至11期，署名麦克昂，现改用本名。5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宣传“普罗文艺”的罪名再次遭查禁。

五 月

本月 《〈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由日本东京文求堂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

本月 4日，“左联”诗人应修人(1900—1933)在上海被特务追捕，于搏斗中坠楼牺牲。丁玲于同时被捕。

同月 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联名签署“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

六 月

本月 《沫若文选》(上海文艺书店版)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宣传“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

七 月

21日 作自传《武昌城下》。此文原系日文稿，内容与《北伐途次》相同。1936年由上海晓明书店出版。

本月 革命作家洪灵菲(1901—1933)在北平被捕，遭秘密枪杀。

同月 大型文艺刊物《文学》在上海创刊，由鲁迅、茅盾、陈望道、郁达夫、郑振铎、叶绍钧、夏丏尊等组成编委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刊物，出至1937年11月因上海沦陷而停刊。

八 月

25日 作《〈沫若书信集〉序》。收《沫若书信集》。

26日 作《〈沫若自选集〉序》，序内附有《民国三年以来我自己的年表》。收《沫若自选集》。后又收于《郭沫若文集》。

九 月

24日 作日记《离沪之前》(1928年1月15日至2月23日)的《前记》。追述当年写这一段日记的原由。载《现代》(月刊)1933年11月第4卷第1期。收《离沪之前》。

25日 作通信一则，同意《离沪之前》交《现代》(月刊)发表。载上海《文艺春秋》(月刊)1945年12月15日第2卷第1期。影印手迹无收信人姓名。

26日 作散文《鸡》。通过白母鸡失而复归的故事，表现了对受压迫的旅日朝鲜工人的同情，并预示着人民必将起而反抗。收《沫若自选集》。现收《沫若文集》第8卷，改题为《鸡之归去来》。

本月 《沫若书信集》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收致宗白华、田汉、郁达夫、成仿吾书信十五件。

秋

《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三册)集成。此书包括：《殷契余论》一卷附录一卷，《金文续考》一卷、《石鼓文研究》一卷、《汉代石刻二种》一卷(《熹平石经鲁诗残石》、《龟兹刻石》)。

十一月

25日 作《〈古代铭刻汇考〉序》。收《古代铭刻汇考》。

30日 作散文《自然底追怀》。此文原系日文，由济民译成中文，载1934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星期学灯》第70期。后又分别刊于《现代》(月刊)1934年4月1日第4卷第6期(题名《自然之追怀》)和1936年10月20日汉口西北风半月刊社《西北风》第10期(题名《我在日本生活》)。

本月 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压迫进步文艺，指使特务捣毁艺华影片公司，散发反动宣言，恫吓各影片公司，禁止拍摄“赤化宣传”、描写阶级斗争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影片。

同月 进步诗人潘漠华在天津被捕，翌年12月为抗议反动派虐待，于狱中绝食牺牲。

十二月

本月 《古代铭刻汇考》四种由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共三册，线装。

同月 小说《行路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上篇、中篇（飘流插曲第一章末日，第二章活的坟尘，第三章流氓的情绪）、下篇。

本年 《幼年时代》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此即《我的幼年》（1928年作，1929年出版），因遭国民党政府查禁，改现名出版，书中有改版说明。

一九三四年(四十三岁)

一月

21日 作《〈信号〉序》。收1934年3月20日上海中外书店出版的《信号》一书，该书系张白衣所作。

本月 光华书局出版的《孤鸿》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欠妥”的罪名查禁。

同月 《郭沫若自选集》由乐华图书公司出版。《选集》收戏剧四部、小说六篇、论文二篇，均系1920年至1925年间的作品。

二月

3日 与傅抱石同去东京中野留学生监督周慧文家晚餐。

本月 19日，国民党中央电令上海市党部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进步书籍，其中包括郭沫若的译著多种，计有：《创造十年》（现代书局版）、《黑猫》（现代书局版）、《幼年时代》（光华书局版）、《文艺论集》（光华书局版）、《文艺论集续集》（光华书局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现代书局版），译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神州国光社版）、《石炭王》（现代书局版）、《煤油》（光华书局版）、《美术考古学发现史》（湖风书店版）、《屠场》（南强书局版）等等。

同月 《郭沫若自选集》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宣传“普罗文艺”罪查禁。

春

“左联”日本东京分盟成立，干事会由林林、丘东平负责，郭沫若参加并指导了分盟的活动。据任白戈回忆：“那时东京有一个中国‘左联’的留日支部，郭老也作为一个‘左联’的盟员参加支部的活动。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亲密的同志，更把他当作一个敬爱的领导人，凡是遇到一些文艺思想理论方面和文艺组织活动方面带原则性的和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和魏猛克同志都要专程到他家里去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先听我们汇报，然后才和我们一道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甚至往往一谈就是半天。”（《深切地怀念郭沫若同志》，见《欢呼春天的诗人》）。

五月

21日 发表《昭君出塞曲》。载上海光芒书店《光芒》（旬刊）第1卷第1期。

本月 20日，《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由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

七月

31日 携女儿淑子去浪花村度假。浪花村是日本千叶县面向着太平洋的一个村子，离市川约有三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暑假开始后，安娜已带了四个儿子先去那边度假。

从今日起至8月9日止作《日记》，记叙在海边度假的情景。后题名《浪花十日》。载《文学》(月刊)1935年第5卷第1期。收《归去来》。

八 月

1日 午后译《生命之科学》四页。

2日 晨，继续翻译。午后和妻子儿女们游波都奇。

3日 午饭前负鸿儿去海滨游玩，回寓后见两个刑士“在垣外探头探脑地窥伺”，“心中颇不快”。(《浪花十日》)

5日 午前译《生命之科学》十页。午后全家又赴小波都奇。

6日 午前，接徐耀辰信，说周岂明(作人)欲一见，问郭何时回市川，即复信告以十日前后回去。

在海边时“忽然间在昏聩的脑中浮出了两句诗样的文字：“举世浮沉泽似海，了无风处浪头高。”(《浪花十日》)

7日 林林等三位中国学生来访。他们的来意是想办一种文学杂志，请郭沫若为他们在上海介绍出版处，郭沫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8日 早饭后带淑子和鸿儿去海滨，一位“很象是中国人”的浴客送给淑子一条小章鱼，孩子们喜悦万分，“一匹小小的章鱼添上了无限的情谊。”(《浪花十日》)

9日 午前独自留在寓里译书。午后携淑子去临海的一座山头看史迹：“日、墨、西交通纪念碑”。(《浪花十日》)

10日 同和儿先回市川。

九 月

9日 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序》作附注。收《青铜时代》。

本月 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译文》月刊创刊，由鲁迅、茅盾发起筹办，1935年9月出至第13期停刊。1936年复刊后，又出16期，因抗战爆发而停刊。

十 月

本月 所译《生命之科学》(英 威尔士)第一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石沱，书前有《译者弁言》。

十 一 月

9日 作短论《历史和历史》。载《太白》(半月刊)1934年12月5日第1卷第6期，署名谷人。

中旬 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5年3月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现收1957年12月北京科学出版社新一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写作时间按所作“引言”推算)

20日 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引言》。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影印本。

25日 作《彝器形象学试探》。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影印本。

本月 所译《新俄诗选》(光华书局出版)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宣传“普罗文艺”罪查禁。

十二月

6日 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附录》。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影印本。

7日 作《〈日本短篇小说集〉序》。收《日本短篇小说集》。

15日 作《正考父鼎铭辨伪》。载《东方杂志》(月刊)1935年3月1日第32卷第5号,署名郭鼎堂。

25日 作论文《老聃、关尹、环渊》。载《新文学》(月刊)1935年4月10日创刊号。收《青铜时代》。1945年2月19日又作“追记”一篇。

一九三五年(四十四岁)

一月

1日 作《鲁迅传中的误谬》。载《台湾文艺》2月1日第2卷第2期。

15日 作《〈离骚〉今言译》毕，并作“附注”。文中说：“原文乃中国至和谐之韵文，译为今语，实多勉强而难于讨好。然余戇然为此者，凡古代韵文，于字法句法多所省略，吾辈读之，每陶醉于其音韵之铿锵，如接聆音乐而多不明其意。今以今言译之，于名词、代名词之单复数，动词之时调等三致意焉，则古文之节段与意境有不烦辞费而豁然自呈者。本篇之译述，读者请视为韵语注疏可耳。”收《屈原》；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屈原赋今译》。译诗于1941年校订，收同年群益书局出版的《屈原研究》一书的“附录”内；1942年又润色过一次，1953年再次修订，并于3月31日作“题解”，收《屈原赋今译》。

24日 作论文《屈原》毕，文章第一部分《屈原的存在》载《中学生》杂志1935年第55期。本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后编入《屈原研究》一书，为该书的第一章。

28日 作《〈屈原〉序》，从屈原“自沉汨罗”的时间和原因谈起，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实施“亡国灭种”的反动政策予以抨击和讽刺。指出：“自从屈原死后，凡是神经过敏的诗人稍一不得志

便要自比屈原，其实屈原是不好比拟的”，“因为要想成就一个屈原，那儿须得有一幕亡国灭种的惨剧”，所以作者说“我国的屈原，深幸有一，不望有二。”文末特别注明写于“1935年沪难三周年纪念日”。收《屈原》。现收《沫若文集》第12卷《深幸有一，不望有二》一文内。

本月 8日，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同月 曹禺的多幕剧《雷雨》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剧曾在北平《文学季刊》发表，受到戏剧界一致好评。

二 月

15日 作《〈离骚今言译〉附白》。收《屈原》。

三 月

10日 作《周易的构成时代》。收《青铜时代》；现收《沫若文集》第16卷，题作《周易之制作时代》。

31日 作杂文《阿活乐脱儿》。载《杂文》（月刊）1935年5月15日第1卷第1期，署名谷人。

本月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由日本东京文求堂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共五册，线装。

同月 《日本短篇小说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万有文库”（第2集第548种）。

四 月

22日 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毕，并作《解题》。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影印本。

本月 《屈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同月 由光华书局出版的《漂流三部曲》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宣传“普罗意识”罪查禁。

六 月

1日 为王亚平《都市的冬》所作封面题字于本日发表。《都市的冬》，中国印刷社出版。

3日 作历史小说《孔夫子吃饭》。小说取材于《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篇，通过孔子及其学生们在陈蔡之间被围困的故事，讽刺了孔子的虚伪，赞美了颜回的纯朴。载《杂文》1935年7月15日第2期。收《豕蹄》。

4日 作日记《浪花十日》的“前记”。载《文学》1935年第5卷第1期《浪花十日》。收《归去来》。

8日 作《老生常谈》。载本东京新闻社《留东新闻》(周刊)6月12日，6月19日日创刊号、第2期。

本月 18日，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终年三十三岁。

夏

作诗《信美非吾土》。诗云：“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何当挈鸡犬，共得一升腾。”现收《潮汐集·汐集》，这是写给刘任侠的一首五律（参见《革命文物》1979年7月第4期《难甘共鱼烂·矢得一升腾》）。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收入《潮汐集》时，诗后注为“作于日本，时间约为抗战前两三年”。而阿英在《关于郭沫若夫人》（收1938年广州战时出版社《抗战中的郭沫若》）一文中说，他在1937年11月20日曾在作者寓所见到过，诗后附跋云“此四年前流寓日本时所作……”

七月

13日 作《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系统地介绍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的生平、思想和在音乐发展史上作出的贡献。说他是“跑过了时代，不为流俗所容”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文中还详细地论述了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和当时音乐界各派不同主张的尖锐斗争。文末附万宝常《年表》。载《文学》1935年9月1日第5卷第3期，收《历史人物》。

本年 7月17日我国现代著名音乐家聂耳(1912—1935)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鹤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终年二十三岁。

八 月

6日 作历史小说《孟夫子出妻》。通过孟子欲成圣贤而出妻的描写，讽刺其伪善，并赞扬了孟妻的贤慧和“实践躬行”的美德。载《杂文》1935年9月20日第3期，收《豕蹄》。

10日 作《关于诗的问题》。此系与友人子鹤论诗的两封信。认为诗歌是“强烈的情感之录音”，是“表现大众情绪的形象的结晶”，它应该“和音乐结合起来”。诗要有韵、简短、“有韵才能诵”，简短“才能接近大众”。作者还特别强调阶级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把它称作是“文学的脊椎”，并说“意识是第一着”的，“有了意识无论用什么方法，无论用什么形式，无论取什么材料都好。反之，则无论怎样都无是处。”载《杂文》1935年9月20日第3期。收《沫若近著》，1937年北新书局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月底 接丘东平从房州的北条海岸寄来的小说《沉都的梅冷城》，要求“予以批评”。几天后，又接其明信片，要求将小说寄回。

本月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由日本东京文求堂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共三册，线装。现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57年中国科学院出版。

本月 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九 月

16日 发表自传《初出夔门》（海外十年之一），即《初出夔门》的第1节。载本日出版之《宇宙风》（半月刊）创刊号。署名鼎堂。收《豕蹄》。又收《少年时代》。

18日 作诗《悼聂耳》。诗中称誉聂耳为“民众的天才”，是“我们的乐手”，说他的歌将永远“在大众中高奏”。载日本东京诗歌社《诗歌》（月刊）10月10日第1卷第4期《聂耳纪念特辑》，收《战声》。

24日 作历史小说《秦始皇将死》。通过秦始皇临死前对往事的回忆和自我批判，表明作者对这一历史人物的态度。文中，借秦始皇的口说：“唉，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我烧毁了百家的书，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几个人，我想来统一思想，想使天下的人都对我心悦诚服，其实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骂我；我一死，天下便会动乱起来，千秋万岁后的人也都会骂我。我相信千秋万岁后决不会有我这样的一个人，来干统制思想的这样的蠢事。”载《杂文》1935年12月15日第4期。收《豕蹄》。

本月 光华书局出版的《沫若小说戏曲集》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欠妥”罪查禁。

同月 歌曲《湘累》收于本月现代歌舞研究社出版的《现代名歌三百首》（此篇原为诗剧《湘累》中之一首诗，为电影《生之哀歌》收录作插曲）。

十月

5日 作题为《中日文化之交涉》的讲演。郭在演讲中论述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并从中总结历史教训，期望中国人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本文是作者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所作之讲演，后根据斐琴的记录稿整理而成文。载于10月16日上海《立报·言林》。收《沫若近著》，题为《中日文化的交流》。现收《断断集》。

16日 发表自传《幻灭的北征》（海外十年之二），此即《初出夔门》的第2节。载本日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第3期，署名鼎堂。收《豕蹄》。又收《少年时代》。

本月 作杂文《“举案齐眉”》。对“案”字的涵义作具体说明，以回答某些人的责难。文中列举《考工记》、《方言》、《说文解字》等大量材料，证明自己对“案”字的解释是正确的，而那些人把“案”解为“椀”，是“不通故实者的妄作聪明”。收《沫若近著》；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本月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同月 赵家璧主编之《中国新文学大系》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共十集，至1936年2月15日出全。

十一月

1日 发表自传《北京城头的月》（海外十年之三），此即《初出夔门》的第3节。载本日出版之《宇宙风》（半月刊）第4期，署名鼎堂，收《豕蹄》。又收《少年时代》。

3日 作《七请》。自从《关于诗的问题》两封通讯在《杂文》第3期上发表后，国内论坛上，对其中“意识是第一着，有了意识，无论用什么方法，无论用什么形式，无论取什么材料，都好”等几句话引起了议论，有的人甚至误以为郭沫若“要恢复标语口号诗”，因写此文作答。文章从七个方面提请“评者们注意”，所以“戏颜之为‘七请’”。载《质文》（月刊）12月15日第4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

13日 致其敏、淑明信，论诗。载11月23日上海《时事新报》。

16日 发表自传《世间最难得者》（海外十年之四），即《初出夔门》的第4节。载本日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第5期，署名鼎堂，收《豕蹄》，又收《少年时代》。

17日 作《东平的眉目》。叙述与丘东平的交往，和对他的印象。载日本东京《东流》（月刊）第2卷第2期。收《归去来》。

20日 作《应该学习的地方——给YT君的一封信》。载上海《知识》（半月刊）12月1日第1卷第1期。

十二月

1日 发表自传《乐园外的苹果》（海外十年之五），即《初出夔门》的第5节。载本日出版之《宇宙风》（半月刊）第6期，署名鼎堂，收《豕蹄》，1936年10月上海不二书店出版；又收《少年时代》。

10日 作《〈红痣〉序》。载青岛《诗歌生活》1936年3月5日创刊号（《红痣》，甦夫作）。

23日 作《〈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追记》。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本月 为《质文》杂志取名并题字。《质文》是“左联”留日支部的机关刊物，在日本编印，运至国内发行。原名《杂文》，系鲁迅命名。出至第3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第4期起改名《质文》，继续编印出版。郭沫若在旅居日本期间，积极参加“左联”留日支部的活动，经常为所属刊物撰稿。任白戈回忆说：“‘左联’留日支部办有一个机关刊物，先名《杂文》，出了几期就被日本警视厅封了，接着就由郭沫若同志改名为《质文》继续出版，差不多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在上面发表，所以这个刊物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较大。”（《深切地怀念郭沫若同志》，见《欢呼春天的诗人》）又臧云远回忆说：“《杂文》社设在‘三闲庄’。三闲庄住着三个人，一位是魏猛克，一位是任白戈，还有一位是姚潜修。《杂文》是在东京编排印刷，寄到上海向国内发行，出了三期，因为宣传革命而畅销，被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封掉了。《杂文》社同人基本队伍有陈辛人、丘东平、林焕平（他以后又办了《东流》），张天虚、张香山、林林、邢桐华、任白戈、魏猛克等。郭沫若先生差不多一个月来一两次。刊物被封掉后，大伙开会讨论换个名字再出。郭沫若先生说：‘就改名叫《质文》吧，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大家都赞成，就由郭先生为刊物题字。在上海的鲁迅先生继续来信来稿支持。”（《东京初访郭老》，见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1978年第7期）

本月 9日，北京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从而掀起了遍及全国的反日高潮。

本月 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本年 作《推行手头字缘起》。载《太白》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12期；现收《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

又 作《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主于论究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导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各种生产方式的论述，说明社会发展经历了氏族家长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等阶段；说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或“东洋的社会”“实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并说“经我研究的结果，我们中国正典型地经历了这些阶段”。载《文物》，1936年3月第1卷第2期。收《沫若近著》；收《断断集》。

又 作论文《释丙子》。原系日文，载日本《书道》杂志1936年1月1日第5卷第1号，后由殷尘译成中文，载《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10至11期。

一九三六年(四十五岁)

一月

15日 作论文《屈原的时代》。继1934年所著《屈原》一书之后，对屈原及其所处的时代作进一步的考察。文中运用金文资料具体地论证了殷周以来的社会制度，证明“西周乃至春秋时代是奴隶制”，春秋末年至公元前221年是“奴隶制向身分制”的转变时期，阐述了屈原和他的作品在社会史上的意义。作者称誉屈原在诗歌领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彻底地创立了一个体裁”，是值得后人“追慕而效法”的；同时，也指出由于“时代”和“资质”的限制，屈原“只认识在上的力量，而不认识在下的力量”，因而“在诗域以外的现实世界里却没有力量来领导时代。”载《文学》(月刊)1936年2月1日第6卷第2期，收《沫若近著》。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又 作论文《答马伯乐先生》。回答法国东方学权威马伯乐教授对《甲骨文字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作的批评，表示对马伯乐的意見有好些地方“尚碍难表示同意”。载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文学年报》1936年第2期，收《沫若近著》，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篇名题《答马伯乐教授》。

18日 为长篇小说《铁轮》(张天虚著)作序，题为《论幽默——序天虚〈铁轮〉》。认为这部作品在表现时代生活上充满

激情，“对于目前在上海市场上泛滥着和野鸡的卖笑相仿佛的所谓‘幽默小品’，是一个烧夷弹式的抗议。”要求中国的文艺界应该再“来一次‘狂飙突进’，把一切朽老的精神病态扫荡得一干二净。”载1936年2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收1936年12月东京文艺刊行社出版的《铁轮》。

23日 作论文《关于〈雷雨〉》。称赞《雷雨》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肯定作者在“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旁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的输入”等方面所表现的艺术功力。同时指出，作者对于“人生已成为黑暗的运命之主人”这一方面的认识“似乎还缺乏得一点”，因此，“全剧几乎都蒙罩着一片浓厚的旧式道德的雾围气，而缺乏积极性”，使“悲剧情调之古风”和“艺术手法之新味”之间，产生了矛盾。载东京出版的《东流》（月刊）1936年4月1日第2卷第4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篇名题《关于曹禺的〈雷雨〉》。

本月 作论文《请大家学习新文字》。积极支持汉字拉丁化，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地完成这一工作。载东京出版的《东流》1936年2月1日第2卷第3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

二 月

2日 作杂文《“刺身”》。认为日本人吃的生鱼片“刺身”（sashimi洒西米）是中国传至日本的习惯。收《沫若近著》。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4日 作通讯《水与结晶的溶洽》。驳斥《盍旦》第4期周金对《中日文化的交流》（1935年10月5日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的批评，说自己“从不曾‘把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抹杀’过，更从不曾‘完全从历史唯物论走开’过”，再次申明应该“利用

我们的优秀的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级的新的文化”，那种“主张‘中国本位’的”是“半封建的意识”，“主张‘全盘接受’的”是“买办意识”，都是错误的。载《质文》1936年11月10日第2卷第2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据14日所作文前小引，此篇系致孙席珍的一封信。

15日 译《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德 马克思）毕，并作《前言》。本书系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的后半部。1936年5月由日本东京质文社出版。编入该社的《文艺理论丛书》。

28日 作历史小说《楚霸王自杀》。写项羽在垓下战败，退至乌江边自刎而死的故事，说明凡是脱离群众，残害人民的人，虽是“盖世英雄”，最后终将被人民抛弃。载《质文》（月刊）1936年6月15日第5、6期合刊，收《豕蹄》。现收《沫若文集》第5卷。

三 月

3日 译《隋唐燕乐调研究》（日 林谦三）毕，并作《序》。1936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4日 作历史小说《齐勇士比武》。载《文学丛报》（月刊）1936年5月第2期，题为《齐勇士比武——一段从古书上翻译出来的故事》，收《历史小品集》，上海长江书店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5卷。

9日 作诗《给彭澎》。热情地称赞彭澎和他的诗作，鼓励他继续努力。彭澎是留东新闻社的一名年青勤杂工，他当过兵打过仗，也能够写诗。诗歌写得粗犷豪放，不落俗套。诗稿送给郭沫若看后，郭大为称赞，因作诗加以鼓励。（林林：《做党的喇叭——忆郭老在日本二三事》）诗载《质文》（月刊）1936年6月15日第5、6期合刊。收《战声集》，篇名题《结澎澎》。

13日 作《与林谦三合影照片之说明》。载1937年4月《宇宙风》，题名《郭沫若同志近影》。

15日 复北新书局赵景深函。谈出版《沫若前集》事。这样的信札还有4月3日、4月15日两封。（均见赵景深：《〈沫若前集〉和〈郁达夫全集〉——郭沫若给我的信》，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23日 作《〈夜行集〉序》。载《文学丛报》1936年5月1日第2期。收《夜行集》。《夜行集》，是周而复的诗集。

本月 作《天亮黑一黑》。载《质文》（月刊）1936年6月15日第5、6期合刊，署名安娜，原文写作时间题1936年樱花初放时节，篇名误刊《亮天黑一黑》。

春

林林来访，以党的《八一宣言》见示，郭沫若看后极为兴奋。据林林回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火药气够浓了，在东京市街上见到坦克车不断在游行，大家心里是有数的。我从国内寄到神保町青年会（这里人杂、邮件多）的书报里，得到印在淡红色的纸张上的《八一宣言》，是党在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组织抗日联军，成立国防政府，等等。私私地兴奋地看了，我就把他带到须和田郭老住宅，请他也看了。很久没有得到党的消息了，他当然是很兴奋的。”（《做党的喇叭——忆郭老在日本二三事》）

四月

4日 蒲风来访，谈论诗歌创作问题。主要内容有：关于

诗的写作；关于自己的诗集《女神》、《星空》等；关于讽刺诗、剧诗、长诗的创作及中国诗坛动向等问题。最后，希望诗人们“努力化除个人的意气，坚定思想上的立场，作时代的前茅，作大众的师友”。谈话由蒲风记录整理，经本人校阅后发表。载《现世界》（半月刊）1936年8月15日创刊号，题为《郭沫若诗作谈》。

13日 作杂文《鼎》。《文学》三月号曾刊载署名“鼎”的《作家们联合起来》一文，因署名与郭沫若的笔名相同，故在文中首先就此作了说明，同时，称赞这篇文章是“目前顶切要的文字”，并就当时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和作家们的联合问题，提出看法说：作家们“联合”的目的是为了“反帝国主义”，为了“民族生存”。“消弭内战”，“鼓动人们爱真理、爱正义、爱气节”，而不是为了“拥护某某一二个人的文坛地位”、“巩固某某一二种刊物的销路”。联合要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分头并进地努力实践工作”，因此，必须清算阻碍这种联合的“个人主义和行邦意识”。载《质文》（月刊）1936年6月15日5、6期合刊。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

26日 作历史小说《司马迁发愤》。描写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后，发愤著《史记》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司马迁不畏强暴、藐视权势的坚强性格；歌颂他那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高尚行为。小说取材于历史，严格地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但又密切结合现实，影射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那些卑鄙无耻的政客官吏，表现了作者坚强的斗争精神。载《文学界》（月刊）1936年6月5日创刊号。收《豕蹄》。

五 月

1日 作《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系用日文撰写，

载《日本文艺》1936年第6期；后由菲戈译成中文，并经作者校改，补上发表时被删去的内容，载《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

3日 作历史小说《贾长沙痛哭》。写贾谊先遭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被罢免回乡，抑郁不得志，痛哭太息。载日本《东流》（月刊）第3卷第1期，收《豕蹄》。关于贾谊，作者后来说：“我假如有得充分的时间”，“是可以写成所谓‘雄篇大作’的”，“他的悲剧最和我们现今的情形相近”。（《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

22日 作《〈甲骨文辨证〉序》。《甲骨文辨证》系章太炎致金祖同书。序文用日文写成，由金祖同译出。载《说文月刊》1942年12月第2卷第5、6期合刊。

23日 作诗《给 C、F、——“豕蹄”献诗》。收《豕蹄》。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

本月 《离沪之前》由上海今代书店出版。

同月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署名郭鼎堂，后编入《青铜时代》；现收《沫若文集》第16卷。

同月 所译《艺术作品之真实性》（马克思）由质文社出版，列入《文艺理论丛书》。此外，该丛书尚收张香山译的《现实与典型》，林林译的《文学论》、辛人译的《批评论》、孟克译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陈北鸥译的《作家论》等共十种。

同月 温流（梁惜芳，1912—1937）第一本诗集《我们的堡》出版，卷首有郭沫若题字。（据劲松：《温流小传》，载《梅江文艺》1981年第2期）。

六 月

1日 作《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论述历史小说的写作原则。他说：“我始终是站在现实的立场”，注重“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谕”，在描写古人时，应“力求其真容”。《豕蹄》集，收历史小说《孔夫子吃饭》等六篇，并附有李柯的新文字译文。书名取“豕蹄”，是因为“本书所收的东西都是取材于史事，而形式有点象法国的‘空托’(Conte)。我起初便想命名之为‘史题空托’。但觉得四字题太累赘，便想缩短为‘史题’，又想音变为‘史蒂’。最后因为想到要把这个集子献给我的一位朋友，一匹可尊敬的蚂蚁，于是由这蚂蚁的联想，便决心采用了目前的这个名目——‘豕蹄’”。载《质文》1936年10月10日第2卷第1期。收《豕蹄》，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2日 作散文《痈》。从《东方文艺》第2期《新钟创作丛刊》广告将“历史小品”误印为“历史小”一事说开去，认为“‘历史’真正是‘小’”，“愈有‘历史’者，人愈‘小’。愈有将来者，人愈大。古代的人小于近代的人。年老的人小于年青的人”。并告诫青年，不要把“年老的人当成偶像而崇拜。”载《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2号，收《归去来》。

4日 作散文《双簧》。回忆1926年10月10日晚上，与政治部宣传科组织股李鹤岑一起去汉口青年会演说的情景。当时，他们嘻笑怒骂，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讽刺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青年传教士，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就好象一向受人欺负，今晚才得到机会要图报复的一样”。载《东方文艺》(月刊)1936年6月25日第1卷第3期。收《双簧》，联合出版社出版，又收《北伐·附录之二》。现收《沫若文集》第5卷。

14日 作论文《国防·污池·炼狱》。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这是“在目前的救亡关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以促进战线的统一”的“适当的语汇”。文中郭沫若又详细地论述了“国防文学”的理论和主张:第一,“国防文学”的口号,“不妨扩张为‘国防文艺’”,可以“把一切造形艺术、音乐、演剧、电影等都包括在里面”。“凡是不甘心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艺术家,都在这个标帜之下一致的团结起来”,如果“暂时不能团结”,也不要互相进行“内战”。第二,“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它“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因而,“‘国防文艺’最好定义为非卖国的文艺,或反帝的文艺”。第三,“‘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凡是非卖国的,非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人”“我们都可以和他们携手”。他针对那种认为提倡“国防文艺”,会堕入“爱国主义的污池”,因此不积极参加统一战线做法,指出,这是“洁癖的一种表现”,而“带着白色的手套是不能革命的”。在祖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处在“岌岌不可终日”的时候,大家觉醒起来“认真地爱国”,“积极地作反帝的斗争”,这样的爱国主义是“炼狱”,而决不是“污池”。“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的情绪愈真,则他的反帝的行动便愈炽”,他“对于同站在反帝战线上的邻人”愈亲,“这种的爱国主义者和‘污池’式的爱国主义者是应该严加区别的”。郭沫若希望作家们共同走反帝、爱国的道路。郭沫若关于“国防文学”的解释,后来得到鲁迅的赞许,鲁迅说:“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据林林回忆,郭沫若接受“国防文

学”的口号是有一个过程的。当时在日本东京的“左联”成员，要林林转请他写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时，郭沫若对“国”字有所犹豫，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而他对蒋介石是极端憎恶的。但经过几天的思考，认识到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表示愿意做“党的喇叭”，并在6月14日写了《国防·污池·炼狱》，解释不该害怕堕入“爱国主义的污池”。该文后由林林寄至上海发表，接着，郭沫若又写了《在国防旗帜之下》、《我对国防文学的意见》、《菟苗的检阅》等文，体现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据林林：《做党的喇叭——忆郭老在日本二三事》，见《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文载《文学界》（月刊）1936年7月5日第1卷第2号。收《国防文学论战》，1936年新潮出版社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

15日 发表所译《黑格尔式的思辨之秘密》（马克思）。载本日出版之《质文》（月刊）第5、6期合刊。

16日 作论文《在国防的旗帜下》及“追记”。载《文学丛报》（月刊）1936年7月1日第4期。

17、19日 作诗《细砂一粒》，包括诗三首：1.《为亚比西利亚》，2.《为一个讲礼义廉耻的国家》（以上17日作），3.《为高尔基逝世》（19日作）。其中《为高尔基逝世》即《纪念高尔基》之第一首。载日本东京新闻社《留东新闻》（周刊）1936年6月19日，26日第38、39期。

19日 今日“日蚀”。对此次日蚀，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极为关心，特别是由于在日本的北海道可以见到日蚀的全部，日本的报界因此作了大规模的宣传。郭沫若近日来亦颇注意买报读报，但他所关心的“不是天文家的日蚀，而是人文界的日蚀”，因为“几天前报上早就在报导着：我们人文界的太阳——高尔基

病了”，为了这件事，平时怕看报的他，一清早往返三四次的等报纸，好不容易等到报纸，只见报上的第三面登着“马克希姆·高尔基在十八日午后三时，逝于莫斯科，享年六十八岁”。郭沫若看到这一消息，好象觉得“太阳之所以要罩上黑纱，是要代表着全宇宙，为我们的文化巨人吊唁。”（《人文界的日蚀——悼唁高尔基》）

同日 作诗《纪念高尔基》之一，哀悼高尔基。收《战声集》。

20日 作《应该学习的地方——给 Y T 君的一封信》。载《郭沫若杂文集》（盗版），1936年10月永生书店出版。

22日 作诗《纪念高尔基》之二。表示要以文字为铁槌，以言语为镰刀，学习高尔基，继承高尔基，要用血、刀和生命，来继续完成高尔基的事业。收《战声集》。高尔基逝世后，郭沫若与留日进步学生一起参加追悼大会，并观看留日学生和日本进步剧团为纪念高尔基而联合举行的演出。（据曹靖华：《怀郭沫若同志》，见《欢呼春天的诗人》）

本月 夏衍的《包身工》在《光明》（月刊）上发表。

同月 1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阿·马·高尔基（1868—1936）逝世。

夏

收到刘体智托人带来所藏甲骨文拓本二十册，刘希望郭沫若利用这些拓片进行研究。郭沫若从这些拓片中选了一千五百九十九片，纂成《殷契粹编》一书，于次年（1937年）在日本印行出版。在编纂这些拓片时，日本人河井仙郎向郭提议，愿意把他所珍藏的安国三种《石鼓文》的照片与之交换借阅。“河井是三

井的学术顾问,事实上就是帮忙三井收买中国古代文物的掮客。安国《石鼓文》被三井收买时,正是他从中斡旋的,故他藏有三本的全套照片,即是最初进行交易时由上海送去的样本。这样藏本在河井处,他也是讳莫如深,秘不示人的”。郭沫若接受了河井的提议,因而,得有机会看到“先锋”、“中权”、“后劲”三本的全貌。“三本照片前题后跋俱全。‘中权’和‘后劲’的蹊跷也就因而得到了阐明。”(《“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

七 月

2日 作论文《人文界的日蚀——纪念高尔基》。称赞高尔基的一生“是一部崇高的伟大的富于悲壮美的、富于营养价值的杰作”,他“吐着自己的光,发挥着自己的能(energy),普及其恩惠于群生”,使我们“在他的光辉之下”健全生长,“看明白了自己所应该走的路”。载《质文》(月刊)1936年10月10日第2卷第1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副标题改为《悼唁高尔基》。

13日 编辑“国防文学”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编成《现阶段的文学问题——国防文学集谈》,并作《我的自述》(即《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及“小引”。认为“‘国防’这个用语”,“字面既简单而包括又广大,最适宜于作为一个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只要能反帝的人在目前通是我们的朋友”。当然,“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更高级的意识和更远大的目标。我们在强调救亡,强调爱国的军号中,同时要吹奏着我们的意识和目标的”。文中,还就报告文学问题,文艺作品中塑造典型问题,历史题材问题,作家的世界观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据任白戈回忆:1936年7月,当国内原“左联”的领导人带信到东京要他们对“国防文

学”这个口号发表意见时，经郭沫若建议曾召开座谈会进行讨论，会上，由陈北鸥做记录，并把记录稿给郭沫若审查，郭亲自将整理出来的记录稿编成一辑刊载在《质文》杂志上。任白戈说：“我们在印这一期《质文》时，鲁迅先生的文章还没有见到。等到这期《质文》印出来，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发表了。我们知道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鲁迅先生提的，两个口号论争也就基本结束了。因为当时论争的双方，对鲁迅先生都是非常尊敬的”（任白戈：《深切地怀念郭沫若同志》，见《欢呼春天的诗人》；《访任白戈》，见《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我的自述》列为《国防文学集谈》之十。载《质文》（月刊）1936年10月10日第2卷第1期。收《现阶段的文学论战》，林淙选编；又收《国防文学论战》，上海新潮社出版；现收《郭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篇名题《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

19日 作自传体小说《宾阳门外》并“小引”。写北伐军进攻武昌城的情景，对翻译纪德甫阵亡，表示深切的哀悼。载《光明》（半月刊）1936年8月10日第1卷第5期。初收《北伐》，后收《革命春秋》的附录；现收《沫若文集》第5卷。

25日 作论文《青年们，把文学领导起来》。载《文学大众》1936年9月5日第1卷第1期，后编入《名家近作集》，1937年金屋书局出版。

同日 发表《高尔基的死》。这是记者的采访记录稿。载上海《东方文艺》（月刊）第1卷第4期。

八月

1日 作《克拉凡左的骑士》前言。载《质文》（月刊）1936年10月10日第2卷第1期。收《地下的笑声》。中篇小说《克拉凡左

的骑士》全稿在十万字以上，本年10月起分期发表于《质文》，连载二次，因杂志被禁而中断。1937年回国时，曾将余稿随身带回；离沪前又托友人保管，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中遗失。《质文》上已发表的部分，现收《沫若文集》第5卷，题作《骑士》，《前言》未收入。

13日 译剧本《华伦斯太》(德 席勒)毕。1936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55年更名《华伦斯坦》，增加序文一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5日 作《译完了〈华伦斯太〉之后》。收《华伦斯太》初版。

26日 作《〈石鼓文〉书后》。收1939年7月长沙商务印书馆《石鼓文研究》，篇名题《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锋本石鼓文书后》内附《中权》、《后劲》两本诸题跋缩影。

30日 作论文《菟苗的检阅》。就“两个口号”问题发表意见，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载《文学界》(月刊)1936年9月第1卷第4期。收《国防文学论战》(《救亡文化丛书》之一)，1936年10月新潮出版社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

本月 自传《武昌城下》由上海晓明书局出版。

九 月

2日 发表《戏答陈子展》一诗。载本日出版的上海《立报·言林》，诗后注明“8月22日寄自日本”。

同日 午后，访金祖同，谈起国内文坛的纠纷。郭说：“我虽处身海外，倒也看得清楚。”金问他“清楚得如何？”他提起笔来，戏拟一联：“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呀失门。”写毕说：“这就是我们的观

点”，掷下笔打着哈哈去了。（据金祖同：《郭沫若〈戏论鲁迅茅盾联〉附文》。载《今代文艺》第1卷第3期，转引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1978年8月《中国现代文学史》昆明教材会议编）

4日 作论文《我的作诗的经过》。自述“诗的觉醒期”是1913年，读了“美国的朗费洛（Longfellow）的《箭与歌》（Arrow and Song）那首两节的短诗”，后来在日本接触了泰戈尔的诗，为他那清新和平易径直的风格所吸引，“便和太戈尔的诗结了不解缘”，这时候“偶尔也和比利时的梅特灵克的作品接近过”。后来由于和安娜恋爱，才使自己的思想倾向有所转变，而且，“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这以后又受了德国诗人海涅的影响。1919年，从《时事新报》上所登的白话诗中得到启发，激起了创作欲，从此，就不断地写诗，“因而在民八、民九之交的《学灯》栏，差不多天天都有我的诗”，这是诗的爆发期，经常有诗兴袭来，“真是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起来”。除了泰戈尔外，后来郭沫若还接触过斯宾诺莎和华格纳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受过他们的影响，“而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于是写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凤凰涅槃》等诗篇。“总之，在我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太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载《质文》1936年11月10日第2卷第2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

5日 作《〈豕蹄〉后记》。收《豕蹄》。

7日 作评论《斗牛国的牛》。热烈歌颂西班牙人民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文末，联系胡适鼓吹的“把北平作为无军备的文化都城”的谬论，指出这是“投降主义，秦桧主义！”载

上海《女子月刊》第4卷第10期。初收《沫若近著》，题《西班牙的精神》。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16日 作评论《关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5期,收宇宙风社出版的《日本管窥》。

17日 作杂文《君子国》。通过一个岛上的“夜不闭户”的君子国被海盗侵占的故事,影射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载《希望》(半月刊)1937年第1卷第1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

18日 作诗《们》。歌颂集体力量,表示要和群众“结合着,融化着”。载《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0号。收《战声集》,又见《名家近作集》;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

19日 致若英信(署名石沱)。手迹载1936年12月21日上海《大晚报》。

本月 所译剧本《华伦斯太》(德 席勒)由生活书店出版。

本月 茅盾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中国之一日》出版。

十 月

1日 与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语堂、洪深、周瘦鹃、茅盾、陈望道、夏丐尊、张天翼、傅东华、叶绍钧、郑振铎、郑伯奇、赵家璧、黎烈文、鲁迅、谢冰心、丰子恺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体现了文艺界的广泛的联合。

8日 作《〈人类展望〉书后》。收《人类展望》,1937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0日 发表《侠情与友谊的纪念——高尔基〈文学论〉序》。载本日出版之《光明》(半月刊),文中对高尔基及其《文学论》作

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作者六十八年来做文和做人的经验的记录，它“不仅是我们二十世纪做文学者的精神粮食，同时也是我们做人者的精神粮食。”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高尔基文学论》由扬凡翻译。此外，在与青年谈话时，郭沫若亦称赞高尔基的文学论文“多系他自己几十年创作经验的结晶，又站的高，看的远。不象我们的文艺理论家的文章，架势很大，连篇空话，同创作实践对不起号来。”（臧云远：《东京初访郭老》，见《悼念郭老》）。

14日 作《水与结晶的溶洽》一文之“说明”。答复周金对郭所作讲演的批评。郭沫若说，那次讲演的命题是“等质的文化容易溶洽，如清水之与浊水。异质的文化不易溶化，如水之与油”。然而“油与水并不是完全不能溶洽，用高度的压力可以使它们生出Emulsion（乳融）。这高度的压力便是 Revolution（革命）。而我十年来所关心的、所主张的还不仅只是这水与油的溶洽，而是水与结晶的溶洽。”收《沫若文集》第11卷。

5至19日 小病两个礼拜，至19日才“稍微舒适了一点”（据《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

19日 作《〈资本论〉中的王茂荫》，考证《资本论》首卷第一篇第三章注83提及的 Wan—mao—in即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载《光明》（半月刊）1936年11月第2卷第2号。收《沫若近著》。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又 作《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接读晚报，惊悉“鲁迅先生于今晨五时二十五分在上海长逝了”，不禁潸然泪下，“仅仅相隔着四个月，连接失坠了两个宏朗的大星，这损失的重大实在是不可测算的”，并因未能见鲁迅一面，为“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他高度评价鲁迅，说：“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先生为真实意义的开山”，称颂

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载《质文》(月刊)第2卷第2期,收《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纪念委员会编)。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

又 作《挽辞》:

鲁迅先生 千古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欲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郭沫若 哀挽

载《鲁迅先生纪念集》挽辞部分第23页。

又 代表质文社同人题词哀挽,词曰:

“平生劝业尤拉化
旷代文章数阿Q”。

载《质文》(月刊)第2卷第2期。(参阅林林:《“左联”东京分盟及其三个刊物——回顾文学路上的脚印》,见《新文学史料》第3辑;郑林曦:《郭老热心文字改革二三事》,见《悼念郭老》)

22日 作《坠落了一个巨星》,悼念鲁迅。此文原系日文稿,载东京《帝大新闻》,后由北鸥译成中文,并经作者亲自修改。载《现世界》(半月刊)第1卷第7期。

本月 《豕蹄》由上海不二书店出版,列入“不二文学丛书”。本集包括序一篇,献诗一首,历史小说六篇,自叙传五篇及后记一篇。

本月 19日,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1881—1936)逝世,享年五十六岁。

同月 《国防文学论战》一书,由新潮社编辑出版,为《救亡文化丛书之一》,收四十位作者的文章五十七篇,书后附录《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文艺界同人为团结

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十一月

1日 作《不灭的光辉》，悼念鲁迅。赞扬鲁迅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是民族的精英，他的光辉“将永远的照耀而且领导着我们”。载《光明》（半月刊）1936年11月25日第1卷第12号。收《鲁迅先生纪念集》，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集外”。

10日 作《青年与文化》及《跋语》。本文为郭沫若7月在日本明治大学所作题为“青年与文化”的讲演，由拓生记录。郭沫若从“青年是什么”，“文化是什么”谈起，指出：当前的文化“遇着了重大的危机”，每个青年“都要负起责任来，把文化由危机中救起”。本日在《跋语》中说：“这篇讲演，当时说得很局促”，因为，“有不少的日本宪兵刑士在场，有好些话还没有说尽”。均载《光明》（半月刊）1937年第2卷第5号。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11日 作诗《诗歌国防》。号召在和帝国主义斗争的生死存亡关头，要“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吹奏起诛锄汉奸的军号”，“把全民唤到国防前线把侵略者打倒”。收《战声集》。

又 作诗《疯狗礼赞》，赞美那“解放了一切狗性”的“疯狗”，因为，它不分贵贱，不分主奴，如果有人“要挡着它的行程”，“它都要把他死咬一口”。收《战声集》。

17日 在留日学生各团体追悼鲁迅大会上作演说。指出：“鲁迅的死是最伟大最光荣，三代以来，只此一人。而鲁迅的精神是永远不死的。”载1936年11月18日上海《文化报》，收《鲁迅先生纪念集》卷首，“逝世消息”栏。

20日 译诗剧《赫曼与窦绿苔》（德 歌德）毕。并作“书后”。载《文学》（月刊）1937年1月、2月第8卷，第1、2期。1942年

重庆文林社出版单行本。

中旬 郭沫若应邀参加了日本改造社编辑《鲁迅全集》的会议和为欢迎郁达夫而举行的晚宴，席间作诗一首，书赠郁达夫，诗曰：“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第四句“开始想写成‘《广陵散》绝倍苍凉’，以嵇康喻仿吾，嵇康临刑自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因念到当时在报上流传着的仿吾的死耗以为不确，“便索性夸张一下，改成了国破家亡之句。”（《达夫的来访》）郭沫若自1928年2月到日本后，和郁达夫没有通过消息，这次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郭寓访问，终于使中断多年的友谊完全恢复了。（《论郁达夫》）又因郁达夫的关系，郭沫若也被东京的日本文人们邀去参加过几次欢迎郁的宴会。（《再谈郁达夫》）

24日 出席日本文人们举行的郁达夫欢迎会，并合影留念。照片载日本出版的复刊《中国文学》别册。

29日 星期日傍晚，郁达夫来，邀郭沫若和阿博、阿佛同到东京去吃中国菜。到了神田，达夫怕郭沫若着凉，在一家洋货店里买了一条骆驼绒的围巾送他。郁这厚意，使郭十分感激，并由此想到了古人的解衣推食之举（《达夫的来访》）。

本月 所译《隋唐燕乐调研究》（日 林谦三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二月

2日 致赵家璧信，答应承担德国短篇小说的编选工作。信中说：“《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承邀担任德国部分，似可勉强为之。但译文材料手中毫无搜集，望尽量提供，用后退还。”赵家璧当时是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良友图书公司在编辑出版《中国

新文学大系》之后，又拟出版十卷《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英、美、法、德、日、俄、南欧，北欧、苏和新兴国各一卷。其中“德国集”的编选工作，经出版社约请，由郭沫若担任。后因1937年“八·一三”战争而流产。（据赵家璧《编辑回忆》，见1957年5月15—17日《人民日报》；又见《中国新文学史料》第1辑、第3辑）。

7日 作论文《旋乾转坤论——由贤妻良母说到贤夫良父》，批判鼓吹“贤妻良母”的封建道德观，主张男女平等，“男女应该以同等的人格相对待，互相尊重，互相玉成，以发展各自所禀赋的性能，不应该有片面本位的片面义务。”载《妇女生活》（半月刊）1937年第4卷第1期。收《沫若近著》，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又 作散文《大山朴》。载1936年12月15日上海《立报·言林》。收《归去来》。

9日 作杂文《漫话〈明星〉》。载12月18日上海《大晚报·火炬》，见1939年11月上海秋鸣社出版的《秋窗集》。

16日 参加日本笔会招待郁达夫的晚宴，席散后，与郁达夫同去于立忱寓所，作七绝一首和于立忱，题为《断线风筝》。诗云：“横空欲纵又遭擒，挂角高瓴月影沉。安得姮娥官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并应于之请，书以赠之。于立忱的原诗是“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题《咏风筝》。诗见散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收《归去来》。

17日 早晨，去车站为郁达夫送行。这次郁达夫到日本，前后滞留了一个月，他到郭沫若的寓所三次，又在日本人的招待会上，见过郭三次（《达夫的来访》）。

27日 作杂文《沃尔眸》（沃尔眸是一种两栖动物的名称）。载1937年1月5日上海《立报·言林》。

本年 作自传《北伐途次》(1926—1927年),共三十一节,连载于《宙宇风》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第20—34期。后改为三十节。1937年由北雁出版社出版,初版题名《北伐》,列为《创造丛书》之一,后编入《沫若自传》第2卷《革命春秋》。

同年 作论文《再谈官票宝钞》。论述清咸丰年间发行的官票宝钞。载《光明》(半月刊)1937年第3卷第1号。收《沫若近著》。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

同年 作《我在日本的生活》,回忆早年在日本的生活和所作的诗。原系日文,载《文艺杂志》。(据海英:《郭沫若留学日本初期的诗(1914—1918)》一文,见《中国现代文艺丛刊》第3辑。)

同年 作诗《题渊明沽酒图》。《渊明沽酒图》系傅抱石所画。收《潮汐集·汐集》。

同年 冬,作诗《题画红绿梅》二首。收《潮汐集·汐集》。

一九三七年(四十六岁)

一月

8日 作散文《达夫的来访》。以充满感情的笔触，追叙去年郁达夫访日的情况。载《宇宙风》(半月刊)1937年2月16日第35期。收《归去来》。

13日 作散文《杜鹃》。用名实不符，欺世盗名，以怨报德的杜鹃，隐喻日本帝国主义。载1937年1月20日《立报》。现收《沫若文集》第7卷《集外》。

15日 致《中流》杂志信，答复《中流》第1卷第8期所载君度在《苏鲁支语录》一文中对郭译《查拉图司屈拉》译文的不同意见。载《中流》(半月刊)1937年2月第1卷第10期《来函照登》栏。

19日 作《答田军先生》。载1937年1月25日上海《大晚报·火炬》。

25日 作诗《妇协歌》，为留东妇女协会而作。载1937年2月2日上海《立报·言林》。

本月 《北伐途次》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

二月

15日 作《北伐途次·后记》。收《北伐》，1937年6月北雁

出版社出版；现收《革命春秋》。

三 月

本月 作《读〈实庵字说〉》。批驳陈独秀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阶段的看法。《实庵字说》是陈独秀写的关于文字学的著作，连载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5、6、7、10、13号。他反对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古代存在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论断。郭沫若在文中再次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确实存在过奴隶制。初收《羽书集》，现收《沫若文集》第11卷，题《驳〈实庵字说〉》。

同月 作《考古记的年代与国别》。见《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同月 所译《人类展望》（英 韦尔斯著）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本月 周扬在《希望》创刊号上撰文，第一次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著作，至四十年代，全文译出出版。

四 月

1日 发表《创造十年续篇》。本日起连载于上海《大晚报》至8月12日止（未完）。193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7卷。

15日 作《殷契粹篇》毕，并作《序》。收《殷契粹编》。1937年5月29日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该书出版时并附有《〈殷契

粹编>述例》，《考释》追记二则及索引。

20日 作《克拉凡左的骑士》小引。载上海绸业银行《绸缪》(月刊)1937年6月1日第3卷第9期。

29日 为《曲江河畔》照片写说明。收《北伐》；现收《沫若文集》第8卷。

同日 致北雁出版社信，委托查究版权问题，手迹收《北伐》。

五 月

月初 出席“左联”东京支盟在东京神田区一家餐室里举行的聚餐会，参加者约五十人。(据林焕平：《深切的怀念 沉痛的哀悼》，见《悼念郭老》)

19至24日，作论文《借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批评胡适在《说儒》一文中的错误观点。载《中华公论》(月刊)1937年7月创刊号。收《蒲剑集》，现收《沫若文集》第16卷《青铜时代》。篇名题均作《驳说儒》。

下旬 一天，风子来寓所辞行。郭沫若对她说：“国内局势有了大变化，国共再次合作了。你是广西人，回广西可以了解一下情况，也可以做点促进团结应变的工作”，鼓励她积极投入抗日家风子系应留日学生的邀请来日本参加《日出》的演出。离沪前，阿英(钱杏邨)曾交给她一封信，嘱她交给郭沫若，并说“这封信很重要，要避免国民党和日本当局的检查”。风子抵日后，由林一平陪同会见郭沫若，递交了信件，这封信给郭沫若带来了有关政治形势新发展的重要讯息。(风子：《回忆阿英同志》，见《新文学史料》第2辑)

本月 接郁达夫来电，告以当局有意召郭回国，郭回电要

郁说明详细情形，但未获回音。（据《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

同月：《殷契粹编附考释索引》由日本东京文求堂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

初 夏

作诗《题兰》。这是应日本东京京华堂主人小原次郎之请，为其所作兰花谱而题的诗。诗云：“葦蕤盈室艾盈腰，谁为金漳谱寂寥？九畹滋兰百亩树，羨君风格独嵯峣！”见《破与立》（双月刊）1979年山东曲阜师院第1期，陈梦熊《鲁迅和郭沫若书赠日本友人的题兰绝句》。

六 月

1日 作《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记述去年12月16日同郁达夫一起访问于立忱的情景，以悼念死者。文末附记中说：“立忱死后已10日，很想写点文字来纪念她，什么也写不出。只她的《咏风筝》和我的《断线风筝》总执拗地在脑子里萦回”。于立忱系于立群之姊，破落官宦家庭出身，毕业于女子师范大学，因参加政治活动被捕，出狱后进天津《大公报》工作，不久，因生肺病赴日本就医，兼任《大公报》驻日记者。二年后病体渐愈，因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日益暴露，积极从事爱国的政治活动，为此，受到报社的警告。1937年3月，于立忱被迫回国。她眼见国家危亡，社会黑暗，悲愤交集，于5月22日在上海自缢而死。死时留下几句哀切的遗言：“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洪波曲》）载上海《妇女生活》（半月刊）1937年6月16日第4卷第11期，收《归去来》。

7日 作杂文《中国左拉之待望》。载上海《中国文艺》(月刊)1937年6月第1卷第2期。

15日 发表《给〈威廉迈斯达〉译者》。载上海《作品》1937年6月创刊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达》(即《维廉·麦斯特》),歌德著。

同日 发表所译《古代社会的经济》(诺瓦略夫),载上海读书生活社《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思想文化问题特辑》。

22日 作评论《自由并不是中立》。载上海《作品》(半月刊)1937年6月第1卷第2期。

本月 《北伐》由上海北雁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杨朔、孙陵合编。

七月

1日 复川东达县小同学信。载上海《中国文艺》(月刊)1937年7月15日第1卷第3期。发表时题作《双鲤鱼》,内容包括来往信件各一封。复信后又载《国闻周报》第14卷“战时特刊”,系自《双鲤鱼》中摘出,题为《复达县小同学书》。

14日 以“廿四传花信”诗一首,寄横滨的朋友,暗喻定于二十四日乘船返国,参加抗战,希予以妥善安排。诗见《由日本回来了》一文中,载1937年8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第47期,又载于8月4日上海《大晚报》,报载篇名为《郭沫若题诗》。收《翹去来》。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战声集》,题《归国杂吟》(一)。

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后,郭沫若满怀爱国热忱,决定立即回国,投身于祖国和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由于当时日本宪兵、刺士的严密监视,有关回国的准备工作只能秘密进行。日前,接友人来信,告以“青年会有西式房间十八、二十、二十四

号等，设备甚周全”。这是隐语。青年会指神户，西式房间指外国轮船，号数指日期。于是，郭以此诗作答。当时，具体帮助郭沫若回国的是钱瘦铁和金祖同（据《再谈郁达夫》）。又，1978年6月19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郭沫若逃出日本，六十年朋友谈秘史》一文说，协助郭沫若逃出日本的人士之一是一位老华侨名叫刘明电，是1914年郭沫若在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认识的老朋友。

22日 晚，C君来寓所辞行，谓将于近日返国。郭沫若和C君将乘同一艘船。为了保密，郭沫若没有将自己也要回国的消息告诉他。（见《由日本回来了》）

24日 晚饭时，郭沫若暗示安娜自己将离日返国。安娜知道了郭有走意，曾告戒过他，走是可以的，只是他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但表示，只要他是认真地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安娜的这些话，使郭沫若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见《由日本回来了》）

同日 作七律一首，步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表达了抛子别妻回国参加抗战，为了民族的解放，甘愿献身埋骨的精神。诗见于《由日本回来了》一文，载1937年8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第47期，收《归去来》；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题《归国杂吟》（二）。

25日 星期日，凌晨四时半起床，决心趁妻儿们尚在熟睡中离去，郭沫若先在书房给妻子及四儿一女写好留言，连最小的六岁的鸿儿“都用‘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替他写了一张

纸”，希望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然后，又走进寝室，此时安娜已醒，开了电灯正在枕上看书，儿女们均在甜睡中。他“在安娜额上亲了一吻，作为诀别之礼”，但她的“眼，没有离开书卷”。郭沫若穿着和服和木屐，“心里默祷着妻儿们的和一切的平安”，告别了自己的家，从后门走出，经过田野，走上了大道。（《由日本回来了》）

他身上只带了五毛钱电车费。步行了两站路后，当确认没有人跟踪时，才坐上头班电车。五时半至东京，改乘汽车赶赴横滨友人家，友人资助“五十元大洋”，又借换了一套不甚合身的西装和鞋袜；九时半，在友人陪同下，乘“燕号”特别快车，赶赴神户。

下午五时半抵达神户，登上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为了避人耳目，他平生第一次坐了头等舱，并化名Young Pat-ming。

晚九时开船，与住了十年的岛国作最后的诀别，看到船上与岸上的人们在互相投扔五彩的纸带，联想到自己也有“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和自己永远联系着。

同日 发表所译《古代社会之没落》（诺瓦略夫）。载上海读书生活社《认识月刊》1937年7月第1卷第2期。

26日 在船上，写了好几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并分别写信给日本市川市的宪兵分队长和警察署长道谢他们十年来的“保护”，并请对留下的家室加以“照顾”。

轮船上的中国船员为了慰劳华北前线的抗敌将士，假托“慈善会”名义，发起募捐，郭也捐款五元。

27日 清晨，作七绝《黄海舟中》。诗云：

此来拚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秦岱早安排。

表露了公而忘私的伟大胸怀。诗见于《由日本回来了》一文。载1937年8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第47期。收《归去来》。又收上海大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抗战与觉悟》(代序),系作者手迹;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题《归国杂吟》(三)。此诗与“又当投笔请缨时”一诗,曾由《光明》半月刊制版发表(见《光明》1937年8月第3卷第5期)题作《黄海舟中》,均注明7月27日作。

午饭后,应船上的一位女服务员之请,在《北伐》一书上题“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句。

下午,船抵上海。郁达夫在码头迎接。郁是事先接到电报后,专程从福建赶来上海的。去码头迎接的还有刘海粟、倪貽德、叶灵凤等。刘海粟是送郭沫若上船的钱瘦铁通知的;(参见郁风:《能师大众者 敢作万夫雄》,《美术》1978年第4期)到达上海后,由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住所,暂住沧洲饭店,当去迎接他的夏衍等“问他还有什么行李时,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见《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30日 回国后的第四天,偕两位朋友去中国公墓吊于立忱墓。

同日 发表评论《抗敌与民主的不可分性》。载上海人间十日社《人间十日》(旬刊)1937年7月第14期,署名杜衍。

31日 郭沫若回国后,国民党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声明撤销对他的“通缉令”。唐弢回忆说:“郭老归国在当时是个重要新闻,公认为一件大事情,一件有点神秘意义的大事情,所以人刚上岸,他在邮船上写的步鲁迅原韵的七律诗便广泛地传开了。几家报纸争着刊登。这首诗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记得张菊生、沈尹默都写了和诗”。(《永恒的怀念——悼郭沫若同志》,见《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

本月 7日,日本军国主义进攻芦沟桥,是为“芦沟桥事变”,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

同月 28日,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成为团结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教育各方面进步人士和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

八 月

1日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由林林等人协助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一所捷克人的公寓。

同日 书《黄海舟中》赠于伶。(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见《上海文艺》1978年第7期)

同日 日记体散文《由日本回来了》脱稿。文中详细记述了返国前后及旅途中的情景。载《宇宙风》(半月刊)1937年8月第47期。收《归去来》。现收《沫若文集》第8卷《革命春秋》。

又 作诗《题廖仲恺先生遗容》,诗前有小序。手迹载1937年8月20日上海《立报·言林》,题为《郭沫若题词》。收《战声集》。

3日 本日报发表题为《两文化团体昨宴郭沫若,潘公展致词备致赞佩,郭挥泪赋诗,合座感动》的消息。内云:“郭致答词,谓今日承两团体宠宴招待,深为感谢。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示寸衷……”即席朗诵了7月24日所作步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诗一首。(参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79期)

同日 作散文《一二八的炮手》。载《光明》(半月刊)1937年9月1日战时号外第1号。收《战时小说选》,1938年战时出版

社出版。

4日 为戏剧界即将联合公演《保卫芦沟桥》题词：“芦沟桥已经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芦沟桥，它是不应失掉，在我们精神中的芦沟桥，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芦沟桥虽然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载1937年8月7日上海《大晚报》，题为《郭沫若题词》，又见当年该剧公演时的说明书。（手迹影印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79期）

《保卫芦沟桥》（三幕剧），由戏剧界集体创作，参加创作的有崔嵬、张季纯、马彦祥、阿英、于伶、宋之的、姚时晓、舒非等十七人，由夏衍、张庚、郑伯奇等四人整理成稿；内有冼星海、周巍峙等六人所作的歌曲；由阿英起草代序。该剧于本月7日起在南市蓬莱大戏院公演，参加演出的戏剧和电影工作者近百人。上演后，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魏绍昌：《郭老抗战回国后第一次观看的话剧》，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79期）

戏剧界为了欢迎郭沫若和刚出狱的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君子”，在日夜场之间，特地加演了一场。“当夏衍和阿英同志陪着郭老进场时，剧场全体起立，鼓掌欢迎，久久没有平息。”（于伶：《回忆“中国剧作者协会”和集体创作、联合公演〈保卫芦沟桥〉》，收《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及《怀念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

7日 作七律一首，诗云：

十年退伍一残兵，今日归来入阵营。
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
金台寂寞思廉颇，故国苍茫走屈平。
挈眷挈家何处往？蚩蚩叹尔众编氓。

有感于当时政治形势，作者在《由“有感”说到气节》一文中说：

“那时平津失陷，全面抗战尚未开始，故不免略有‘寂寞’之感”。此诗写成后，被友人抄去，发表在1937年8月25日的上海《救亡日报》上，题为《有感》。诗见《由“有感”说到气节》一文，收《战声》；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题《归国杂吟》（四）。

12日 清晨，应友人张发奎（向华）邀，赴嘉兴游南湖。张时任沪浙区前线指挥，苏浙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到浦东去来》，见《归去来》）他要求郭沫若帮助组织政工队，郭应允。后来“在淞沪抗战的最高潮中，上海一群爱国的文化人士”“参加了战地工作”，队长是钱亦石。（《亦石真正死了吗？》。收《沸羹集》）。

当晚，从嘉兴乘夜车往杭州。

13日 “八·一三”战事爆发，郭沫若自杭州返回上海，火车开到西站便已经不能前进，使迎接他的人扑了个空。

17日 作论文《我们为什么要抗战》。载《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23日，第2期。收《抗战与觉悟》。此篇曾收入1938年1月上海一心书店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要抗战》，题作《中国为什么要抗战》。

19日 发表诗《抗战颂》。热情地讴歌抗战。载《抗战》三日刊第1期，收《战声集》。

20日 晨，作诗《民族复兴的喜炮》。收《战声集》。收入《沫若文集》时改题为《民族再生的喜炮》。

又 作诗《战声》。收《战声集》。

又 作《中国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及其种种罪行，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斗士，一切理智清明的国际的弟兄们，尤其日本国内的弟兄们，请你们一致起来，和我们携手，共同战斗。”载1937年8月24—25日上海《救亡日报》。收《羽书集》，题作《告国际友人书》。

22日 作诗《血肉的长城》。号召人们为了战胜敌人，“我们

要以血肉新筑一座万里长城！”载1937年8月24日上海《救亡日报》，收《战声集》。

23日 作论文《国难声中怀知堂》。载上海《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1937年8月30日第1期。收《全面抗战的认识》。又收《羽书集》，香港孟夏书店出版。

24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出版。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出至本年11月22日第86号时被迫停刊。郭沫若经常在该报发表诗文，指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前景，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

同日 乘张发奎派来的汽车往前线，当天返回上海。

25日 作通讯《到浦东去来》。记述往浦东前线访问的见闻。载1937年8月26日、27日《救亡日报》第3号、第4号。收《抗战与觉悟》；又收《归去来》。

又 作评论《理性与兽性之战》。指出：这次抗战就是“理性与兽性之战”，是“进化与退化之战”，是“文化与非文化之战”。我们应该“运用全力来扩展这理性与兽性之战，联合全世界理性清明的民族或个人，扑灭全世界一切人形的兽类！”载《文化战线》（旬刊）9月1日创刊号。收《抗战与觉悟》，又收《羽书集》。

28日 发表歌词《中国妇女抗战歌》，歌颂妇女踊跃参加抗战。载本日上海《立报·言林》。收《抗战歌声》，又收《战声集》。

29日 上午，去法租界马斯南路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参观，为一位儿童题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字句。（见《归去来·希望不要下雨》）

30日 作评论《不要怕死》。谈对付汉奸的办法，并告诫人们要“凛烈自己的气节，要不受利诱，不受威胁，临到最后关头争这一口气，不要怕死！”载1937年9月10日上海《救亡日报》。收《抗战与觉悟》，又收《羽书集》。

又 发表杂文《由“有感”说到气节》。深刻地批判汉奸卖国贼。“这是听见江朝宗辈就伪职时所做的”。文中附诗两首(即《归国杂吟》之四,之五)。载1937年8月30日上海《救亡日报》,收《抗战与觉悟》,又收《羽书集》。

31日 作诗《“铁的处女”》。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人民的暴行。载《高射炮》1937年9月5日第2期。收《战声集》。

本月 作散文《回到上海》。记回沪后的几件事。收《归去来》。

又 作诗《前奏曲》。以激昂的声调,热情讴歌全民抗战。收《战声集》。

同月 为《早报》编辑副刊,撰写稿件。《早报》是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在“八·一三”后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而创办的。(据唐瑜:《忆郭老二三事》,见《悼念郭老》)

又 20日,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在上海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其中五个队于1938年集中于武汉,改编为“抗敌演剧队”。

八、九月间

把几年来所写的文章编为《断断集》,由施复亮介绍交某新开的书店出版;因该书店未开张,结果连稿本也被丢失了。于是又从中选了一部分带学术性的文字编成《沫若近著》,由北新书局出版,收1935—1936年写的文章十二篇。

九 月

2日 作散文《希望不要下雨》。郭沫若在参观马斯南路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时，看到“那棚顶的篾席只能遮日，不能遮雨”，深为难民担忧，希望天不要下雨。载1937年9月7日《救亡日报》第19号。收《归去来》。

3日 晚，自杨行郊区返回上海。（据《前线归来》）

4日 作诗《只有靠着实验》，认为抗战时间的长短，“只有靠着实验”。收《战声集》。

7日 作评论《忠告日本政治家》。警告日本政治家，特别是近卫文磨，不要做日本军部的傀儡和传声筒。载1937年9月9日上海《救亡日报》，又载1937年出版的《抗战》三日刊第1、2期合刊。收《羽书集》。

同日 晚，由杜君陪同往昆山访陈诚。只见沿途步哨密布，戒备森严，颇有战地风味，具体地感受到了“所谓‘伟大的时代’，‘神圣的战争’，那些语汇的意义”。抵昆山后，因陈诚上了前线，便在汽车里过夜。

8日 分别会见司令长官冯玉祥，江防总司令陈诚，向他们提出有关军事、政治工作的建议。

作五律一首，云：“雷霆轰炸后，睡起意谦冲。庭草摇风绿，榴花映日红。江山无限好，戎马万夫雄。国运升恒际，清明在此躬。”并作小跋：“在××（昆山）遇敌机轰炸，于明远帐中午睡片时，醒来见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兴赋此。”（此诗即《归国杂吟》之六，见《战声集》）

晚，遇东路军副总司令薛岳。

9日 和杜君往薛岳驻地，遇黄琪翔等。下午返上海。

11日 作论文《抗战与觉悟》。指出要正确认识抗战的形势，提高对抗战的觉悟，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载1937年9月20、21日《大公报》。收《抗战与觉悟》，又收《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和《羽书集》。

15日 作评论《全面抗战的再认识》。认为所谓全面抗战，是指“国家社会内的一切设施的战时机构化”，要把经济、财政、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根据战时的要求进行规划和施行，发动各阶层人们投入抗战并积极开展国民外交。载《抗战》1937年11月1日第3期。收《羽书集》。

中旬 作通讯报告《前线归来》。记叙去昆山前线访问情况。载1937年9月12日至14日《救亡日报》第14、15、16号，又载《抗战》1937年11月1日第1、2期合刊。收《归去来》。

又 作七绝《归国杂吟》之七（“炸裂横空走迅霆”）。收《战声集》。

17日 作诗《所应当关心的》。提醒人们“所应当关心的”是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究竟有没有十成”。号召人们要“督促政府抗战到底”。收《战声集》。

18日 清晨，作《关于敏子的信》。纠正《申报》所载《敌机长斧田一封凄凉的家信》一文译文的错误，批评宣传工作的缺点。载1937年9月19日《救亡日报》第21号，收《全面抗战的认识》，又收《羽书集》。

又 发表《九一八的国庆纪念化》。载本日出版的《救国日报》第20号。

又 发表杂文《归途》。载本日《光明》（半月刊）战时号外第3期。

20日 作杂文《“侵略日本”的两种姿态》。要人们警惕侵略者所放出的“和平”的烟幕，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人

中蒙着画皮的它的同类”——汉奸的本质。载《文摘》战时旬刊1937年12月第1号。收《全面抗战的认识》；又收《羽书集》。

同日 晚，离上海赴某地访陈诚，后偕陈等往前线。深夜二时返司令部。

21日 傍晚抵苏州。

22日 在苏州，访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张一馨。傍晚六时乘汽车离开苏州往南京。

23日 清晨五时抵南京。访周至柔，与他议论战事的发展趋向。午后一时，访第一侍从室主任钱大钧。

又 往八路军后方办事处访叶剑英。郭和叶是“北伐时代的老友”，别后已整整十年。谈话中，郭向叶询问了陕北方面的消息。

继又分别往访陈立夫、邵力子，未遇。晚，邵力子来。

24日 至新民报社访田汉，未遇。应报社负责人陈铭德夫妇邀请，搬至他们的家里居住。

访张群。

会见蒋介石。郭沫若后来在《在轰炸中来去》中详细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景。

应邀至周至柔处晚餐。从周处听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

至张群处，告以明日返沪，托其转告蒋介石，并重申不愿接受职务的意见。

25日 在警报声中见我方高射炮击落敌机两架，极为兴奋。

本日会见了汪精卫、陈公博。访问了孙科。

26日 清晨，乘汽车离南京，回上海。

27日 清晨，抵上海。郭沫若后来曾谈到这次去南京的原因，是因为回国后“当局曾经要我到南京，我没有去。一直到9月底，又由陈诚的推挽，我终究到了一次南京”，（《再谈郁达夫》）

郭沫若还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是一个胜利。”（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见《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下旬 作《在轰炸中来去》，记叙南京之行。载1937年《救亡日报》社所刊单行本，列入阿英主编的《抗战文艺小丛书》，1937年上海文艺研究社、1938年汉口新人书店均出过单行本，后分别收入《前线归来》和《归去来》；现收《沫若文集》第8卷。

本月 《抗战与觉悟》一书由抗敌出版社出版。

本月 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儿童团体孩子剧团成立，由吴新稼（吴莆生）任团长。上海沦陷后，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年底到达武汉。

十 月

1日 《中日战争预测》一书本日出版，郭沫若题签，此书系汪馥泉所编。

4日 作评论《关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以蛆虫去腐促进新肌，比况华北战局。认为封建腐肉一旦去尽，中国的新肌就能成长，而日本帝国主义这蛆虫，也必将在新兴中国的土地上惨死。收《沫若抗战文存》，又收《羽书集》。

又 作杂文《日本的儿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儿童的毒害。载《文摘》战时旬刊1937年10月第2号。收《羽书集》。

5日 作诗《唯最怯懦者为最残忍》。记敌机在我炮火下逃

审。载1937年10月7日上海《救亡日报》。收《战声集》。

又 作诗《人类进化的驿程》。载1937年10月10日上海《救亡日报》。收《战声集》。

7日 作杂文《逢场作戏》。提倡严肃的献身精神。认为做事应“灭却自己的私心以完成客观的美的世界”，以此来鼓励大家为抗战出力。载1937年11月4日上海《救亡日报》。收《全面抗战的认识》，又收《羽书集》。

9日 作《惰力与革命——为纪念二十六周年国庆而作》。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以“专制政治的惰力”阻碍“民主政治的革命运动”。收《全面抗战的认识》，又收《羽书集》。收入《沫若文集》时题为《惰力与革命——为纪念辛亥革命二十六周年而作》。

10日 发表《救亡日报国庆慰劳将士特刊》题词，见本日《救亡日报》。

又 为《立报·言林》题词，见本日该报。题词内容为：“炸裂横空走迅雷，春申江上血风腥。清晨我自向天祝，成得炮灰恨始轻”。载报时篇名题《郭沫若先生近作》。此诗即《归国杂吟》之七。收《战声集》。

16日 作《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赞诗》，诗云：“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艾芜：《你放下的笔我们要勇敢地拿起来》，《四川文艺》1978年7月第7期）

17日 作《鲁迅并没有死》。载1937年10月19日《救亡日报》。

18日 去女青年会出席由战时文艺协会主办的鲁迅先生纪念会，并讲了话。

19日 去浦东大楼出席由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鲁迅先生纪念会，并讲了话。会上，由陈望道动议，决定组织文艺界救亡协会。

在这两次会上，郭沫若在演讲中号召发扬鲁迅精神，坚持浴血抗战。演说辞载本日《救亡日报》，题为《鲁迅并没有死》。后收《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册》；又收《鲁迅与抗日战争》。

据当时与会者的回忆，郭沫若的讲话“含意深刻，态度诚恳，赢得全场一致热烈的掌声”。（唐弢：《永恒的怀念》，见《欢呼春天的诗人》）“那天到会的群众很多，郭老的演讲，博得不断的掌声。下了讲台后，在院子里，群众就久久围拢着他，要求他签名留念，很不容易脱身。”（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见《悼念郭老》）

23日 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从文化界救亡协会到分别成立文艺界救亡协会，表面理由为克服文艺界散漫现状，实际的目的却在摒除潘公展、周寒梅之流的直接干扰。”（唐弢：《永恒的怀念》）郭沫若积极参加了这些协会的工作。

23至29日 从23日的晚上起，一直到29日止，几乎每天都在前线上驱驰。

24日 作《〈归国杂吟〉附注》。收《战声集》。

26日 作《悼郝军长》，并为《郝梦龄军长追悼特刊》题词。悼词为：“一死真如泰山重 襄扬明令出元戎 竝闻面谕传优渥 既得成仁又建功”。郝军长即郝锡九又名郝梦龄。均载1937年10月30日上海《救亡日报》。

29日 作评论《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指出要持久抗战“务须及早确定外交路线以求军火的接济，务须及早武装民众以求兵员的补充”。载1937年10月30日上海《救亡日报》，又载《半月文摘》1937年12月5日第1卷第4期。收《沫若抗战文存》；又收《羽书集》。

30日 作杂文《由四行想到四川》。载1937年10月31日上海《救亡日报》。收《全面抗战的认识》；又收《羽书集》，1941年孟

夏书店出版，文后附有1941年8月15日所作之后记。

本月 为郁风所画的像题词：“这便是我，出一刹那，艺术之力，千古不磨。”那时郭沫若住在法租界的一家小公寓里，主持文化界救亡协会出版的《救亡日报》。郁风作为他的后辈和给《救亡日报》画画的记者访问了他，一面谈话一面为他画了速写像。“他毫不嫌弃一个美术青年的幼稚的技法，立即欣然握笔题了上面的字”。后来，他还把这幅画印在散文集《在轰炸中来去》一书的扉页上。此画后来一直由阿英代为保存，十年浩劫时，“四人帮”一伙把阿英数十年来历尽艰辛所保存和搜集的珍贵革命文物和珍善本藏书全部查抄掠夺而去，其中就包括郭老的存稿，也包括那张画像。粉碎“四人帮”以后，阿英的家属在整理查抄归还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张画像，送还给郁风。那画上布满污渍霉点，甚至还有鞋印，当她把这画像送给郭老观看并告诉他拟请人去污后重新装裱时，郭沫若说：“装裱好了就由你保存作个纪念吧。”（郁风：《千古不磨——记郭老的一幅速写像》，见1978年6月20日《文汇报》）

同月 为唐瑜、丁聪、柯灵等人所编的《民族呼声》题刊名。

十一月

1日 《在轰炸中来去》由上海抗战出版部出版，列入《抗战文艺小丛书》。

3日 作杂文《一位广东兵的诗》。载1937年11月6日《救亡日报》。收《全面抗战的认识》；又收《羽书集》。

6日 作论文《后来者居上》。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载1937年11月7日《救亡日报》第70号。收《全面抗战的认识》；又

收《羽书集》。

10日 作杂文《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载1937年11月11日《救亡日报》第74号;又载《国民》1937年11月19日第1卷第9期。收《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又收《羽书集》。

12日 作四幕剧《甘愿做炮灰》。收《甘愿做炮灰》,现收《沫若文集》第8卷。

15日 为谢冰莹所作《军中随笔》题书名。

18日 所作诗《看〈梁红玉〉》发表。诗前有“小序”,云:“淞沪抗战期中,予倩兄用旧瓶装新酒法,编成《梁红玉》剧本,由名演员金素琴表演,一夕获观,深受感动,归而书此。”载本日《救亡日报》,收《潮汐集·汐集》。

19日 发表诗《遥寄安娜》。诗云: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如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撻,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疆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载本日《文汇报·世纪风》;又载上海《杂志》(月刊)1938年5月创刊号。见《抗战中的郭沫若·关于郭沫若夫人》(1938年广州战时出版社出版)。

21日 作评论《我们所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这是为《救亡日报》(沪版)终刊号写的社论。文章总结了三个月来淞沪抗战的战斗历程,指出“因为战略上的关系,暂时由上海附近向后撤退”,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采取“消耗战术”“长期地消耗敌人”。文章还揭露敌人的凶残本质,戳穿他们的所谓“和平亲善”、“皇道乐土”的假面具。最后强调指出:“我们目前所失掉的并没有什么,只是做奴隶的镣铐而已”。文章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对战争必胜的信念。载1937年11月22日《救亡日

报》(沪版)第86号——终刊号。收《全面抗战的认识》，题为《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暂向上海同胞告别》；又收《羽书集》。

22日 上海《救亡日报》(沪版)出至今日被迫停刊。该报自本年8月24日创刊以来，共出八十六期。

又 修改《棠棣之花》毕。上海成为孤岛后，有一个时期，郭沫若住在租界上一位朋友的家里，“因为工作不能做，而且不便轻易外出，于是便想起了把《棠棣之花》来作一个通盘的整理。加了一个行刺的第三幕，把以前割弃了的两幕恢复，就这样便使《聂婪》扩大了。”(《我怎样写〈棠棣之花〉》)后来的《棠棣之花》五幕剧的形态，就是这时候初步形成的。与最早的《女神》中的《棠棣之花》相比，修改是不小的。“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适当地顺理成章地强调了团结抗日的思想。二、暗中批评了蒋介石打内战的不得人心。”

据阿英回忆，郭沫若在离沪去港前夕，曾把《女神》的修改本子交给他，托他设法印出，后因时局恶化，未能成为事实。(以上均据吴泰昌《〈女神〉的修改本》，见1978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27日 清晨，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赴香港。

“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各报都改变了论调，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了。以贩卖抗战书报极盛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模样。上海是瘫痪了”。留在上海“已经完全失掉作用”，于是郭沫若决定离开上海。当时打算到南洋去，“向侨胞募集一些款项来办报或搞其它的文化工作”，所以选了一位曾经到过南洋的广东人同行。同船的，还有不少朋友如何香凝和邹韬奋等。(《洪波曲》第一章“南迁”)

30日 作《〈沫若抗战文存〉小序》。收《沫若抗战文存》，

1938年1月上海明明书局出版。

本月 作诗《上海沦陷后吊于立忱墓》。收《潮汐集·汐集》。

同月 上海沦陷后，根据组织决定，计划把《救亡日报》迁至广州复刊，当夏衍向郭沫若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时，“他毫不迟疑地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见《悼念郭老》）

十二月

月初 抵香港，住六国饭店。回想四个月来，南京政府“在军事上虽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却只时而做些姿态，丝毫也没有改变作风的诚意。尤其对于民众动员工作，他们是死不放松的”。自己虽然计划去南洋募款以开展宣传工作，但是否能成功又没有把握，即使募款成功，仅仅靠着字面的宣传也不一定有多大效果。这时，真感到前途渺茫，不免增加了惆怅之意，失悔没有到延安去。他遥望着十年前曾经游览过的宋皇台，不知不觉地做成了两首诗。诗云：

十载一来复，两番此地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其一）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其二）

（《洪波曲》第一章“南迁”）

香港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与此同时，郭沫若还要准备着出国的事，“连护照都已经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后来由于朋友

的建议，终于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先去广州恢复《救亡日报》。

在香港住了一星期左右，与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于立群等乘船去广州。

抵穗当晚，宿“梅村”李寓。回想十二年前从广州出师北伐的往事，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作七律一首（“竟随太岁一周天”）。见《洪波曲》，现收《潮汐集·汐集》，题名《广州郊外》。

8日 为《中国诗坛》封面题词，见桂林中国诗坛编委会《中国诗坛》（月刊）1937年12月15日第1卷第5期。

9日 出席广州学生纪念“一二·九”斗争二周年大会，并作演讲。演讲词收《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题名《纪念“一二·九”斗争的二周年——在广州学生纪念大会演词》。

20日 应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邀请在群众大会上演说，题为《武装民众之必要》。呼吁“彻底解放民众运动”；“彻底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尤其必要的，在目前是应该武装民众了。”他的演讲，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听众一片沸腾”。大会后开始示威游行，郭沫若“被请去站在队伍前头的大横旗之下，群众齐声唱着广州话的‘动员，动员，全国总动员’的歌”，郭沫若“随行列的歌声前进，经过长长的长堤，有时握着拳头跟群众一起喊口号”。《新华南》杂志的封面曾刊登郭沫若带领群众示威游行的照片。（林焕平：《深切的怀念 沉痛的哀悼》，见《悼念郭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忆郭沫若同志》，见《新文学史料》第2辑）这篇演说词曾被广州无线电台广播。收《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又收《羽书集》。

24日 作文悼念诗人温流（温流，原名梁启佑，后改梁惜芳）。载桂林《中国诗坛》1938年1月15日第1卷第6期。

28日 作《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救亡日报〉复刊致

词》。复刊词庄严宣告：《救亡日报》将“继续着以往的步骤，加紧地向前奋斗”，“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文中具体生动地宣传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表示要“在‘团结抗战’的标帜之下，诚心诚意地为国家为民族而携手，而努力，而牺牲”。最后，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共同“建立我们的文化堡垒”，“在文化战线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载1938年1月1日广州《救亡日报》，标题和署名均为手迹。收《羽书集》。

29日 作评论《饥饿就是力量》。以帝俄、帝德失败的历史事实论证日帝失败的必然性。指出：“我们受敌人的压迫太甚，所失陷的土地愈多，为饥饿所迫的难民愈众，我们对于敌人的敌忾便愈见加强，而抗战的力量便愈见增大”，所以说：“饥饿就是力量”。载《救亡日报》（广州）第88号，收《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又收《羽书集》。

本月 作诗《南下书怀四首》。（其中三、四两首见本谱本月初条。一、二两首的首句是“圣凡同一死”，“忧患增人慧”。）收《潮汐集·汐集》。

本年 作诗《题山水画小帧》。收《潮汐集·汐集》。

同年 作散文《张发奎将军》。收《抗战将领访问记》，1938年广州战时出版社出版。

同年 在救亡呼声社作题为《我们有战胜日本的把握》的演讲，由江坚记录。

同年 作《克服三种悲观——在港沪文化界联欢会上演讲》。收于《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

同年 作《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年)。1938年出版单行本。

同年 郭沫若回国后，安娜和博儿曾被日本警察局拘禁月余。郭沫若在《家祭文》中说：“贞幸得脱出，而妻子则委诸虎穴，为贞而受牺牲，其苦心，其处境，一为置身而思之，即不觉泪之盈睫。且也，贞之去后，敌寇之警宪曾将富氏及长子宗易孙拘禁月余，惨加锤楚，至于不能引步。贞时在沪，得闻此息，只觉寸心欲裂。当此之时，曾求驻日大使设法营救，并求允贞眷属归国。乃敌寇万恶之军部复加厄阻，谓富氏媳未脱日本国籍，尚是日本臣民，且有间谍之疑，不能自由离去。”（见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教资料简报》第88期）

本年 老舍的著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出版。

一九三八年(四十七岁)

一月

1日 《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社址在广州长寿东路。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参加报社工作的有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高颢、高汾等。复刊号(第87号)以显著地位刊登了郭沫若为该报所写的复刊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复刊后的《救亡日报》，成了当时华南的抗战精神堡垒。郭沫若为该报写了许多文章；到武汉后，仍深切关怀报社的工作，并不断地为报纸写稿。

同日 作《纪念张一麐先生》。载1938年1月3日广州《救亡日报》。收《沸羹集》，1947年大孚出版公司出版。张一麐曾做过袁世凯的秘书长，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和袁决裂。抗战发生后，曾积极倡导组织“老子军”，充满着爱国主义热情。关于张一麐之死，此时系误传。1939年5月10日郭沫若在该文的跋语中指出：“仲仁(即张一麐)先生之死本系误传，我这篇文章要算是等于‘生祭’了……”。

同日 接陈诚从武汉来电：“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郭沫若为了了解情况，也为了有机会见见现在汉口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于是，“决定到武汉去一趟”。(见《洪波曲》第一章“南迁”)

5日 夏衍应邀自上海来穗负责《救亡日报》工作。不久前，郭沫若已搬入新亚酒楼，夏衍到达后，就同住在一起。他把有关《救亡日报》的事向夏衍作了交代，感到“留在广州的任务算告了一个段落”。（《洪波曲》第一章“南迁”）

6日 晚，偕于立群和一位姓苏的青年，由广州黄沙车站乘车离广州去武汉。夏衍等同志至车站送行。郭沫若这次在广州仅住了四十天，但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诗文，特别是为《救亡日报》的复刊，化了不少心血。（《洪波曲》第一章“南迁”；林焕平：《深切的怀念 沉痛的哀悼》，见《悼念郭老》；《再谈郁达夫》，见《沫若文集》第13卷）

9日 为庆祝《新华日报》创刊，题词云：“发动全民的力量，从铁血之中建立新的中国”。载本月14日《新华日报》。该报于11日在武汉出版。潘梓年任社长。1938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

傍晚抵汉口，宿于一家小客栈里。

10日 打电话与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四军办事处联系，不久，叶挺来访。

与叶挺一起至法租界璇宫饭店访黄琪翔，得悉陈诚电邀的原由，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又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大家的意思要郭沫若担任第三厅的厅长。

应叶挺邀请，搬至太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办事处居住。

晚，往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和董必武等人。谈起恢复政治部的事，郭本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周恩来同志婉言相劝，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

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洪波曲》第一章“一道去挤”）

12日 作《致华南友人们》。关怀在华南的战友们，希望他们更努力地办好《救亡日报》，“使这座几乎是唯一的华南文化堡垒，得以长久维持，发挥它的抗战建国的、唤起民众的力量”。载1938年1月15日广州《救亡日报》。收《羽书集》。

13日 接见记者访问，就“保卫大武汉”这个口号发表看法。郭沫若说：“上海的失败已经给我们一个教训，单只军事防守还不够，必定要动员广大的民众来配合；单只提口号，还不行，必定要切实的兑现。目前的问题，还是在于怎样组织民众，保卫大武汉运动必需有这样切实的工作做基础。”访问结束时，又为记者题词：“恢复十年前的精神保卫大武汉”。载1938年1月16日汉口《新华日报》，篇名为《郭沫若访问记》及“郭沫若亲笔题字”。

18日 夜，作论文《抗战与文化》。认为“（一）在抗战期中，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集中于抗战有益的这一个焦点。（二）抗战必须动员大众，因而一切文化活动必须充分地大众化。（三）在使大众与文化活动迅速并普遍的接近上，当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彻底自由，并要求战时教育的实施。（四）抗敌理论不厌其单纯，并不嫌其重述，应该要多样地表现它，并多量地发挥它。（五）对于抗敌理论嫌其单纯，嫌其重复的那种‘反差不多’的论调，或故作高深的理论以渡越流俗的那些文化人，事实上是犯着了资敌的嫌疑。”载《自由中国》（月刊）1938年6月20日第3期。收《文艺与宣传》，又收《羽书集》，均题《抗战与文化问题》。

25日 《新华日报》登载《郭沫若谈抗战形势》的报道。郭沫

若在向记者谈了自己对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到底、胜利终归于我’的一句口号,今天已象铁一般的坚定”,“只要全国一致,决心抗战到底,则民族的光荣前途,自然不成问题了”,表明郭沫若在艰苦的抗战中,对胜利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29日 为“孩子剧团”题词。收《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1938年4月汉口大路书店出版。

本月初,作诗《陕北谣》。诗末附注:“立群有志赴陕北,以此赠之,时同在广州”。收《潮汐集·汐集》。

又 应刚就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之请,书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1937年8月3日《人民日报》)

又 作杂文《抗战中之新发现——华北战局应有的认识》。收《中国为什么要抗战》,1938年1月上海一心书店出版。

同月 话剧《甘愿做炮灰》,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列入《文艺新刊》。

同月 诗集《战声集》,由广州战时出版社出版。收1936—1937年的诗作二十一首,列入《战时小丛书》,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

同月 《全面抗战的认识》由广州北新书局出版。

同月 《创造十年续篇》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本月经过三个月的筹备,江南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长,军部设在南昌,汉口设办事处。

同月 17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音乐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协会成立后,很快形成了抗日救亡音乐运动的高潮。

同月 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电影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夏衍、田汉、阳翰笙、阿英、蔡楚生、洪深、司徒慧敏、陈波儿、沈西苓、史东山、袁牧之、孙瑜、应云卫、赵丹、孙师毅、苏怡等任理事。

二 月

3日 发表《挽刘湘将军》。载本日广州《救亡日报》，篇名题《郭沫若陈铭枢挽刘湘将军》，见《羽书集·由四行到四川》“后记”，1941年香港孟夏书店出版。

4日 发表在武昌“广西学生军营”的讲演词，题为《日寇之史的清算》，从历史的角度，概述日寇的大概情形，指出只要坚持抗战，必然有胜利的前途。载1938年2月4日广州《救亡日报》，骆剑冰记。收《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

6日 和阳翰笙同赴陈诚公馆，参加以“吃中饭”为名的“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议”，陈诚玩弄阴谋不邀周恩来，郭沫若对此表示不满。会上，郭沫若驳斥了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等谬论。（据《洪波曲》第二章“动荡”）

会后，坐轮渡回汉口，嘱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会议的情况。

晚，自徐家棚车站匆匆乘车赴长沙。

7日 上午，抵长沙，至《抗战日报》社访田汉。中午应田汉邀，去“李合盛”菜馆午餐，同席的有廖沫沙、张曙、胡萍、熊岳兰等。

晚宿留芳岭曹如璧、梁淑德家。

同日 发表为“反侵略国际宣传周妇女日”所写的题词：

“和平为侵略者所蹂躏，

欲求恢复和平祇有从反侵略做起。

妇女，在平时是和平的象征，

在战时便尤当为反侵略运动的宣传使。

中国的诸姑姊妹们哟，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请你们学习沃尔伦少女，西班牙的少女。”

载本日汉口《新华日报》。

8日 会见不久前刚从延安来长沙的徐特立。

10日 发表《在孩子剧团欢迎会上的讲话》。孩子剧团由二十二个青少年组成，于本年1月从上海来到武汉，受到周恩来、郭沫若等的亲切关怀。本月初，八路军办事处举行了一次欢迎会，欢迎孩子剧团。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郭沫若、叶挺等同志都亲自参加。

欢迎会上，周恩来要大家作自我介绍，叫大家唱歌，大家“唱《流浪儿》，当唱到‘我们都是没家的流浪儿，流落在街头没饭吃，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全被杀……’的时候，周副主席难过得低下了头，擦着眼泪；郭老的眼眶润湿了。”孩子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副主席讲话，周副主席希望儿童们“革命、救国、创造”。接着，郭沫若十分兴奋、激动地发表了讲话，他说：

“真正亲爱的小兄弟小妹妹！我回国半年，今天可说是最快乐的一天。……九岁的小弟弟，就晓得救亡了，是作孽么？不，是幸福。好象一株植物放在温室里虽然茂盛，但一拿出来就谢了。惟有在山谷里，寒风暴雨中磨炼出来的树木，才是坚强的，才能发展起来，顶天立地。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象征着中国，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决不是容易的事体，一定是流许许多多勇士的血，牺牲许许多多战士的头颅，用这些血液来作水门汀，头颅作砖块，这样才能建设得起来！我

希望你们在困苦艰难和磨炼中长成起来，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长成起来！……”对儿童们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无限的期望。讲话由记者慧琳记录，载本日《新华日报》。又载1938年7月17日《译报》，题作《郭沫若先生的演说——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欢迎上海“孩子剧团”会上》。（参见陈模执笔的《郭老和孩子剧团》，1978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13日 出席长沙文化界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徐特立、田汉、翦伯赞、薛暮桥、孙伏园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大会并讲话。郭沫若在讲话中，对长沙文化界的欢迎，深表谢意。他认为半年的抗战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推动了文化界的同志们，去实践“到民间去”的愿望和决心，衷心希望大家“站在自己的岗位，各以至诚担当自己的工作。只要每个人肯把他的最善的力，至诚的心，贡献出来”，只要“大家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是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的。”（见《抗战中的郭沫若》）

15日 作《对于文化人的希望》。这是根据在长沙文化界抗敌协会的一次演讲整理写成的。他强调指出文化工作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希望文化工作者深入民众，把抗战的道理反复向群众宣传；同时，要克服自身的“悲观的情绪”与“彷徨歧路的现象”，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载1938年2月19日广州《救亡日报》。收《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题名为《对于文化人的希望——在长沙文抗会演词追记》，又收《羽书集》。

18日 作评论《国际形势与抗战前途》。文章分析了抗战以来国际国内的形势，明确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载1938年2月27日、28日广州《救亡日报》。收《国际形势与抗战前途》，本年汉口自强出版社出版。又收《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

24日 作诗《在天空写的壮快的诗篇》，热情歌颂空军将士

于本月18日和23日的两次出色的空战，满怀激情地写道：

哦哦，我英勇的空军将士，你们在空中写就的是何等
壮烈的诗篇，

这快捷假如容许我用死来庆祝，

我就把心脏剝出作为祭品也所情愿。

.....

这快捷假如容许我用死来庆祝，

我就割下头颅作为祭品也是心甘！

载1938年3月2日广州《救亡日报》，收《抗战中的郭沫若》。

26日 于立群自武汉到长沙，带来周恩来和其他人给郭沫若的信。关于政治部及其第三厅的组建，由于周恩来和郭沫若等坚持必要的原则斗争，国民党当局才基本上接受了一些合理的要求和意见。这一情况由于立群专程来长沙相告，直到这时，郭沫若才正式接受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委任，决定回武汉就职。

27日 与于立群同游岳麓山。

28日 在警报声中作杂文《长沙哟，再见！》。记述对长沙的印象，希望战事取得胜利，可不要再到长沙，而能到南京、上海、杭州、济南、北平去。载1938年3月16日广州《救亡日报》。收《抗战中的郭沫若》；又收《羽书集》。

晚，乘车去武汉。于立群、田汉、张曙等同行。

29日 抵武汉。晚，陈诚来。郭沫若向他提出三项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陈诚迫于形势，对所提条件，口头上表示同意。由此商定第三厅于4月1日正式成立。（《洪波曲》第四章“筹备”）

本月 作诗《长沙有感二首》（“洞庭落木余霜叶”、“伤心最

怕读怀沙”）。收《潮汐集·汐集》。

同月 作词《满江红》。收《抗战诗选》，1938年2月汉口战士文化出版社出版。

同月 《前线归来》由汉口星星出版社出版，内收《在轰炸中来去》、《到浦东去来》、《前线归来》三篇。

本月 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成立战时工作委员会，发表战时工作大纲，组织战时宣传工作。5月，改名为中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

同月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会刊《戏剧新闻》(月刊)在汉口创刊。

三 月

9日 为《自由中国》创刊题词。题词说：“要建设自由的中国，须得每个中国人牺牲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的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则每一个中国人也就得到自由了。”载1938年4月1日汉口《自由中国》(月刊)。

同日 为《少年先锋》题词。载《少年先锋》1938年4月5日汉口第4期。

12日 发表为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题词：“仰之弥高”。载本日汉口《新华日报》。

16日 为《战地半月》题词：“政治工作之先决条件”。载《战地半月》1938年4月10日汉口创刊号。

同日 发表为《抗战戏剧》刊名题字。见《抗战戏剧》(半月刊)第1卷第8期。

25日 为“黄花岗烈士殉国二十七周年纪念”题词。载1938

年3月29日广州《救亡日报》。

同日 上午出席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代表大会。

下午在汉口女青年会演讲，题为《女子是人类美好的一半》。着重讲了妇女们的社会地位问题，勉励妇女同胞们，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战的各项工作，努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载1938年3月26日汉口《新华日报》；又载《弹花文艺》（半月刊）1938年4月10日汉口第2期。

26日 发表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立而写的祝词：“统一文艺战线，巩固精神国防”。载武昌《文艺战线》（旬刊）第2卷第1期；又载1938年3月27日汉口《新华日报》，篇名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特刊》题词。

27日 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大会，被选为理事。出席大会的代表五百多人，来宾五十多人，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及其夫人池田幸子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大会推举蔡元培、周恩来、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十三人为名誉主席团，推举冯玉祥、郭沫若、老舍、田汉等十余人为主席团。大会通过了《告世界艺术家书》、《致日本被迫害作家书》、《向抗敌将士致敬电》，大会还通过了《大会宣言》和《简章》，并推举郭沫若、茅盾、冯玉祥、老舍、巴金、丁玲、许地山、夏衍、郁达夫、田汉、朱自清、胡风、冯乃超、邵力子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吴奚如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见《新华日报》1938年3月27、28日，关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的特刊和报道）“文协”是党领导下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该会还在上海、昆明、桂林、广州、香港、延安等地设立分会。“文协”曾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作家参加文化工作团和战地慰问团。还提倡文艺大众化，号召写通俗文艺。

同日 作《文艺与宣传——为庆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论述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的意义和文艺的作用。指出：协会的成立“不仅向我们告白了中华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共赴国难而团结了起来”，而且，也昭示了文艺的本质。载1938年3月27日重庆《大公报》，收《羽书集》。

31日 作评论《日寇残酷心理的解剖》。分析抗战形势；揭露日寇惨无人道地奸掠、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和企图投掷细菌弹的阴谋，对日寇的残酷心理进行了深入的解剖。载1938年4月2日《新华日报》。收《羽书集》。

本月 筹建政治部第三厅。

同月 经周恩来同志的介绍，认识董维键同志，邀他担任三厅第七处第三科科长职务，负责国际宣传工作。（《怀董维键》，见《沸羹集》）

同月 电邀郁达夫，请他来武汉参加三厅的工作。原来想请他负责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后因“工作迫切，等不得他来只得就近请范寿康担任”，郁达夫改任设计委员。（据《再谈郁达夫》，见《天地玄黄》；冯雪峰：《郁达夫生平事略》，见《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同月 月底，陪周恩来去三厅驻地武昌昙花林看望“孩子剧团”，亲切地关怀孩子们的生活与学习。不久，郭老和三厅党的地下组织，安排了一些教员给大家讲课，还派去老党员蔡家桂同志担任指导员。（据《郭老和孩子剧团》，陈模执笔，见1978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本月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大败日军，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同月 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

国纲领”，选举蒋介石为总裁。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设立特务组织“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以及设立“国民参政会”。

同月 汉奸梁鸿志等在南京组织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春

与于立群结合。（据《家祭文》，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88期）

四 月

1日 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郭沫若出任厅长。第三厅下设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处长胡愈之。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处长田汉。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处长范寿康。阳翰笙任厅的主任秘书。参加三厅各处、科工作的知名文化人士有洪深、徐悲鸿、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等，人材济济，阵容强大。

同日 出席武汉十一个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大会，并讲了话。郭沫若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欢迎鹿地亘先生和池田女士，不仅因为他们是日本反战作家，而且因为他们是人类的斗士。日本有许多作家都作了军阀的喇叭，象林房雄之类。和林房雄这些比较起来，鹿地亘先生是多么值得我们钦佩！”（1938年4月2日汉口《新华日报》）

5日 作评论《鲁南胜利之外因》。分析敌人的弱点，鼓舞自己的斗志。文章指出“最近临沂、临城等地的连捷”，是有许多内外因素促成的，而“敌人军事上的主要弱点”即是“于我作战有

利的主要外因”，但在获得胜利的时候，“尤其应当加强我们的内因，以前仆后继之精神，踏着将士们的神圣血迹，勇往前进”。载1938年4月7日汉口《新华日报》。收《血战台儿庄》，民族出版社出版；又收《羽书集》。

7日 出席第三厅在武汉主办的各界扩大宣传周的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他说：“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和前线将士抱一样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我们要一声的呼号摧毁敌人的心胆！现在我们除要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之外，我们大家还有一种共同的财产：‘死’！我们今日人人要拿出死来！我们一定可保永远的胜利。”（1938年4月8日汉口《新华日报》）

同日 台儿庄胜利的消息传来，全城沸腾，真是家家庆祝，人人称贺。原定于宣传周最后一天举行的火炬游行提前进行，有数十万人参加庆贺，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许多朋友向三厅纷纷道贺：“第一炮公然打响了，响得这么宏亮！”“老郭的运气好！”“三厅的运气好！”（《洪波曲》第五章“宣传周”）

同日 作评论《纪念台儿庄》。提醒人们，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必须“不骄不怠，不屈不挠，一心一德，再接再厉”，以保证最后的胜利。载《自由中国》（月刊）1938年5月10日第1卷第2号。收《文艺与宣传》；又收《羽书集》。

又 作演讲稿《来他个“四面倭歌”》。这是为明天的扩大宣传周广场歌咏大会而准备的演说词。收《文艺与宣传》；又收《羽书集》。

8日 出席歌咏大会，并致开幕词《来它个“四面倭歌”》。指出：以历史上的张良曾给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为例，号召大家也“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9日 驳斥政治部的“训令”。宣传周的第一天，筹备会印了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并在会场上散发。陈诚立即提出抗议，并当场把全部印刷品扣留。本日，政治部又下了一道训令，说“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郭沫若针锋相对地驳斥道：“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把国民党的“训令”顶了回去。

10日 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国民党为统制部发文件，由张厉生（秘书长）提出要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郭沫若揭穿了他们的诡计，使此事不了了之。

晚，接到陈诚的亲笔信，谓“明日扩大宣传周大游行，将有奸人准备利用，乘机捣乱”。

11日 清早，和具体负责示威游行的阳翰笙到北郊外的大会场参加大会。开会前，康泽也来了，说是来“维持秩序”。不久，天下起雨来，可就在那样的滂沱大雨中，竟然拉起了警报，游行队伍被迫解散，游行计划遭到破坏。

24日 应广州文艺界之请，为“诗歌节”而写的题词发表。题词是：“五月是诗的月，读过歌德五月歌的人一定会同意。五月又是人性积极发动的月，单拿五月的纪念日之特多，便可证明。诗人们，请积极发挥你们的创作欲，不仅要纪念‘诗歌日’，而且要莫辜负这个诗歌月。”载本日广州《救亡日报》《“诗歌节”纪念特辑》。

26日 得到可以出入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区的“特别通行证”，号码是“珞字第二一八号”，盖有“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团团长”的官章。本月底，和于立群一起由汉口太和路搬来这里，住在

张有桐教授先前住过的那幢房子里。

29日 “在武昌城内陈诚的公馆里开宣传会报”。适今日是日本的所谓“天长节”（“天皇”的生日），日寇以大量飞机侵袭武汉，空战即起，历时三十分钟，击落日机二十一架，我方损失五架。（《洪波曲》第十三章“撤守前后”）

本月 《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由广州离骚出版社出版，收《国际形势和抗战前途》等十二篇。

本月 《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后移重庆出版），茅盾主编，先为半月刊，后改月刊。1942年11月出至第7卷第4期，被迫停刊。其中第5卷第1、2期为“文阵丛刊”：①《水火之间》、②《论鲁迅》。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又改出《文阵新辑》：①《去国》、②《哈罗尔德的旅行》、③《纵横前后方》等三辑。此外，尚附有《武汉特刊》3期。该刊在抗战期间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月 《战地》半月刊在汉口创刊，由丁玲、舒群编辑，出至第6期停刊。

同月 茅盾为香港《立报》编辑副刊《言林》，他的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在该刊连载。

同月 阳翰笙的五幕历史剧《李秀成之死》由汉口华中图书公司出版。

同月 张天翼在《文学阵地》第1卷第1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华威先生》，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挂着“抗日”的招牌，实则压制和破坏抗日的真相，在当时影响较大。

五 月

3日 作《把精神武装起来》。谈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认为要战胜敌人，必须加强“雪耻的决心”，把群众的“精神武装起来”。载1938年5月12日广州《救亡日报》。收《文艺与宣传》；又收《羽书集》。

5日 作《〈政治工作的实施〉序》。该书为郑传益编，1938年6月武汉拔提书店出版。

8日 作演说辞《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从王铭章师长为国牺牲，谈应该怎样对待生死的问题。载1938年5月9日汉口《新华日报》，篇名题《郭沫若厅长弔王（铭章）故师长广播辞——把有限的生命融化到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收《文艺与宣传》；又收《羽书集》。

同日 发表旧体诗《弹八百壮士大鼓词 书付潜修》：“枯肠搜索费沈吟，响遏行云弹雨音。词与健儿同壮烈，自拟身亦在枪林”。潜修，即姚潜修，当时在广州《救亡日报》工作。诗载本日《救亡日报》。

10日 发表笔谈《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就编者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一、抗战以来文艺的特征

以品类言，诗歌、短剧、速写、报告文学之类，最受鼓舞。

以品质言，则简短、敏捷、而有煽动性、通俗化、大众化。

二、抗战以来文艺工作者的成果

作品颇不少，似以诗歌为最有成绩。但划时代的作品尚未见，大约还需要相当的酝酿的时期吧。

三、抗战以来文艺工作者的任务

1. 应利用文艺的多样性,以调剂抗战言论之定型式。
2. 应抓着抗战的经过,把伟大的时代记录下来。
3. 应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
4. 应洗净文士的洁癖,尽量地大众化。

四、中国文艺的前途

只要文艺工作者肯努力,并通力合作,必然有伟大光明的前途。

载《自由中国》(月刊)第2期。参加笔谈的还有老舍、夏衍、郁达夫等。

13日 作《答儿童救国募金队的小朋友们》(书信)。广州至德小学的学生,为抗日爱国热情所鼓舞,自动组织了儿童救国募金队,他们把募得的钱,转交给郭沫若,委托他“转献给为民族而抗战的斗士们”。郭沫若收到小朋友的钱和信之后,非常感动,给他们写了一封情深意挚的回信。信中道:

“……小兄弟们,你们这一举动真使我感激,感激得快流出眼泪来了。我受了你们那样诚恳的信赖,我自己实在是惭愧,倒是你们的纯洁、热诚、无私,是应该作为我们大人物的‘导师’的。大人们年纪大了,便有很多的打算、邪念、私欲窜了出来,尽管国家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然而有好些人的私心总是克服不了的,这实在是可悲叹的事体。因此我是愈见崇拜你们,愈见崇拜你们这样的举动。鲁迅先生曾经为你们设想,要大人物‘救救孩子’,但我却为大人设想要他们‘学学孩子’。小兄弟们,我并不是有意地要恭维你们,我素来的信念就是这样,但我读了你们的信,知道了你们的行为,我的信念是愈见加强了。……”

载1938年5月22日广州《救亡日报》。

中旬 张季鸾和王芸生来访，企图拉拢郭沫若向国民党靠拢，要他“有机会多找岳军(张群)谈谈”，他们的阴谋被郭识破。(《洪波曲》第十一章“生活面面”)

25日 为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题词。载1938年5月26日汉口《新华日报》。同时应邀出席由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代表周恩来主持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的盛大招待茶会。

26日 下午2时，代表中华全国艺术界主持欢迎大会，欢迎世界学联的代表。(1938年5月29日《新华日报》)

本月 新四军一部进入安徽，开辟江北解放区。

同月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发表。文章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指出必须实行“持久战”。

同月 19日，陇海线上的重镇徐州陷落。

同月 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后移至重庆出版，初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半月刊，最后为不定期刊。由蒋锡金主编，楼适夷、姚蓬子曾参加编辑。8月，蒋锡金去广州后，由冯乃超、孔罗荪、叶以群接编。1946年5月停刊，共出七十三期。该刊在《发刊词》中要求作家们“首先强固起自己阵营的团结，清扫内部一切纠纷和磨擦，小集团观念和门户之见，而把大家的视线一致集注于当前的民族大敌”。《抗战文艺》是抗日战争期间出版最久、影响最大的文艺刊物，在抗战中起过较大的作用。

六 月

3日 作论文《纪念高尔基》。盛赞高尔基的“慈和、公正、

伟大的人格”和“为人类社会的幸福”而斗争的革命精神，怒斥托派当年毒杀高尔基，现在又破坏我抗日团结联合战线的鬼蜮伎俩。载《自由中国》（月刊）1938年6月20日第1卷第3号《高尔基逝世二周年特辑》。

15日 作《战时宣传工作》毕。1938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初版。

17日 作诗《高尔基万岁》。热情称颂高尔基的伟大精神，说高尔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教育全人类，孕育未来世界的圣者”。载1938年6月18日汉口《新华日报》。

22日 晚，在电台作广播讲话，题为《抗战以来日寇的损失概观》。概述了抗战以来日寇之重大损失，勉励人民只要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载1938年6月23、24日汉口《新华日报》，副标题为《郭厅长沫若昨晚广播》。收《文艺与宣传》，篇名题《抗战来日寇的损失》。

23日 作《〈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序》，并题书名。收《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英 田伯烈编著，杨明译），汉口国民出版社出版。

本月 新四军一部在陈毅率领下，开辟苏南解放区。

同月 11日，国民党军队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利用洪水阻止日军，结果日军仍迂回前进，而黄河改道南流，豫东、皖北六十余县受淹，使该地长期成为“黄泛区”。

同月 安庆、开封等城市失陷。

同月 15日，《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共二十卷。

七 月

5日 傍晚,和陈诚、黄琪翔、吴国桢研究“七七”纪念活动。当谈到拟设立“献金台”一事时,陈诚竭力反对,后经郭沫若据理力争,他才不得不同意。

6日 上午,参加“七七”周年纪念大会。郭沫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大会连续了三天,搞得轰轰烈烈。其中献金活动一项尤为成功。“……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街头的流浪儿、乞丐,都尽力的奔走呼号,不仅自己捐献,并劝别人捐献。捐献的数目积少成多,反而是这些所谓的下层的民众,在总的数目中占了较多的百分比。总数在一百三十万以上”。(《“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见《天地玄黄》)

7日 作《双七节挽歌》。载汉口《半月文摘》1938年7月25日第3卷第1期;又载重庆《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38年8月16日第2卷第1期(题名《挽歌》)。收《抗战歌声》第3集,张曙谱曲。

8日 发表杂文《抗战一年来的文化动态》。载本日《武汉日报》,收《抗战建国第一年》,1938年8月重庆七七书局出版。

18日 出席武汉献金音乐大会,并讲话。指出:只有“保持精诚团结的精神,更加团结起来,团结成钢铁一般,把所有一切的力量贡献给抗战建国,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赶出日寇出中国,建设灿烂的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见1938年7月19日汉口《新华日报》)

23日 出席武汉各界各团体联合举行的响应国际反轰炸大会,和周恩来等二十余人一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郭沫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要发展我们创造欲的精神,反对发展占

领欲最残暴的侵略者”。强烈要求“要予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予轰炸者以猛烈的轰炸”。（见1938年7月24日汉口《新华日报》）

本月 “七七”周年纪念活动以后，因不满于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发生过辞职的念头，有三个整天躲在珞珈山的寓所里，没有上厅去办公”，有些朋友也有表示同感的，张志让（季龙）和董维键，还联名写信来，“愿意共同进退”。周恩来知道后，在第三天晚上邀郭等去寓所吃饭，进行劝说。“周公认为，这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我们要提醒群众的意识，认识自己的力量，而同时也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依然是值得重视的”。在谈话中，“向来炯炯有神的周公的眼光仿佛要着火了”，他对郭沫若说：“那吗怎么办呢？”“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周恩来同志的话使大家受到很大教育，郭沫若等终于打消了辞职的念头。（据《洪波曲》第九章“反推进”，《怀董维键》，见《沸羹集》）

本月 九江陷落。

同月 上海剧艺社成立。

八 月

3日 上午，出席战时节约运动宣传周开幕式，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人类生活根本即应节约，乃使物力体力不为无益消耗。平时应注意节约，战时更应注意节约。”（1938年8月4日汉口《新华日报》）

同日 晚，应邀在电台上作题为《节约与抗战》的广播演讲，

阐述节约运动对抗战建国的意义。载1938年8月5日汉口《新华日报》，题名《郭厅长沫若昨讲演〈节约与抗战〉》，收1939年5月《一九三九年文汇年刊》。

13日 上午，出席在武汉上海大戏院举行的《纪念“八一三”，保卫大武汉》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演讲，号召加紧民众动员，保卫武汉，坚守武汉。“……今天纪念‘八一三’，我们要努力，把日本鬼子打得向我们投降！”（见1938年8月14日汉口《新华日报》）

同日 发表纪念“八一三”题词（手迹）。载本日《救亡日报》，篇名《郭沫若先生题词》。

15日 晚八时，在电台作题为《纪念“八一三”，保卫大武汉》的广播演讲，号召广大民众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八一三”，积极投入保卫武汉、抗击日寇的斗争。载1938年8月17日汉口《新华日报》。

24日 和阳翰笙等受武汉各界慰劳前方抗敌将士委员会的委托，代表武汉一百二十万民众，向武汉城防部队将士，赠献旌旗和慰劳函件，并致词表示慰劳和鼓励。（据1938年8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

27日 和阳翰笙等又去另一部分城防部队的驻地，代表武汉各界进行慰问活动。郭沫若向部队赠献了题有“为民前锋”的旌旗，并致词表示慰问。（1938年8月28日汉口《新华日报》）

月底 由珞珈山搬到汉口杨森公园居住。

本月 《文艺与宣传》由汉口生活书店出版。

本月 八路军一二〇师开赴绥远抗日。

同月 延安的战歌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发起街头诗歌运动。街头诗多以抗战为内容，短小精悍，战斗性强，对鼓舞

群众的抗日热情起了很大作用。

同月 汉口东方印务局出版《现代戏剧图书目录》(舒畅编),所收书目分剧本、剧论、剧刊、剧图四类。《序言》中说:此目录是我国“三十年来戏剧图书出版物的一部总账”。

同月 月底,陈诚下令解散“青救”(青年救国团)、“民先”(民族先锋队)、蚁社三个最有名的青年团体,并勒令其他十余个团体停止活动,剥下了他的“抗日将军”的伪装,露出扼杀青年的刽子手的真面目。此事激怒了所有的进步人士及广大爱国群众,《新华日报》用整版篇幅表示抗议。

九 月

1日 下午,出席在江汉路普海春召开的中国记者节纪念会。到会的还有沈钧儒、胡愈之、范长江、田汉等一百一十余人。会议由范长江主持,郭沫若在会上讲了话。他风趣地说:“以前用刀刻木为书,所以硬;后来用毛笔写了,所以显得软弱。现在已经用钢笔了,新闻记者应发挥他的钢性。(鼓掌)做政治工作的人,容易腐化,你们应该用钢笔来刺一刺这些人的背,以便使其前进!”(1938年9月2日汉口《新华日报》)

3日 为国际青年节题词。词曰:

“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呈抛物线形而进展,文化的进展也是同样。各个时代的文化都有它的最高峰,待达到最高峰后便次第下降。如无新的推动力使它另起更高的峰峦,下降的趋势是可以回到无文化状态的。文化的不断的进展实赖有各个时代的新的推进力。这新的推进力的发动是什么呢?便是各个时代的青年和年龄虽老而精神不老的永远青年”。

“目前资本主义的文化是老早超过了它的最高峰的，所谓法西斯蒂的潮流，便是极显著的下降趋势，要拖着人类返回无文化的状态。时代的青年又当到他创造更高的文化峰峦的时候了。”

“青年们应该认清楚这种使命，要努力使文化永远青年化，使青年永远文化化！”

与胡愈之所写的社论同载1938年9月4日汉口《新华日报》。次日，接陈布雷信，说胡愈之的文章和郭的题词“‘委座’（按，指蒋介石）表示不满意，希望以后不要在有色彩的报纸上发表文字。”后来，蒋介石还为此事当面指责郭沫若。（见《洪波曲》第九章）

4日 作杂文《笔的三阶段》。载上海《华美》（周刊）1938年10月22日第1卷第27期。

5日 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痛斥日本侵略者妄图独占远东利益之侵略理论。（1938年9月6日汉口《新华日报》）

10日 发表杂文《中国会成为法西斯蒂国家吗？》。载《反侵略周刊》第1卷第2期。

上旬 参加武汉三镇的慰劳团往北战场的第五战区劳军。午后出发，傍晚至宋埠，在司令部里见到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

晚饭后，用日语与一个日本俘虏谈话。对方向郭出示一张纸头，说是在战壕里拾得的，原来是三厅印发的六种“通行证”之一，上面有图画，有优待俘虏规定的译文。对于三厅对敌宣传工作所产生的效果，郭沫若感到非常高兴。

深夜，乘卡车返回，次日清晨到达武汉。

12日 再次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敌人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等阴谋活动。（1938年9月13日汉口《新华日报》）

15日 下午，与国际宣传处的曾虚白一起乘车往前线开始南战场的慰问活动。路上，遇敌机，“同行者决意不顾危险，仍

上车急驰而前”。过咸宁后因轮胎上的螺蛳钉掉落而抛锚，真是“五人生命寄一螺，怪事今宵意外多。漫道沙场征战苦，老爷车子费张罗”。晚十二时半到达目的地阳新。宿于一小学校里。（据《日记》）

16日 晨，偕曾虚白外出散步，至纱帽盒司令部见到参谋长施北衡，早餐后返回小学校。

上午，“陈诚偕朱代杰、谢仁钊同来，谈颇久”。（《日记》）

午饭后，与曾虚白出游，至富水边，乘渡船过江至南土塘，见墙上有红字标语，署“中国共产党阳新县第十区第十三支部”字样，原来此地曾是苏区。据一老人说，“彭德怀曾到此。此地人多打游击。后红军撤退，村上遭劫，被屠杀者一半以上”。（《日记》）

晚饭后，由朱代杰陪同，往政治工作大队第二队看望久别的队员们。该队即是淞沪战役时，应陈诚的要求组织的战地服务团，由一群在上海读书的爱国青年所组成，成立于昆山，与钱亦石、杜国庠领导的、在张发奎部工作的那个服务团是兄弟组织，他们在部队中备受歧视，均被看作是共产党分子。（《日记》）

17日 凌晨始归，正拟就寝，武汉各界慰劳代表团到，与陈诚同往迎接。午后行献旗典礼，任会议主席，主持大会。李德全献旗致词。晚偕陈诚赴武宁，宿前方指挥所。（据《日记》）

18日 星期日。上午，由朱代杰作向导，偕曾虚白往附近军队驻地访王芳舟（王陵基），未遇。午饭后，原车返回，途遇王芳舟，谈话间，王大诉其苦，谓“杂系和嫡系待遇不同”，“杂系挡头阵，嫡系督后队”，“送死而已，送死而已”！被王芳舟邀返驻地，晚饭后始回。（《日记》）

19日 上午偕陈诚往翁家塆，对王芳舟部的干部讲话。

下午，往政工大队看望队员们。

晚，赴武宁城中，对第八军第三师及十五师讲话。

20日 下午，“与谢然之谈及瞿秋白及其他诸友”。（《日记》）

21日 清晨，乘一大卡车绕道修水、平江、长沙，沿粤汉路返武汉。

同日 发表杂文《戎机零什》。载本日及上海战时妇女社《战时妇女》1938年9月25日第4、5期。

23日 回到武汉。

同日 和蔡元培共同领衔代表中国文化界，致电国联大会主席，请即对日本侵略者实施制裁。电文指出：“暴日对华侵略，撕毁国际盟约，无异对全人类挑衅。……希即依盟约第十七条，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见1938年9月30日汉口《新华日报》）

24日 今日是“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扩大宣传周的第七天。晚，在电台上作题为《后方民众的责任》的广播讲话，报告战区的见闻，提出后方民众应尽的责任。载1938年9月25日《新华日报》，题为《郭厅长广播后方民众的责任，前方将士带着伤寒病挑战，要加速征募救护医药棉衣》。收《思想家的鲁迅》，1938年11月上海译报图书馆出版，又收《羽书集》。

月底 由杨森花园移居鄱阳街一号。

本月 29日田家镇要塞失陷，从此，长沙门户洞开，武汉动摇，政府机关、民间工商业，在已经部分撤退之后，又在开始再撤退。

同月 国民党派胡适为驻美大使。

同月 郭沫若根据党的“要把集中的文化力量尽量散开”的指示，通过政治部第三厅，把上海五个救亡演剧队和一些进步

戏剧团体改编为九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分别派到各个战区去作抗日宣传工作。（据吕复：《郭沫若同志和抗敌演剧队》，见《悼念郭老》）

对于这件事郭沫若后来回忆道：“假使要用批评的眼光来看三厅，认为它的存在在抗战期间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话，那倒不在乎它在武汉三镇前后做过的几次轰轰烈烈而却空空洞洞的扩大宣传，而实实在在是在这些文化触角所给予各战区和后方的安慰、鼓励和启迪。虽然由于前方也一样受着限制，工作并不能顺畅展开，而有时还要有更艰苦的适应，但至少总把反动势力的嚣张牵制着了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人下了乡，受着了老百姓的熏陶，使先天带着舶来气质的新文化本身换上了民族气质。这在演戏和歌咏方面特别显著”。（《洪波曲》第八章“推进”）

十月

8日 下午五时和胡愈之、冯乃超、于立群、胡绳、钱俊瑞、沈兹九、陈北鸥等乘车去歧亭第五战区司令部。

9日 中午会见李宗仁。这次来歧亭是因为听说第五战区要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而且打算聘胡愈之为主任委员，见了面，其实“那位司令长官并没有这个意思，而是他的部下有一二人在这样拟议。更有一二位买空卖空者，便把我们动员了起来，是要我们到前线来学毛遂自荐的。这简直是笑话了！”因此，也就没有提这件事。（《洪波曲》第十二章“疾风知劲草”）

18日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作《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指出：鲁迅精神“便是不屈不挠，和恶势力斗争到底。这种精神是特别值得发扬的，尤其在目前整个民族，艰苦地对于

暴日作持久抗战的期间”。载1938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纪念专页。

19日 傍晚，出席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任会议主席，题词并致词。这次纪念会由文协、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发起，出席会议的有三十余人，周恩来、潘梓年、冯乃超、胡愈之等也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郭沫若的题词是：“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一个新纪元，中国近代文艺是以先生为写实主义的开山”。在开会词中，他说：

“鲁迅先生的学问、思想和文学上的成就，大家一定认识得很清楚，但是鲁迅先生不仅在学问上开了坦途大道，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同时在做人上亦标出很好的榜样。并且鲁迅先生所以有学问上、思想上、文学上的成就，即是在做人上有特别值得敬仰和学习的地方。”

“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斗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亦是他在学问上有所建树的要素，否则，任何事体将不得成功。”

载1938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题为《主席郭沫若先生致词》。（报道中的文字与《洪波曲》中的文字略有不同）

20日 下午二时，出席青年记者学会在青年会举行的题为“抗战中的文化工作问题”的讨论会，郭沫若发言说：“抗战以前的文化人，只是在亭子间、书斋、马路上收集材料，他们只是文化人；现在则不同，有的参加了抗战，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变。……以后文化的路子，不是单单将技巧提高，相反，为了创造大众的文化，要更加通俗，非将文化水准通俗化不可。”（见1938年3月21日《新华日报》）

21日 清晨，送于立群乘小轮船随三厅同志疏散至长沙，自

已则因为“还得做好些应当做的工作：为报纸写文章，在汉口市内布置对敌的墙头标语，应付国际新闻记者，有时还得照顾市内的治安”，故暂时不走。（《洪波曲》第12章“疾风知劲草”）

下午，周恩来搬来鄱阳街和郭沫若同住。

22日 下午，见到刚从华北前线回来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

晚，康泽招待朱德将军，郭沫若和周恩来一起出席作陪。

夜，邀朱德同宿鄱阳街一号。

23日 清晨，在书房里与朱德畅谈，并写赠白话诗一首以作纪念。朱德也写了一首白话诗《重逢》回赠。

上午，送别朱德飞返前线。

同日 拟日文的宣传标语，以备撤退时书写。

同日 参加政治部的“四巨头会议”，讨论政治部人员的撤退问题。本来已经决定贺衷寒坐船，可他怕船被敌机轰炸，临时变卦，因此，全部哗然，大家也不愿意坐船。为了顾全大局，安定人心，郭沫若主动提出和胡愈之一起让出汽车改乘轮船。

24日 清早，替《扫荡报》写一篇准备明天见报的最后的社论，题为《武汉永远是我们的》。载1938年10月25日《扫荡报》，收《羽书集》。《扫荡报》是国民党最反动的报纸，三厅从来没有管过它，可是，因为形式上是隶属于政治部的，也得服从周恩来的命令，但这时他们连写社论的人也跑光了，这篇社论只好由郭沫若“代劳”。平时该报从不欢迎进步人士的文章，而一些意识稍微清楚一点的人也不愿替它写稿，为了贯彻周恩来关于出到最后一天的指示，郭沫若破例为它写了这一篇文章，作为社论在该报刊登。由于是“代笔”，文章的有些内容和语气是按照国民党的意思写的，所以，后来郭沫若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勉强”，“是昧着良心，在那儿替别人圆谎，昧着良心在那儿帮忙骗武汉

的市民”。(《洪波曲》第十三章“撤守前后”)

同日 下午，和胡愈之一起至怡和街国际宣传处出席每星期一例行的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由吴国桢主持了这最后一次会议。

会后，巡视市区，见朝鲜义勇队在刷大幅日文标语，极受感动，也替某些中国人感到惭愧。

晚，七时，和前来送行的周恩来握别，赶赴码头，登上太古公司的一只小火轮。

25日 清晨四时开船，离别武汉。

同日 日寇攻占武汉，武汉陷落。

28日 下午，抵沙市。遇21日离汉口到长沙又至沙市的冯乃超。

29日 与冯乃超同往长沙。

30日 中午，至常德。晚抵长沙，住“陶园”，遇鹿地亘夫妇、尹伯林、罗髻渔、朱洁夫等。

本月 六妹惠贞死。

本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这次全会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同月 21日，广州为日军侵占。

同月 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在延安成立。“鲁艺”是以1937年至1938年初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第五队、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上海蚁社流动宣传队等团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内设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及研究室、实验话剧团等。

十一月

5日 作评论《文化人当前的急务》。提出文化工作者当前的急务“应该以广大的农村和广大的沦陷区域为对象，努力于动员大众的宣传”及“努力于切合实际的学术研究与技能学习”。收《羽书集》。

7日 晚，应刘斐邀，参加唐生智家的晚宴，同席的有周恩来、何应钦、贺耀祖、于立群等。

宴毕，与周恩来赴衡山，去和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周恩来是另有重大使命。

8日 抵衡山，见到陈诚，决定三厅废处减科，把原来的三处九科缩减为四个科。

9日 返回长沙。

10日 岳州失守，长沙危急。郭沫若整天为准备转移而忙碌。

11日 傍晚，夏衍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护送于立群去桂林，同车的有孙师毅、池田幸子。郭沫若因忙于公务，无暇送别。（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见《悼念郭老》）

晚，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拟定撤退计划，把三厅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步行，另一部分乘火车。

12日 清早，参加在操场上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周恩来讲了话，并就撤退的事作了详细指示。

13日 凌晨一时，国民党派兵放火烧长沙，“一霎时满城都是大火”，惨不忍睹。郭沫若和张曙在大火中撤离长沙。（《洪波曲》第15章“长沙大火”）

清晨，至湘河边，和先行到达的人汇合，后来，又见到了周恩来和洪深等人。周恩来是和叶剑英一起从大火中冲出来的。

接着，与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乘卡车折回长沙，想探看一下究竟。返抵长沙不远，知日寇并未侵占长沙。

14日 在摄司停留一天，收容人员，整顿行李。

15日 和全体人员撤退至衡山，与原驻衡山的三厅人员会合。

16日 由衡山出发到衡阳三塘。

19日 和冯乃超一起赴长沙，帮助先去的洪深、田汉处理善后事宜。

24日 应张发奎的邀请，偕冯乃超、田汉前往平江访问。当晚，由张作向导访杨森。

26日 返回衡阳三塘。

月底 参加南岳会议的闭幕会。

又 与周恩来、贺衷寒步行登山。

下山后作记游诗《登南岳》。初见《洪波曲》，又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作诗《铁佛披金色相黄》。此诗未收集，原件存乐山文管所。

同月 作诗《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收《潮汐集·汐集》。

同月 7日，《节约献金竞赛歌》收入上海英商导报馆《少年时事读本》第1集第9册。

同月 所译《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著)由言行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

2日 清晨，由衡阳坐火车动身去桂林。

3日 清早到达桂林,和先期到达的三厅的同志及于立群、于的母亲和小妹立修等会合。对三厅的人员重新作了安排。

在桂林期间,曾应陶行知的邀请在生活教育社的年会上作演讲。

23日 作论文《复兴民族的真谛》。指出“应该尽量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收《羽书集》。

27日 和于立群由桂林飞往重庆,仍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本月 作诗《舟游阳朔二首》。收《崑漓行》一书附录,1961年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线装本);又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3日,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鼓吹反苏,对国民党进行诱降。

同月 18日,汪精卫叛国潜逃,由重庆经昆明,转往河内。

同月 22日,日本发表“近卫第二次声明”,提出“共同反共”,进一步对国民党进行诱降。

同月 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卖国通敌,赞成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同月 八路军、新四军力量迅速壮大。前者发展至十五万六千余人,后者发展至二万五千人。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四十万,占六十万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建立了大小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十多块,人口达五千万以上。

同月 张曙在日寇轰炸桂林时遇难,终年二十九岁。葬于桂林城外的冷水亭,郭沫若替他写了墓碑。为悼念张曙,郭沫若曾作挽词(调寄《望海潮》)及挽诗二首,挽联四副(《洪波曲》第十六章“入幽谷”)。张曙,安徽歙县人,中共党员,是我国著名音

乐家。抗战爆发后，和冼星海等共同参加三厅工作，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著有歌曲二百多首，著名的有《农夫苦》、《车夫曲》、《保卫祖国》、《丈夫去当兵》等。《洪波曲》也是他所谱的一首曲子。

本年 6月，出版小册子《战时宣传工作》，对报纸、期刊、壁报、通讯等宣传工具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作了专门论述。

同年 在去重庆前，曾以诗一首，寄赠《新民报》负责人。诗云：

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花泣恨频添；

寄言巴渝诸友好，复兴责任在双肩。

抒发抗敌救国的壮志豪情，与友人共勉。

一九三九年(四十八岁)

一月

1日 在中山公园的群众集会上演说。他的话“象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听众被他的演说所感动。（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为郭沫若先生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见1941年11月26日《新华日报》）

初旬 为《救亡日报》在桂林第二次复刊作诗一首，诗云：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

这是郭沫若为该报响应义卖而写的。（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见《悼念郭老》）此外，为了抗日宣传，他还把他的稿费收入和生活费积余交给唐瑜，用以出版《救亡日报》航空版。（唐瑜：《忆郭老二三事》，见《悼念郭老》）

6日 作论文《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分析当前的抗战形势和敌我双方各自存在的困难，指出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坚定必胜的信念”，同时，用“降低生活”来支持抗战。载桂林《十日文萃》1939年2月5日第1卷第7期。收《羽书集》。

7日 在青年记者协会演讲，对日本近卫下台，平治组阁进

行分析。题为《暴敌无出路》。载1939年1月8日重庆《大公报》。

11日 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讲话，题为《日本帝国崩溃的前奏》。载1939年1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

12日 发表《过桂杂咏》。载桂林十日文萃社《十日文萃》第1卷第6期。

17日 作《战时文化工作》的演讲。载1939年1月18日《新华日报》，题为《文化人到农村去，到敌人后方去——郭沫若讲战时文化工作》，由洛克记录，未经作者审阅。又载重庆《中苏文化》(半月刊)1939年2月1日第3卷第6期(抗战特刊)题为《战时文化工作——在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

27日 作《纪念“一·二八”剪辑》。这是为纪念“一·二八”七周年所写的诗文片断的剪辑，强调指出：“要肃清倭寇，便须充实目前抗战的实力”，这就应该拿起武器去“当兵”。收《羽书集》。

28日 本日为“一·二八”七周年纪念日，也是世界反侵略运动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的日子，重庆各界集会纪念，郭沫若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世界反侵略秩序的建设——纪念“一·二八”》的演讲。讲话回顾了抗战以来的形势变化，指出中国人民正不惜以生命血肉来保卫民族的文化。为了“追求真正的和平，建设世界新秩序”，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一致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对于侵略者加以实际的制裁”。载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反侵略周刊》1939年7月1日第10期。由余惠霖记录，题《和平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郭厅长在重庆各界纪念“一·二八”暨响应国际反侵略动员大会演词》。收《羽书集》。

本月 作《妇女文化歌》。收《抗战歌声》，1939年1月浙江丽水会文图书社出版。

本月 国民党召开以“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为主要内

容的五届五中全会。

同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晋东南的沁县创刊。

同月 1日，《救亡日报》在桂林第二次复刊。

二 月

12日 作题为《巩固反侵略的战线》的广播演讲。详细分析了本月10日日本海军在我国海南岛登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指出：“敌人的野心不仅想并吞中国，想独霸太平洋”，而且“冒犯着诱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认为英、美、法三国，必须“与我国和苏联切实地联合起来，形成巩固的和平阵营，以惩膺扰乱世界和平的侵略者和它的同盟”。载1939年2月14日《新华日报》，收《羽书集》。

本月 10日，日本海军侵占我海南岛。

同月 蒋介石为加强个人独裁，成立党政军一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同月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战线》在延安创刊。周扬任主编，成仿吾、艾思奇、周扬、沙可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柯仲平、荒煤、刘白羽、夏衍、陈学昭、丁玲等任编委，共出六期，同年12月停刊。

同月 《救亡日报》社在桂林编印《救亡木刻》十日刊，刊登木刻创作和理论报道文字。

三 月

16日 作论文《文化与战争》。认为文化是“人类的创造欲望所产生出的各种成品之在空间及时间上的总和”，“是表示着对于占有欲望的克制与对于创造欲望的培养廓充的那种精神活动的总动向”。侵略战争“破坏文明，毁灭文化”，而反侵略的义战，则“合乎文化的战斗性与积极性”，能保卫文化，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摧毁文化的罪行，并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载1939年3月19日重庆《大公报》。收上海文献丛刊社《艺述文献》第1册，署名白圭。又收《蒲剑集》。

同日 发表书简五封。载《宇宙风》(乙刊)第2期。

本月 回四川乐山探望父亲。这是他自1913年离开家乡以后，第一次回乡，时间相隔已二十六年。这次回家时间很短，“假期仅旬有四日，旅行往返去其四，中间赴峨眉县哭母墓又其四”，在家仅六七日。3月9日是他父亲的八十六寿辰，第二天即告别父亲回重庆。(据《先考膏如府君行述》，见南京师范学院编《文教资料简报》第88期)

郭沫若回乡时，乡亲们请他讲演，“他站在一张用方桌临时凑成的讲台上，第一句就说：‘离别了二十六年的家乡父老兄弟们，我是一个不肖的子孙……’”讲话中表现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人民充满感激崇敬的心情。(郭庶英、郭平英《回忆父亲》，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郭沫若研究专刊》)

又 为沙湾小学题词。词曰：“教育是国家的基础，学问是做人的基础，凡事要从基础做起！”并且在操场上栽了二十多棵珍贵的桢楠树，对家乡人民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寄予无限期望。(王大敏：《访郭沫若故乡》，见《欢呼诗人的春天》)

又作诗一首，诗云：

依旧危台压紫云，青衣江上水殷殷。
归来我独怀三楚，叱咤谁当冠九军？
龙战玄黄弥野血，鸡鸣风雨际天闻。
会师鸭绿期何日，翘首嵩高苦忆君。

这是回乐山登尔雅台的时候做的，“诗意侧重在感事怀人”，“是寄怀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玉阶”的。（《龙战与鸡鸣》，见《羽书集》）上年12月23日，朱德曾题赠一首白话诗《重逢》，内有“重逢又别，相见——必期在鸭绿江边”等句。后来，当1944年日寇南侵黔桂时，朱德又作《和郭沫若同志·登尔雅台怀人》诗一首，诗云：“回顾西南满战云，台高尔雅旧情殷。千村沦落悲三楚，四位‘英雄’丧廿军。北国翻新看后劲，东邻陨越可先闻。内忧外患澄清日，痛饮黄龙定约君。”

春

子宗炎(汉英)生。

四月

9日 在中央摄影场的宿舍里观看《一年间》的排演。

同日 发表《纪念碑性的建国史诗之期待——庆祝文艺界抗敌协会周年纪念》。回顾、总结一年来文艺界所取得的成就。对“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含义作了说明，认为，把广大士兵和工农群众的“生活、心理、言语”作为文艺作品的“血肉和灵

魂”，只有这样，才是“我们所要求的纪念碑性的建国史诗”。载重庆《大公报》。收《蒲剑集》。

10日 作杂文《“中国人的确是天才”》，为《一年间》的演出而作。载1939年4月30日桂林《救亡日报》。收《羽书集》。

又 作《〈石鼓文研究〉序》。收《石鼓文研究》。

11日 作论文《发挥大无畏的精神——论文艺作家在精神总动员中的任务》。分析文艺界的现状，指出其不足之处，号召作家们努力，使“文艺部门切实成为精神总动员的一个动力”，尤其是要“发挥大无畏的精神”，深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生命”“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收《羽书集》。

12日 作杂文《戏剧界精诚团结》。载1939年4月30日桂林《救亡日报·〈一年间〉演出特刊》。

23日 作评论《争取最后五分钟——对于失败主义的批判》。批判汪精卫投降卖国的谬论。汪精卫自去年12月18日叛逃后，于29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3月23日又在香港的《华南日报》上发表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以“证明”他卖国主和有据。4月8日，又发表《答华侨某君书》，诬蔑我前方抗战将士，胡说：“只要和的条件不是亡国条件，我们就该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来讲和”。郭沫若在文中引用大量材料，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有力地驳斥了汪精卫的谬论，号召群众，“加紧我们的反攻力量”，为“达到我们的胜利的前途”“争取最后五分钟”。载1939年4月23日桂林《救亡日报》。收《羽书集》。

29日 作评论《绝妙的对照——请看希特勒替我们痛骂汪精卫》。继续批判汪精卫投降卖国的谬论。收《羽书集》。

五 月

3日 作论文《青年化，永远青年化》，纪念“五四”青年节。指出：五四运动“以抗拒日本的侵略、肃清汉奸、拒绝不合理的和约起，而蔚成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洪流。”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全中国的青年永远保持着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就是要全民族的精神永远发扬着那种青年化的光彩”。使“我们自身的一切，中国的一切，世界的一切，时时刻刻青年化，永远青年化！”收《羽书集》。

4日 清早，从观音岩上坡，目睹昨晚敌机大轰炸所造成的惨状，极为愤慨。（见《芍药及其他》）

10日 作《〈纪念张一馨先生〉跋语》。收《沸羹集》。

12日 作诗《惨目吟》。收《潮汐集·汐集》，诗前作者附注：“五三、五四大轰炸，死者累累。书所见如此，以志不忘。”

21日 作《和平的武器与武器的和平——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第二次年会宣言》。回顾分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宣告今后要努力“使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皆成为反侵略的战士”，“使反侵略的精神遍植于每一个中国同胞的心坎”。收《羽书集》。

本月 作诗《铭刀》。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3、4日，日本空军大炸重庆，国民党政府防空无方，使群众数千人死伤。

同月 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为了加强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联系，于14日召开大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大会选出成仿吾、周扬、肖三、丁玲、艾思

奇、柯仲平、沙可夫等为理事。

六 月

6日 作杂文《大人物与小朋友》。为《抗战儿童》纪念“七七”三周而作。教育儿童要正确对待人生，“要永远学习大人物的本领，要永远保持小朋友的心情”。载1939年7月《抗战儿童》。收《羽书集》。

18日 发表为高尔基逝世三周年所作的题词：“诵海燕歌，就好象和高尔基见了面。纪念高尔基，最好是成为他所歌颂的海燕，不怕暴风雨，在黑暗当中确信着光明就在眼前！”载重庆《群众》周刊第3卷第5期。

19日 作七律《有感》（“比来人怕夕阳殷”）。收《潮汐集·汐集》。

20日 作五绝《题竹扇》（“质本岁寒友”）。收《潮汐集·汐集》。

24日 作七律《喜雨书怀》。收《潮汐集·汐集》。

29日 作评论《“无条件反射”解》，回答胡风对《抗战与文化》一文的批评，并解释“无条件反射”的含义。载《文艺月报》1940年9月15日第2卷第1、2期合刊。收《羽书集》。

本月 月底，因城里寓所被“炸得屋顶纷飞”，移居乡间。

本月 国民党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总政策。用军队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惨杀八路军指战员四百余人。

同月 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包围新四军后方平江通讯处，惨杀涂正坤主任，罗梓铭少校以下全体工作人员。

夏

夏历4月，父亲郭膏如病逝，郭沫若时在重庆，闻耗，即偕于立群及刚出世不久的儿子汉英“星奔回籍”。他在家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即返回重庆，于立群就留在沙湾。不久，郭沫若又至沙湾，料理父亲丧事。自夏至秋，前后在家住了四个月。

七月

本月 《石鼓文研究》一书，以“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由长沙商务印书馆根据作者手迹影印出版，线装二册。

本月 7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时局宣言》，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指示全党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士，进一步动员广大群众，向一切投降、分裂、倒退的活动进行斗争。（见《中共中央抗战宣言集》，1949年苏南新华书店出版）

同日，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表两年来的战绩：与敌作战三千一百二十九次，毙伤敌伪军十万。

同月 2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目前形势“万分紧急”，“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并提出了八项具体办法。（见《中共中央抗战宣言集》，1949年7月苏南新华书店出版）

八月

16日 发表《二年来敌国的社会状况与反战潮流》。载《改进》(半月刊)第1卷第9、10期合刊。

本月 国民党修改1938年7月制定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并利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进一步控制言论自由。

同月 作家叶紫(1912—1939)病逝，终年二十八岁，著有小说集《丰收》等。

九月

23日 作《题花卉画二首》(《题海棠与紫白丁香》、《题野菊与茄花》)。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作诗《登乌尤山(用寺字韵)》(“雨余独上乌尤寺”)。载1941年《笔谈》第2期《龙战与鸡鸣》一文内，收《羽书集》；又收《潮汐集·汐集》。乌尤山在乐山县城外，其上有乌尤寺，有汉代犍为舍人郭氏注《尔雅》的地方。

同月 作诗《别季弟》。收《潮汐集·汐集》。

同月 作诗《晨浴北碚温泉》。收《潮汐集·汐集》。

同月 作《祭父文》。(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88期)

本月 1日，德国分兵三路进攻波兰，占领但泽。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同月 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开会，商议成立汉奸政府，实行南北的汉奸组织大合流。日本派西尾寿造为侵华派遣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以相策应。

十 月

15日 作五言古诗《石池》。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作五律《游北碚》。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4日，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同月 19日，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主办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木刻展览会，展出结束后，又赴战地及后方城市展出。

十二月

24日 为温流逝世(1937年1月13日)题词：“你的早逝，不仅是中国诗坛的损失，同时是中国抗敌战线上的损失。抗敌的号队，缺少了你这位优秀的号手，使我们感觉着寂寞。”(见李金基：《忆温流》，载《梅江文艺》1981年第2期)

本年 回乡办理父亲丧事时，见大哥所写的《祭母文》后，痛哭不已地说：“先兄有祭母文，情辞悱恻，在欧阳之上”。还在大哥所作的诗文手稿册上写了如下诗句和跋语：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东瀛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鞅述阡。

手把遗篇思近事，一回雒诵一潸然。

长兄橙坞先生乙巳负笈日本时，有留别嫂氏诗五绝，嫂氏装制成册囑为题识。捧读再四，思今感昔，不知涕之何从，率成一律，惜不得起伯氏于九泉为斧政耳。”（据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88期）

同年 回乡时，在年青时所读过的书籍中，找到有64期的《国粹学报》的合订本，“《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我的旧梦”，因而把书带至重庆，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后来小说没有写成，终于采取了戏剧的形式，即1942年所作的《孔雀胆》。（据《孔雀胆的故事》）

同年 冬，一个星期日，在一家电影院里亲自主持文艺演讲会，向青年进步学生宣传我党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成就。会上，由洪深、马彦祥、贺绿汀、赵飒作报告。（据赵飒：《铁翼乘风逐太阳——回忆郭老二三事》，收《欢呼春天的诗人》）

本年 王任叔、唐弢、柯灵、孔另境等在上海创办《鲁迅风》周刊，出至第19期停刊。同年创刊的文艺刊物还有成都的《笔阵》月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编），《戏剧战线》半月刊（戏剧阵线社编）、重庆的《戏剧岗位》（熊佛西、叶仲寅编），等等。

一九四〇年(四十九岁)

一月

11日 为《新华日报》创刊二周年题词：“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黄河还要浩大。”这是对《新华日报》的崇高评价，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限制人民言论自由，迫害进步报刊，破坏抗战、制造分裂行为的有力揭露和批判。载1940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

23日 作《〈战争与和平〉序》。载《文学月报》1940年2月15日第1卷第2期。收《战争与和平》(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此书从1931年开始翻译，仅译了三分之一，后交邢相华续译。现见译本系高地(即高植)译成。译竣后，高地写信给郭，建议与郭共同署名，以合译名义出版，郭乃作《序》说明之。

本月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同月 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同月 《文学月报》在重庆创刊，该刊是抗战期间重要的文艺刊物。

二 月

3日 为广播电台作题为《春节劳军与军民合作》的演讲。载1940年2月9日桂林《救亡日报》。

27日 致王冶秋信。(本年6月17日、8月4日又有致王冶秋信二通。均见《沫若书简》，载《战地》增刊1979年第5期)

28日 作杂文《关于“戚继光斩子”的传说》，并公开征求有关戚继光生平事迹的史料，以作编写剧本之参考。载1940年3月2日重庆《大公报》。收《“民族形式”商兑》。又收《羽书集》。

三 月

21日 作评论《汪逆傀儡是自进坟墓》。揭露汪精卫卖国投敌“是自己挖了墓坑，自己钻进去葬送”，正应了汪过去所说的“南京便是我们的坟墓”的预言。载1940年3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收《羽书集》，题作《汪精卫进了坟墓》。

本月 《周易的构成时代》，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二》。

本月 5日，蔡元培(1868—1940)在香港逝世。

同月 汪精卫至南京，发表《和平建国宣言》，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南北汉奸大合流，组成傀儡政府。

同月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在延安创刊。1941年8月，出至第3卷第2、3期合刊时停刊。

四 月

1日 发表《抗战儿童》刊名题词。载重庆《抗战儿童》1940年4月1日创刊号。

7日 星期日，下午，与卫聚贤往生生花园寻汉砖不得。后过江，在嘉陵江北岸无意中发现汉砖、汉墓。次日(4月8日)报上便登出了发现汉砖的消息。

10日 又与卫聚贤去生生花园，同先至的马衡一起过江察看汉墓，参加调查的还有常任侠。

12日 作论文《成仁便是成功》。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无数从事政工工作的烈士们。收《羽书集》。

14日 星期天。参加试掘汉墓，无所得。下午因另外有事便先离开了。卫聚贤等仍在继续试掘。

18日 下午，接卫聚贤电话，说有重要的东西发现，因有事未能前去。

20日 下午，过江去看汉墓发掘所得，计有五铢钱无数，长三尺的铁剑一口，土偶大小七个，陶猪陶鸡各一，陶罐陶孟若干，“看情形的确是汉墓”。(《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见《羽书集》)

21日 星期日，参观试掘结果展览会。参观的人十分踊跃，估计在两千人以上。郭沫若对朋友说：“象这样的办法多来几次，对于国民的保健上都是有利益的”。

同日傍晚，看到农民从小丘的墓址中掘出的汉砖。砖有两种：一种两端有公母笋，中有“富贵”二字；另一种为长方形，一端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这样便把汉砖汉墓的问题完全解决了”。而且，还证明了顺帝是“第二年始改元

为‘永建’的”。(《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见《羽书集》)

晚，马衡来访，传达政府的意见，据说这一次的汉墓的发掘，手续不合，按规定“应该先呈准古物保管委员会”，且应由“国立的学术机关”发掘。

27日 作《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详细记述发现、试掘汉墓的经过。郭沫若见本日报载“中央社”的一则消息，引述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谈话：“此次发掘的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云云。这是国民党政府有意阻挠古物的试掘工作，并借此机会攻击郭沫若。对此，郭沫若在文中据理予以驳斥，指出：“这位‘负责人’，我不知道究竟是谁，而他们‘查询’我的‘函’，我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收到。其实这一次的汉墓发现，只是偶然的试掘程度，根本说不上‘发掘’。那末，所谓‘与规定手续不合’的话，更不知从何处说起。”载1940年4月28、29日重庆《大公报》，又载《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收《羽书集》。

本月 与田汉、赵清阁等去北碚缙云山参观育才中学，然后在山上的缙云寺小憩，太虚法师以甜茶招待。回来时，赋诗一首并写成条幅赠赵清阁。诗云：“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落款为“清阁女士，双正。乐山郭沫若”。(据赵清阁所藏原件)

五 月

3日 作论文《关于屈原》。介绍大诗人屈原的生平和创作。指出在他身上，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载1940年6月9日重庆《大公报·战线》，收《“民族

形式”商兑》。又收《蒲剑集》。

20日 作论文《中苏文艺交流之促进》。论述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民族的现实生活有它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的文艺存在着差别，它们各自有着独特的内容和风格。加强“民族文艺的交流可以使文艺形态多样化，且更能动地使民族生活交互受其影响而生变革”。文章强调要学习苏联文艺和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使“中苏两大民族的更密切的融洽与两大民族的文艺之间更高阶段的发展”。载《中苏文化》(半月刊)1940年6月18日第6卷第5期。收《蒲剑集》，题作《中苏文化之交流》。此文曾被译成俄文，“在苏联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同情与反映”。(《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在中苏文化协会讲》，见《今昔集》)

31日 作论文《“民族形式”商兑》。正确地阐述了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批评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认为实现“民族形式”的正确途径是：作家要“投入大众当中，亲历大众生活，学习大众的语言，体验大众的要求，表扬大众的使命。作家的生活能够办到这样，作品必能发挥反映现实的机能，形式便自然能够大众化”。强调了必须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来谈论“民族形式”问题。载1940年6月9、10日重庆《大公报》，又载《中国文化》9月25日第1卷第2期。收《“民族形式”商兑》，又收《蒲剑集》。

六 月

5日 作评论《粉碎敌寇的政治攻势》。载重庆北碚中山文化教育馆《时事类编》(特刊)1940年7月第54期。

7日 作论文《革命诗人屈原》。从文学形式、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历史，谈屈原的伟大功绩，批判当时一些“死守着文言

文的旧垒”“排斥白话文”的顽固派。载1940年6月10日《新华日报》。收《“民族形式”商兑》；又收《蒲剑集》。

12日 作论文《先乱后治的精神》。重新解释“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一语的含义，认为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在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应发扬这种“先乱后治的精神”。载重庆《现代读物》（月刊）第5卷第7期，收《羽书集》。

17日 作诗《罪恶的金字塔》。诗题有注：“这首诗是为大隧道惨祸而写的。日寇飞机仅三架，夜袭重庆，在大隧道中闭死了万人以上。当局只报导为三百余人。”载桂林《诗创作》1941年9月18日第3、4期合刊。收《蝴蝶集》；又见《蜀道奇》。

27日 作《〈“无条件反射”解〉后记》。收《羽书集》，见重庆群益出版社版。

本月 日寇侵占宜昌。

同月 茅盾从新疆到达延安，留住半年，并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课。

七 月

1日 作《短筒》（致孙凌书）。载《自由中国》1940年11月新1卷第1期，信内附所作词《蝶恋花》一首（赠杜国庠夫人）。（参阅下一条）

又 作《蝶恋花》词一首，赠刚由潮汕步行至香港，更经越南、昆明、贵阳，于今日抵重庆的杜国庠夫人，时郭沫若因城里寓所被炸，已迁居乡间。载《自由中国》新1卷第1期。收《蝴蝶集》。

7日 作论文《三年来的文化战》。系统地回顾、总结抗战三年来的文化工作。载1940年7月16日、17日重庆《大公报》。收《“民族形式”商兑》；又收《羽书集》。

15日 作诗《和朱德诗》。载1940年7月24日《新华日报》，题名为《郭沫若和朱德诗》，原诗七首，经作者修改收入《潮汐集·汐集》成四首，题为《和朱总司令韵四首》。

20日、30日 发表评论《抗战三年来日本社会的危机》。载桂林《十日文萃》新1卷第2—3期，收《抗战三年》，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书刊发行部出版，题为《三年来日本社会的危机》。

27日 在金刚坡乡下寓所接法国驻重庆领事央克列维奇夫人尼娜的邀请信。次日赴央克列维奇家作客。下午告别时，尼娜夫人送了一首她用英文写的诗。（即《小皮筐》，见《芍药及其他》）

本月 日本公然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要建立“东亚新秩序”，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夺取太平洋地区的侵略野心。

同月 蒋介石加剧反共，拟订了所谓“中央提示案”，企图取消陕甘宁边区，减缩并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

八 月

3日 在重庆纪念鲁迅六十诞辰大会上讲话。称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认为“他在思想、文学与革命的斗争的各方面都放射了不可比拟的光辉”。载1940年8月4日《新华日报》，题为《行都文化界纪念鲁迅六十诞辰》。

5日 作诗《司徒慧敏导演〈白云故乡〉题赠》。收《潮汐集·汐集》。

26日 作词《水调歌头·赠广东艺人》。收《潮汐集·汐集》。

28日 作诗《夜会散后》。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月底，孩子剧团第二队在川西工作了大半年，从乐山回到重庆，住在郭沫若住所的院子里。“郭老夜间工作结束，走到院子里，发现孩子们已经睡熟了。他立刻回到屋里，把棉被、夹被、毯子和衣服，一次又一次地抱出来，替孩子们盖上”，生怕大家被夜雾寒气冻着了，无微不至地关心孩子们。（据《郭老和孩子剧团》，见《悼念郭老》）

同月 8日，《“民族形式”商兑》由桂林南方出版社出版，列入《南方文艺丛刊之三》。

本月 夏衍等编辑的《野草》月刊在桂林创刊，这是抗战期间专门刊登杂文的进步文艺刊物。

九 月

4日 作《鹧鸪天四首——吊杨二妹》。收《潮汐集·汐集》。

19日 作诗《读方志敏自传（次叶剑英韵）》。收《潮汐集·汐集》。叶剑英的诗《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收《远望集》（1979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又 作诗《题饮马长城图》。收《潮汐集·汐集》。

30日 国民党为了迫害进步文化人士，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了第三厅，把第三厅的左翼文化人士全部解职，郭沫若也卸去第三厅厅长职务。

本月 德、日、意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进一步勾结在一起。

秋

为丁正献书写联语：“大河前横流水今日 生气远出明月雪时”。据丁正献回忆：当时，国民党胁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作离厅论。郭沫若在这关键时刻，赶到郊外的办公地点三塘院，作了义正词严的讲话，勉励大家即使离厅，也要干革命事业。随后三塘院子内摆开书画台，郭沫若挥笔疾书，写了几个条幅。（丁正献：《昙华永念》，《东海》1979年第8期）

十月

2日 在全国慰劳总会举行的献药仪式上致词。载1940年10月3日《新华日报》，题为《全国慰劳总会昨举行献药仪式，马超俊、郭沫若分别致词》。

9日 作词《解佩令·贺友人结婚》。收《潮汐集·汐集》。

10日 作《关于“无条件反射”的更正》。载《文学月报》1940年12月15日第2卷第5期。

12日 作杂文《写在菜油灯下》。高度评价鲁迅的功绩和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驳斥某些人诬蔑鲁迅“褊狭”、“偏私”、“刻薄”、“世故”等谬论。载《抗战文艺》1940年12月第6卷第4期《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收《羽书集》。

19日 在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希望有更多更多的鲁迅在中国生长起来。”载《抗战文艺》（月刊）1940年12月1日第6卷第4期《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原题《记〈鲁迅

纪念会》和《鲁迅晚会》》，记者记。

同日 作诗《题慰劳前线书》。载1940年12月29日《新华日报》，题名《渝贺年片展览会结束，郭沫若参观当场赋诗一首》。收《潮汐集·汐集》。

20日 作杂文《告鞭尸者》（未完）。载重庆《新蜀报·七天文艺》1941年9月17日第23期。收《文艺新论》（郭沫若、茅盾合著），1943年成都莽原出版社出版；又收《羽书集》。

本月 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等，提出在黄河以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已达五十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应缩编为十万人等无理要求。从此时起，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同月 19日，延安各界举行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发布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继承鲁迅的战斗精神，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大会还决定成立“鲁迅研究委员会”，编印《鲁迅研究丛刊》，该刊第一辑于1941年1月出版。

十一月

1日 出任今日正式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政府在撤销三厅以后，为了装点门面，新设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属政治部领导。其实，这是一个形同虚设的机构，主任委员也是有职无权的。但为了进行合法斗争，郭沫若遵照党的指示，答应担任这一职务，并把原第三厅的工作人员全部吸收了进去。

同日 为出版《赫曼与窦绿台》单行本给友人信。载桂林《自由中国》（月刊）1940年11月1日新1卷第1期。

2日 在戏剧的民族形式座谈会上发言，谈中国古代音乐问题。（田汉记录）载桂林《戏剧春秋》（月刊）1941年7月第1卷第4期，题为《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

3日 作《答〈国际文学〉编者》，回答苏联《国际文学》编者罗科妥夫提出的问题，积极主张加强中苏文化的交流。收《沸羹集》。

23日 出席《抗战文艺》编辑部召开的“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座谈会报道载《抗战文艺》（月刊）1941年1月1日第7卷第1期，其中引录了郭沫若讲话的部分内容。

本月 朱德总司令、叶挺军长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发出通电，揭露国民党策动新的反共高潮。

同月 田汉主编的《戏剧春秋》在桂林创刊，该刊至1942年9月终刊，共出十期。

十二月

4日 作论文《中国美术的展望》。回顾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预示今后发展的前景。载1941年1月1日《中苏文化》文艺特刊。收《蒲剑集》。

14日 作论文《续谈“戚继光斩子”》。继续记述有关“戚继光斩子”的各种传说，并具体分析其可靠性。因为史料的不可信，写作剧本的计划，终于未能实现。收《羽书集》。

17日 发表讲演稿《日本外交》。载重庆《战时日本》（月刊）第4卷第21期。

18日 作论文《庄子与鲁迅》。从鲁迅作品中摘引了大量材

料，说明鲁迅受庄子的影响。载《中苏文化》(半月刊)1941年4月20日第8卷第3、4期合刊。收《蒲剑集》。1941年7月11日又写了“补遗”，引录材料二条。

28日 作讲演《用锋韧之笔坚持抗战》。载1940年12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副标题为《文艺界举行大检阅，作家分作一年总结报告》。

31日 发表杂文《为节储进一解》。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

本月 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部署皖南新四军北移。

本年 作诗《题路工图》、《喜雨》、《汉相》。收《潮汐集·汐集》。

又 再次发表《〈威廉迈斯达〉序》。载《说文月刊》1940年10月15日第2卷第6、7期合刊。此即1937年所作《给〈威廉迈斯达〉译者》。

又 译《沙姆涉沸的游击战》(《战争与和平》之一章)，系与高植合译。载《抗战文艺》1940年11月1日第6卷第3期。

又 在高龙生所画《猪》上题诗三首，题为《猪童叟三部合唱》。见《沸羹集》中的《猪》一文。

又 为楚剧演员徐小哈追悼会写祭轴：“楚些招魂”。见1978年5月《武汉文艺》，龚啸岚：《永远为自由而歌唱》。

同年 年底，在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一次全体委员及工作人员会议上，针对有人说该会委员及工作人员大多数不是国民党一事，批驳说：信佛法的人不一定是和尚，反之，和尚也未必个个能守法规，真信佛法，酒肉和尚不是也很多吗？信仰三民主义不一定加入国民党，非党员信仰三民主义的程度，奉

行三民主义的热忱，敢信不在国民党之下。驳得某些人哑口无言。（茅盾：《为祖国珍重——祝郭沫若先生五十生辰》，见1941年11月16日《华商报》）

同年 曾把《羽书集》交重庆大东书局准备出版，一切手续均已完备，但后来书局不肯印行，只得把原稿要回（据《羽书集·第二序（重庆版）》）后来该书于1941年11月，由香港孟夏书店出版。

同年 女儿庶英生。

本年 陈铨、林同济等组成“战国策”派，在昆明出版《战国策》杂志，又在《大公报》上辟《战国》周刊，他们把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说成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

一九四一年(五十岁)

一月

1日 作《这一千日——为反侵略分会三周年而作》。分析三年来世界反侵略战争的形势，认为总趋势是“推进着大多数人类向上，面向光明冲破黑暗”。载1941年1月23日《新华日报》。

12日 上午，出席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次国际问题讲座并致词，邀请冯玉祥主讲《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

13日 发表为冯玉祥六十生辰所作诗，题为《郭沫若诗寿冯玉祥将军六十大庆》。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报社附注：去年冯寿，郭事后得知赋诗为寿。（按：冯玉祥生于1882年，本年为虚龄六十岁）

下旬 一天夜里，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孩子剧团团员李少清，因在文委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被政治部特务连抓走。第二天上午郭沫若得悉后，立即打电话给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愤怒地说道：“一个小青年，给新四军募点钱，犯了什么罪，值得抓起来么？……你快给我放回来！”郭沫若的严正抗议，使这位部长不得不将李少清释放出来。后来，地下党组织把他送到广东东江纵队去工作，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据陈模：《郭老和孩子剧团》，见1978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31日 发表歌词《出钱劳军歌》。载本日《新华日报》。系为慰劳总会举行的“出钱劳军”竞赛运动而作。后由贺绿汀谱曲。

本月 为哀悼“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愤而作诗二首，痛斥国民党的罪行。收《潮汐集·汐集》，题为《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

本月 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九千余人，由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出发，向茂林前进。被国民党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的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是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以电话严斥国民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并在《新华日报》上悲愤地用大字题了悼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全国爱国人士纷纷谴责、揭露国民党反动派。20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率领广大指战员，继续坚持在大江南北进行抗日斗争。

二 月

本月 修改历史剧《棠棣之花》。

本月 1日，桂林《救亡日报》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被迫停刊。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回忆说，“这报纸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洪波曲》第16章“入幽谷”）。

同月 9日，在香港的进步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致电国民党，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

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941年2月9日《新中华报》)

三 月

6日 作诗《题六骏图——为田寿昌获六骏图拓本题识》(五首)、《送田寿昌赴桂林》。均载《戏剧春秋》1941年10月10日第1卷第5期。《送田寿昌赴桂林》收《潮汐集·汐集》。

9日 据《新蜀报》报道:在重庆文化界发动的捐款慰劳抗日战士运动中,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号召作家卖字捐款劳军,郭沫若等的墨迹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5日 作诗《建设行》。以“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之道贵基底”作比喻,说明建设国家和人生亦应如此。收《潮汐集·汐集》。

22日 作诗《鞭石谣》。借神人鞭石这一古老传说,歌颂人民的巨大力量。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董必武、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十二条临时办法,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被国民党拒绝。

春

根据形势的发展,在周恩来同志的部署下,组织重庆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士,分头去香港、缅甸等地工作。郭沫若耐心教育同志们执行周恩来同志这一指示。(赵汎:《回忆郭老的一些片断》,见《悼念郭老》)

四 月

4日 作儿歌《满天星》。收《潮汐集·汐集》。

5日 作诗《题水牛图》、《题峡里行舟图》。二图均系李可染所画。在《题水牛图》中，称赞了水牛为生产“稻粱麦黍稷”所作的贡献。在《题峡里行舟图》中，作者以蜀道山峡比喻当时政治形势的险恶，抒发了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收《潮汐集·汐集》。

7日 作诗《感时四首》，唱出了在国民党反共政策之下，政治空气的低回沉重和抗日形势的艰难，唱出了郁结在心头的忧愤悲哀，同时斥责了背叛“民意”，挑起“党锢”，“趋步墨希”^①的国民党反动派。见《诗刊》1959年10月号。收《潮汐集·汐集》；又收《蜀道奇》。

17日 作诗《百虎图》。中午，张悲鹭来访，将所画《百虎图》请求指教。郭沫若仔细看了画中一百零八只不同姿态的老虎，风趣地对张说：“我喜乡人中得此健者，吾病好矣！”并亲笔为《百虎图》题了八十八行长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为文章君作画，我今五十君廿五，匹夫有志不可夺，莫因道塞而穷武”，鼓励青年“在困境中斗争，在政治上追求光明，靠拢革命；在艺术上要敢于冲破陈规，勇于创新。”（据张悲鹭：《悼念·回忆·学习——忆郭老二三事》，见《新文学史料》第2辑）。诗收《潮汐集·汐集》。

20日 作诗《华禽吟》。写乳虎、华禽追逐嬉戏的情景。收《潮汐集·汐集》。

27日 作诗《题〈画云台山记图卷〉》（四首），诗前有“序”

^① “墨希”，指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云：“傅抱石成《中国古代山水画史》，以解释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为中心，并附以图卷；索题，因成四绝”，诗中嘲笑了日本人伊势专一郎和内藤虎的无知，对傅抱石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史》及图卷倍加称赞。收《潮汐集·汐集》。

同日 在抗建堂讲演，题为《诗歌底创作》。载重庆《文学》(月刊)1944年10月、11月第2卷第3、4期。

本月 为《战时的英国》一书题签。见《战时的英国》(叶南、彦实甫作)，本年4月重庆欧亚文化月刊社出版。

本月 苏北文化协会在盐城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组织简章、工作计划等，并选出钱俊瑞、夏征农、许幸之、薛暮桥、徐步、冯定、戴平万、孙克定、丘东平等二十五人为第一届理事。

同月 国民党加剧迫害进步文化工作，从本年1月至今，桂林《救亡日报》、《国民公论》和重庆《全民抗战》等数十种报刊先后被迫停刊。大批抗日文化人士受到迫害，大批进步书刊遭到查禁，仅据国民党官方发布的数字，从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1941年7月，被查禁的书刊就达九百六十一一种，其中绝大部分是进步书刊。

五 月

1日 作诗《奔涛》。以奔腾的怒涛比喻民情，相信“国运”必将得到“挽回”。收《潮汐集·汐集》。

2日 作诗《百蝶图四首》。称赞绣品“百蝶图”。收《潮汐集·汐集》。

3日 作论文《青年哟，人类的春天！》纪念“五四”运动二十

二周年。载1941年5月4日《新华日报》，初收《蒲剑集》。1947年3月8日曾写《前言》一段，并此文摘要，收1947年5月华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呼喊》。

10日 作诗《题苏联妇女生活展》。歌颂十月革命给苏联妇女带来了幸福生活，坚信中国也会有这一天。收《潮汐集·汐集》。

17日 作诗《为陈望道题画》。收《潮汐集·汐集》。

21日 作诗《和沈衡老》。收《潮汐集·汐集》。诗前有作者附言。沈衡老即沈钧儒（沈衡山）。

27日 作杂文《蒲剑·龙船·鯉帜》。谈有关端午节各种风俗习惯的由来、发展和涵义。文中，还从日本的“鯉帜”这一风俗谈起，对日本民众寄予期望。载1941年5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校改后，收《蒲剑集》。

30日 晚，和于右任、老舍等出席全国文艺界协会举行的首届“诗人节”庆祝会，并报告屈原生平。

本月 和黄炎培、章士钊等发起组成友声书画社，“目的在以所得润资，捐助优待出征军人家属费用”。（1941年5月8日《新华日报》报道）

本月 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秦邦宪）任社长。

同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时局的通知。

同月 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备委员会发起举行“五四”奖金征文，收到作品一百五十余篇，得奖作品二十三篇。

初夏 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在邹韬奋主编的香港《大众生活》周刊上开始连载。作品以皖南事变为背景，揭露控诉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种种罪行。同年10月由上海华夏书店出版。

六 月

18日 和周恩来、董必武、冯玉祥等出席在中苏文协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并作题为《活的模范》的演讲。热情地颂扬高尔基是“活的模范”。载1941年6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有6月20日附识一条。收《蒲剑集》。本文又载于《中苏文化》6月25日第8卷第6期，题为《写在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的一天》，文字略有改动。

30日 应郑林曦转来《香港新文字学会会报》编者信所请，作论文《今日新文字运动应取的路向》，支持文字改革活动，并纪念该学会成立两周年。文章论述了新文字和旧文字的辩证关系，以及在推广新文字时应引起注意的问题。载《香港新文字学会会报》，收《沸羹集》。《香港新文字学会会报》是张一麀等于1939年夏为开展新文字活动而出版的。（郑林曦：《郭老热心文字改革的二三事》，载1978年6月15日《光明日报》）

本月 22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

同月 16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文代会开幕，27日。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

同月 1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举行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肖三、周扬分别作了报告。

七 月

2日 作小说《金刚坡下》。通过一个年青的流浪妇女的不

幸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载1941年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收小说散文集《波》。

7日 出席文化工作委员会召集的文化界座谈会，并作题为《四年来中日文化战》的发言，总结抗战四年来的文化工作。发言内容摘要同张申府发言摘要合题《让我们结成一 座新的长城——四年来文化战线上的总检讨》。载1941年7月8日《新华日报》。

8日 下午，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演讲会。演讲会由郑伯奇等分别报告文艺各部门工作情况及今后打算。

10日 苏联P·巴甫连珂致函郭沫若，感谢郭沫若所赠之书画。函载1941年11月2日《新华日报》。

11日 领衔签署的《中国文化界致苏联科学院会员书》发表。表示坚决响应苏联科学院6月28日致各国科学家的通电：全世界文化界一致起来反对文化与科学最恶毒的敌人——法西斯强盗。载本日《新华日报》。在该文件上签名的还有沈钧儒、茅盾、郁达夫等二百六十四人。

同日 作《庄子与鲁迅·补遗》。补记两条鲁迅著作中引用庄子的话的材料。收《蒲剑集》。

15日 出席中苏文协关于苏德战争座谈会，以《苏联抗德战争之形势》为题，详细报告战况。报告内容见报道：《苏联，为人类自由幸福而战着！》载1941年7月16日《新华日报》。

16日 作诗《和老舍原韵并赠三首》，对老舍及其作品极表称赞。收《潮汐集·汐集》。

同日 作诗《赠谢冰心》。收《潮汐集·汐集》。（又见冰心《悼郭老》一文，《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18日 作诗《秋风》。收《潮汐集·汐集》。

20日 作诗《纪念日本人反战同盟一周年》。赞扬鹿地亘主

持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中所起的作用。收《潮汐集·汐集》。

21日 作诗《天鹅蛋》。收《潮汐集·汐集》。天鹅蛋即仙人球。

27日 作杂文《龙战与鸡鸣》。通过对几首诗歌的分析，批判汉奸汪精卫，歌颂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载《笔谈》（半月刊）1941年9月16日第2期。收《羽书集》。

本月 《屈原研究》由群益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屈原时代》、《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及附录《屈原赋今译》等篇。

本月 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号召坚持抗战到底。

同月 17日始，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三篇，在延安《解放日报》分三天载出。

同月 作家丘东平（1910—1941）在苏北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

八 月

10日 作《〈告鞭尸者〉附记》。收《羽书集》。《告鞭尸者》作于上年10月20日。

13日 发表论文《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收本日出版的《抗战四年》，军事委员会出版。

15日 作《〈由四行想到四川〉附记》。收《羽书集》。

17日 作儿歌《燕老鼠》。收《潮汐集·汐集》。燕老鼠即蝙蝠。

19日 致孙望信，称赞《中国诗艺》上刊登的《从农（场）里

出来》(邹狄帆作)和《诗坛闲步》(李白凤作)等作品。对《轰炸后》(白鹤作)一诗提出不同看法。载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79期。《中国诗艺》是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型诗刊。

21日 作诗《蝙蝠的抗议》。载广州《文艺生活》(月刊)1941年10月15日第1卷第2期。收《潮汐集·汐集》，改题《燕老鼠的抗议》。

又 作诗《轰炸后》。描写人民在遭敌机轰炸后的镇定情绪，“这超越一切的深沉的镇定哟！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生命是不可战胜的！”载广州《文艺生活》(月刊)1941年10月15日第1卷第2期。收《潮汐集·汐集》。

26日 作诗《寄赠南洋吉打筹赈会》，勉励大家“努力共期回国步，他年握手纵高歌”。收《潮汐集·汐集》。

28日 作诗《回报马叔平用原韵》。马叔平即马衡，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召开会员大会，总结分会成立后三年来的工作成绩。

同月 4日，作家许地山(1893—1941)在香港病逝，终年四十九岁。著有《缀网劳蛛》、《危巢坠简》等小说集。

九 月

1日 作儿歌《公鸡是号兵》。收《潮汐集·汐集》。

6日 作论文《今天创作的道路》。认为目前的中国和世界，是美与恶、道义与非道义斗争最剧烈的时代，也是最需要维护和发扬斗争精神的时代。文章还对所谓写“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的论调进行了批评。载桂林《创作月刊》1942年3月15日第1卷

第1期。收《今昔集》。

12日 作诗《抗日书怀四首》。描写“九一八”、“七七”以来中国人民和日寇浴血奋战的情景，表示对取得最后胜利充满信心。收《潮汐集·汐集》。

14日 作《新诗的语言问题》。载1941年10月7日重庆《新蜀报·七天文艺》第27期。

18日 作诗《“九一八”十周年书感》。收《潮汐集·汐集》。

25日 为自己五十寿辰作《五十年简谱》。载《中苏文化》(半月刊)1941年11月第9卷第2、第3期合刊。又载《抗战文艺》1942年6月15日第7卷第6期。现收《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1956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

30日 题关良所作京剧人物画长卷。(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88期,鲁真:《郭沫若为关良画辑拾》)

又 作诗《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一周年》。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评论《戏剧运动的展开》。载1941年10月11日重庆《新蜀报·蜀道》第509期。

本月 发表时论《世界反法西斯大战中迎接抗战第五年》。收《胜利的四年》,1941年9月第三战区司令部出版。

本月 16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创刊,由丁玲主编,刊登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并介绍外国文艺理论和文艺动态。每月经出二十期。第101期起改由舒群主编,出至111期停刊。

十月

2日 作诗《题天溟山水遗墨》。收《潮汐集·汐集》。

4日 作诗《传湘北大捷》。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诗《苏联友人歌》。载重庆《中苏文化》(半月刊)1941年11月7日第9卷第4、5期合刊。

10日 发表《短简——给××先生的信》，谈写作《戚继光斩子》一剧中辍的原因。载本日出版的桂林《戏剧春秋》第1卷第5期。

15日 发表散文诗《母爱》。载广州《文艺生活》第1卷第2期。此诗内容与1939年5月12日所作《惨目吟》相似。1942年4月30日修改，仍题名《母爱》，收《芍药及其他》。

16日 作诗《贺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收《潮汐集·汐集》。

同日 作杂文《“O.E.”(《集外集》中的人物)索隐》。说明O.E.即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文中介绍了小原荣次郎卖兰草的经过及鲁迅为他题诗的情况，也记述了自己和小原荣次郎的交往。本文系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而作。载1941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又转载于《文艺春秋》1946年第2卷第2期。

18日 为《羽书集》作《序》，表示为了抗战，虽然把学术研究工作“完全荒废了”，但“并不引以为憾”，不过，对于文艺创作或学术研究的“自信和兴趣还没有失掉”，今后，“总能有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出现”。收《羽书集》(香港版)。

24日 作诗《浓雾垂天——贺友人结婚》。收《潮汐集·汐集》。

27日 和冯玉祥等一百五十人签名的《中国诗歌界致苏联诗人及苏联人民书》发表。载本日《新华日报》。

本月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成立，1944年9月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同月 19日，延安各界举行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肖三、丁玲在会上讲话。

十一月

4日 发表诗《报警》。载重庆《新蜀报·七天文艺》第31期。

6日 作诗《不准进攻苏联》。载1941年1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

7日 上午，和冯玉祥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出席茶会，祝贺十月革命节。同时出席茶会的还有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官员。

同日 作诗《谢〈园地〉》。收《蝴蝶集》。《园地》作者为余心清。

8日 作《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两大任务——加强国际与国内团结》。联系国际国内抗战实际，指出当前尤要“以苏联为中心去扩大”同其他民主国家的联合阵线，国内则要坚决反对分裂。载1941年11月12日《新华日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特刊》。

同日 出席中苏文协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并朗诵诗作《苏联友人歌》、《不准侵犯苏联》。

9日 和周恩来等参加文学书店开幕仪式。

12日 发表《永在的荣光——为纪念国父诞辰而作》。载本日《中央日报》。

同日 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

14日 发表为冯玉祥六十寿诞所作贺诗一首。诗云：“大树遗风在，劳谦一伟兵。普天能夔铎，四海庆耆英。战阵雄弑略；骚坛溢颂声。乾坤今报荡，不坠赖撑撑。心广涵春海，雍容积圣功。危言经叔世，太朴似童蒙。食饮箪瓢乐；戎衣大布缝。滔滔天下是，诚悦拜斯翁。”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

15日 晚，在新加坡的我国文化界人士郁达夫、胡愈之等发起举行了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的聚餐会。郁达夫、胡愈之作报告，然后，“大家立起来，为这位伟大诗人郭沫若先生干饮一杯。同时，通过了一个贺电，拍往重庆。贺电的最末两句是：‘先生永生，民族永生’！”（见报道《星州文化界庆祝郭沫若寿辰》，载1941年12月11日《新华日报》）

16日 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

为庆祝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周恩来发表文章《我要说的话》作为“代论”，刊载于本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文中，对郭沫若作了高度评价。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创作生活的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并从“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三个方面概括了他的特点。周恩来的这篇文章《人物杂志》转载时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

同日 《新华日报》出版《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董必武（诗：《郭沫若先生五十大庆》）、邓颖超（文：《为郭沫若先生创作廿五周年纪念与五秩之庆致祝》）、田汉（诗：《南山之什》）、欧阳凡海（文：《我们应该研究郭沫若先生的作品》）、绿川英子（文：《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潘梓年（文：《诗才·史学·书征气度》）、沈钧儒（诗）等所作纪念诗文，

以及苏联大使等友人的贺词。

同日 发表所作诗《步原韵却酬沈尹默》。载本日《新华日报·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题为《步原韵谢沈先生》，现收《潮汐集·汐集》，改本题。沈尹默的贺诗亦载本日《新华日报》。

同日 作七绝《赠绿川英子》。（龚佩康：《照书还喜一灯妍——郭沫若同志与绿川英子二三事》，载1979年6月17日《四川日报》。（参见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李德润、王立文：《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记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1979年1月17日《文汇报》龚佩康：《绿川英子的足迹》）

同日 下午，出席重庆文艺界在中苏文化协会为他举行庆祝诞生五十周年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大会。大会由冯玉祥任主席，周恩来等讲话，并出版了纪念特刊。大会会址中苏文协的门口，高悬着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和“以清妖孽”四个大字。冯玉祥致词说，要向郭沫若学习的，第一是他的革命精神，第二是他的忠心为国，第三是他永远和青年们在一起的“赤子之心”，永远领导着青年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老舍报告说，准备成立郭沫若文化科学研究所、设立郭沫若文学奖金、刊行郭沫若全集和选集等。黄炎培、潘公展、张申府亦致词祝贺。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言，也勉励大家“要学习郭沫若革命的热情，研究的精神与战斗的生活”。（杨庚：《诗笔灿烂的二十五年》，载1941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

同日 下午，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柳亚子、茅盾、叶灵凤、杜国庠、马鑑、邹韬奋、胡风等举行庆祝大会，报告郭沫若对中国文化科学界的贡献。

同日 下午，延安文化界集会，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凯丰、丁玲、周扬、艾思奇、肖三等出席。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香港《华商报》等报刊均发表文章，纪念郭沫若诞生五十周年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计有周扬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解放日报》）、茅盾的《为祖国珍重》（《华商报》）、宗白华的《欢欣的回忆与祝贺》（香港《星岛日报》）、乔木的《一个真实的人》（香港《大公报》）、杜国庠的《中国历史新研究的拓荒者》（香港《光明报》）等。

17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萧湘的《文化战争与文化交流》长文，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并发表夏衍等《救亡日报》同人自香港打来的贺电。

18日 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专辑，载有李初梨的文章《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认识》和艾思奇、肖三、欧阳山等人的祝词。

20日 领衔和沈钧儒等几十名中国文化界人士签署的《致苏联人民书》发表。向建国二十四周年之际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苏联人民致敬。载本日《新华日报》。

同日 历史剧《棠棣之花》开始在重庆第一次上演。这时，正是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的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重庆文艺界为了表现团结战斗的胜利，也为了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演出了《棠棣之花》。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这次演出，先后抽时间看了七次。《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赞扬这次演出。《棠棣之花》的演出活动，是进步文艺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大示威。郭沫若热情地关怀戏的排练和演出，多次亲临排演场，帮助大家理解剧本，理解人物。见1941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张瑞芳：《郭老，我们的一代宗师！》，收《悼念郭老》）。

2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郭沫若电谢港延文化界》，全文为：“香港张仲老柳亚子茅盾诸先生并转香港文化界、延安吴玉章先生转延安文化界：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

深惭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撻。郭沫若叩。”

23日 复陈布雷函并赠和诗一首致谢。这是因陈布雷等曾参与发起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活动，接连两次致函郭沫若，表示敬意，并以贺诗相赠，郭以此作答谢。（植耘：《郭沫若与陈布雷》，载《战地》1980年第4期）

24日 作诗《用原韵却酬柳亚子》。载1941年12月2日《新华日报》。收《潮汐集·汐集》。《新华日报》发表时题为《柳郭唱和诗二首》，诗前有序：“五十初度，蒙陪都、延安、桂林、香港、星岛各地文化界友人召开茶会纪念，亚子先生寓港并为诗以张其事，敬步原韵奉和，兼谢各方诸友好。”

25日 致田寿昌信。载桂林《戏剧春秋》1942年4月第1卷第6期，题为《文化之平衡的发展》。

29日 发表诗《题伍蠡甫先生山田图》。载本日重庆《新蜀报·蜀道》第538期。

30日 发表为《新华日报·中国青年反法西斯特刊》所作的题词。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

本月 《羽书集》由香港孟夏书店出版，收录抗战以来所作杂文七十余篇及序文一篇。香港被日寇占领后，书版被毁，1945年在重庆重新整理出版，篇目削减至五十余篇。

本月 18日，蒋锡金主编的《奔流新集》丛书第一辑《直入》出版，刊登鲁迅遗稿《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及许广平的《鲁迅先生对批评的态度》、楼适夷的《怀雪峰》等文。

十二月

4日 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本日闭幕，“对郭沫若文化科学研究奖金将设专门委员会扩大征集”。（见1941年12月5日《新华日报》报道）

5日 作诗《和鸳湖老人二首》。鸳湖老人乃沈鈞衡之兄。诗收《潮汐集·汐集》。

9日 作《我怎样写〈棠棣之花〉》。回顾写作、整理《棠棣之花》的经过，并详细记述有关《棠棣之花》的各种历史资料，并对历史剧的写作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载1941年12月14日《新华日报》，收《蒲剑集》。现收《沫若文集》第3卷。

15日 致瘦舟先生信。对发掘王建墓甚为关切，并对抗战时期学术空气稀薄表示感叹。原件存成都王建墓。

17日 作《世界大战的归趋》。文章具体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指出必须用持久战、消耗战、资源保卫战来对付轴心国企图实现速决战的阴谋；并估计战争发展的趋向“主要即决定于高加索地带防御战与争夺战之谁胜谁负”。本月23日在电台广播。收《今昔集》。

19日 作论文《由“墓地”走向“十字街头”》。回答黄芝冈在《评〈棠棣之花〉》中对该剧提出的批评，并解释《棠棣之花》戏剧结构上的一些问题。文中还论述了剧中歌舞场面的处理，以及聂斐这一形象的历史根据等问题。收《蒲剑集》。

21日 在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题为《屈原的艺术与思想》。考证屈原作品的真伪，论述屈原在艺术上的成就。认为屈原是我国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而且是“很有革命性的革命诗人。他的艺术是富有革命性的艺术”。载1942年1月8日、9日《中央日

报》，收《蒲剑集》。此篇即《屈原考·下篇》。

23日 《棠棣之花》(五幕历史剧)整理完毕。

同日 作《棠棣之花的故事》。收《棠棣之花》。

31日 作《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这是给《诗创作》编者的信。详细论述了中国奴隶制产生演变的过程：殷代已有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存在，西周是奴隶制时代。奴隶制的变革是在西周末年开始，春秋战国数百年间都是这个变革过程，到秦汉以后才真正完成。并认为诗剧和叙事诗，正如绘画和图案画一样，可以同时存在，“两者差不多是两绝端，然而同样是美”，可以“充分求其美妙、匀称、调和而不必求合乎现实”。载桂林《诗创作》(月刊)1942年2月20日第8期。收《今昔集》。

本月 作诗《题傅抱石画山水小幅》。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7日，星期日晨，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8日，英美对日德意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扩大。

同月 23日，国民党政府至此正式对日宣战；同日，日军进攻长沙。

冬

作诗《无题》，为关良题画，又为关良所画《黄金台》、《拾玉镯》等题诗。(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79年4月总第88期，鲁真辑：《郭沫若为关良题画辑拾》)

又 为关良所画《翠屏山》、《乌龙院·坐楼杀媳》题诗(见关良：《深切的怀念》，载《美术》(双月刊)1978年5月25日第4期)。

本年 作讲演稿《屈原考》。以大量材料证明“屈原是确有

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并对屈原作了极为崇高的评价。指出：屈原“对后世的伟大而长远的影响，实在可与希腊的荷马、意大利的但丁相媲美。他不但在中国的文学思想上有极伟大极长远的影响，就是在普通人的精神中，我们也可以找出他的影响的深刻的痕迹”。文章还详细考证了屈原的生卒年月。本文系《屈原考·上篇》，由余湛邦速记，经作者校改后定稿。收《蒲剑集》。

同年 作诗《司派狂》。司派，Spy 的音译，即间谍、侦探、特务。诗中揭露了国民党用欺骗手段，把青年训练成特务的罪行。载1946年4月1日《新华日报》。诗前有小序。收《蝴蝶集》。

同年 皖南事变后，写信给在香港的夏衍等人，庆贺他们平安脱险，要夏衍妥善安排被迫停刊的《救亡日报》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工作。信中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租界”是指文化工作委员会，“大树”是指周恩来同志。

同年 在一次日本反战同盟的集会上，他说：“自己到五十岁了。自己还得向那荆棘的路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这些话极大地感动了在座的听众。绿川英子说：郭沫若的“这些话象刀似的刺进刚受到中国神圣革命战争洗礼的盟员的内心，他们静下来，默默无言了。他那种诗人的热情的宣传，在这样一个国际的集会的场面，我实在深深感到了它的力量。”（据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为郭沫若先生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载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同年 冬，子世英生。

本年 夏衍的剧本《心防》由新知识书店出版。

一九四二年（五十一岁）

一月

2日 “晚间开始写《屈原》得五页。”（《日记》^①）

3日 “午前写《屈原》得十页左右。”（《日记》）

4日 “晚归续草《屈原》第一幕行将完成矣。”（《日记》）

5日 看石凌鹤的稿件《山城夜曲》，“整个费了一天功夫”。
（《日记》）

6日 “写完《屈原》第一幕，续写第二幕。”（《日记》）

7日 “继续写《屈原》，进行颇为顺畅。某某等络绎来，写作为之中断。”（《日记》）

晚，赴苏联大使馆参加茶会，并看影片到深夜。

8日 “上午将《屈原》第二幕草完，甚为满意。……本打算写为上下部者，将第二幕写成之后，已到最高潮，下面颇有难以为继之感。吃中饭时全剧结构在脑中浮出，决写为四幕剧，第三幕仍写屈原之桔园，在此幕中刻画宋玉、子椒、婵娟等人物。第四幕写《天问》篇中之大雷电，以此四幕而完结。得此全像，脑识颇为轻松，甚感愉快”。（《日记》）

^① 《日记》内容引自1942年1月20日作《写完〈屈原〉之后》，以下至11日所引《日记》出处皆同。

9日 “《屈原》须扩展成五幕或六幕，第四幕，写屈原出游与南后相遇，更展开南后与婵娟之斗争，但生了滞碍。创作以来第一次遇着难关，因情调难为继。”（《日记》）

10日 “第四幕困难得到解决，且颇满意。上午努力写作，竟将第四幕写成矣。”（《日记》）

下午，赴沙坪坝中大讲演。在写作《屈原》的十天中，郭沫若曾外出讲演四次，这是其中的一次。

“夜为第五幕复小生滞塞，只得早就寝。”（《日记》）

11日 “夜将《屈原》完成，全体颇为满意，全出意想之外。此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计算二日开始执笔至今，恰好十日，得原稿一二六页，……真是愉快”。（《日记》）

同日 作七律《奉祝梓年兄大衍之庆》。载1942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潮汐集·汐集》，篇名题《赠潘梓年》。

20日 作论文《写完〈屈原〉之后》。记述历史剧《屈原》酝酿和写作的经过。载1942年2月8日《中央日报》，初收《屈原》单行本，1942年3月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后收《蒲剑集》时改题《写完五幕剧〈屈原〉之后》，收入《文集》时题为《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24日 历史剧《屈原》自本日起至2月7日，在《中央日报》连载。

同日 作《亦石真正死了吗？》以真挚的感情悼念亡友钱亦石。载1942年1月27日重庆《新蜀报·十日国际》第12期《钱亦石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特刊》。收《沸羹集》。

又 作诗《题画翎毛花卉三首》，一首七绝（“天寒群鸟不闻喧”），两首五律（“普天皆冰雪”、“月季何娟娟”）。收《潮汐集·

汐集》。

26日 再致瘦舟先生信，表达了对发掘王建墓的关切和期望。原件现存成都王建墓。

本月 苏、美、英、中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一个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国家的联合宣言。

同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在根据地普遍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同月 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统一文化团体的管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林伯渠、吴玉章、周扬等为委员，吴玉章任主任。

同月 22日，女作家肖红（原名张迺莹，1911—1942）在香港病逝，著有长篇小说《生死场》等。

二 月

2日 “午前开始写信陵君”，（《日记》^①）即历史剧《虎符》。

3日 “写信陵君得十页左右。人物眉目渐由浑沌中突出。决将信陵君之母写为贤母，如姬为时代之先驱者。配以侯嬴女与朱亥女。侯女同情于善，朱女濡染于恶，厥后朱女出卖如姬。……但将安釐王写成暴君，……”（《日记》）对全剧人物作了总体设计。关于贤母，这是受了周恩来的启发。郭沫若说：“有一次周恩来先生在我家里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来写成剧本？”于是便创造了信

^① 《日记》内容引自1942年2月12日所作《〈虎符〉缘起》，以下至11日间所引《日记》内容出处皆同。

陵君的母亲这一形象。(见《〈虎符〉缘起》)

4日 上午写《信陵君》。

下午去化龙桥演讲。

夜,在枕上将《虎符》全剧结构想成熟,共分六幕。“第一幕写信陵之家。第二幕夷门外饯别。第三幕如姬父墓前求窃兵符。第四幕如姬授虎符——此幕当设于何处,尚待考虑。第五幕魏王焚信陵君之邸,朱亥女叛变,仍被戮。第六幕,如姬在父墓前自裁,须出现信陵君之幻影,由小而大。群众出场后闭幕。”(《日记》)

6日 “写第二幕完成,原拟于第三幕方写到乞窃兵符,不意即于第二幕中得到解决。于第三幕由如姬授信陵君兵符,如此则五幕即可竣事,无须写第六幕也。”(《日记》)夜,写成第二幕。

7日 写第三幕,“初以为很可容易写出,但却大费气力”,因为,想到若“如姬将虎符交出,毫无阻碍,未免过于平淡”。“欲多生波折,遂招致意外困难。”(《日记》)

8日 为写第三幕,“颇费思索”。对“如姬如何交出虎符一点,煞费苦心,终于取了一个间接的办法,由侯生转达。魏王出场之波折,却得良好之效果。一使魏王性格更加突出,二使信陵君之主张得到表现。唐雎老人之效果亦颇好。”(《日记》)

9日 “今日写第四幕为使情节复杂,亦颇费绸缪。决写成中秋日,因之遂联想到庆节的歌舞,遂将旧作《广寒宫》中之《张果老歌》及《牛郎织女歌》插入。《牛郎织女歌》改作了一遍,较旧作更为满意些。想尽力写成先乐后哀,以增加悲感。此幕写太妃较成功,欲使之代如姬承罪。唯写到如姬欲自首处,遂生障碍。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使如姬退场,而发展为第五幕之墓前自杀。——此处须斟酌,拟勿令如姬先退场,此点明晨再加考

虑……夜三时顷醒来，在枕上突然得到解决。由信陵君母劝如姬逃，由侯女作伴。拜月弹琴中，魏王来。母自承虎符为其所盗，王赐之死。朱女畏死吐实。王令人往捕侯生与如姬，捕者返，报知侯生已自刎而如姬逃，仅将侯女捕来。魏王最后杀朱女而带侯女入宫。如姬则于第五幕，在其父墓前自裁。”（《日记》）

10日 傍晚完成第四幕，决定名为《虎符》，副题为《信陵君与如姬》。全剧结尾一歌，系“于火盆之畔，用脚自敲拍子而成，实一主题歌也”。（《日记》）

11日 清晨三时左右醒来，得一新鲜观念，“使侯女生存，由唐雎领之赴邯郸，唐雎亦得交代。得‘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两句，将结尾歌词略加修改。”

午后，全剧完成。“继续写缘起，得十三页，已十一时过矣”。（《日记》）

历史剧《虎符》自2日起，至本日写毕。剧本通过信陵君和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揭露了侵略者的贪婪横暴，统治者的妥协投降和压制抗敌力量的罪恶行径，歌颂了反抗不义战争和保卫祖国的爱国志士的崇高精神。剧本载《时事新报·青光》。1942年10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2日 完成《〈虎符〉缘起》，记写作历史剧《虎符》的起因和经过，并摘录有关的历史资料。收《虎符》单行本，收《沫若文集》第3卷时题为《写作缘起》。

15日 作诗《倔强赞》。收《潮汐集·汐集》。

17日 致翦伯赞信，称赞翦来文化工作委员会讲课，为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壮气不小”。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载1978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20日 作论文《屈原思想》。论屈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侯外庐商榷。侯外庐曾作《屈原思想的秘密》一文，认为屈原的

思想有矛盾，“这一秘密是归结到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并把屈原和王国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相比拟。郭沫若同意侯所说的屈原的思想有矛盾的论断，但不同意他的具体分析。他认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王国维，他们从方法论上看，是进步而合乎科学的，但世界观都是落后保守的。屈原和他们正相反，他的“世界观是前进的、革命的，而他的方法——作为诗人在构思与遣词上的技术——却不免有些保守的倾向”，这便是“屈原思想的矛盾”。为了说明这一结论，文章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发展，认为屈原思想“很明显地是带有儒家的风貌”，而“儒家思想，在当时，由奴隶制蜕变为封建制的当时，是前进的”。文中还具体比较了屈原与王国维、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不同之处。载1942年3月9日、10日重庆《新华日报》。收《蒲剑集》。又收《屈原研究》。

27日 作《日本民族发展概况》。介绍日本民族及其文化的发生、发展的概况，论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以及近代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情况和取得成就的原因。载1942年3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同月4日、7日《新华日报》又载更正）。收《今昔集》，改名为《日本民族发展概观》。

28日 作《〈虎符〉后话》。声明自己作《虎符》时没有看过《东周列国志》，其构思也和《东周列国志》的作者不同：“我的是另外一套，不敢说比《列国志》那一套就怎么好，然而总是我自己费了心思所想出的一套。要说坏，是目无前人，要说好，或许是不落前人的窠臼吧。”收《虎符》单行本。

本月 1日，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8日，又发表《反对党八股》，由此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

三 月

8日 发表诗《神明时代的展开》。为纪念“三八”妇女节而作。期望“总有那一天，神明的时代终得展开，一切都新鲜、甘美、生动、活泼而和谐，不再有权势、贪婪、淫欲、险恶的斗争，只有的是技能的比赛和自由的爱。”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收《蜩螗集》。

17日 作诗《无题》。收《潮汐集·汐集》。

25日 会见刚从香港平安到达重庆的徐迟。

27日 接徐迟26日所写的关于谈《屈原》的信。

同日 出席纪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四周年的聚餐会。

28日 复徐迟信。在谈到徐迟所说的《屈原》与莎士比亚的《釐雅王》(即《李尔王》)“有平行”等问题时，郭沫若说，自己在写《屈原》之前不曾读过《釐雅王》，“《屈原》的雷电独白和《釐雅王》的也有一些很大的不同，便是屈原是与雷电同化了，而釐雅王依然保持着异化的地位，屈原把自然力与神鬼分化了，而釐雅王则依然浑化，屈原主持自己的坚毅，釐雅则自承衰老”。载1942年4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屈原》公演特刊”，题为《〈屈原〉与〈釐雅王〉》。收《屈原》单行本，又收《今昔集》。

本月 历史剧《屈原》由文林出版社(生活书店的化名)出版单行本，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出版物。本剧又于1948年校改于九龙，作《校后记》；1951年8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新一版；1953年校订，作《新版后记》。

本月 9日，丁玲在她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上发表《三八节有感》；接着又发表了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1日）；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12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13日、23日）；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4月8日）。王实味还在《谷雨》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以上这些作品后来曾被批判。

四 月

1日 作诗《偶成》。抒发归国抗战以来的感触。收《潮汐集·汐集》。

10日 发表史论《殷周是奴隶社会考》。载《学习生活》（月刊）第3卷第1期。

11日 作诗《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二首》。载1942年4月13日《新华日报》，题为《屈原唱和》。收《潮汐集·汐集》。黄任老即黄炎培。

同日 晚，往国泰戏院后台慰问演出《屈原》的演员们。

12日 作散文《芍药及其他》中的《芍药》、《水石》两篇。载成都《笔阵》（半月刊）1942年8月20日第4期。初收《波》。

又 作《〈蒲剑集〉序》。记《韩非子》中有关聂政、南后郑袖的史料，以补充《棠棣之花》、《屈原》两剧的本事。收《蒲剑集》。收入《沫若文集》时作了部分删改，改题为《〈蒲剑集〉后序》。

13日 作诗《和李仙根观〈屈原〉演出一首》。诗中表达了对屈原的同情，抨击了“狂狷掩中行”“百草失芬芳”的世道。李仙根的诗题为《金山力演沫若成功作〈屈原〉》。诗载桂林《半月文萃》1942年6月第1卷第2号，题为《和韵》。现收《潮汐集·汐集》。

16日 应演出《屈原》的演员们的请求作诗题赠，这些诗是：《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白杨饰南后（二首）》、《顾

而已饰楚王》、《施超饰上官大夫》、《孙坚白饰宋玉》、《饰公子子兰者》、《饰令尹子椒者》、《饰郑詹尹者》、《饰张仪者》、《饰钓者者》、《饰渔父者》、《饰更夫者》、《饰招魂老人者》、《饰仆夫者》等。其中十四首曾载于同年4月重庆《七天文艺》第59期，题为《十四绝赠演员诸友》，又录于28日致田寿昌的信中，现收《潮汐集·汐集》，篇名改为《赠〈屈原〉表演者二十一首》（原诗只有十六首）。

18日 作诗《次韵赋答真如》二首。载桂林《半月文萃》1942年6月20日第1卷第1号。现收《潮汐集·汐集》，题为《和无名氏观〈屈原〉演出后二首》，无名氏系陈铭枢。

19日 作自传《我的学生时代》。载《野草》（月刊）1942年6月15日第4卷第3期，原题《学生时代》。收《今昔集》。现收《沫若文集》第7卷。

又 作论文《历史·史剧·现实》。论历史与历史剧的区别及如何正确评价历史剧。郭沫若认为：历史是科学，历史剧则是艺术。研究历史要“力求其真实而不怕伤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实”，而创作历史剧“注重在构成而务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构成”。然而，历史剧既然以历史为题材，就“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对于重大问题的“既成的史案”，没有经过正确的研究，是不能推翻的。“但因有正确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却是一个史剧创作的主要动机”，因此，史剧家在创作之前必须认真研究历史。文章还谈到在评价历史剧时的有关各种观点，指出：不能把写“史剧”和“现实”对立起来，那种把写历史剧斥为“逃避现实”，“不敢正视现实”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现在的事实固可以称为现实，表现的真实性也正是现实。我们现在所称道的‘现实主义’无疑是指后者”。载《戏剧月报》1943年4月第1卷第4期。收《沸羹集》。

20日 作《敬致木刻工作者》。载重庆《木刻艺术》1943年12月30日第2期。收《今昔集》。

21日 到北碚复旦大学讲演。

23日 作诗《题吴碧柳手稿》。收《潮汐集·汐集》。

26日 晨，作散文《芍药及其他》中的《石池》篇。载成都《笔阵》(半月刊)1942年8月20日新4期。收《波》。

又 作《答和诗》二首，再和黄炎培观《屈原》演出。其中歌颂了高洁之士，对无耻之徒表示蔑视。载1942年5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屈原》唱和篇”，题名《郭沫若先生答和诗》。收《潮汐集·汐集》，改题为《赴璧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

27日 作五律《平生多负气》二首。和西康女子李绍朴，赠诗二首。诗前有小序，记作诗的由来并引录李绍朴的原诗。同收《潮汐集·汐集》。

28日 致田寿昌书，告以《屈原》演出成功。载桂林《戏剧春秋》(月刊)1942年7月25日第2卷第2期。

29日 作七律《三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后》。载《半月文萃》1942年7月20日第1卷第3期。收《潮汐集·汐集》。

30日 晨，作散文《芍药及其他》中的《母爱》篇。通过叙述1939年“五·三”大轰炸中遭敌机轰炸被烧死的母子三人的惨状，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载成都《笔阵》(半月刊)1942年8月20日新4期。收《波》。

又 作论文《由葛录亚想到夏完淳》。3月12日《新华日报》的《科学专页》上刊登算史氏的《算数奇才葛录亚》一文，介绍十九世纪初期法国数学家葛录亚的业迹。郭沫若由此联想到明末天才诗人夏完淳，认为与葛录亚相比，夏完淳在才气的优越，政治实践的坚苦，而且同以妙龄被杀的这些事迹上，可以说是无

独有偶。认为夏不仅能写绝好的诗文词赋，也并没有忽略了人生的实践，他的诗文，差不多篇篇都是辛酸，字字都是血泪，写出了国破家亡，种族沦夷之痛。载1942年5月5日《新华日报》，收《今昔集》。

本月 作评论《戏剧运动的展开》。载《戏剧春秋》1942年第1卷第6期。

同月 3日起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新华日报》刊出《〈屈原〉公演特刊》。在这“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上演《屈原》，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剧本中对屈原的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的歌颂及对南后等人卖国罪行的揭露，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政策。周恩来非常关心《屈原》的创作和演出。他听作者朗诵剧本，指导演员排练，观看演出，还多次提出修改意见，甚至亲自动手写剧评。4月10日，还为《屈原》演出成功在天官府设宴庆祝。《屈原》的演出轰动了整个山城，“上座之佳，空前未有”（4月4日《新华日报》）。同时，演出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陈立夫、潘公展之流亲自出马，以国民党中央文委、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名义举行规模巨大的“戏剧界同人茶会”，声称《屈原》一剧“大成问题”，“鼓吹爆炸”，“不利精诚团结”，等等，并当场下令禁演。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挑衅，郭沫若和演员们立即退场表示抗议。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禁令”，《屈原》改在北碚演出。

五月

1日 作七绝《赠朴园》。收《潮汐集·汐集》。

4日 作文艺论文《写尔所知》。收《夏孟集》，1942年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又收《佩剑集》，1943年2月文林书店出版。

5日 作五绝《听唱〈湘累曲〉四首》。收《潮汐集·汐集》。

又 为《屈原研究》写《跋》。收《屈原研究》。

6日 作散文《小麻猫的归去来》。载桂林《文化杂志》(月刊)1942年6月25日第2卷第4期。收《波》，题名《小麻猫》。

7日 作《夜和高鲁诗二首》。收《潮汐集·汐集》。

又 致翦伯赞信，谈“追悼董维键兄”事。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8日 作杂文《怀董博士维键兄》。悼亡友董维键，揭露国民党摧残人才。载1942年5月14日《新华日报》，收《沸羹集》，篇名改为《怀董维键》。

11日 复孙望信。同意武汉大学教授刘永济《屈原列传发疑》一文中关于《史记·屈原列传》中有错简的说法。《屈原列传发疑》见刘著《屈赋通笺》。复信手稿载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第79期。

又 为冯玉祥所作骑驴图题诗。诗云：“有马借人乘，有驴独自坐。骑去看梅花，板桥容易过，骑去上战场，枪炮容易躲。何必如龙始足豪，须知马大人显小，其进锐者其退速，何如进退如一慢慢跑。视死能如归，看花上阵两都好。”诗后并有题词，说：“焕章先生以名将而能诗善画，诗名妇孺皆知，而画却不轻易动笔，然其画之超脱，实有飘飘欲仙之意，观此为非杞先生所图可知也。”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列于冯玉祥《为柳非杞作骑驴图并题》之后，题作《郭沫若先生题诗》。冯诗云“许多人们好乘马，惟有此翁爱骑驴。只要铲走日本鬼，无论如何皆欢喜。”

14日 作五言古体诗《有赠》。抒写自己身处浊世不得不“退”而治学的心情，表达了“忧先天下”，“独善”其身的愿望。收

《潮汐集·汐集》。

又作诗《水牛赞》。载1942年5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收《蜩螗集》。

15日 作杂文《“深幸有一，不望有二”》。为纪念屈原而作。载1942年6月18日《新华日报》，收《屈原——五幕史剧及其他》，本年12月新华书店出版。又收《屈原研究》。

又发表《陕西新出土器铭考释》。载本日出版的重庆《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

16日 修改润色《离骚今译》。

22日 为李可染《风雨归牧图》作词《西江月·风雨归牧》。载上海《文选》(月刊)1946年4月1日第2期。现收《潮汐集·汐集》，篇名题《牧童与水牛唱和》。

23日 作散文《银杏》。载1942年5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初收《波》。现收《沫若文集》第9卷。

26日 作文艺论文《略论文学的语言》。论述小说、戏剧、诗等体裁对语言的不同要求，指出学好文学语言的途径。载重庆《文坛》1943年3月30日第4卷第2期。收《沸羹集》，题为《怎样运用文学的语言？》

同日 决定写历史剧《筑》，拟定了一个人物表和分幕表。(见6月20日作《〈筑〉序言》)

27日 在中美文化协会作《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的演讲。指出抗战以来，绝大多数文学家、艺术家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为抗战尽着自己的努力。认为中国的文艺，已改变了战前那种与现实脱节，一味摹拟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的状况，“新的艺术到这时才生了根，旧的艺术到这时才恢复了它的气息，新旧的壁垒到这时也才逐渐的化除了”。载1942年5月28、29日《新华日报》。收《今昔集》。

28日 开始写历史剧《筑》(即《高渐离》),得八页。①

29日 继续写《筑》,临睡时成《荆轲刺秦》之歌。

30日 继续写《筑》,午前得十页。午后去中苏文协作题为《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的讲演。由罗颖之速记,摘要载1942年5月31日《新华日报》,题名《郭沫若先生讲:中苏文化交流》,全文收《今昔集》。

又作《一字之师》。(《割记四则·二》)记听取演员的意见,把《屈原》第五幕中的一句台词“宋玉……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中的“是”改为“这”,改动一字,极大地增强了效果。载桂林《文学创作》(月刊)1943年1月15日第1卷第4期。收《沸羹集》,总题《瓦石割记》。

31日 草成《高渐离》的第一幕。因北碚管理局长卢子英相约游华蓥山,写作中止。晚,宿红崖嘴卢作孚(卢子英兄)之别墅。此行自本日起至下月5日归。

本月 译诗《给迷娘》(德 歌德)。收《春草集》。

本月 2日至23日,延安文艺界召开座谈会。这是文艺界的整风会议,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月 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编者在“告读者”中说:“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讨论”。

同月 29日,陕甘宁边区文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选出吴玉章、艾青、丁玲、塞克、莫文骅等十二人为委

① 见《〈筑〉序言》下篇(《沫若文集》题《剧本写作的经过》),下同。

员，实行文化人战时动员，号召大家到部队去，到民兵队伍里去，开展“文化入伍”运动。

同月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国家总动员宣传提纲”，加强文化统制，查禁进步报刊杂志。

六 月

1日 清晨，乘轮往北碚，午后抵达。

中华剧艺社的沙蒙来访，说《天国春秋》^①在北碚已上演两天，大受群众欢迎。即与沙蒙同往，看望中华剧艺社诸友，见到夏衍、陈白尘、徐迟、金山、天国等。

晚，应卢子英邀，赴餐馆晚餐，同座的有夏衍、陈鲤庭、应云卫、汉文等。席间，卢子英告知原约定同游华蓥的一批国民党官员突然回绝不去了，原因是他们对郭沫若有所忌避。于是，改变游览计划，与卢子英约定明日游合川。

饭后，和马宗融及其夫人往剧场看望《天国春秋》的演员。

2日 午后乘轮往合川。在船上遇两位青年，据云乐山盛传郭沫若已为敌人俘去，且被锯去两脚。有很多人为之流泪。

傍晚抵合川，宿水电厂，夜读《合川县志》，所记钓鱼城的故事颇为详细。

3日 游钓鱼城。作七律《钓鱼城怀古》。载1942年6月18日重庆《新蜀报·七天文艺》第63期；又录于《钓鱼城访古》一文，载《说文月刊》1942年8月15日第3卷第7期。收《今昔集》。

同日 晚，水电厂胡伯雄厂长招饮于公园餐馆，“有一些记者和特种人来打交道，执拗地问这问那，问我是一人来还是好

① 阳翰笙所作历史剧。

些人来。我觉得幼稚得很有意思。”(《钓鱼城访古》)后来，重庆的反动派闹得满城风雨，说郭沫若在北碚和合川“纠集”文化人，“图谋不轨”云云。

4日 早晨，与卢子英同至北温泉。

5日 乘轮回重庆。经过这次旅游，郭沫若曾想利用有关钓鱼城的材料写一个历史剧，为此还读了一些关于元朝的文献(《孔雀胆的故事》)，但后来没有写成。

9日 “今日开始写《高渐离》第二幕，然进行颇勉强，欲刻画秦始皇，颇不易。余人太多，如专写一人则欠平衡发展而成木偶。因此竭一日之力仅得六页，仍不甚满意。”(《日记》①)

10日 “第二幕写了十页左右，颇感濡滞，忽思将原定计划改变，将原定第二幕改为第三幕，原定第三幕改为第二幕。但筹画新第二幕之开始复极感困难，欲写赵高诱导胡亥作恶，但无这番经验，颇不容易。欲利用《韩非子》，翻阅了若干篇，仍无着落。”(《日记》)

11日 因“昨晚在枕上将呼卢喝雉想到”，原所遇到的困难迎刃而解，“今晨起开始新第二幕，进行颇速，思绪层出，写到后来生了滞塞。人物出场，换来换去，太呆板。对于家大人之处理，始终感觉着不妥帖，赵高写得颇成功，高渐离则因未写，将来恐怕连题目都要改变。落幕究竟如何落法，尚须考虑。”(《日记》)

12日 “续写第二幕，想到始皇焦急，再潜至催促，而使高渐离下场，怀清因而受骗，终幕。第一幕得完成。续前所写旧第二幕，拟改为第三幕者，所写乃登琅邪台观日出，但读去毫无意趣。且怀清夫人受污辱次日复同道登山玩水，对于女性亦视同娼妓，颇觉难安。因想到索性让怀清自尽，以显其贞洁，并衬出

① 即《剧本写作的经过》，收《筑》。

暴君之淫诈。第三幕遂决定完全从新编过，作为审判场面，场景不换。已成之十余页全弃，写来颇觉快意，午前竟得二十页左右。”“晚上写了数页，不甚惬意，遂作罢。”（《日记》）

13日 “昨晚想到以家大人与怀清作为孪生姊妹，一人双演，剧情可增加屈折。早起写作至九时半，写完第三幕，昨夜所写者废弃六页。将家大人怀清处理得极为满意。使怀贞毁容，渐离去势，如此让其合作，便不致使两人同毁，起初本拟让怀贞忍辱含垢，作为夏无且之妻，而最后出以报复，至此亦无须乎用此下策矣。”“想到把徐福写成一个假聋子，增加了剧情，因而第二幕之描写，当略加修改。昨日尚有写四幕即可完结之意，三幕完成后，仍觉非写成五幕不可。第四幕仍在同一景中，写高渐离盲目后之生活。无此一幕，则高渐离真成木偶矣。第五幕写琅邪台成，可不必延到十年之后……校读一二幕，直至深夜。”（《日记》）

14日 “午后，抱世英（刚满半岁）在手。一面吟哦，一面草成《白渠水歌》，情调颇适，大可作为《高渐离》之主题歌也。诗成后，灯下继续写作，得七页。”（《日记》）此诗曾单独抽出发表于成都《诗星》1942年8月10日第3卷第1期。

15日 “夜，将第四幕完成。”（《日记》）

16日 “写第五幕开场，颇费思索。于处理童男童女之退场入场，苦不易恰到好处。午前仅写二页，即成滞塞。……夜饭后对于第五幕之处理，始获得适可之办法”。（《日记》）

又作《〈筑〉序言》上篇。考证古筑形制及奏法。载1942年6月29日《新华日报》题名《筑》，收单行本《筑》，收入《沫若文集》时题为《关于〈筑〉》。

17日 “午后三时顷将《高渐离》完成。续写《人物研究》计得八页。”（《日记》）剧本载《戏剧春秋》1942年10月30日第2卷第4

期，1946年5月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题名为《筑》。收入《沫若文集》时，改名为《高渐离》。

又作《〈高渐离〉人物研究》。载桂林《戏剧春秋》1942年9月10日第2卷第3期，题为《“筑”的人物研究》。收单行本《筑》。

18日 “草筑之考证，成。决定名《高渐离》剧本为《筑》，虽不通俗，饶有风致”。（《日记》）

20日 作《〈筑〉序言》下篇，记述历史剧《高渐离》写作之经过。载1942年6月29日《新华日报》，题名《筑》，现收《沫若文集》，题为《剧本写作的经过》。

又作杂文《笑早者，祸哉！》。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一周年。载1942年6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收《今昔集》。

26日 为观看《屈原》演出，拂晓由千厮门乘船赴北碚。

27日 清早冒雨去剧社看望演员们。作七绝《雨》。诗云：“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意未开。敢是热情惊大士，杨枝惠洒北碚苔？”三、四两句原作“敢是抱瓶成大错”，“梅霖怒洒北碚苔”，遵程梦莲、张瑞芳的建议，作了修改。诗录于散文《雨》中，载7月12日重庆《大公报》。收《波》；又单独收于《潮汐集·汐集》。

28日 雨止转晴，《屈原》顺利地地上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后连演五场，场场客满。

本月 作《中国文艺界为苏联抗战周年致斯大林先生及全体苏联战士书》。载1942年6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题为《中国文艺界贺苏联抗战周年》。

七 月

6日 致田寿昌、浅哉书，谈《屈原》剧本中个别字句的修改问题。载《戏剧春秋》1942年10月30日第2卷第4期。

7日 发表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题词，全文为：“胜利愈接近，斗争必愈艰苦。轴心国正以决死之心求胜，民主国尤须以必胜之念决死。须于死里求生，断不可于死中苟活。中国既已经历了五年血战，领导了全世界反侵略的斗争，自当加紧团结，加紧奋斗，以争取全世界反侵略的胜利”。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

8日 作散文《雨》。记上月27日北碚演出《屈原》的情景。载1942年7月12日重庆《大公报》，又载1942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收《波》。

10日 作杂文《“娜拉的答案”》。从秋瑾革命的一生，谈妇女解放的道路。载1942年7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收《今昔集》。

13日 晨起开门，见两年前失去的一只小皮篋夹在门缝里，顿时感到：在这“人情日见凉薄的时代，竟为我启示出了这样葱茏的人性美”，深感“任你恶社会的压力是怎样的大，就是最遭了失败的人也有不能被你压碎的心。人类的前途无论怎样是有无限的光明的。”（《波·小皮篋》）

同日 作散文《钓鱼城访古》。记游合川钓鱼城的经过。文中详细记述了宋末合川元将王坚、张珏等人的事迹。载《说文月刊》1942年8月15日第3卷第7期，题名误为《钓鱼台访古》。收《今昔集》。1947年6月3日作“追记”，就题名作了说明。

又 作《〈少年维特之烦恼〉重印感言》。收《少年维特之烦恼》，本年11月重庆群众出版社出版。

又 作《南后郑袖》（《割记四则·三》）。回答某晚报的指摘，说明根据史料“南后郑袖”是一人而并非二人。载桂林《文学创作》（月刊）1943年1月15日第1卷第4期。收《沸羹集》，总题《瓦石割记》。现收《沫若文集》第3卷《〈屈原〉附录》。

14日 作小说《波》。载1942年7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波》。

同日 致葛伯赞信。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18日 分别致柳亚子、田寿昌书。均载桂林《戏剧春秋》(月刊)1942年10月30日第2卷第4期。

20日 发表《论儒家的发生》。批判胡适在《说儒》一文中关于儒为殷朝宗教的观点。载本日出版的重庆《学习生活》(月刊)第3卷第2期。收《今昔集》。

同日 作散文《小皮篋》。载1942年8月2日重庆《大公报》。收《波》。

22日 致葛伯赞信, 借阅《宋史·忠义传》、《元史·宪宗本纪》, “希望在炎热之中写成一部火烈的剧本也”。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27日 签名于《中国诗歌界致苏联诗人及苏联人民书》, 同时签名的有冯玉祥等一百五十人。载《新华日报》。

29日 作小说《月光下》。写知识分子逸鸥因贫病交迫而企图自杀, 揭露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载《人世间》(月刊)1942年10月15日第1卷第1期。收小说散文集《波》。

30日 致葛伯赞信, 谈有关钓鱼城的史料。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本月 历史剧《棠棣之花》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1954年修订, 1957年编入《沫若文集》第3卷。

本月 7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 号召团结抗战, 团结建国。

八 月

1日 作七律《感怀》。收《潮汐集·汐集》。

3日 作五言古体诗《中国有诗人》，题傅抱石所画《陶渊明象》。赞扬了屈原与陶渊明“忧先天下人”的崇高品德和不与污浊同流的高洁情操。载1942年10月11日重庆《新蜀报·蜀道》第812期。又见《题画记》，收《今昔集》。现收《潮汐集·汐集》。

4日 作五言古体诗《题傅抱石屈原巨幀》。写屈原因不得志而自尽，遂使楚国亡于暴秦的悲剧。载1942年10月11日重庆《新蜀报·蜀道》第812期。又见《题画记》，收《今昔集》。现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五言古体诗《题陶渊明沽酒图》。载1942年10月11日重庆《新蜀报·蜀道》第812期。又见《题画记》，收《今昔集》。现收《潮汐集·汐集》。

5日 作五律《抱石写龚半千与费密游诗即步半千韵题之》三首。载1942年10月11日重庆《新蜀报·蜀道》第812期。又见《题画记》，收《今昔集》。现收《潮汐集·汐集》，篇名为《题〈与尔倾杯酒〉》三首（用野遗原韵）。

又 作七绝《抱石写张鹤野石涛诗意极为沉痛即为鹤野原韵及其意以昂之》二首。载1942年10月11日重庆《新蜀报·蜀道》第812期。又见《题画记》，收《今昔集》。现收《潮汐集·汐集》，篇名《题〈张鹤野诗意画〉二首》。

6日 致书傅抱石，询问石涛唱和张鹤野诗的出处。傅即复信，并以《大涤子干净斋和诗画册》一册见示（大涤子即石涛；干净斋即张鹤野）。

同日 作散文《题画记》，记为傅抱石题画。收《今昔集》。

8日 作文艺论文《关于“接受文学遗产”》。论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认为文学的宝贵遗产总是应该接受的,诸如文字、历史、文学等等,不仅要继承中国,的也应注意吸收外国的。载《抗战文艺》1943年1月15日第8卷第3期。收《今昔集》。

12日 作词《烛影摇红》。词前有小序,说明作词以谢王昆仑。收《蝓蟾集》。

28日 在“歌德晚会”上演讲,由爱兰记录,载桂林《诗创作》(月刊)1942年11月25日第16期,题为《关于歌德》。

本月 作讲演稿《论古代社会》。介绍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及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法。收《今昔集》。

本月 诗人蒲风(1911—1942)逝世。著有诗集《七月流火》、《茫茫夜》等。

九 月

1日 作七言古体诗《气朔篇》。收《潮汐集·汐集》。

3至8日 作历史剧《孔雀胆》。剧本以元末云南梁王的女儿阿盖公主因丈夫段功被害,悲愤自杀的故事,表现了“善与恶——公与私——合与分的斗争”的主题,抨击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民族奸臣。剧本成功地塑造了阿盖公主的形象,把她作为美的化身。作者为了使剧本更完善,曾多次向朋友们朗读和听取意见,花了二十天时间进行修改。载桂林《文学创作》1943年4月1日第1卷第6期,1943年12月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0日 作《孔雀胆的故事》。记述有关阿盖公主的史料。载1942年9月28日《新华日报》。收《孔雀胆》单行本。

11日 作《祝与献》〔即致张煌书简(一)〕。收《当代作家书简》，1943年7月桂林普及出版社出版。

18日 发表散文《蚯蚓》。赞美蚯蚓默默地耕耘土地，为人类造福的精神。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波》。

同日 作七绝《题画莲》。收《潮汐集·汐集》。

19日 作诗《崇德小学校歌》。收《潮汐集·汐集》。

20日 发表《论古代文学》(讲演录)。论述先秦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并提出要总结历史教训，不要让历史再走错路，在新的时代，要有计划地创造历史。载本日出版的《学习生活》第3卷第4期。收《今昔集》。

30日 作《〈孔雀胆〉后记》。记《孔雀胆》的写作和修改过程。载桂林《野草》(月刊)1943年3月1日第5卷第3期。收《孔雀胆》单行本。

十月

6日 作《创作长假可以满期了》〔即致张煌书简(二)〕。收《当代作家书简》。1943年7月桂林普及出版社出版。

14日 作《〈孔雀胆〉故事补遗》，对《孔雀胆》有关史料加以考证。载1942年10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后于本年11月28日对内容作了增补。收《孔雀胆》单行本。

18日 作诗《第十八次“十二三”》。为纪念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将所部改称革命军、改组曹锟内阁、驱逐溥仪(宣统)出宫十八周年而作。提出应该吸取历史教训，为了使中国人民有“翻身的一天”，要“团结一致，对敌人彻底清算！”载1942年10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收《蝴蝶集》。收入《沫若文集》时篇名题《团结一致——纪念第十八次“十二三”》。

19日 发表时评《有钱最好买公债》。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

20日 作《离骚一句》(《割记四则·四》)。载桂林《文学创作》(月刊)1943年1月15日第1卷第4期。收《沸羹集》，总题《瓦石割记》。

22日 作《〈孔雀胆〉资料汇辑——昆明杨亚宁先生所提供的函件》。收《孔雀胆》单行本。

23日 为《今昔集》作《序》，说明书名的涵义。收《今昔集》。

又 作杂文《鼠乎？象乎？》从《隋书·经籍志》所载有关“冰鼠”变“象”谈起，说明主观主义的可笑及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由此批判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当时国内的反苏分子。载1942年10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又 作杂文《驴·猪·鹿·马》。从东晋孝武帝认驴为猪和赵高指鹿为马谈起，说明“消灭法西斯细菌”的重要性，否则，“一切的科学都会成为杀人的利器”。载1942年10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24日 作杂文《赵高与黑辛》。谈怎样评价赵高。认为人们如果站在秦国的立场来看赵高，赵高便是一个大坏蛋；如果从赵国报仇的观点来看，那结论又完全不一样了。这一观点，系受章太炎诗作的启发。前此，郭曾和柳亚子在信中讨论过章诗的有关内容。1947年8月14日又作《附记》，订正文中对“黑辛”的解释。“‘黑辛’是人名，是清朝的一位宦官，与李莲英约略同时。”载1942年10月31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25日 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留乡的朋友们约二十余人同游飞雪崖，并在崖边观看南宋及清代的题壁。晚，作散文《飞雪崖》，记述白天游览飞雪崖的情景。载1942年11月29日重庆《大公报·战线》，本年11月13日又作《补记》附于文后。收《波》。

27日 作《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答客难》。载桂林《文化杂志》1943年1月10日第3卷第3号。收《先秦学说述林》。

28日 作杂文《一样是伟大》。载1942年1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29日 作《赞天地之化育——纪念中国助产士协会成立一周年》。收《沸羹集》。

30日 作杂文《“绿”》。以王安石《泊船瓜州》中“春风又绿江南岸”句为例，说明文艺作品“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达到好处”。载1942年11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30日、31日 作散文《丁东草》三章（《丁东》、《白鹭》、《石榴》）。载广州《文艺生活》1943年2月15日第3卷第4期。收《波》。

本月 历史剧《虎符》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1946年6月上海群益出版社第一版；1948年、1956年曾先后两次修改，并作“校后记”、“校后记之二”。1957年按修订本编入《沫若文集》第3卷。

本月 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重庆《新华日报》连载苏联电影文学剧本《列宁在十月》并发表耐芳（夏衍）的《苏联电影与世界》一文，介绍苏联电影的成就。

同月 于伶的剧本《长夜行》由新知书店出版，作品描写上海的爱国知识分子与敌伪作斗争的故事。

同月 14日，全国木刻展览在重庆展出，解放区的木刻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注意。徐悲鸿于10月18日在《新民报》上著文称赞古元的木刻，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他的《割草》，“可称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对解放区其他作家的作品也很赞赏。

同月 张道藩在本月出版的《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上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提出文艺要表现“民族意识”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所谓“八德”。后来梁实秋也发表了《关于“文艺政策”》，应和张道藩。叶以群等作《关于文学与人性》等文予以批判。

十一月

4日 作《杜鹃与道学——读梁任公〈王安石评传〉有感》。载重庆《学习生活》1943年1月1日第4卷第1期。

16日 希夷（即叶挺）夫人带女儿扬眉来赖家桥寓所访问，赠郭沫若以希夷手制的“文虎章”一枚，作为祝贺他五十寿辰的礼物。“文虎章”是用香烟罐的圆纸片制成的，正面用钢笔横书“文虎章”三字，周围环绕着“寿强肖伯纳，骏逸人中龙”十个字。背面写着“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章上，希夷夫人用红丝线订上了佩绶，并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实在是使我怀着深厚的谢意和感激。我感激得潸着了眼泪”。（《叶挺将军的诗》，见《沫若文集》第13卷）

19日 致翦伯赞信。祝贺翦伯赞将要完成《中国史纲》（一、二卷）的写作。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23日 作杂文《无题》。谈自己虽年过五十，但仍“感觉着一切都还年青”。收《沸羹集》。

本月 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者扉语》。载《少年维特之烦恼》，本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

本月 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反攻入侵之德军。

同月 罗果夫主编的《苏联文艺》在上海创刊。

同月 茅盾的散文集《白杨礼赞》由新新出版社出版，收散文十八篇。

十二月

5日 致翦伯赞信，说《孔雀胆》一稿之成“您是助产士”。（参见翦伯赞：《关于〈孔雀胆〉》，载1942年12月31日重庆《新华日报》）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5日、6日 发表文艺论文《屈原·招魂·天问·九歌》。答复陆侃如的批评。陆侃如在《文化先锋》（周刊）第1卷第9期上发表《西园读书记》一则，对郭沫若《蒲剑集》中关于屈原的生卒年月和《招魂》、《天问》、《九歌》的作者问题的结论表示怀疑。郭沫若作此文予以答复，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载《新华日报》。收《今昔集》。

6日 作散文《追怀博多》。记九州帝大所在地博多湾的景色。收《沸羹集》。

9日 作五言诗《吊友》。悼念革命烈士孙炳文（孙维世的父亲）。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五律《题峡船图》。收《潮汐集·汐集》。

12日 作论文《文艺的本质》。指出：“文艺的本质是斗争，是对自然界（人包含在内）暴力的斗争，因此文艺是武器”；而反动派的“文艺”，只不过是“暴力的化身”。因此，“我们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载桂林《艺丛》（月刊）1943年5月创刊号。收《沸羹集》。

又 作古体诗《丹娘魂》。歌颂苏联女英雄卓娅。收《潮汐集·汐集》。

13日 作散文《〈飞雪崖〉补记》。收《波》。

14日 作七言诗《王暉石棺题咏之一》，诗前有小序。王暉，东汉时人，墓在芦山东城，时经人发掘，郭沫若曾作检视。载1946年4月10日上海《大晚报·剪影》。收《潮汐集·汐集》，篇名题《咏王暉石棺》。

15日 作七言诗《题王暉棺玄武象》。收《潮汐集·汐集》。

31日 为“洪深先生五十寿”所写题辞发表。全文为：“洪深先生中西共治，新旧兼融，著作六十余种而犹孜孜不息，实我国文化界杰出之人才。其所以能致此者，身体健康，精神开放，思想自由，生活坚实也。凡此均足以供吾人效法。”同时具名的作者尚有沈钧儒等。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

本月 作《新年献词》。对文艺界提出希望，要求在新的一年里，“诗歌和戏剧应该加紧战斗下去，但小说和批评不可再冷落了。”载《文学创作》（月刊）1943年1月15日第1卷第4期。现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艺史料选辑》，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同月 《屈原——五幕史剧及其他》由新华书店出版。收《屈原——五幕史剧》、《屈原思想及其他》等。

本月 宋之的的剧本《雾重庆》在重庆出版。

同月 曹禺改编巴金的《家》为话剧。

同月 党领导下的进步话剧团体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成立，该社后来陆续演出《祖国在呼唤》、《家》、《戏剧春秋》、《春寒》、《清明前后》、《岁寒图》等剧，1946年迁至上海与上海剧艺社合并。

冬

作诗《题〈白水滩〉》。为关良的京剧人物画题诗，称赞他的

画“比戏更好看”。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总第88期《郭沫若为关良题画辑拾》(鲁真辑)。

又 作七绝《题〈打渔杀家〉》，为关良的画题诗。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总第88期《郭沫若为关良题画辑拾》(鲁真辑)。

本年 作词《满江红》。鲁实先将其近作驳日本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的《驳议》一书寄赠郭沫若，郭赋《满江红》一首赠之，称赞他的文才史识。收《蝴蝶集》。

同年 闻周谷城到达重庆，特邀他为几个年轻的同志作报告。周回忆说：“这时他(指郭沫若)已看见过拙著《中国通史》，已知我对中国古史的分期与他的完全不同，他却毫不介意。”(周谷城：《怀念郭老》，见《悼念郭老》)

同年 应文艺工作者李门的要求，为他题字。书曰：“勇气与专精，是成功的最大要素。对客观事物，必须用尽全力以处理之，未能称意，死不罢手，天下实无难事”。(见李门：《泰山之神永生》，收《悼念郭老》)

本年 年底，由胡丹佛执笔的独幕剧《把眼光放远一点》写成，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在话剧创作上最早出现的优秀作品之一。

一九四三年(五十二岁)

一月

6日 发表诗《人类解放的曙光》。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的新战果而欢呼。载本日《新华日报》；本月27日《解放日报》转载。

8日 作《献给现实的蟠桃——为〈虎符〉演出而写》。从自己写作《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等剧说明对历史剧的看法。收《沸羹集》。

15日 作《序洪深著〈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论述了诗歌、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过程，指出研究念词和朗诵的重要性。载1943年8月10日《新华日报》。收《沸羹集》，篇名题《序〈念词与朗诵〉》。《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一书，1946年11月上海大陆书屋出版。

又 作七律《祝新华五周年》二首。歌颂《新华日报》作为“民人”的“喉舌”，代表人民说话，以及“扫荡妖氛”的功绩。载1943年1月18日《新华日报》。收《潮汐集·汐集》，篇名题《祝〈新华日报〉五周年》。

17日 作五言诗《题敦煌画展》。收《潮汐集·汐集》。

23日 作《〈孔雀胆〉的润色》。谈《孔雀胆》的修改。《孔雀胆》演出后，徐飞在《〈孔雀胆〉演出之后》一文中说：“造成这个历

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郭沫若同意这一观点，说“徐飞先生替我点醒了主题”，“这就好象画龙点睛一样，把当时的历史点活了”。为了强调段功是个妥协主义者，在修改时，给第三幕加了一场。载1943年2月11日《新华日报》，收《孔雀胆》单行本。

28日 作论文《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提倡战士们从事文学创作。收《沸羹集》。

二 月

1日 作杂文《争取历史创造的主动》。要求实质上的平等、自由。载1943年2月5日《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又 作论文《本质的文学》。提倡创作、翻译儿童文学，认为儿童文学应该“能够表达儿童心理，创造儿童的世界”，这样的文学才是“很纯很美的文学”。收《沸羹集》。

同日 致戈宝权信。（见《上海文艺》1978年8月第8期戈宝权：《忆郭老》）

13日 作杂文《忆成都》。收《沸羹集》。

15日 作杂文《死的拖着活的》。为汤肇虞教授因科学研究而发掘公墓，竟被提起公诉一事而作。指出：为了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提倡科学、发展医学，“决不能再让死的老是把活着的拖着”。载1943年2月19日《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23日 发表诗《颂苏联红军》。为苏军斯大林格勒大捷而作。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收《蜩螗集》。

24日 作杂文《人做诗与诗做人》。记为夏衍等人改诗的经过，并论改诗和作诗。载1943年2月26日《新华日报》。收《沸羹

集》。

26日 作《序〈祖国之恋〉》。称赞史东山的谦逊态度，说他是“把专家的习气完全破除了”。载1943年10月17日重庆《大公报·战线》，收《祖国之恋》（9月重庆当今出版社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祖国之恋》系史东山所作的电影剧本，1946年上海明华出版社重印出版时改名为《还我故乡》。

本月初，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全歼德军三十三万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使苏德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同月 春节，延安举行盛大的秧歌活动，鲁艺、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等专业文艺团体和群众业余剧团参加演出，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群众热烈欢迎这种“新秧歌”。其中，鲁艺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是延安文艺整风后产生的第一个优秀剧目。

三 月

8日 作论文《论读经》。表示自己不反对读经，但不希望青年人读经，而希望成年人，尤其是那些提倡读经的人认真读经。载重庆《学习生活》1943年5月1日第4卷第5期。收《沸羹集》。

10日 作论文《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回顾“五四”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新文艺的发展过程；批判“文艺与抗战无关”、“反对作家从政”、“文艺的贫困”等错误观点。载1943年3月27日《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11日 作《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论述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载1943年3月27日《抗战文艺

·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收《沸羹集》。

12日 作七律《黄山探梅》四首。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五言诗《求仁得仁者》。咏云南某女医生在霍乱防疫中殉职的事迹。现收《潮汐集·汐集》。

14日 作四言诗《铭张天虚墓》，赞张天虚和聂耳。收《潮汐集·汐集》。

15日 开始写史剧《南冠草》。至17日第一幕成。^①又作七绝《游特园》六首。收《潮汐集·汐集》。

18日、19日 草《南冠草》第二幕。

20日 续草《南冠草》第二幕。

又 应鹿瑞伯六十大庆之邀，往鲜园赴宴。

21日 作《题李可染画》二首，一为《东坡游赤壁图》（五言诗），一为《村景》（五律）。收《潮汐集·汐集》。

同日 构思《南冠草》第三幕。

22日 始草《南冠草》第三幕。

同日 作论文《沿着进化的路向前进——纪念文协五周年》。肯定文协成立五年来的成就，希望今后“不仅要保持团结，扩大团结，而且要讲求团结的致密化与合理化。”收《沸羹集》。

23日 续草《南冠草》第三幕。“伯赞来访，将全剧结构为之详谈，颇表同感。”

25日、26日 改作、续写《南冠草》。

27日 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

29日 《南冠草》第四幕草成。

30日 作五律《咏水仙》。现收《潮汐集·汐集》。

31日 修改《南冠草》。

① 据《〈南冠草〉日记》，以下有关该剧写作过程出处同。

本月 为张天虚作墓志铭，赞扬他为国为民辛劳早歿的精神。（见马仲明：《张天虚传略》，载《边疆文艺》1979年第10期）

本月 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集文艺界的党员五十余人开会。会上，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李卓然讲了话，号召大家认真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到群众中去。《解放日报》报道了会议消息，并发表了凯丰和陈云的讲话。

同月 22日，《解放日报》报道中央文委开会确定戏剧运动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总方针，参加会议的有文委委员和徐特立、吴玉章、李卓然、肖向荣等同志。中央文委决定成立戏剧工作委员会，由周扬、柯仲平、张庚、王震之、仲敬之组成。

同月 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正式出版。这本书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也是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四 月

1日 历史剧《南冠草》脱稿。通过明末爱国诗人夏完淳与满清统治者及汉奸洪承畴的斗争，热情地歌颂了夏完淳不屈不挠、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有力地批判了洪承畴认贼作父充当汉奸的卖国罪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主题，寄托了作者对抗日英雄的歌颂和对国民党顽固派及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诅咒。1944年3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初版书名页题《金风剪玉衣》。

同日 作五言诗《山容》。收《潮汐集·汐集》。

12日 为报载有人“用出版《沫若全集》名义，画画募捐”一事^①，声明：“事前全未得本人同意”。载1943年4月13日《新华日报》。题名《来函照登》。

16日 作论文《夏完淳之家庭师友及其殉国前后》。依据大量原始材料，论述夏完淳的生平事迹。载《中原》1943年9月第1卷第2期。收《南冠草》，1943年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篇名题《〈南冠草〉后记》；现收《沫若文集》第4卷，篇名题《夏完淳》。

23日 作《题人物画二首》，一为《司马相如对卓文君弹琴图》，一为《仿刘松年群仙图》。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发出指示，提出京剧改革的问题。

同月 国民党公布《非常时期报社通讯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以摧残文化事业。

五 月

8日 为《中原》杂志作《编者的话》。说明杂志的编辑原则是：只要合乎以文艺为中心、能于读者多少有一些好处，不管是创作、翻译，还是评论，都一律欢迎。但那种“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或“带有些那样的气息”的，则“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载《中原》月刊1943年6月创刊号。该杂志由郭沫若主编，本年6月创刊出版，第1卷出四期，第

^① 4月11日《新华日报》《北碚近讯》栏一短讯载：“名画家张悲鹭教授日前来此间售画，为《郭沫若全集》募集出版费，当地士绅订购者异常踊跃……”

2卷出二期，1945年5月停刊。

11日 作杂文《命·力·才》。认为人力固然可以影响后天的成就，但由于科学的发达，也可以影响先天的才质。载1943年5月13日《新华日报》。收《沸羹集》，篇名题《才·力·命》。

17日 作七绝《题延光砖五首》。1940年4月21日在嘉陵江北岸发现“延光四年”造的汉墓，因作诗咏之。收《潮汐集·汐集》。诗后有《附记》。

19日 作七言古体诗《亚子先生五十晋七诗以寿之》。高度评价柳亚子在近代革命史和文化史上的成就，并把柳亚子同民族义士夏完淳相比，并说献上历史剧《夏完淳》剧本以祝寿。全诗载1943年5月28日《新华日报》。又见《柳亚子诗词选·序》；收《潮汐集·汐集》时篇名题《寿柳亚子先生》。柳亚子于同年6月8日作诗和之，柳诗见《柳亚子诗词选》，题为《次韵答沫若六月八日作》。

22日 作七律《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沉重地抒发了自己退而著述、无法实现报国救民的宏愿的内疚心情，透露了对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的不满。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22日，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鉴于各国共产党已日趋成熟，公布建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同月 赵树理创作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创作上的新成果，本年9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此后，陆续写出了《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中、长篇小说。

同月 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 月

2日 作七绝《题风景画二首》（“杨柳青青古渡头”、“造化分明是画师”）。收《潮汐集·汐集》。

6日 作诗《孔丘》。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诗《白杨来》。收《潮汐集·汐集》。

7日 发表诗《鞋袜劳军》。要求后方人民“多送些布的鞋子和袜子”，支援前方将士抗日。载本日《新华日报》。

7日 作诗《猪与石》，包括《猪颂》、《石颂》二首。载《诗刊》1958年11月第11期。

18日 作七言诗《灯台守》。颂赞在黑暗中引人航向的灯塔，坚信和平必将战胜战争，“早迟武士化民主”，连日本国土也会成为和平生活的地方。现收《潮汐集·汐集》。

29日 作杂文《由人类血型说到战后世界》。载《东方杂志》1943年8月15日第39卷第11号。

又 作诗《咏月八首》。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在上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蒋介石嗾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冒“民众团体”的名义，召开座谈会，通过电文，胡说“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刊布这一消息，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下“讨伐令”。与此同时，国民党调动四五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并多次进行挑衅进攻。

夏

参加周恩来召开的文化界人士的会议，讨论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会议在重庆通运门的天官府街郭沫若寓所举行，出席的有各剧团的负责人与主要编导，以及书店出版界人士，“讨论对反动派查禁一百多种书和剧本的抗议活动，周副主席详细地听了各剧团在下一个雾季中准备演出的剧本与题材之后，作了周详的指示”。

当时郭沫若的家，如同红岩（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五十号（周恩来住所），化龙桥《新华日报》社一样，是革命者经常聚会的地方，大家称这些地方是“我们的解放区”。（均据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收《悼念郭老》）

七 月

3日 作五言诗《反七步诗》。载1944年3月《中原》第1卷第3期，收《历史人物》。后将此诗抽出，收《潮汐集·汐集》。

7日 作论文《论曹植》。对历史上种种“抑丕扬植”的论点作了具体剖析，提出不同意见。载《中原》1944年3月第1卷第3期。收《历史人物》。

9日 嘱陈北鸥转赠黄炎培《南冠草》剧本油印本一件。（见肖斌如、丁言昭：《〈南冠草〉的演出本》，载《战地》增刊1979年第3期）

18日 作七绝《原来寿母是同乡》四首。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屈原研究》（校改本）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新著

论文《屈原思想》编入书后附《跋》。1952年编入《历史人物》，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八 月

6日 作论文《墨子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墨子的思想，认为“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并指出墨家很快消亡的原因：一是“由于墨家后学多数逃入了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二是“由于墨家后学过分接近了王公大人物而失掉了人民大众的基础”。本文是郭沫若“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是应《群众》杂志之请，化了两天功夫写成的。（据戈宝权：《忆郭老》，见《悼念郭老》）。文载《群众》1943年9月16日第8卷第15期，初收《先秦学说述林》。又收《青铜时代》。

14日 作杂文《关于吴起》。载1943年9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七天文艺》。

19日 夏衍来，谈《墨子的思想》发表事。

20日 致翦伯赞信。告以《中原》杂志因遭当局干扰迫害，“二期以后无望再出，已奉命停刊”。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5期。

22日 发表时评《大家来做伤兵之友》。载本日《新华日报》。

29日 作论文《秦楚之际的儒者》。考察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儒的动向。载《中苏文化》1944年第15卷第2期。收《青铜时代》。

又 为程道清著《标点使用法》作《序》，题为《正标点》。提倡重视文章的标点。收《沸羹集》。

本月 桂林国民党政府封闭《文学月报》、《音乐与艺术》等刊物。9月又查封《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月刊》等杂志。

九 月

2日 致翦伯赞信。寄去最近写的《墨子的思想》的补充，即《秦楚之际的儒者》一文，请转交侯外庐主编之《中苏文化》月刊。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4日至5日 作论文《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考证公孙尼子其人，并论述他的音乐理论。8日，又为本文作《追记》一篇。二文均载重庆《群众》周刊本年10月16日第8卷第17期。收《青铜时代》；又收《先秦学说述林》。

11日 作论文《追吴起》。详细论述吴起的生平、思想及其事迹。认为吴起是中国历史上永不磨灭的人物，与商鞅、孙武相比，他的品格是最高的。载《东方杂志》1944年1月15日第40卷第1号，初收《青铜时代》。

本月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宣布投降。

十 月

3日 作论文《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毕。本文9月25日开始写作，至今日完稿。载重庆《群众》周刊1943年12月1日、16日第8卷第20、21期合刊及第22期。初收《先秦学说述林》，收《沫若文集》第15卷时篇名题《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10日 开始读《韩非子》。（据戈宝权：《忆郭老》，见《悼念郭老》）

17日 星期日，应约访傅抱石。途遇杜守素(国庠)，邀之同往。“抱石寓金刚坡下，乃一农家古屋，四周竹丛稠密，颇饶幽趣。展示所作画多幅，意思渐就豁然。更蒙赠《桐阴读画图》一帧”(《日记》，转引自1944年作《十月十七日》一文)，画上有傅抱石亲笔题字以为纪念。午，抱石夫人时慧备酒菜招待，于立群偕子女也来，至午后三时，才怡然辞归。

28日 作七言诗《题良庄图》。良庄，是沈钧儒在重庆的寓所。诗中赞扬了沈钧儒“热心救国劳呼倡”“梦为营长驱方良”的精神。收《潮汐集·汐集》

29日 作古体诗《吊姜爱林》。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七律《题梅怪画梅残幅》。收《潮汐集·汐集》。

30日 作杂文《啼笑皆是》。讽刺林语堂。载1943年11月2日《新华日报》；又载1943年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收《沸羹集》。

本月 《今昔集》由重庆东方书社出版，列入《东方文艺丛书之四》。本集收杂文、散文等二十余篇。1947年7月，与《蒲剑集》合辑，书名《今昔蒲剑》，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十一月

4日 民英生。

8日 致翦伯赞信。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12日 整理《〈南冠草〉日记》(3月15日—4月1日)，说“此剧费时最多，改而又改，向所未有。”载1945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

本月 22日至26日，中、美、英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发表《开罗宣言》。

同月 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载11月8日《解放日报》），决定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向。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十二月

6日 作诗《奸雄的歌唱完了》。载1944年2月6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8日 作论文《〈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通过详细考证，就《韩非子·初见秦篇》一文作者的姓名提出新见解。认为该文既不是韩非所作，也不是张仪、范雎、蔡泽所作，它的作者应该是吕不韦。载重庆《说文月刊》1944年5月合订本《吴稚晖先生八十大寿纪念专号》。收《青铜时代》。

10日 作五律《看〈南冠草〉演出后》。收《潮汐集·汐集》。

18日 作七律《题巫峡图》。现收《潮汐集·汐集》。

19日 作五律《题沈衡老像》。沈衡老即沈钧儒（衡山）。收《潮汐集·汐集》。

21日 出席重庆各界为庆祝沈钧儒七十寿辰而举行的集会，并在会上讲话。（据陆诒《怀念董老》，见1980年3月5日《解放日报》）

29日 作七律《次田寿昌韵寄赠》（“别后江城万事非”）。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作《元旦献词》。载桂林《当代文艺》1944年1月1日创刊号。

同月 四幕历史剧《孔雀胆》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内收《〈孔雀胆〉的故事》等附录五篇。本书于1948年校订，1956年再一次修订。

本月 11月28日至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德黑兰举行会议。

本年 曾出席陶行知主持召开的一个武训纪念会，并应邀在会上讲话。

同年 为黄炎培所著《民主化的机关管理》一书作《序》。见1943年5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主化的机关管理》。

同年 作诗《题“特园”》。收《沫若文集》第13卷（又见1979年1月14日香港《大公报》鲜继根：《敬爱的周总理在重庆“特园”》）。

同年 五幕历史剧《南冠草》由群益出版社出版，附录内收论文《夏完淳》；1948年修订，附录内增加《侯玄涵〈夏允彝传〉》一文；1956年再次改订。

本年 孟超编的《艺丛》月刊在桂林出版；柳无忌编的《世界文学》月刊在长沙出版，柯灵编的《万象》月刊在上海出版。

同年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训令”各级有关机构，自明年1月起“应将辖区所出版之戏剧方面图书、杂志、报刊所刊剧人消息或论文，包括剧情说明书、演出广告等项，广为搜集”，每月汇报，强化文化统制。

一九四四年(五十三岁)

一月

1日 作《题赠董老画二绝》。为朗珂画题诗,祝贺董必武六十寿辰。收《潮汐集·汐集》。

5日 发表七言诗《董老行——祝董老六十寿辰》。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收《蛭螭集》。

同日 为诗集《凤凰》作《序》。谈自己学诗的经过和对诗歌的看法。认为“旧诗是镣铐,新诗也是镣铐”,除非有“真诚的力感来突破一切的藩篱”,否则就很难把诗写好。表示要“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我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认为自己的有些“诗”,都是“包含有分行写出来的散文或韵文”,而“好些剧本或小说或论述,倒有些确实是诗”。收《凤凰》。又收《沸羹集》。现收《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篇名题《序我的诗——有人要把我以前的诗集来翻印,我便写了这样的一篇序》。

12日至20日 作论文《韩非子的批判》。探究了韩非思想的渊源,指出他实质是个“法术家”,“推重权势的结果流而为专制独裁”。载上海《新文化》(半月刊)1945年11月16日至1946年2月16日第1卷第3期至第9期。收《先秦学说述林》,题作《韩非子的思想》。又收《十批判书》。

本月 9日，毛泽东在延安看了京剧《逼上梁山》后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贺信，其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此种工作。”（参见本谱本年12月条）

同月 桂林出版的《野草》、《戏剧生活》等刊物，被国民党政府查禁。

二 月

8日 作《人乎，人乎，魂兮归来！——题〈浮士德〉新版》。这是为《浮士德》第一部东南版所写的序文。认为“个性不能消泯，亦不能偏废，但须立一标的，以定其趋向。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话虽说旧，理却近真”。企望德国民族从法西斯主义下解放出来。载1944年4月8日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联合周报》。收《浮士德》上卷。又收《沸羹集》，副标题为《新版〈浮士德〉题辞》。1947年7月28日，郭沫若在《消暑两则》一文中曾谈及此文，见《天地玄黄》。

又 致翦伯赞信，询问明末李岩的事迹为写作《甲申三百年祭》作准备。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学版）1978年第3期。

10日 作杂文《“五十以学”答问》。谈对“五十以学”一句的理解，提倡“活到老、学到老”，并指出林语堂对该句的误解。载1944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12日 作文艺评论《戏剧与民众》。提倡戏剧应为民众服务，走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现实主义的路；批评剧坛上流行的为艺

术而艺术的不良倾向。载1944年2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17日 作论文《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从《噫嘻》、《臣工》等诗中所反映的内容看周代社会，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井田制是存在过的”，但应是十进位的百分田法，而不是孟子所说的“八家共井”。载《中原》1944年9月第1卷第4期。收《先秦学说述林》。

20日 作《〈先秦学说述林〉后叙》。收《先秦学说述林》，后收入《青铜时代》时改为《后记》。

24日 作七绝《帝子二绝》。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发表《民主与文艺》一文。载《民主文艺》新1卷第6期。

本月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桂林举行，有三十三个戏剧团体参加，历时九十天，对团结戏剧工作者坚持进步的戏剧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月 23日，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的八个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演出的节目有《红军万岁》、《冯光琪锄奸》、《牛永贵挂彩》、《动员起来》、《红军大反攻》、《刘连长开荒》、《女状元》、《刘海生转变》等，这是文艺座谈会后，延安文艺运动新方向的一次检阅。演出时，中央负责同志大多前往观看。

三 月

3日 致戈宝权信（见戈宝权：《谈郭老写的〈十批判书〉有关的几封信》，《社会科学战线》增刊，1978年12月）。

10日 作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毕。为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作。文章总结历史经验，告诫

革命者永远不能骄傲，胜利后仍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同时，文章还通过论述崇祯的覆灭，预示了蒋介石的政权必然灭亡。文章脱稿后，郭沫若经过几天修改，把稿件送交当时在重庆的董必武同志审阅，第三天（3月19日）即在《新华日报》上开始连载，至22日全部载完。文章一发表，国民党惊慌失措，指责这篇东西是“影射当局”。3月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竟专门发表了一篇陶希圣写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诬蔑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是“流寇”，攻击郭沫若的文章是“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4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提到这篇文章，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本文于1944年4月18、19日由延安《解放日报》转载；文前编者加了按语；同年延安出版单行本；又，1945年10月由上海野草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明末亡国史》，副题为《甲申三百年祭》。

13日 作七绝《咏秦良玉》四首。收《潮汐集·汐集》。

16日 作七绝《题幼女图》。收《潮汐集·汐集》。

25日 作《两次哭先生》，悼念张一馨。载本年4月18日《新华日报》，收《沸羹集》。张一馨曾做过袁世凯的秘书长，但他坚决反对袁称帝，并和袁决裂。抗战发生后，张一馨积极参加抗战，倡议组织“老子军”。张还热心推行新文字，赞成文字改革。郭沫若在1937年“八·一三”战役期间曾去苏州访问过他。（《洪波曲》）。

28日 作论文《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谈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认为，要成为一个诗人或艺术家，第一，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以指导自己的生活；第二，必须有多方面的知识 and 体验，对现实社会或有关文献有透彻的研究；第三，言

语文字必须熟练，力求大众化、近代化、明确化、精洁化；第四，要“多读文艺方面的书，近代的欧洲大家的作品是好的模范，必须能多读或采一二种精读”；第五，趁年青时多作各种准备，“多写作、多改润、多请教、少发表，不要汲汲于想成名。”载1944年4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怎样自我学习》，1944年《新华日报》编印，1945年青年生活社出版；又收《沸羹集》。

30日 作七言诗《题画虎》。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发表《〈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编者按后案》。载《中原》(半月刊)1944年3月第1卷第3期。《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作者为陈贵兼。

同月 为臧克家写条幅，内容为：“生命乃完成人生幸福之工具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欲求人生幸福之完成，必须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均实实具足，以文艺为旗帜者，尤须致力于此。内在生活，殖根欲深，外在生活，布枝欲广；根不深，则不固，枝不广，则不闳，磐磐大树，挺然独立，吾企仰之。”(臧克家《以文艺为旗帜者》，收《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79年第4辑)

本月 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起对正面战场的新进攻，国民党军队望风溃逃，八个月中，日寇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分和贵州的一部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斗争日益活跃，纷纷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

同月 陈白尘创作剧本《岁寒图》，8月修改，翌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

春

在赖家桥寓所会见来自延安的刘白羽和何其芳，听取有关

延安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介绍。根据刘白羽、何其芳转达的周恩来副主席的意见，为他们在重庆开展工作，作了具体安排。第二天，郭沫若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由刘、何向文艺界人士作传达。后来，又在城内天官府街寓所，多次举行集会。（刘白羽：《雷电颂——怀念郭沫若同志》，收《悼念郭老》）。

四 月

1日 作五言诗《赠舒舍予》，祝贺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收《潮汐集·汐集》。

2日 作讲演《诗歌底创作》。载《文学》1944年第2卷第3、4、5期。

5日 作散文《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收《沸羹集》。

6日 作七绝《忆嘉州》。收《潮汐集·汐集》。

10日 作五言诗《拟屈原答渔父辞》。写屈原不愿超然出世，而是执着于现实生活的态度。收《潮汐集·汐集》。

17日 下午和邵力子、黄炎培等参加文艺界祝贺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盛会。

同日 发表诗《文章入冠——祝老舍先生创作生活廿年》。载本日《新华日报》；又载《抗战文艺》1944年9月第9卷第3、4期合刊。

20日 夜，费德林来，托还翦伯赞《中国史纲》并约翦往苏联使馆讲学。

21日 致翦伯赞信，告知昨日费德林来访情形，并为《中原》杂志约稿。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同日 有农民发掘墓址，得古砖两种，一种有“富贵”二字。郭沫若连夜拓墨，并挥毫写了五言咏砖诗一首（《题富贵砖拓

墨》),表现了鄙弃荣华富贵,潜心钻研学术的精神。(全诗见《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

又作《答国际友人①的一封信》。谈有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问题。载1944年7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时篇名题《答费正清博士》。

本月 8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为配合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书辑选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的有关文艺理论和意见。

五 月

1日 为小说《不朽的人民》(苏联 瓦西里·葛罗士曼)作《序》。指出人民的力量是不朽的,谁得到人民的力量便会胜利,谁失掉人民的力量便会失败。反映人民利益的文艺,必然会得到人民的保护和爱惜。载1944年5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收《不朽的人民》,1945年12月上海正风出版社出版;又收《沸羹集》。

4日 作七律《题天发神讖碑》。天发神讖碑,即吴主孙皓天玺纪功碑。收《潮汐集·汐集》。

10日 屈楚、林辰来访。林辰谈起三十年代郭沫若寓居日本时所作的一首诗的首四句,(即“信美非吾土”诗)但后四句却一

① 国际友人,即费正清,美国人,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抗战时在重庆任美国新闻处处长,同郭沫若有往来。

时想不起来。晚，与立群往剧场观看路曦演的《不夜天》。继续思索那首诗，终于记起了全诗。（参见本谱1935年初夏条）即作散文《影子》。写回忆“信美非吾土”一诗的经过。载1944年5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波》。

19日 作杂文《新陈代谢》。谈如何正确对待文化遗产。认为接受文化遗产的主要方针，应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为准则，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便“应该阐扬”，反之“便要扫荡”，经过“谢陈代新”，使文化得以发展。载《群众》1944年9月第9卷第18期。收《沸羹集》。

21日 作七言诗《观〈两面人〉》。《两面人》系阳翰笙所写的话剧。诗中对周作人事敌的行为作了批判。载1944年5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绝句《题新莽·权衡二首》。诗中说，人民才是真正伟大而永久的存在，统治阶级则“均属昙一现”。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七绝《题关良画凤阳花鼓》。收《潮汐集·汐集》。

24日 作《答教育三问》。提出要普及教育，保证学艺研究自由，尊重学者，保卫师资；要反对法西斯式的思想统治；要加强青年思想的领导，采取诱发式、感应式、培养式的教育方法，使青年的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照顾，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究的习惯，发挥自由创造的精神。”收《沸羹集》。

25日 晨，书写碑文“剧人江村之墓——生于一九一七——歿于一九四四”，并作散文《悼江村》。文中说：我写《屈原》这一剧本，“本就是出于江村的要求”和鼓动。收《沸羹集》。

30日 全家又搬到赖家桥乡居。

本月 题关良画《春秋配》；

不怕你手执钢刀，我并非为你唬倒，
看牙齿锁着舌头，到头牙齿掉了。

(见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1979年4月第88期《郭沫若为关良题画辑拾》(鲁真辑))。

六 月

13日 作杂文《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要求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文艺创作的自由。收《沸羹集》。

14日 作《契诃夫在东方》，为纪念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而作。文中论述了契诃夫作品的风格和他对中国新文艺的巨大影响，并把他和鲁迅相比，认为他们两人“极相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载1944年7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15日 作七律《叠和亚子先生四首》(“凭栏独醉瓮头春”；“烽燧连天已七春”；“黄天当立世当春”；“八千岁内尚为春”)。诗中指出了“黄天当立世当春，民主高潮际此辰”的新局面，对抗战和中国的前途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收《潮汐集·汐集》。柳亚子的原诗题为《五月七日旅桂同志公宴廖夫子暨普椿女士赴渝都》。

本月 诗集《凤凰》由重庆明天出版社出版。此书原由泰东书局出版。1947年又改由群益出版社出版。

夏

题关良画《情探》，称赞川剧的表演艺术。见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第88期《郭沫若为关良题画辑拾》(鲁真辑)。

七 月

3日—7日 作学术论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从文献、甲骨、金文等资料，及生产发展和生产关系等方面，对古代社会研究作了全面的整理，纠正了自己过去研究中的某些错误，进一步发展了研究成果。并在《十批判书》的《后记》中对自己研究中的新成果作了概括的介绍。论文载《群众》1944年11月第9卷第20期；1945年1月23日—28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收《十批判书》。

10日 致翦伯赞信。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18日 作杂文《劳动第一》。说明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收《沸羹集》。

19日 开始作《孔墨的批判》。

本月 为《诗前哨》题刊名。见《诗前哨》第1辑，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本月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蒋介石诱降。

同月 国民党发布审查图书、杂志、戏剧、电影的修正条例，规定各种“送审须知”，对报刊、杂志、戏剧、电影，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八 月

1日 《孔墨的批判》脱稿。论述孔墨的基本立场及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在反对墨子的同时赞扬孔子。载《学府》1945年

创刊号，又载《群众》1945年3月8日第10卷第3、4期合刊的附册。收《十批判书》。

9日 作《〈孔雀胆〉二三事》。谈《孔雀胆》的人物设计和主题。指出：作品中的人物与史实不尽相符。“我只是借一段史影来表示一个时代或主题”，并说，这种办法我国元代以来的剧作家，外国的莎士比亚、席勒、歌德，都是采用过的，而“中国的史学家们往往以其史学的立场来指斥史剧的本事，那是不免把科学和艺术混同了”。关于写作《孔雀胆》的动机，“是因为同情阿盖与段功”，在写作时“也加上了一层作意，现代人所说的主题，我是企图写民族团结。阿盖站在团结的一面，车力特穆尔站在破坏的一面，结果成为悲剧，来了个大破落”。但是，“这层作意似乎很少被人看透”。收《孔雀胆》，又收《沸羹集》。

19日 读《管子·心术》等篇，忽悟与《庄子·天下篇》宋钘尹文之学相近，“大快于心”，“在灯下更不断发掘，愈发掘，愈信其不可易。”（《日记》，转引自《十批判书·后记》）。

26日至28日 作论文《宋钘尹文遗著考》。通过考证，说明《管子》一书中的《心术》、《内业》、《白心》、《枢言》等篇，系宋钘、尹文的遗著。并说：“就这样，我感觉着我是把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派发现了。有了这一发现，就好象重新找到了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一样，道家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儒、墨两派间的相互关系，才容易求得出他们的条贯。宋钘这一派，无疑是战国时代的道家学派的前驱，而它的主要动向是在调和儒、墨的”。载重庆《东方杂志》（月刊）1944年10月15日第40卷第19号。收《青铜时代》。

下旬 收到周恩来同志从延安托林伯渠带来的《屈原》、《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后知党中央已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在延安和解放区普遍印发。当天，

即致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许多在延安的朋友，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于立群：《难忘的往事》，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本月 作家鲁彦(王衡，1901—1944)病逝。

九 月

1日 开始作《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2日 作杂文《猪》。回忆四年前在高龙生所画的一幅“猪”上的题诗《猪童叟三部合唱》，并讽刺说：“我感觉着活着便拿定可以进文庙的，怕只有这被人豢养着的猪吧。”“狗却不行，守夜虽然要它，进文庙是不要它的。”讽刺反动派的走狗们。收《沸羹集》。

5日 作杂文《羊》。寄寓了对软弱者的批评。收《沸羹集》。

7日 写《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慎到、田骈一节毕(《日记》)。

8日至11日 因昨日草田骈、慎到一节，思路中途转向，遂作学术论文《儒家八派的检讨》。分别阐述儒家思想的发展。儒家八派，指子张、子思、颜回、孟氏(即孟轲)、漆雕氏(孔门的任侠一派)、仲良氏(陈良)、孙氏(荀子)、乐正氏等八派。载《中原》1945年3月第2卷第1期，收《十批判书》时题名《儒家八派的批判》。

9日 作《〈孔雀胆〉归宁》。为《孔雀胆》在昆明演出而作。收《孔雀胆》。

18日 续草《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关尹、老聃的一节。

19日 论文《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脱稿，论述了稷下道家

三派(宋铤、尹文为一派,田骈、慎到为一派,关尹、环渊为一派)的勃兴及其发展。载《群众》1944年12月25日第9卷第23、24期合刊。收《十批判书》。

21日至26日 作论文《庄子的批判》。论庄子及其思想。载成都大学《大学》(月刊)1945年3月、6月第4卷第1、2期合刊,第3期。收《十批判书》。在《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说:“庄子书是我从小便爱读的一种,至今都还有好几篇文字我能够暗诵。但写起他的批判来却也相当吃力。主要的原因是书里面的各篇,究竟那些真是庄子本人的,那些是他的后学或许别派的,实在画分不出一条显明的界线。我只按照着一般学者间比较近于公认的一些见解,把《内篇》作为庄子本人的文字而处理着,其他《外》、《杂》诸篇使它们处在从属地位,或则完全除外了。”

23日 作《“中医科学化”的拟议》。载1944年10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1947年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

本月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上,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拒绝。

十月

1日 参加邹韬奋追悼会并讲演。哀悼邹韬奋,鼓励人们继承他的遗志,拿起笔杆,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奋斗。载1944年10月2日《新华日报》,题为《韬奋先生哀词——在追悼会上讲演稿》。收《沸羹集》。收《沫若文集》时,篇名为《一支真正的钢笔》。

8日 致翦伯赞信。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10日 发表《新辜鸿铭》。收本日出版的《两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

同日 作杂文《写在双十节》。讽刺国民党借口实行“训政”，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收《沸羹集》。

15日 开始作论文《荀子的批判》。

16日 作寓言《黑与白》。文中说：“乌鸦是漆黑的，我们说它不白，它是不白。

白鹤有丹顶和黑翎，我们说那些不白，那些也的确是白。

聪明的乌鸦却找着抗辩的口实了：‘哼，你们说我不白吗？连白鹤都有人说它不白呢！’

于是乎乌鸦就好象比白鹤还要白了。”收《沸羹集》。

又 作杂文《分与合》。认为“自从有人吃人的制度成立以来，天下便从来不曾‘治’过，也从来不曾‘合’过”。历史上那些太平统一时代，只不过是“貌似‘治’，貌似‘合’。在骨子里依然是分裂动乱”的。因此，必须打破“一治一乱”的旧观念，建立正常的史观：“天下大势，以往是常分不合，今后须永合无分”。收《沸羹集》。

又 作杂文《圉与扒》，抨击国民党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收《沸羹集》。

18日 致翦伯赞信。见《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30日 作《学习歌颂不完的伟绩——为纪念“十月革命”而作》。提倡按照列宁、斯大林的教导行事：无论何时都不要拒绝工作中间的细小事情，因为伟大事情是由细小事情构成的。载

1944年11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31日 《荀子的批判》脱稿。全面论述荀子的思想理论，认为他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儒家之大成，也可以说集了百家之大成。载《抗战文艺》（月刊）1945年第10卷第1期。收《十批判书》。

同日 作书简《复颜公辰先生》。谈关于“中医科学化”问题的讨论。载1945年3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本月 7日，中、美、英及美、英、苏分别于美国赖巴顿橡树园开会，商讨战后成立世界性的机构。9日公布成立“联合国”之建议。

十一月

1日 发表诗《迎潮》，题迎潮图。载本日出版的重庆《经纬副刊》第1卷第2期。

6日 从乡间回到重庆城里，在城里住了九天。（《〈十批判书〉后记》）

7日 去青年馆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集会并作了题为《奉行孙中山遗教，向苏联看齐！》的演说。载1944年11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题为《奉行国父遗教，向苏联看齐！》收入《沫若文集》时，题为《向苏联看齐！——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说辞》。

11日晚，在天官府街七号文化工作委员会内设宴欢迎刚从桂林逃难来重庆的柳亚子。那天晚上，“差不多所有的民主人士都到了，最使人喜出望外的是周恩来副主席恰在那天从延安飞来，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因此，这‘双十一’成为了我们朋

济中的一个难忘的日子”(《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席间,周副主席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给小小‘蜗庐’带来了光明”(于立群:《难忘的往事》,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大家又“痛哭”,又“狂欢”,而且还跳了秧歌舞,“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同日 复戈宝权信。(戈宝权:《忆郭老》,收《悼念郭老》)。

15日 作《序〈羽书集〉》。载1944年1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收《羽书集》。1945年1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收《沫若文集》第11卷时,篇名题《〈羽书集〉·第二序》。

又 作诗《咏虎二首》。收《潮汐集·汐集》。

17日 作七绝《题傅抱石薰风曲图》。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五言诗《喻仿石涛者》。诗中写出了石涛画的特点是“大力贵浑然,疑将宇宙炸”,希望后学者“学之能超之,有益于天下”。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诗《题刘伶醉酒图》。收《潮汐集·汐集》。

19日 往北碚访老舍。来回花了三天。

同日 作五言古诗《题伯夷叔齐图》。收《潮汐集·汐集》。

22日 作七绝《题湘君与湘夫人二首》(“沅湘今日蕙兰焚”;“夫人矢志离湘水”)。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七绝《题柳浪图》。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七绝《题夏山图》。收《潮汐集·汐集》。

23日 作七律《补题湘君与湘夫人二首》(“古帝南巡不计年”,“水中荷盖播椒堂”)。收《潮汐集·汐集》。

29日 始作论文《名辩思潮的批判》。

本月 11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开幕,朱德、吴玉章、徐

特立等出席讲话。晚，由“延大”演出郭沫若所著的历史剧《虎符》。

同月 13日，汉奸汪精卫病死。郭沫若在《羽书集·第二序》（重庆版）中说：“前两天的报上载出了汪逆已在日本病歿的消息，朋友们说：死得太便宜了。自然，他如再迟死得两年，看到日本覆灭，国家把他生擒，付诸人民裁判，那是便更加痛快的事。然而汪精卫死在今天已可算不甚便宜了。假如他早死得六年，他毫无疑问会荣膺‘国葬’。更假使早死得三年，德寇的败征还没有十分显露的时候，他死时的心境也会比较恬静：因为他满可以还有希望做洪承畴。然而他却死在今年今天，尽管怎样愚昧，也该早觉悟到他的铁像是铸就了。真可谓‘如含瓦石’，死得是太不‘闲泰’”。

十二月

3日 作五绝《题水牛画册》。赞扬水牛“任劳任怨，努力事耕耘”的自我牺牲精神。收《潮汐集·汐集》。

4日 全家搬回城内寓所居住。当时，桂林、柳州相继沦陷，气氛紧张，对郭沫若的举动，“有的朋友感着奇怪”，问郭沫若：“别人都在下乡（逃难）的时候，你怎么又搬进城来了？”郭沫若回答说：“敌人不会来的”。进城后的第三天，又续作《名辩思潮的批判》。（《十批判书·后记》）

25日 作七律《衡老以双十一追忆诗见示，步韵却酬，兼呈亚子先生》。诗前有小序，说明沈钧儒此诗系参加本年11月11日在郭沫若寓所宴会时所作。载1945年1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初见《沸羹集·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一文中，又收《潮汐集·汐集》，篇名题《双十一》。诗中称喻周恩来同志为手持火炬的人。事

后郭沫若追述说：那晚，由于周副主席的努力“友朋皆甚热烈狂欢”。（《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柳亚子诗词选》）

26日 作七绝《赠张瑞芳》（“风雷叱罢月华在”）。收《潮汐集·汐集》。

28日 作政论《欧洲的教训》。从德国军队在欧洲战场挣扎反扑谈起，联系国内政治形势，提醒人民注意：“敌人的力量并未充分削弱，而比这更值得警惕的是自私自利的诡计早已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了”。文章还揭露“少数的政治家”破坏人民要求建立民主政权的行径。载1945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文章登出时被删节。

本月 接毛泽东11月21日从延安写来的信。信中对郭沫若所写史论史剧极表关怀和支持。全信如下：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

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对信中提及“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一事，“郭老始终放在心上。在重庆时，他就曾想动笔，但因资料不足，未能实现。六十年代初，郭老积累了一些材料，准备动手，由于种种原因，计划又未能实现。郭老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于立群：《难忘的往事》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同月 作《争取今天》。载西安高原出版社出版的《高原》（月刊）1944年12月第2期《郑伯奇先生文坛生活廿周年纪念特辑》。

本年 作散文《竹荫读画》。记去年10月17日去傅抱石寓所观画的经过。收《波》，题名为《十月十七日》。现收《文集》第9卷《芍药及其他》。

同年 作诗《题彝器图像拓本》。收《潮汐集·汐集》。

一九四五年(五十四岁)

一月

3日 作时评《苏联会参加东方战场吗?》分析国际形势,认为“苏联是会参加东方战场的”。收《沸羹集》。

8日 作《宏大的轮船停泊到了安全的海港》。为悼念1944年12月30日逝世的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而作。文中称罗曼·罗兰是人类“精神的领港者”,他的精神将在人类史上永存。载重庆《文学新报》1945年1月20日第1卷第3期。收《沸羹集》。收入《沫若文集》时篇名题《宏大的轮船泊到安全的海港》。

13日 发表七绝《题关山月画》六首并跋。题下注:“关君山月,有志于画道革新,侧重画材,酌摭民间生活,而一以写生之法出之,成绩斐然。近时谈国画者,犹喜作狂禅超妙,实属误人不浅。余有感于此,率成六绝,不嫌着粪耳。”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收1948年8月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关山月纪念画集第一辑西南、西北旅行写生选》;又收《蜩螗集》。

18日 作论文《文艺与民主》。指出: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说明“文艺的生命是植根在民众里面;文艺脱离了民众,它便要失掉它的生命”。载《青年文艺》1945年2月15日新1卷第6期。收《沸羹集》。

同日 作《伟大的战士,安息吧!——悼念罗曼·罗兰》。

载重庆《文艺杂志》(月刊)1945年5月25日新1卷第1期。

本月 《羽书集》(重庆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收1937年——1941年间抗战初期的论著,连序共五十九篇。《羽书集》1941年11月曾由香港孟夏书店出版,不久,香港为日寇占领,版被毁,故此版流传很少。(见1958年《改编小引》)重庆版比香港版少十七篇,“因为把它们编入《今昔蒲剑》里去了。”(同上)1958年11月改版,从重庆版中删去三篇,并按写作年月的先后,重新排列,最后四篇。是从香港版中抽出编入,计收五十九篇,另有《序》二篇,《改篇小引》一篇1959年编入《沫若文集》第11卷。

中旬 史论《名辩思潮的批判》脱稿。文章论述先秦名辩思潮。对孔子以后各家的态度,分别叙述,逐一研讨。载《中华论坛》1945年3月第2、3期。收《十批判书》。

30日 开始写《前期法家的批判》。

本月 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出版。在第一期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胡风的《置与在民主的斗争里》,认为作家“主观力量”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扩张”就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1944年底至1945年初,何其芳等遵照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对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

二 月

5日 上午至磐溪访画家徐悲鸿。并带去延安的红枣和小米,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托他送给徐悲鸿的(据廖静文:《嘉陵江畔的一段往事——回忆郭老与悲鸿》,收《悼念郭老》)。午饭后作七绝一首,题为《访徐悲鸿醉题》。收《潮汐集·汐集》。

6日 作七绝《磬磬大器》。收《潮汐集·汐集》。

8日 作《文化界时局进言》。这是文化界人士对时局的宣言，由郭沫若起草，签名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三百余人。呼吁实行民主政治，建议召开临时紧急国事会议，商订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针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使人民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的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保障学术与文化自由，停止特务活动，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等六项要求。宣言发表后，“震动了全国文化界，震动了全国人民，因为它喊出了人民的呼声”。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CC系特务头目张道藩气势汹汹地找在他直接控制下的“中国文艺社”，威胁、逼迫有关的职员，并千方百计从事破坏活动。后来郭沫若叙述说：“那时的高压之下要找人在宣言上签名是多么困难，就连宣言两个字也还不敢用，只好使用‘进言’。结果呢，‘进言’一进去之后，费巩教授失踪了，至今还无下落；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撤消了，有好些朋友一直都还失了业。”（参阅廖静文：《嘉陵江畔的一段往事——回忆郭老与悲鸿》及郭沫若《天地玄黄·我更懂得庄子》、《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等文）。宣言全文和签名者的姓名载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时在正文前加了序言。收《沸羹集》。

8日至10日 作论文《青铜时代》。从大量出土的实物中考定中国的青铜器时代，认为它的下限是在周秦之际，其上限较难确定，但可以肯定殷代已有青铜器。关于本文的写作，郭沫若说：“这本是我十几年来研究青铜器所得的结论。腹稿构成了多年，在最近一两年间我曾作过几次的演讲，现在率性把它写了出来。”（《十批判书·后记》）。收《青铜时代》。

11日 作《青铜时代·序》。说明本集的内容和写作情况。此书“偏于考证”，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是姊妹篇，“两者相

辅相成”。收《青铜时代》。

又 作《周代彝铭进化观》一文的“跋语”。收《青铜时代》。

13日 致戈宝权信，谈《十批判书》出版问题。（戈宝权：《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在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郭沫若研究专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18日 论文《前期法家的批判》脱稿。论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的思想与事迹。收《十批判书》。

19日 作《老聃、关尹、环渊》一文的《追记》，补述有关范环之史料。收《青铜时代》。

又 作五言诗《赠国际友人》。收《潮汐集·汐集》。

23日 作时论《人类的前卫——纪念第二十七届红军节》。载1945年2月24日《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本月 作《和平之光——罗曼·罗兰挽歌》。载1945年2月25日《新华日报》。收《螭螭集》。

同月 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1883—1945)逝世。毛泽东、郭沫若分别致电吊唁。郭沫若唁电载3月1日《新华日报》。

三 月

7日 作五律《咏兰》、七绝《题画梅二首》和七绝《咏梅》。均收《潮汐集·汐集》。

18日 作七律《贺友人在巴黎公社纪念日结婚》。收《潮汐集·汐集》。

又 作五律《泰山不让壤》。收《潮汐集·汐集》。

19日 发表《申述关于中医科学化问题》。载本日《新华日报》。

21日 作《罗曼·罗兰悼辞》。称他是“伟大的人类爱的使

徒”，表示要以他为模范，不断地前进，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里面去，从人民大众中吸收充分的营养，再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载1945年3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时题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悼念罗曼·罗兰》。收《沸羹集》。

24日 史学家金毓黻来访，并邀去小酌。

28日 作和诗一首送往金毓黻寓所。26日，金毓黻赠来诗一首。说“寰海知名几作家，如君卓卓自堪夸”，并把郭沫若对文学研究的功绩比作段玉裁。郭在和诗中说：“平生四海以为家，亡命险经被捉拿。求学粗通风雅颂，立身愧短乘除加。不辞尝尽苦中苦，犹信能堪牙以牙。何意当筵逢太史，一番清话胜清茶。”谦逊地写出对自己的评价。（宋德金、丛佩远：《平生四海惯为家——读郭沫若同志一首未发表的七律》，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30日 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政府强令解散。31日《新华日报》发表消息并加了编者按，题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昨日奉令解散——该会由郭沫若先生领导，包括文化界许多知名之士，对抗战文化贡献很大》（参见本谱本年2月8日条）

31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的消息发表后，郭沫若“一整天在家接见客人，从早到晚前往郭先生寓邸拜访慰问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4月1日《新华日报》报道：《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 中外人士极表关切》）

本月 发表《关于中国音乐》。载《音乐艺术》第2卷第1期。

同月 《青铜时代》由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十年来关于先秦社会及学术思想的研究论文集之一，与《十批判书》为姊妹篇。《十批判书》偏于批评，而本书则偏于考证。全书收论文十三篇，《序》一篇，文后另附录三篇旧作。1946年改由上

海群益出版社出版，加作《后叙》一篇。1962年编入《沫若文集》第16卷。

本月 特伟、叶浅予、张光宇、余所亚、丁聪、沈同衡、张文元、廖冰兄等在重庆举办“漫画联展”，展出作品两百余幅，揭露和讽刺国民党反动统治。

四 月

1日 晚，和沈钧儒、章伯钧等参加政治部三厅成立七周年纪念聚餐会。在会上，激动地表示：始于今日，终于今日；“花瓶”摔掉，还我面目。指出，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是更自由了。（见4月2日《新华日报》报道）

又 为纪念三厅在晏华林成立题词：“晏华林纪念。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勿忘今日”。（见浙江《东海》1979年8月第8期丁正献：《晏华永念》）。

2日 将3月28日赠金毓麟诗加以修改，署名后又赠之金。诗云：“平生四海惯为家，刻鹄未成不敢夸。折节粗通风雅颂，立身幸免乘除加。微僧已失耳为耳，犹信堪能牙报牙。秉笔相期学司马，无心取宠向谁哗。”（见宋德金、丛佩远：《平生四海惯为家——读郭沫若同志一首未发表的七律》，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参阅本谱本年3月28日条）此诗后收《潮汐集·汐集》，又有不少改动。

8日 晚，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欢宴郭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诸工作人员。沈钧儒、左舜生、侯外庐、史东山、王若飞、邓初民、马寅初、翦伯赞等相继发言，对郭沫若表示慰问和赞扬。黄炎培因病未能前来，派人送来诗三章。柳亚子

愤慨地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表示了对国统区人妖颠倒的强烈抗议。王若飞在发言中，称赞郭沫若在世界文化事业上起了伟大作用，他是国家的至宝，为全国人民所热爱，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欢迎他到边区解放区去，半个中国是需要郭先生及诸位先生的！”郭沫若致答辞表示：“文工会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五十四年唯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据4月9日《新华日报》报道：《在不自由的狭小天地里欢宴文化战士郭沫若》。

12日 作论文《向人民大众学习》。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努力向人民学习。载《文哨》1945年5月4日创刊号。收《沸羹集》。

15日 作文《悼念A·托尔斯泰》。称A·托尔斯泰是“全世界最卓越、最有声望的作家之一”，认为他取得成就的主观原因，是由于不断地改正自己的错误，以及对民间语言 and 艺术的尊重；客观条件是苏联文艺政策的正确，文艺工作者特别被重视。收《沸羹集》。

20日 作《人民的文艺》。认为文艺诞生后，逐渐被上层所垄断，庙堂文艺成了文艺的主流，人民文艺被萎缩了。但他们二者之间在不断地斗争着，“一部文艺史也就是人民文艺与庙堂文艺的斗争史”。并说：“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体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须是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文艺”。载1945年4月29日重庆《大公报》。收《沸羹集》。

又 作七绝《忆樱桃树》。小序中说：“文工会被解散后，赖家桥乡居撤消。闻樱桃树已发花，成此”。收《潮汐集·汐集》。

23日 作七绝《题书画册》。收《潮汐集·汐集》。

27日 作杂文《“五四”课题重提》。强调要继续“五四”精神，

接受科学并发展民主。科学，应该中国化，使它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开花、结实。为此必须有政治的民主化作为前提。载《群众》1945年5月第10卷第9期。收《沸羹集》。

28日 在沙坪坝学生公社作讲演，题为《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指出，从文学史看，历来存在人民文学和庙堂文学两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学。由R. L记录整理，载1945年5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副题为《郭沫若先生在沙坪坝讲演》。

本月 为龚啸岚所著《岳飞》一书题签。见《岳飞》，汉口新快报社印刷所出版。

同月 《先秦学说述林》(又名《白果树下》)由福建东南出版社出版，作为“大学学术丛书”。文后的《后记》，1962年移录于《沫若文集》第16卷《青铜时代》内。

本月 25日，四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到6月25日，参加会议的五十一国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董必武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签了字。

同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是党的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代表大会。

同月 歌剧《白毛女》(鲁艺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等作曲)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出，中央负责同志观看演出后，作了重要指示：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艺术上是成功的。这部作品是我国第一部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命运和斗争的新歌剧，为后来歌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

供了成功的经验。

五 月

5日 作《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载《民主与科学》1945年第6期；又载上海《文萃》(周刊)1946年1月1日、8日第13、14期。收《十批判书》时加正标题《后记》。

6日 作诗《民主家庭》。贺马寅初之女仰惠与徐鸿辛结婚，收《蝻螭集》。收入《沫若文集》第2卷时，加副标题《贺友人结婚》。

8日 作《鬼进文艺的新潮》。叙述了自己在“五四”前后，“对于文学和政治发生兴趣的一些回忆”。载《文哨》(月刊)1945年7月5日第1卷第2期。现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辑。

19日 和于立群、阳翰笙、冯乃超、朱海观、湘楼、卢鸿谋等去乡下金刚坡下赖家桥看望原文化工作委员会留下的朋友。途访李侠公，约同往。友辈们眼见文工会被国民党解散，触景生情，感慨激切。交谈时，郭沫若“痛骂了四川历史上的几位大文人，司马相如，扬雄，三苏父子。他们专门做帝王的花瓶，而三苏父子尤其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死党，可谓糊涂透顶。”(《波·下乡去》)

28日 作《如果我再是青年》。勉励人们趁年青时更好地学习和工作，不要作口有余而行相反的骗子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懦夫。载《青年知识》(半月刊)1945年7月创刊号。收《沸羹集》。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篇名题《我如果再是青年》。

同日 晚，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费德林博士来访，递交苏联科学院给郭沫若的邀请信，请他参加该院成立第二百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同时被邀的还有丁西林。

30日 作杂文《国际的文化联盟刍议》。指出战争胜利后，必须努力肃清法西斯思想，为此，建议成立国际性文化组织。载1945年6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沸羹集》。

本月 法西斯德国战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同月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一党独裁，并准备发动内战，攫取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月 何其芳的诗集《夜歌》由重庆诗文社出版。

六 月

2日 作《十批判书》的《后记之后：一》，说明书中二则材料系杜守素提示。收《十批判书》。

4日 作散文《下乡去》。记5月19日乘车赴乡下看望前文化工作委员会留在乡间的朋友的经过。收《波》。

又 为《高尔基》作《序》。收《高尔基》（A·罗斯金著，葛一红、茅盾等译），1948年北门出版社出版。

6日 和邵力子等到中苏文协欢迎苏大使彼得罗夫。

同日 晚，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友们举行饯别茶会，欢送郭沫若赴苏联访问。从上月底接到请柬以来，朋友们都为郭沫若庆贺，“开会欢送，设宴饯别，整整忙了十天。”（《苏联纪行·前记》）

8日 下午，出席中苏文协等三团体欢送大会。在茅盾、史东山、侯外庐致词后致了答词。

9日 下午由九龙坡机场坐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转道印度、伊朗，飞往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纪念

会。同行者有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邵鲁诺夫。去机场送行的有安南略、苏牧(戈宝权)、于立群、费德林、司徒慧敏等。晚，抵昆明。(自本日起至8月16日止，除署明出处者外，均见《苏联纪行》)

10日 在昆明会见光未然、闻一多、吴晗等人，并共进午餐，下午，又启程。深夜，到达加尔各答。

17日至19日 途经伊朗阿巴旦(Abadan)。天气炎热，风吹来灼热似火焰。得一句类似诗的句子：“六月的火焰流出阿巴旦的黄沙”，联想到唐僧取经，过火焰山的故事，认为《西游记》作者对南方的气候，确有经验，并不是全凭想象。

20日 飞抵德黑兰，中国大使馆大使李铁铮、秘书吕式伦来机场迎接。

21日 至李铁铮大使的别墅午餐，并应其女儿之请，题诗一首。

22日 在旅舍，于寂寞中突然想到希夷(叶挺)，作诗一首。诗中，对祖国的前途深深关注，对自己“赤手空拳”，在“强梁者”高压下搏斗感到需要支持，表达了对先烈的追怀。全诗录于本日《日记》中，见《苏联纪行》。

25日 与邵鲁诺夫分手，独自坐飞机启程，经巴库、斯大林格勒，往莫斯科。在机上，想起留在日本的儿女和留在重庆的儿女，作诗一首(“生别常惻惻”)，录于本日《日记》。见《苏联纪行》。收《潮汐集·汐集》。

晚九时半抵莫斯科，大使馆秦涤清、李清盛，苏联友人齐赫文斯基、特罗伊次克、栗文松、苏布拉清太太等来机场迎接。宿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第230号房。

26日 由齐赫文斯基陪同，乘飞机往列宁格勒。苏联汉学家阿列克塞也夫院士等来机场迎接。

27日 晨，写准备在大会上用的《祝辞》和致科玛洛夫院长的信，祝贺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祝辞》全文录于《苏联纪行》。

按大会日程与各国代表乘车参观郊外名胜和战迹；又和齐赫文斯基游览市容。

晚，到市政府出席市长举行的宴会，见到苏联科学院科玛洛夫院长和东方学院院长司徒鲁卫。司徒鲁卫对郭沫若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形成了例外”。

28日 在东方学院听学术报告，并应邀致辞。致辞全文录于《苏联纪行》。

参观阿列克赛也夫院士的书斋。参观列宁博物馆。去齐赫文斯基家作客。晚，乘火车返莫斯科。

29日 午后至莫斯科。晚，由齐赫文斯基和阿列克塞也夫院士陪同去国立剧场观看歌舞。午夜回寓，丁西林到，带来于立群信。

30日 下午，应邀赴机场欢迎来莫斯科参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的宋子文。在机场欢迎的有莫洛托夫、洛索夫斯基、丁西林、中国驻苏大使等。

晚，和丁西林参加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与李约瑟同席。出席宴会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等。

七 月

1日 和丁西林参观东方文化博物馆。

晚，得于立群信。又去国家剧院出席为招待宋子文及中国

使团而举行的晚会，观看柯夫曼的童话芭蕾舞剧《硬果钳子》。

2日 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布拉清夫人陪同参观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并题词，中有：“帝王生活诚然富丽堂皇，到今朝尽归诸人民玩赏。试问权威何在？春梦几场？”等句，全文录于《苏联纪行》。

晚，观木偶戏《鹿王》。

3日 下午，与丁西林同赴苏联外交宾馆出席莫洛托夫为中国使团举行的招待会。

4日 上午，写演讲稿《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

下午，赴对外文化协会，拜会该会会长凯缅诺夫，商谈并制定了参观的计划。

晚，李立三来访，同到高尔基大街散步。

5日 访苏联作家协会秘书亚布雷丁。

下午，往历史研究所作《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的讲演。“主要的说到抗战以来的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关心，封建制长期停滞的探源”等问题，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受到听讲者的欢迎。（参见本谱本年8月3日条）

6日 下午参观列宁博物馆。

晚，在外文出版部作战时文艺活动的报告，李立三也来听讲。

7日 晨起，草就《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为向苏联文艺界报告作准备。

下午，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同英国主教约翰逊博士等乘汽艇游伏尔加莫斯科河。

8日 继续参观列宁博物馆，参观完毕，在纪念册上题词：“一代的伟人，无产阶级的父亲，全人类新历史的开创者，你的

遗像永远如生。人民的欢乐，将和你的勋业，永远长存。”

9日 登机启程往斯大林格勒参观，同行者有约翰逊博士，文协副主席卡拉冈诺夫等。午后抵斯大林格勒。

傍晚，由执行委员会主席洛伯钦等陪同观看市容和战争遗迹。

10日 参观工厂、医院和战争遗迹，途中作诗一首（“站立在英雄城的彼岸”）。诗录于《苏联纪行》。

11日 游伏尔加河，在汽艇中听工程师介绍重建城市的计划。

晚，出席市政府举行的饯别宴会。

12日 离开斯大林格勒，乘飞机去塔什干。在近郊宾馆下榻，花草树木甚多，颇为幽静，得诗两句：“林檎委地无人拾，芙蓉花大桑叶肥”。

13日 往市政府拜会市长。

访乌兹别克科学院，听学术报告，并蒙赠书四册，又访伊斯兰教的长老，受到教长按当地习俗的热情款待。

晚，观《奥塞罗》演出。

14日 “清晨独步园中，忧国之念不可遏止。……刘后主入魏，曾云‘此间乐，不思蜀’，余来塔什干，独有‘此间乐，愈思蜀’之心。地狱正需人，我何当久于天国淹留？”成诗三章（一、“清晨入园林”，二、“晨风溢清凉”，三、“临流濯我巾”）描写乌兹别克佳景，思念祖国和亲人，痛斥国统区“狐鼠正纵横”的状况。诗录于《苏联纪行》，又收《潮汐集·汐集》。

参观女子中学和斯大林纺织工场，并题词。题词收《苏联纪行》。

晚，看歌剧《乌鲁格·柏格》。

15日 参观果树实验场，受到热情款待。席间，戏以手指

抓食，主人皆大欢笑，一女研究员教以抓法。作诗一首（“一字横眉额下齐”）记其事。诗录于《苏联纪行》。

午后，参观“第十八届共产党代表集体农场”，主人以瓜果、葡萄酒招待，并为客人们表演歌舞。郭沫若即兴赋诗一首（“党代表的集体农场”）以表谢意。诗录于《苏联纪行》。

16日 参观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化学工场。

17日 晨乘飞机赴撒马尔罕（铁木耳——兀鲁伯时代的旧都），参观古迹毕，飞返塔什干。

18日 参观“棉花研究所中央精选站”。

晚，出席盛大的饯别宴会。参加宴会的有乌兹别克科学院主席和副主席及戏剧音乐界著名人士。会上郭沫若致词表示感谢。

19日 晨，乘飞机离塔什干；晚，抵莫斯科，至旅舍，见丁西林留条，告以已于今晨返国。

20日 参观莫斯科历史博物馆，见有几片汉瓦，上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字样，系1941年贝加尔湖区的卡拉斯诺雅尔斯克省内出土。闻尚发现有纯汉代式的中国建筑的基趾。据云乃公元前99年李陵降匈奴后所建。郭沫若认为：这不会是李陵的居趾，馆中陈列的瓦当和一铜制兽环，应该是中国传去的，北匈奴境内没有可能自行制造。因此，很可能是“汉家的公主下嫁时，王室为慰藉她的乡愁，特别建立此屋以为陪媵。”

21日 上午，与齐赫文斯基共同将讲稿《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译为俄文。

下午，写就《苏联印象》以备广播。

晚，和朱庆永谈王安石、王莽、秦始皇、商鞅、吕不韦。认为“秦始皇是应该肯定的，他收到了统一中国的功劳”，当然，也“不能忘记商鞅”，“不能忘记吕不韦”。指出“中国的奴隶生产在

春秋末年已经开始扬弃，经过陈吴革命之后便来了彻底的蜕变”，有些苏联学者认为“两汉也还是奴隶制”是不对的。

22日 上午，应中国驻苏大使邀，往乡间别墅游玩。

23日 参观革命博物馆。

晚，出席对外文化协会欢送约翰逊博士的晚会，在会场上遇见近二十年来未见的鲍罗廷以及苏联作家果尔巴妥夫(《宁死不屈》的作者)、儿童诗人马尔沙克。

24日 参观列宁图书馆。

25日 参观托尔斯泰博物馆、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并在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的纪念簿上题了赞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革命的诗人”)。诗录于《苏联纪行》。

26日 晨，草《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毕。认为这是他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看法的一个提要，大意是：“文学的起源是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的。自从社会内部有了分化，文学也就有了分化。一般的所谓正统文学是走上层路线，愈走愈狭隘，愈走愈板滞。而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者则留在民间，走着下层路线。这种作品每为正统文学所不齿，以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等正统文学走到绝路的时候，却又每每仰借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来输血，而等到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一登上了大雅之堂的时候，便又愈走愈狭隘，愈走愈板滞。中国的文学，反复地走着这样迂回的路”。

下午，应邀至东方语文大学作《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报告。

晚，李立三来访。

27日 上午，往历史博物馆，拓“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瓦当。共三枚，各拓二张，以一份留赠博物馆。

下午，杨新松来邀，至电台作广播讲话，播毕，由杨及孙

维世(孙炳文烈士的幼女)送回寓所。孙维世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健康,郭沫若把周恩来所赠的延安版的《甲申三百年祭》转赠给孙,又应孙的请求,赠以《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讲演稿。

晚,由齐赫文斯基陪同往对外文协作《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的讲演,报告后,参加酒宴,并应该会副会长的要求,把讲演的原稿留下作为纪念。

28日 上午,历史研究所西蒙尼美斯卡雅与列宁图书馆结谢列娃来访,请求协助收集考副博士论文的材料。

午后参观特列洽珂夫斯卡画馆。

29日 朱庆永来访,邀往其寓所——“首都大饭店”共进午餐,谈苏联妇女解放等问题。

下午,参观军事博物馆。

30日 由对外文协栗文松部长陪同,往史丹尼斯拉夫斯基街看漆器展览会。

31日 参观莱蒙托夫博物馆。

本月 17日至8月2日,苏、英、美三国首脑在柏林西南部的波茨坦举行会议。26日,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

同月 姚仲明、陈波儿等集体创作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由抗大在绥德演出。6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扬的《关于政策与艺术——〈同志,你走错了路!〉序》。

八 月

1日 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请,写下对于科学院纪念会之感想。

午后,参观奥斯特罗夫斯基博物馆,并在纪念簿上写下赞

扬的诗句(“在艰难困苦中”)。诗录于《苏联纪行》。

2日 原拟去皇宫病院探望洗星海,因临时有别的约会,未能去成。下一个星期四,也因同样的原因而未能前往。后来郭沫若说:“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没有在他的生前和他再见一面”。(《吊星海》,收《天地玄黄》)

午后,访哲学研究所,由所长斯威特洛甫、副所长鲁宾希契因、历史哲学部主任瓦谢齐克招待,报告了中国哲学界情况。

3日 参观电车工人幼儿园。

晚,往对外文化协会作历史报告,内容是把上次所作的《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略加补充。报告毕,回答听众所提出的问题。《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以俄文发表于苏联《历史研究》1945年12月号,后由文雄译出,载重庆《中国学术》1946年8月1日创刊号。

4日 往波德钦病院,请托鲁特涅甫博士诊查耳疾。

5日 晚,由邵鲁诺夫陪同,乘火车往托尔斯泰的家乡雅斯琴雅·坡里雅琴。

6日 上午,抵雅斯琴雅·坡里雅琴。参观托尔斯泰博物馆。

晚,馆员蒲清和拉略诺夫博士来访,介绍托尔斯泰晚年锐意研究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情况。

7日 继续参观博物馆,并在纪念册上写下感想,其中写了故居的环境气氛,说:“一切都和大自然在拥抱,一切都和老百姓在拥抱。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更容易了解得那博大的农民爱和人类爱,何以能那样地磅礴。”(《苏联纪行》)

晚,告别前,博物馆长、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泰雅·叶先宁娜赠给《雅斯琴雅·坡里雅琴》一册,并在卷首题辞。

8日 晨,作诗一首(“送郎送到九龙坡”),抒写于立群依依送行的情景。录于《苏联纪行》。上午,飞抵莫斯科,在食堂里遇

见刚到莫斯科的蒋经国、卜道明等。

下午，访莫斯科大学。

9日 在食堂遇见熊式辉、沈鸿烈诸人，闻昨夜广播，苏联已对日宣战。

上午，乘车访托鲁特涅夫博士，听取耳疾检验的结果及应注意的事项。

下午，赴对外文化协会参加宴会。出席者有中国驻苏大使、凯缅诺夫会长及作家爱伦堡、西蒙诺夫、吉洪诺夫等。郭沫若在宴会上发言，对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表示深切的感谢。“相信英勇的苏联人民和强大的红军，必然会给予日本法西斯强盗以神速的一蹶不振的打击”，并表示：在胜利之后，愿和苏联的作家、学者们共同努力，为消灭法西斯主义继续斗争。

10日 得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喜极，狂饮一醉。

11日 参观中央铁道工人医院。

下午，苏联国家出版局代表来访，应邀为该局开列一个值得翻译的中国作品的目录。

12日 为艾德林所译《白居易译诗》作《序》。

参加苏联体育节。斯大林、艾森豪威尔等出席。归作诗《红场观体育节》。载安东白山社《白山》（月刊）1946年6月15日第3期题《颂体育节》（系转载《胶东大众》）。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集外》（二）。

13日 李立三来访，请郭审阅《在辽远的北方》、《考验》等作品的译文。

14日 李立三又来，郭交还《在辽远的北方》等书，并讲了自己的意见。

准备回国。

15日 得悉中国使团明晨启程，拟同机回国。

16日 晨,乘飞机离开苏联回国。这次访问,在苏联境内前后共五十天,郭沫若认为这是“一段永远值得回味”的经历。在访问期间,作《苏联纪行》日记,自6月9日起,至8月16日止。《日记》载1945年10月10日至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并附有《前言》;后结集为《苏联纪行》,1946年4月中外出版社出版,为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丛书第三种。其中旧体诗五首,又收《潮汐集·汐集》。

20日 从苏联回到重庆。

29日 下午,出席中苏文协欢迎茶会。在会上谈了赴苏观感。

30日 上午,出席文协、剧协欢迎茶会。报告访苏经过。

本月 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

同月 10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并向日军发出通牒令其投降。在这以后的两个月中,我军共毙俘敌伪军二十三万人,收复国土三十一万多平方公里,攻克城市一百九十余座。

同月 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同月 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

同月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

九 月

2日 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鸡尾酒会。毛泽东、周恩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武官罗申及沈钧儒、冯玉祥、李德全、邵力子等三百余人出席。（龙飞虎：《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

3日 和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于立群等各界人士一起，在毛泽东主席的住所聚会，聆听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的分析。会上毛泽东主席对郭沫若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象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郭沫若看到毛泽东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会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他。（于立群：《难忘的往事》，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9日 和于立群至红岩村拜会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晚餐时，大家谈起郭老在文化界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毛主席很同意郭老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毛主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于立群：《难忘的往事》，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27日 作《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校阅感言。收《十批判书》。

28日 作《十批判书》的《后记之后·二》，补说《管子》。收《十批判书》。

本月 小说散文集《波》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为“郭沫若文集之九”，内收1941年至1945年间的作品二十篇。1947年，1949年又先后编入《地下的笑声》及《抱箭集》内。

同月 学术论著《十批判书》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上、下

两册，为“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是近十年来关于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的研究论文集之一。1950年经作者修改补充，仍由群益出版社出版，1954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年按此版编入《沫若文集》第15卷。

本月 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上签署投降书；3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9日，日军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的投降仪式，冈村宁次代表日军签署投降书。

同月 蒋介石在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同时，秘密颁发《剿匪手册》，准备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内战。

同月 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表《为庆祝胜利告国人书》，指出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实现国内的团结、民主与和平，避免内战危机等。

同月 20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布“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的“训令”，“接收”敌伪所有的新闻出版机构。

同月 17日，著名作家郁达夫(1896—1945)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后来，郭沫若从一南洋华侨处得到郁达夫生前(1945年春日)在苏门答腊为友人“张郎”所画梅花图的题诗照片后，即在背面题字曰：“郁达夫题画梅诗。乙酉乃一九四五年，达夫以此年秋遇难。张郎为谁？惜信遗失，无可考见。”郁达夫原诗为：“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难得张郎如我意，画眉还为画梅花。”(见《西湖》1979年9月第9期，于昕：《怀念尊敬的郭老》。又见《郁达夫诗词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十月

2日 作时论《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载1945年10月11日上海《建国日报》。

7日 作杂文《天地玄黄》。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揭示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如“天地玄黄”，“疟疾初愈”，随时可能“再发寒战”。指出要治愈这病根，必须实行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载上海《周报》1945年10月27日第8期。初收《天地玄黄》。

9日晚，参加李少石验尸。李少石(1906—1945)，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秘书、《新华日报》的编辑。8日晚，从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乘车送柳亚子回沙坪坝住宅，归途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验尸结果，“枪是从背后打进去的，子弹在体内已分裂为五粒，证明是毒弹”。(《沫若文集》第13卷第371页)

10日 创办、发行《建国日报》晚刊，刊头下注明：此为“《救国日报》改名，发行人郭沫若”。该刊出至第15号，于1945年10月21日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发行。

同日 发表《〈苏联纪行〉前记》。载《新华日报》。收《苏联纪行》。

11日 参加李少石葬礼。参加葬礼的还有周恩来、宋庆龄、潘梓年、熊瑾汀、王炳南、徐冰、张晓梅、刘昂、汪琦、乔木等四十余人。(据柳亚子：《誓墓行》，见《柳亚子诗词选》)

12日 致信《周报》编者唐弢、柯灵。月初，唐弢、柯灵为出版《周报》，曾致函郭沫若，请求大力支持。郭沫若在复信中寄去杂文《天地玄黄》一篇，并告知自己的行踪，说：“……友辈居渝者，渴望早日东下，惟交通尚未充分复原，一时恐难成行。至弟个人颇想暂留蜀中，觅得一机会作青城峨眉之游，因弟虽蜀

人，此等胜地未曾去过。近来很少写东西，剪寄《天地玄黄》短文一篇，请一阅，可觐弟之心境也。……”（唐弢：《永恒的怀念——悼郭沫若同志》，见《欢呼春天的诗人》）复信和文章均载《周报》第8期。

15日 发表论文《人民世纪的文艺》。载《建国日报》副刊《春风》第6期。

17日 作《我建议》，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指出：为使鲁迅的纪念由书斋走向社会，为使鲁迅的精神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建议设立鲁迅博物馆，塑造鲁迅像，并把杭州的西湖改名为鲁迅湖，等等。载1945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讲话内容曾录于报道《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力扬）中，载上海《周报》本年11月3日新第9期。

20日 作杂文《今屈原》。称赞柳亚子是今日的屈原。载1945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

21日 上午，在中苏文协妇委会上作题为《苏联妇女漫谈》的演讲。载重庆《中苏文化》1945年11月7日第16卷第11期《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纪念特刊》，内容提要载1945年10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郭沫若先生讲苏联妇女》。

同日 出席“文协”在张家花园召开的联欢晚会并题诗一首：“今夕复何夕，文林盛会开，烛光鸡尾酒，月影凤头钗。香华随风举，词华逐电来，宵深人不觉，清话共徘徊。”会上，周恩来同志向大家讲了延安文艺活动的情况。（据1945年10月22日《新华日报》报道：《文协昨开联谊晚会》）

29日 作杂文《应有的结论》。载《中苏文化》1945年11月7日第16卷第11期《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纪念特刊》。

本月 发表人物评传《王安石》。载重庆知识青年社《知识青年》（半月刊）第1卷第3期。收《历史人物》。文后附作者1947

年7月3日后记。

同月 《郭沫若杰作选》(巴雷、朱绍之编选)由上海新象书店出版。

本月 10日,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发表。

同月 1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文协”)。

同月 茅盾的剧本《清明前后》在重庆出版。

同月 30日,我国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病逝于莫斯科。

十一月

4日 作《苏联问题二三事》。载1945年11月7日《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

同日 在中大学生自治会上作讲演,经报社整理成文,题为《苏联观感》。载1945年8月5日《新华日报》。

本月 郭沫若等致函赛珍珠及全美作家。(据《新华日报》)

同月 周恩来在天官府街郭沫若寓所召开文艺座谈会,建议文艺界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检查工作,改进工作。在回顾过去文艺界的情况时说,“五四”以后,鲁迅起了最好的作用,他的思想的革命性、深刻性和影响最高最大。创造社也起过很好的作用,冲破封建枷锁,也是进步的。他对郭沫若五四运动的新诗作了肯定,说那些诗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对青年的影响很大。也谈到了茅盾和文学研究会。接着,郭沫若也讲了话,表示他在“五四”以后写的新诗也有缺点,但当时他是要求革命的。听了恩来同志的讲话,对自己的认识更清楚了。(据何其芳:《回

忆周恩来同志——〈中国交响乐〉第一乐章的一些断片》，见《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

本月 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策划对解放区的全盘作战计划。

同月 19日，重庆文化界、工商界代表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重庆各界人民反内战联合会”。

同月 25日，昆明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举办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26日，举行罢课斗争；29日，全市学生五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

同月 我国开始收复台湾。

同月 14日，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第2版副刊发表，轰动重庆。

十二月

3日 作文《吊星海》。悼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载1946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1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

9日 去长安寺参加“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追悼会。本月1日，国民党特务冲进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校园，镇压要求和平民主的师生，李鲁连、苟极中、潘琰、于再四人被害，六十余人受重伤，此即“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纷纷抗议国民党的暴行，重庆各界三千人本日举行追悼大会，郭沫若、沈钧儒等怒斥国民党的罪行，要求审判制造惨案的祸首。会上，郭沫若作《祭昆明四烈士》，痛斥“屠民以逞”的“佞人”，强烈要求严惩凶手，表示“公等前驱，为民榜样”，为了中国的前途，后

死者愿“誓步后尘，戢役披猖”。诗收《蝴蝶集》，诗前有小引。

10日 发表诗《进步赞》。为纪念昆明“一二·一”惨案而作。载本日《新华日报》。收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又收《蝴蝶集》。

15日 作时评《历史在大转变》。指出：中国已处在历史大转变的时期，“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扭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载《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1945年12月26日第2期，又载1946年1月1日《文汇报》，并收入1946年11月《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作为《序》，题《序历史的大转变》；又收《天地玄黄》。

17日 作论文《一切为了人民》。载《抗战文艺》1946年5月1日第10卷第6期。

25日 发表《沁园春·和毛主席韵》二首。毛泽东同志的词《咏雪》发表后，许多报刊刊载唱和之作，郭沫若亦填词二首相和。其一为“国步艰难”，其二为“说甚帝王”。回叙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表达了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强烈不满，最后表示：“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朗”，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词中还驳斥了《大公报》的谬论。载1945年12月11日《新民日报》；又转载于《民主与科学》第9、10期合刊及《联合增刊》1945年12月25日第6号合订本。收《蝴蝶集》。

27日 作杂文《兵不管秀才》。从有人主张“秀才管兵”谈起，尖锐批判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提出军政划分，缩小军人权柄，并指出：在要求“秀才管兵”之前，应先要求“兵不管秀才”。载《民主生活》1946年1月创刊号；又载上海《文萃》（周刊）1946年1月24日第10期。收《天地玄黄》。

28日 作杂文《相见以诚》。针对国民党欺骗人民的反动本

质，予以辛辣讽刺。指出：“专门靠欺诈便能打胜战，专门靠欺诈便可以收到任何大小事件的成功，天地间决没有那样的事情。”收《天地玄黄》。

30日 作时评《走向世界和平的桥梁》。提出中国应成为“走向世界和平的桥梁”。收《天地玄黄》。

本月 作诗《春礼劳军歌》。收1948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蝴蝶集》。

同月 作《阵亡及殉职政工人员挽歌》。收1948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蝴蝶集》。

同月 作诗《迎〈西北摄影队〉凯旋》。收《蝴蝶集》。

同月 作诗《咏史》四首。收《蝴蝶集》。

同月 作诗《松崖山寺》。收《蝴蝶集》。

本月 16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由延安飞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同月 23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召开盛大座谈会，声援国民党区文艺界争取和平民主自由运动。

本年 阿英创作历史剧《李闯王》，并在苏北根据地上演。

同年 韩起祥创作并演出《刘巧团圆》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

同年 重庆出版《文哨》月刊(叶以群编)、《艺文志》月刊(聂绀弩编)；南京出版《世界文艺季刊》(杨振声、李广田等编)；上海出版《周报》(唐弢、柯灵编)。

一九四六年(五十五岁)

一月

5日 和周恩来等参加“冼星海纪念演奏会”。

14日 作时评《巩固和平》。本月10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有各党派参加的政协会议同时召开。郭沫若为此指出,这仅仅是开始,“暴风雨的征候并没有完全渡过,害虫还四处都潜伏着”,随时可能破坏这成果。他严正要求国民党真正实现停战,并遵行“人民自由,政党平等合法,由地方自治以至普选,释放政治犯”等四点诺言。载1946年1月15日《新华日报》。

25日 作《民族解放的先锋——纪念“一·二八”第十四周年》。载1946年1月28日《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1947年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

本月 发表为《新华日报》所作题字:“冼星海纪念特刊”。载1946年1月5日《新华日报》。

本月 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同日,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开幕。由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和广大政协代表的斗争,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五项原则。

同月 重庆文艺界茅盾、巴金等发表《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废止文化统治政策”。电影戏剧界阳翰笙、洪深、曹禺、宋之的、马彦祥等五十余人，也发表了《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意见书》，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对电影、戏剧活动的迫害，要求“废除对话剧、电影、旧剧、新剧的一切审查制度”。

同月 《文联》半月刊(茅盾、叶以群编)和《文艺复兴》月刊(郑振铎、李健吾编)在上海创刊。

二 月

10日 携全家参加在校场口举行的重庆各界群众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被国民党暴徒殴打受伤。本日，重庆各界二十余团体的群众，齐集校场口，庆祝政协成功。上午9时，会议刚开始，一个自称“市农会代表”的刘野樵，在特务的起哄声中爬上主席台，霸占扩音器，自称“总主席”，宣布开会。当时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前去阻止，台下特务蜂拥而上，抡起棍棒就打，李公朴被推倒台下，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见此情况，愤慨万分，上前制止特务的暴行，也遭到毒打，左额被打肿，眼镜打落在地上，胸部亦被踢。(见报道：《有组织暴徒借势逞凶捣乱 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 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及到会群众多人被殴受伤》，载1946年2月11日《新华日报》)，当时被打伤的有六十余人，此即“校场口血案”。事后，《新华日报》、《新民报》等各报，揭露国民党的暴行，全国各界人民也纷纷通电，向国民党表示抗议。

同日 下午，赴中苏文协参加二十三团体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校场口事件”经过。

11日 在市民医院里与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等接受周副主席、邓颖超、廖承志等亲切慰问。郭沫若曾记述当时的情况：“一个星期的光景慰问者络绎不绝。鲜花不断地送来，没有那么多的花瓶来插。广柑接到了二十几篓之多。……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做得高明。……然而正感谢你有这一些的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泛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南京印象·十六 慰问记者》）

12日 晨，接见力扬，谈校场口事件，表示要与国民党斗争到底。他说：“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着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力扬：《郭沫若先生访问记》，见《文联》1946年2月第1卷第4期）

17日 作诗《红军为什么那样英勇》。载1946年2月23日南京《中苏文化》庆祝苏联红军节第二十八周年纪念特刊。

23日 为纪念苏联红军节，作短评《红军英勇的源泉》。指出苏联红军胜利的原因是国家制度、文化成就和领导的正确。载1946年2月25日《新华日报》。

本月 作讲演《文艺的新的内容和形式》。指出，今天的文艺“要求有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文艺“不应再只看到上层分子，不能再以少数人为对象，应当是以社会的真正主人为对象，即一般人民大众。文艺作者应当向下看，为人民群众歌功颂德”，认为这是新旧文艺的分水岭。载《文艺春秋》1946年7月15日第3卷第1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集外”。

同月 22日，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报馆被国民党特务捣毁。几天之后，郭沫若和重庆其他政协代表找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交涉。郭沫若慷慨陈辞，严厉斥责国民党当局这种无耻而愚蠢的行径。（见《南京印象·十六 慰问记者》）

同月 郁达夫之子郁飞来访，将沈兹九给自己的信交给郭沫若，信中报告了郁达夫失踪的有关情况。

本月 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三方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叶剑英等。

三 月

4日 和茅盾等二十余名文艺界人士慰问洪深的函件刊出。载本日《新华日报》，题为《郭沫若茅盾等慰问洪深教授》。洪深时任复旦大学教授，本月2日因仗义执言，制止学生非法行动，被少数暴徒殴打。

同日 至中共办事处会见刚出狱的叶挺将军。

同日 作散文《叶挺将军的诗》。高度评价叶挺在狱中所写的诗。他说叶挺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这里燃烧着无限的愤激”，也“辐射着明彻的光辉”，这是“真正的诗”。载《唯民周刊》1946年4月6日第1期。收《天地玄黄》。

6日 作《论郁达夫》。追忆了从日本留学时代起直至抗战以后，两人之间的交往和友情，叙述了郁达夫的主要经历和最后被害的经过，对他表示深切怀念。文中称赞郁达夫的才能，肯定了他在五四时期对于文学和思想革命的突出功绩。载《人物杂志》1946年4月1日第3期。收《历史人物》。

8日 在赖家桥寓所接见在华日本人民战友同盟的代表长谷川敏三等三人。谈话中表示自己绝不参加蒋介石政府。他说：“蒋介石挑动内战，不惜使用日本军队，发动了反共战争，同时却恬不知耻地发表了要我作为无党无派人士的代表入阁的要求”，“那帮家伙花言巧语来引诱我，我绝不去理睬他们”。并对中国

革命充满了必胜信心，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接见时，还应长谷川敏三的请求，为他题了词：“超过了死线获得光辉的新生”。（据长谷川敏三：《超过了死线的日子》，译自1978年7月5日《日本和中国》一文，《新文学史料》第2期转载）

12日 作论文《关于李岩》。谈李岩的生平、思想及轶事。载《清明》1946年5月1日创刊号。收《历史人物》，作为《甲申三百年祭》“附录”。

15日 和李公朴等出席重庆地方法院审理“校场口事件”的庭审。

17日 作文艺论文《文艺与科学》，论文艺和科学的关系。认为“科学是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最高的阶段，是人类精神辨别是非、认识真理的最高成就”，而文艺，“假使是属于研究或批评的范围，那完全是科学的一个分枝”，即便是创作，也是“科学精神的另外一种化装表演”。载《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5月15日第1卷第5期。收《天地玄黄》。本篇又载1946年6月12日、13日上海《文汇报》，篇名题《科学与文艺》，系“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假育才公学礼堂举行的演讲会的记录稿，由俞辰记录，内容略简。

27日 作《〈亚洲苏联〉序》。称赞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是“最适时宜的一件事”，并热情地向读者推荐、介绍。《亚洲苏联》一书系美国戴维斯和施特格作，朱海观译。1946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序言载1946年4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

四 月

1日 为《青年学习》题刊名。见重庆《青年学习》第1卷第1、

2期合刊。

3日 作论文《文艺工作展望》。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历史事实，展望今后的文艺工作。指出，今后文艺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要强调“文艺内容的政治性”，也要重视艺术性，文艺家要进行艺术技巧的锻炼。本文原系北平一文艺杂志之约稿，“后因时局激变，杂志未能创刊，这篇东西也就搁置下来了”（“跋语”），至同年9月18日作补充后发表，载《群众》1946年9月22日第12卷第9期，同年10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收《天地玄黄》。

同日 作《〈联合三日刊〉发刊词》。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破坏民主团结的罪行，揭露国民党“出尔反尔，喊价还价”，污毁、篡改政协决议的阴谋，和某些人助纣为虐，甘当“花瓶”的无耻行径，号召人们排击独裁分裂，坚持走民主团结的道路。收《天地玄黄》。

同日 在戏剧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第一次学术演讲会上作演讲，谈抗战时期的历史剧。讲话列举了抗战以来的历史剧创作情况，指出1941年至1945年历史剧创作中的五种情况：一、追求历史真实；二、借古代史实影射现代；三、同情古人；四、迎合一般人民的兴趣；五、帮闲和御用。对第四和第五种情况表示否定。郭沫若还反驳了那种认为写历史剧就是逃避现实的说法，并谈了历史同历史剧的区别。郭沫若在讲话中还谈到自己爱用我国历史题材写剧本的原因和关于《孔雀胆》的创作。讲话由殷野记录，载1946年5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题名为《郭沫若先生讲：抗战八年的历史剧》。

6日 在天官府街寓所接见黄齐生老先生。黄齐生上月从延安来重庆，代表延安各界人民慰问校场口事件中的受伤者，事毕即将返延安，今日来向郭辞行。后于8日因飞机失事，同王

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等同时遇难。

13日 获悉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遇难的噩耗，即和黄洛峰、史良、阎宝航、李公朴、施复亮、王葆真等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对烈士们牺牲深表哀悼。又，和邓初民、杜国庠等十四人联名致函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赴中共代表团驻地参加吊唁，参加发起举行“陪都各界追悼大会”，为筹备会成员。函件均载1946年4月15日《新华日报》。

同日 夜，作《挽歌——献给若飞、希夷、博古、邓发及其他烈士》。悼念“四·八”遇难烈士。载1946年4月15日《新华日报》；经夏白谱曲后，改题为《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载1946年4月17日《新华日报》。又载本月19日《新华时报》“追悼飞延遇难诸先生特刊”。收《蝴蝶集》，题为《挽四八烈士歌——献给若飞、希夷、博古、邓发及其他诸位烈士》。

15日 作长篇散文诗《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悼念“四·八”烈士，共包括“哭若飞”、“哭博古”、“哭希夷”、“哭邓发”、“哭黄齐老”、“哭秀文姐”、“哭扬眉”等。载1946年4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收中共代表团编《“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又收《蝴蝶集》。

19日 上午，参加陪都各界追悼“四·八”遇难烈士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祭文，“他那颤抖的声音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祭文在他手里颤动着，他读着：‘生为民主，死为民主’，他流泪了，群众也流泪了。”（见特写《陪都昨举行追悼》，载1946年4月20日《新华日报》）

23日 作杂文《我更懂得庄子》。尖锐地讽刺国民党在“和平”“民主”的幌子下，实行法西斯统治。载《联合三日刊》1946年5月第6期，同年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收《天地玄黄》。

25日 作杂文《重庆值得留恋》。于返沪前夕,对居住、战斗了六年半的重庆表示依惜之情,同时,给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以辛辣的讽刺。载1946年5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

本月 《苏联纪行》由中外出版社出版,列入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研究丛书第三种,郭沫若亲自题写书名。本书为1945年6月至8月16日访苏日记。1946年10月再版。1949年8月,另题名《苏联五十天》(删削本),由大连新中国书局出版。1959年按原书名编入《沫若文集》第9卷。

本月 6日,晋冀鲁豫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抗战八年来文教工作的经验,号召文化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邓小平到会作政治报告。

五 月

2日 作《纪念第二届“五四”艺术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回顾抗战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缺点,结合当时形势,提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和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收《天地玄黄》。

4日 在重庆纪念艺术节会上作演说,强调了文艺家要有科学的态度,文艺与科学不能分家,不能“不辨事实”,而提“主观的燃烧,拥抱”;强调指出,今后要全力争取五四的课题——民主。演说由黄裳记录。载1946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题为《“科学”与“民主”,争取“五四”课题的实现》。

6日 作《学术工作展望》。指出“五四”以来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任务,“依然是我们学术工作者急待解决的课题”。要求一切学术工作者团结起来,“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来领导中国的一

切,尽力争取中国的民主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彻底的斗争”。载《中国学术》(季刊)1946年8月1日创刊号。发表时题名为《坚定的民主立场》。本文于第二年又作修改,改为现篇名。收《天地玄黄》。

7日 作《屈原不会是弄臣》。对孙次舟、闻一多认为“屈原是弄臣”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念虽然“新颖”,但“证据太不够”。载《诗歌》月刊1946年6月第3、4期合刊。收《天地玄黄》。

8日 和梁漱溟、章伯钧同乘飞机离开重庆,下午抵上海。住迪思威路719号(现名溧阳路)。

9日 发表题词:“不能作为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手迹载1946年5月9日《文汇报》。

同日 为《消息半周刊》题词:“保持冷静的头脑,辨别事实的真相,真理何在,以全生命趋赴之”。载《消息半周刊》1946年5月20日第11期。

13日 夜,和田汉等赴三和楼晚宴,席间,作诗一首,诗云:

适从山里来,上海今依旧。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
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

载1946年5月14日上海《文汇报》,题作《郭沫若先生近作》。

18日 发表讲演《反对战争》。载本日出版《人民世纪》(周刊)第12期,此文由隆真定记录。

21日 会见吉少甫和魏绍昌。吉少甫是群益出版社负责人,刚随出版社自重庆迁来上海。他应魏绍昌的要求,陪同访问郭沫若。魏绍昌为了支持群益出版社出版全套郭沫若文集的计划,曾把郭沫若在泰东、光华、现代等书店出版的早期著作,赠给出版社,对此,郭沫若表示感谢,并告以最新消息,国民党十万

官兵被我们的部队包围起来了。国民党是不中用的，内战是打不久的。（魏绍昌：《回忆郭老二题》，收《悼念郭老》）。

23日 和田汉等参加上海文艺、戏剧、平剧界人士举行的“改良平剧座谈会”。在发言中指出，“五四”以来新文艺在“民族形式”方面有严重缺陷，肯定了改造旧形式的必要性。载上海权威出版社《月刊》1946年7月10日第2卷第1期。发言摘要又载1946年8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题为《记上海改良平剧座谈会》。

24日 作《由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高度评价屈原的伟大，猛烈抨击反对人民纪念屈原的政治逆流，指出，“要想用政治的力量”再次毁灭屈原的形象是“徒劳的幻想”。同时，认为“屈原是弄臣”的说法“证据不够”。载1946年6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

27日 发表《苏联的建设》，谈苏联战后的建设，指出中国充满全面内战的危机，鼓励人民起来反对内战，赢得光明。此为讲演稿，由兰依记录。载本日上海《文汇报》。

30日 作《“不要把自己的作品偶像化”》。称高尔基是自己“精神上的维他命”，他的名言“不要把自己的作品偶像化”，是“教人谦抑，虚己，实在是极可宝贵的修养过程”，使自己“终身受用”。载上海《群众》（周刊）1946年6月16日第11卷第7期，又载1946年6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

31日 在圣约翰大学文艺欣赏会上作演讲，题为《青年与文艺》。从文学史说起，归结到：“今天我们中国所需的是能代表人民说话的文艺。”因而，文艺作品要“歌人民之功，颂人民之德”，当前，就要表达“和平”“民主”的愿望，坚决反对“内战”。由古人记录。载1946年6月4日、6日上海《文汇报》。

本月 作论文《一切为了人民》。载《抗战文艺》1946年5月

第10卷第6期。

同月 在上海百货业工会演讲，会后，由冯乃超陪同访于伶。当时有人正在为于伶写《看升官图》一诗的条幅，郭老步韵和诗，也写了一张单条赠于伶。首联是“一边大打一边谈，内战烽烟北到南”。中间四句写了美蒋反动统治之下的社会黑暗现象，最后两句是“莫谓人民终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见《悼念郭老》）

同月 偕许广平、冯乃超、周信芳、于伶等人去虹桥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这是郭沫若第一次亲临凭吊鲁迅之墓，在鲁迅坟前默哀并献了鲜花。

同月 在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大会上演说。

同月 历史剧《筑》，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在“附录”中，还收有《关于筑》、《剧本写作的经过》、《人物分析》等三篇。1948年2月修改并作《校后记之一》，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1956年修订，并作《校后记之二》；1957年编入《沫若文集》第4卷，改名《高渐离》。

同月 5月，《归去来》，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本月 5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

同月 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集《宝贝儿》出版。

六 月

1日 作杂文《教育与学习》。从教育和学习谈起，批判国民党以“训政”、“警管”为名，扼杀人民的民主权利。收《天地玄黄》。

同日 发表《编印郁达夫全集——答向蜀光先生》。表示愿“义不容辞”地、“虔诚”地担负起编印郁达夫全集的责任。文章充

分肯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上的进步作用和为人的正派高洁，认为他在中国新文学上的地位“很象俄国文学中的屠格涅甫”，同时，他“也认定了新社会的前途”。载本日出版的《人物杂志》第5期。

3日 作《青铜时代·后记》的跋语，收《青铜时代》。

4日 和茅盾、田汉等出席“诗人节文艺欣赏会”并作讲演，从屈原谈到当前文艺情况，据报道，“他鼓励大家不要害怕，言论自由不是人家赏的，是自己争取来的……”，他“说出了每一个有正义的青年的心里的话，全场掀起强烈的掌声。”（见《为人民歌唱》，1946年6月5日《文汇报》）

同日 晚，参加文艺界聚会。到会的还有柳亚子、茅盾、田汉等。

7日 致金沙信。对金沙所赠之诗刊《野火》第1期作了好评。（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8日 作论文《走向人民文艺》。指出，今天文艺创作的原则“应该以人民为本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善、便是美、便是真，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恶、便是丑、便是伪”。为了创造人民的文艺，文艺工作者必须“诚心诚意向老百姓学习”。载1946年6月22日上海《文汇报》，又载1946年6月24日《新华日报》。收《走向人民文艺》。现收《天地玄黄》。

9日 作论文《诗歌与音乐》。谈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及时代对它们的要求，指出，应把诗歌与音乐“奉仕于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感情，成就人民的愿望”，“要以人民的意识为意识，时代的节奏为节奏”。载1946年6月15日《联合日报》晚刊，又载1946年7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收《走向人民文艺》。现收《天地玄黄》。

10日 作时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

民党反动派的“十五天的停战令”，是为了更大规模的内战作部署，指出“玩火者是会自食其果的”。载《周报》1946年6月15日第41期。收《天地玄黄》，篇名题《毫不乐观》。收入《沫若文集》时篇名题《玩火者必自焚》。

15日 发表《答〈民主周刊社时局六问题〉》，谈国共关系问题。载本日上海《民主》(周刊)第35期特大号。在同一标题下尚有马叙伦、郑振铎、景宋的答问。

16日 在中苏文协等八文化团体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作讲演，题为《追慕高尔基》。热情赞扬高尔基“开创了人民的新文艺”的巨大功绩和对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号召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加强团结，为制止战争，巩固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文艺而奋斗。载1946年6月18日上海《联合日报》晚刊。又载7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收《走向人民文艺》，题为《坚持人民本位的人民文艺》。又收《天地玄黄》。

17日 在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上发言。记录稿载《上海文化》(月刊)1946年7月1日第6期(未经本人审阅)，题为《抗战期间文艺界总趋势，今后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20日 晨，和冯乃超到南京。在兰家庄“民盟办事处”会见朱蕴山、卢广森、罗子为、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

上午去参政会拜会秘书长邵力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施政方案表示不满。又，会见了副秘书长雷震。

中午，访梅园新村30号，和周恩来共进午餐。

下午，在国民大会堂参加第三方面邀请政府代表的茶会，出席者还有黄炎培、张君勱、王云五、以及“政府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等。

21日 上午，去苏联驻华使馆访费德林，为其解决《屈原》

汉译俄的难题，并用白话翻译了《桔颂》、《礼魂》二诗（参见本谱本年7月5日、9日条）。

中午，应周恩来之约往梅园新村，周恩来出示国民党提出的文件和由他起草的代表中共方面的对案。国民党提出的整军方案，要八路军退出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及一切重要的交通线，却只字不提“政治民主化”这一根本问题。对此，周恩来提出的对案中第一条为主张立即下令全面停战，最后一条即为要求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同国民党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准备继续从事反人民内战的阴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下午，去兰家庄出席第三方面的座谈会，得悉“休战延期八天”的消息。

22日 上午参谒中山陵。

下午，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第三方面邀请中共代表座谈。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以及傅斯年、罗隆基等参加座谈。

晚，同冯乃超去侯外庐、曹靖华处，途遇亚克、锡嘉，约他们次日同游玄武湖。

23日 和冯乃超、侯外庐、曹靖华、亚克、锡嘉、张申府、王治秋、冯焕章（玉祥）同游玄武湖，归返，和冯乃超访李任公。回旅社后，接梅园新村电话，即往。周恩来、邓颖超告知上海人民代表来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遭“难民”殴打的消息。

24日 凌晨，和周恩来同往中央医院慰问被打的代表和新闻记者，被打伤的有马叙伦、阎宝航、吴耀宗、雷洁琼、陈震中、叶笃义、浦熙修、高集等。黄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綢伯等没有受伤。

下午，与傅斯年、莫德惠参加第三方面与国民党代表的座谈。

晚，出席民盟招待上海代表的晚宴。

25日 与冯乃超又往医院看望受伤代表。

复往梅园新村访周恩来、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以雨花台的“雨花石”相赠，郭沫若选了二十二粒留作纪念。

又 访浦熙修和高集。

同日 发表《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与参加民主斗争》。载今日出版的《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6期。

同日 发表《反内战》。载本日上海《民言》（半月刊）创刊号。

26日 自南京返回上海。

26日、28日 在上海市立戏剧学校所作讲演记录发表。郭沫若形象地谈到写历史剧的三种主要动机是“赋、比、兴”，并又一次批评了“写历史剧是开倒车、逃避现实”的说法。载26、28日上海《文汇报》，题为《郭沫若讲历史剧》，由周惜吾记录。

本月 收到陆定一寄来的《吕梁英雄传》和《白毛女》，立刻把《白毛女》读了一遍，认为“故事实在是动人”。

本月 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内战。

夏

作诗《断想四章》——《恐怖》、《骗》、《慈悲》、《诅咒》，怒斥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载1946年7月15日上海《文汇报》。收《蜩螗集》。

七 月

1日 作杂文《“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以1938年武汉人民踊跃参加献金运动这一事实说明人民力量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载《民主》1946年7月6日周刊第38期。收《天地玄黄》。

5日 发表《〈桔颂〉今译》。载本日上海《文汇报》。收《蝴蝶集》。

7日 为《文汇报》题词发表：“以十倍抗战的精神从事和平建设”。载本日《文汇报》。

同日 作书简《寄日本文化工作者》。载《日本论坛》(月刊)1946年8月15日创刊号。

同日 记事散文《南京印象》开始发表。从本日起至8月25日，连载于《文汇报》。后集为单行本，于本年11月由群益书店出版。

9日 发表诗《〈礼魂〉今译》。载本日《文汇报》。收《蝴蝶集》。

10日 发表《国共的前途怎样》。载本日出版的《民言》(半月刊)第2期。同时刊登的尚有茅盾、陶行知等人的文章。

同日 作杂文《皮杜尔和比基尼》。反对美国军部在比基尼岛试验原子弹，指出原子弹崇拜狂者“和向着猪神叩头的图腾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载上海《周报》1946年7月20日第46期。收《天地玄黄》，题作《比基尼岛上的试验》。

又 作《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评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批判王芸生借谈历史为名反对共产党。上年毛泽东主席至重庆谈判时，重庆《新民晚报》发表了《沁园春·咏雪》一词，一时人们竞相和韵酬唱。《大公报》也刊登了毛词

和柳亚子的和词，紧接着发表王芸生的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影射毛泽东是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等等。郭沫若在文中指出：王芸生以打倒“正统”、“道统”为“糖衣”，实质是要取消革命，维持国民党的所谓“法统”。他以责骂诸葛亮、曾国藩为糖衣，实际是借题发挥咒骂毛泽东。载上海《周报》1946年7月20日第46期。收《天地玄黄》。

15日 作杂文《让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悼念本月11日被特务暗杀的民主战士李公朴。说李公朴“为民主运动而流尽了他最后一珠血。他的精神和民主运动有机地生合了起来，只要人民还存在着的一天，永远会发生着鼓励的作用的”。载《群众》（上海版）1946年7月21日第11卷第12期。收《天地玄黄》。

17日 作《悼闻一多》。悼念本月15日被特务暗杀的民主战士闻一多，怒斥国民党法西斯暴行。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对闻一多这样的学者“都要用卑劣无耻的政治暗杀的手段来谋害”，说明他们已经到了绝望的顶点了。并说“闻一多没有死”，他为人民献身而“得到了永生”。载《民主》（周刊）1946年7月20日第40期。收《天地玄黄》。

又 作杂文《等于打死了林肯、罗斯福》。悼念李公朴和闻一多。指出：“公朴和一多为人民大众而牺牲，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他们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头，永远领导着争取自由民主的战斗。永远不会死”。并号召大家“化悲愤为力量，把恐怖还给施行恐怖政策者。”学习李公朴和闻一多，“坚决扑灭法西斯瘟疫！”载《群众》（上海版）1946年7月21日第11卷第12期。收《天地玄黄》。

23日 晚，陶行知等来寓交谈，8时，同赴一友人处，10时左右分手时郭沫若对他半开玩笑地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陶也半开玩笑地说：“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

也准定榜上有名的”。表示着对国民党暗杀恐怖手段的卑视和蔑视。不料，两天后(本月25日)，陶行知因操劳过度，突患脑溢血去世。

25日 《文汇报》“读者的话”栏内发表郭沫若、叶圣陶等致该报的慰问信。《文汇报》于本月18日至24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今日始复刊。

26日 赴殡仪馆参加陶行知追悼会，并在哀悼仪式上宣读《祭陶行知先生》一诗。高度评价他对人民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我们不怕无声手枪，我们不怕原子炸弹，我们要追步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的后尘，向法西斯余孽，作毫不容情的清算”。坚信革命必定会取得胜利，“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轻侮的地下火，终有烧毁镣铐，象火山爆发的一天”。载上海《群众》(周刊)第12卷第1期，又载1946年7月31日《新华日报》，收《陶行知先生纪念集》，又收《蝈蝈集》。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题《祭陶行知》。

同日 作文《痛失人师》。怀念陶行知，深感古人所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逢”一语之真切。“有学问知识的人比较容易找，而有人格修养的人实在是如象凤毛麟角。陶先生就是这凤毛麟角当中的一位出色者”。收《陶行知先生纪念集》，又收《天地玄黄》。

30日 作《读〈陶先生的最后一封信〉》。陶行知在给几位朋友的最后一封信里，从关怀青年出发，在“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之外，加了“达者不恋”一条；又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加了“美人不能动”一条，郭沫若认为这“真真是足以使人惊心警目。”并深感陶行知“为青年们设想得怎样周到”，且具有独创精神。文末，郭沫若又为陶的主张作了补充，认为“应当忧而忧，不失为仁者，仁者是‘忧以天下’的。应当感而感，不失为智者，智者是以‘不知为不知’的。应当惧而

惧，不失为勇者，勇者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同样，“应该恋而恋，亦不失为达者，达者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载1946年8月2日上海《文汇报》，收《天地玄黄》。文后附作者1947年3月15日所作的《后记》。

又 作杂文《记不全的一首陶诗》。回忆陶行知的一首诗作，赞扬他虚心向小孩学习的精神。载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8月3日第42期。收《天地玄黄》，文后附作者1947年3月13日所作的《后记》。

又 作杂文《陶行知先生最值得学习的地方》。载上海生活书店《读书与出版》(月刊)1946年8月15日第5期。

本月 作诗《中国人的母亲》。表现丈夫被杀害，儿子受了伤的“母亲”，决心起来反抗、斗争的心情。收《蝴蝶集》。

又 为悼念陶行知作《挽歌》。表示要高举“民主的旗帜”，“不断地向前向前”。载上海《文萃》周刊1946年8月1日第41期，由沙梅谱曲，诗收《蝴蝶集》，题名《陶行知先生挽歌》。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题名《陶行知挽歌》。

本月 周扬的文艺论文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出版，收作者在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以后所发表的文章。

八 月

2日 作杂文《反反常》。有感于“世道”的反常，提出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对于“世道”才有所改革。收《天地玄黄》。

9日 作评论《板话及其他》。高度评价《李有才板话》(赵树理著)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称它们是“抗战以来文艺作品的杰出者”，在这些作品中，“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

的作风，新的文化”，内容和手法“新颖、健康、素朴”。载1946年8月16日《文汇报》。收《论赵树理的创作》，1947年7月冀鲁豫书店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

10日 作《谈解放区文艺创作》，包括向北方的朋友们致人民的敬礼，以及致陆定一信。载《群众》（上海版）1946年8月24日第12卷第4、5期合刊。收《论赵树理的创作》，1947年7月冀鲁豫书店出版。

13日 为《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作《序》，并为该书封面题字。载《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

同日 和茅盾等参加文协上海分会为冯玉祥赴美国而举行的欢送会。

15日 作《自由在我——为纪念〈周报〉休刊而作》。愤怒斥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用“无声手枪”杀害民主人士，用“无声手谕”查禁进步报刊的罪恶行径，表示：“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间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周报》在民主运动史上，在反内战运动史上，将永远保存着它的令誉，就象李公朴和闻一多一样，是永不死，而且永远发展着。”载《周报》1946年8月24日第49、50期合刊（休刊号）。《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唐弢、柯灵编辑。郭沫若曾给该刊以极大支持。7月19日《周报》被禁。

19日 作杂文《司徒·司马·司空》。针对马歇尔、司徒雷登8月10日的联合公报，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揭露它在和平调停外衣下的侵略实质，提醒人们不要为马歇尔的表面现象所迷惑。9月2日在“补记”中，进一步揭露美国利用“剩余物资”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收《天地玄黄》。

本月 作杂文《从灾难中象巨人一样崛起》，评当时正在上

海展出的司徒乔战灾区画展。载《清明》(月刊)1946年10月15日第4号。

同月 《历史人物》，由重庆人物杂志社出版。1947年8月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本月 10日，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调处”失败，实际是放手让蒋介石大打内战。

九 月

3日 作时评《关于非正式五人小组》。揭露司徒雷登玩弄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的新阴谋。收《天地玄黄》。

14日 作论文《鲁迅与王国维》。高度评价鲁迅与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并论述两人的异同。郭沫若说：王国维和鲁迅的经历、思想历程和治学方法及态度，相似到令人惊异的地步。但他们两人却有着“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鲁迅的死，使人感到庄严；王国维的死，使人感到惋惜。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完成”；王国维好象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载《文艺复兴》(月刊)1946年10月第2卷第3期。收《历史人物》。

同日 复赵景深信，谢辞嘱任《郁达夫全集》编委。(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17日 作评论《读了〈李家庄的变迁〉》。赞扬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认为它象“一枝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扎根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由自在”。这是因为作家“处在自由的环境里”，他的作

品才能自由地成长。载上海《文萃》(周刊)1946年9月26日第49期。收《论赵树理的创作》，1947年7月朝城冀鲁豫书店出版；又收《天地玄黄》。

18日 作《文艺工作展望》一文的“跋语”。认为原文中有些说法和当前局势已不甚切合，但仍强调政治性的重要；同时又指出：“第三种人的论调逐渐在出现，我们应该毫不容情地予以反击。”认为在“有的退让，有的高蹈，而大家都有一点茫然”的情况下，人们“正需要灯塔”。载《群众》(周刊)1946年9月22日第12卷第9期。收《天地玄黄》。

26日 作杂文《怎样使双十节更值得庆幸》。认为必须“恢复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彻底实现他的三民主义，实现以三民主义为准绳的政协决议，永远停止内战，成立民主的宪法和政府，限制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谢绝一切帝国主义性的‘援助’”，等等。载上海《民主》(周刊)1947年10月10日第2卷第1、2期合刊。收《天地玄黄》，篇名题《怎样使双十节更值得纪念》。

又 在文化教育界座谈会上讲话，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批判美国对华政策。指出：不仅要美军撤退，更主要的是要美国改变危害中国和世界和平的政策。发言提要载1946年9月27日上海《文汇报》报道：《文化教育界昨举行座谈》。

本月 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长诗以陕北三边土地革命为背景，歌颂了农民翻身闹革命的英勇斗争。全部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成，是《讲话》发表后，我国诗歌创作在民族化群众化道路上的新成就。1947年3月由中国出版社出版。

十月

1日 作杂文《为美国人设想》。载1946年10月2日上海《文汇报》。收《美国反动派走上了希特勒的道路》，1946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又收《天地玄黄》。

4日 为上海各界人士于本日召开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而作《祭李闻》。表示要学习李、闻的革命精神。“誓当毁独裁而民主，代乖舛以慈祥，化干戈为玉帛，作和平之桥梁。俾社会主义及早实施于当代，而使我泱泱华夏允克臻乎自由，平等，富强”。悼文内容曾概要发表，见1946年10月5日上海《文汇报》报道，全文收《蝴蝶集》。

9日 作《诗二首》之一《“双十”解》。讽刺“双十”节。指出辛亥革命已经三十五年，可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好合如故”，人民“加倍受苦”。但诗人相信中国“总有前途”，“必得解放”。载上海《文萃》（周刊）1946年12月19日第2卷第11期。收《蝴蝶集》。

10日 发表杂文《双十节纪念》。载上海《文萃》（周刊）第2卷第1期。

18日 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作《鲁迅和我们同在》。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鲁迅精神的伟大。号召大家“加倍的认识鲁迅”，“体验鲁迅精神”，坚持鲁迅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对于反人民的恶势力死不妥协的方向”，为争取民主，实现解放而奋斗。载1946年10月20日《文汇报·世纪风》。收《天地玄黄》。

19日 下午，出席各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并讲话，指出：“鲁迅指示给我们以方向，是要服务于人民的方向。”“现在，人民已经不是十年廿年前的人民了，人民必然会翻身的，民主必然会胜利的，这是历史必然的发展。”并号召大家本着鲁迅指

示的方向，“赶跑所有的帝国主义”。讲话提要载1946年10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题为《本着鲁迅指示的方向，赶跑所有的帝国主义》。这次大会由上海全国文艺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十二个文化团体发起组织。会议在辣斐大戏院举行，出席的有郭沫若、沈钧儒、叶圣陶、茅盾等四千余人，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演说，他针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局势，号召大家发扬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斗争。

22日 在生活教育社社员进修班所作讲话《青铜器的波动》发表。讲演根据青铜器的形式、花纹、模样、字迹、铭文及文章格式，把青铜时代分为四个时期，并从生产关系的变更来解释这种变化。由维立记录，载本日《文汇报》。

31日 作杂文《世界和平的柱石》。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九周年。收《天地玄黄》。

本月 为《〈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题书名。见中共代表团编《〈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

本月 国共和谈再次在南京举行，周恩来、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谈。蒋介石玩弄两面派手法，一边和谈，一边派军队侵占张家口，并下令召开伪国大。

同月 《鲁迅书简》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许广平编。

十一月

1日 作诗《诗二首》之二《“一二一”纪念》。结合解放战争形势，纪念“一二一”死难烈士，鼓励大家继承先烈遗志把斗争进行到底。载《文萃》周刊1946年12月19日第2卷第11期。收

《蝟螭集》。

7日 发表为苏联革命二十九周年题词，手迹载本日上海《时代日报》。

18日 应戈宝权之请，为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题辞：“普希金是人民诗人的伟大的前驱。他以献身的热情歌颂人民，唤醒人民，而反对封建思想和专制暴政，终于遭受牺牲。不仅他的灿烂的诗章是世界的瑰宝，他那公正而勇敢的生活态度实我辈做人之模范。”（据戈宝权：《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在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郭沫若研究专刊》）

21日 作杂文《人所豢畜者》。借动物、虫类讽刺种种社会现象。载上海《文萃》（周刊）1946年11月28日第2卷第8期。收《天地玄黄》。

24日 作文《纪念邓择生先生》。载《中华论坛》（半月刊）1946年12月26日第2卷第7、8期合刊。收《天地玄黄》。1947年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

25日 在苏联领事馆欢送茅盾去苏联访问，即席赋诗一首。诗云：“不辞美酒几千杯，顿觉心花带怒开。今日天涯人尽醉，澄清总得赖奇才。”载1946年11月28日上海《立报》，又载1946年12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篇名题《送茅盾夫妇出国》。

29日 作诗《题〈南天竹〉》之一。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以日本画家观菴氏所画《南天竹》一幅相赠，因题诗以补之。诗中怀念在日本的妻子儿女。收《蝟螭集》。

又 作诗《寿朱德》。庆祝朱德六十寿辰，称他是“中国的大英豪，人民的小宝宝”。诗中还抨击了美蒋反动派，“内奸赛过汪精卫，黑漆一团糟”，“外敌赛过日本鬼，装作和事佬”。收《蝟螭集》。

又作《庆祝朱总司令六十大寿贺辞》，载上海《群众》周刊1946年12月9日第13卷第8期。据夏顺奎回忆，为了庆祝朱德总司令六十寿辰，特地从烟台解放区拉来一车苹果和葡萄酒，在上海“周公馆”设宴招待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新闻界友好共五十余人。郭沫若的贺诗“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会上“田汉同志引吭高歌，郭沫若同志婆娑起舞，歌声、琴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凡，国民党特务，也无可奈何，只能把此情景记入监视专报”。（《上海“周公馆”的日日夜夜》，见1980年1月8日《文汇报》）

30日晨，作诗《题〈南天竹〉之二》。歌赞那在“天寒地冻众草凋”的环境中，仍高昂挺立“怡然赤”的南天竹。收《蜩螗集》。

本月作诗赠即将回延安的周恩来。诗云：“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驾言期骏驥，岂畏路迢迢？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本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重要城市张家口，悍然推翻政协会议决议，于15日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至此，和谈已经无望。我党在国统区的谈判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代表李维汉奉党中央电召，于19日返抵解放区。周恩来离南京前夕，郭沫若即以此诗相赠。（据许涤新：《疾风知劲草——悼郭沫若同志》）

同月为《还乡一月随笔》题词。《还乡一月随笔》系谢步生著，镜泉文化基金委员会出版。

同月发表儿歌《请来玩》。载上海《儿童》（半月刊）第2卷第3期。

同月散文《南京印象》，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在此以前，本书曾在《萌芽》第2期至第4期连载；同年8、9月间，延安《解放日报》转载。1957年编入《沫若文集》第9卷。

本月15日，伪国大开幕，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代表拒

绝参加。青年党、民社党公开投靠蒋介石，参加伪国大。

同月 北平发生“沈崇事件”，全国学生纷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由此掀起了全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城市的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

十二月

5日 作诗《临别赠言》。茅盾夫妇今日乘斯摩尔尼号赴海参威，去苏联访问，郭沫若至码头送行，并作诗一首相赠。诗云：“乘风万里廓心胸，祖国灵魂诗铸中，明年鸿雁来宾日，预卜九州已大同。”载上海《文艺春秋》（月刊）1946年12月15日第3卷第6期。（参阅《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孔另境作《茅盾出国记》一文）

8日晚，去“兰心”戏院观吴祖光的新编剧本《捉鬼传》的演出。观剧毕，和演员们同吃夜宵，并即席赋诗一首，诗云：“钟馗捉鬼被鬼捉，观者欢娱作者哭，中有眼泪一万斛。非欲衣冠媚世俗，欲使世上绝鬼蜮。”（见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总第96期）。

16日 作《关于〈美术考古一世纪〉》。本文作于1930年12月12日，今日修改于上海，作为该书新版本的序言。序中叙述了此书对自己的教益，说：“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因而我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也多是本书赐给我的。”载1947年1月1日重庆《唯民》周刊。收《天地玄黄》。现收《沫若文集》，篇名题《序〈美术考古一世纪〉》。《美术考古一世纪》为德国米海里司作，1929年郭沫若据日译本转译，题《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1948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时，改现名。

20日 作文《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回忆近几年来民主运动的情况，详细记述了1944年11月11日宴请柳亚子时与友人们互相唱和的情景、1946年2月22日文化界发表时局宣言及10月8日晚中共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遇难的经过。载新加坡《风下》(周刊)1947年1月11日第57期。收《天地玄黄》。

又 作杂文《王安石的〈明妃曲〉》。认为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是历代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词剧曲中最上乘的作品，表现了王安石“对于民间心理的了解程度，也可以说是王安石的精神”。文中，还对“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句，作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载上海《评论报》(旬刊)1946年12月28日第8号。收《天地玄黄》。

21日 作杂文《冷与甘》，谈鲁迅精神。认为“‘怒’加‘忍’等于鲁迅的‘冷’”，表现了鲁迅精神的反抗的一面；而“爱”加“诚”等于鲁迅的“甘”，表现了鲁迅精神的另一面。载《文萃》(周刊)1947年1月1日第2年第12、13期合刊。收《天地玄黄》。

又 作七律《送茅盾赴苏联》。因送行当日(12月5日)“仓卒得句，意不甚洽，今足成此律”，诗云：“以文会友御长风，祖国灵魂诗铸中。石取他山攻玉错，政由俗革贵农工。北辰历历群星拱，罗马条条大路通。海运天池南徙日，九州当已庆攸同。”收《嫫媧集》。

22日 作散文《峨眉山下》。记述故乡的山水风景。载《文艺春秋》(月刊)1946年12月25日第3卷第6期。收《天地玄黄》。

23日、30日 发表演讲《苏联的集体农场与中国的土地改革》。详细报告了苏联农村经济的发展经过和成功，分析了苏联政府的农村政策，指出“中国要工业化，恐怕非要土地改革不可”。由汪慧星、胡嘉谷记录，载上海《文汇报》“中国农村”(周刊)。

31日 作杂文《路边谈话》。仿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写《随

感》十五则。针对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他们的走卒的种种罪恶行为，予以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载1947年1月16日《新华日报》。收《天地玄黄》。

同日 晚，出席上海进步文艺界举行的新年迎春会。（据李凌：《文化战线上的光辉旗帜——忆郭沫若同志》，见《悼念郭老》）

本年 马烽、西戎合著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由晋绥边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欧阳山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社经济的长篇小说《高乾大》（1949年由新中国书店出版）。陈白尘的三幕讽刺喜剧《升官图》（1945年作）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同年 田间作长篇叙事诗《赶车传》。

同年 《文坛》（魏金枝编）、《文艺杂志》（太行文联编）、《文艺与生活》（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北平分会编）、《萌芽》（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分会编）等刊物出版。

一九四七年(五十六岁)

一月

1日 吴祖光等来访。郭沫若把《观〈捉鬼传〉》一诗写成条幅赠他，落款是“今日乃卅五年之翌年元旦 祖光兄嘱为之书”。（见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总第96期）

5日 作《新繆司九神礼赞》。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统制，赞扬进步的新闻记者、漫画家、木刻家、戏剧电影工作者、音乐家等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载《文萃》周刊1947年1月9日第2年第14期。收《天地玄黄》。

9日 参加《文汇报》第54次星期座谈会，并发言。这次座谈的中心议题是马歇尔奉召返国升任国务卿一事。郭沫若针对马歇尔离华声明，指出他在谈到“调处”失败时混淆黑白，把国民党的反动分子与所谓“共产党的顽固分子”相提并论，诬蔑共产党，并推卸了美国的责任。发言由陈尚藩记录，载1947年1月12日《文汇报》，题为《调人高升面面观》。

11日 发表为《新华日报》九周年题词：“人民之命，主义之花，宇宙可显，出世无疆。”手迹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

16日 致葛伯赞信。（《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20日 发表短文《论斗争》。满怀信心地指出：“一个民主的

中国”的诞生,虽会有“阵痛”,但却已经“不会很远”。载本日重庆《新华日报》。

23日 作小说《地下的笑声》。通过一对音乐家的悲惨遭遇,揭露旧社会的罪恶。载《文萃》周刊1947年1月30日第2卷第17期。收小说集《地下的笑声》。

25日 作杂文《拙劣的犯罪》。指责沈从文对创造社的看法是“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明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并说,沈从文“极尽了帮闲的能事”,而简直成了“死心踏地的帮凶了”。载1947年1月27日上海《文汇报》。收《天地玄黄》。

29日 发表评论《关良艺术论》。分析了中国画和西洋画在创作风格和技巧上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差别,希望“不要忘记中国艺术的中国风格”。但中国同时也“需要动,需要有一种热情奔放的推进力量”。认为关良艺术创作的特点是“以西画作躯壳,国画作灵魂”。载本日上海《文汇报》。

二 月

5日 作杂文《替胡适改诗》。讽刺胡适。胡适在《文汇报》上曾发表一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郭沫若指出:胡适承认自己是“黑棋一边的‘卒子’”,妄图“擒”“红棋的老王”,为他的主子效劳。为了更真实的反映问题的实质,“倒不如把‘拚’字索性改成‘奉’字”。收《天地玄黄》。

8日 至暨南大学演讲,题为《历史与人生》。由胡深、碧依记录。载本月12、13日上海《文汇报》。

9日 应邀参加上海百货业工人为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召开的大会。会议将开时,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特务捣乱会场,永安

公司店员梁仁达被打死，郭沫若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从后台避走脱险。

同日 作诗《慰问爱国的受难者》。载1947年2月10日上海《文汇报》。

10日 出席上海文艺界在光华大戏院举行的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并作演讲，题为《向普式庚（按：即普希金）看齐！》郭沫若认为，不但“在写作诗文上应该向普希金看齐；就在做人上，在立身处世上，我们尤其是应该向普希金看齐”，“第一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二是他的为革命服务的志趣，第三是在这两种生活原则之下，他发挥尽致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气概”。据戈宝权回忆，那天，“国民党反动派派了特务，来包围剧院，准备要打进来。我们把戏院的铁门紧紧关上，并在后台作了布置，必要时好让郭老从后台逃走。郭老就在会场内外紧张的气氛下”作了讲话，号召大家“要象普希金那样反对专制暴政”（《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又见《忆郭老》，见《悼念郭老》）。讲演稿载2月11日上海《文汇报》。收《天地玄黄》，编入《沫若文集》时，改题为《向普希金看齐》。

12日 发表《较场口》。回忆1946年较场口事件中遭殴的经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的罪行。载本日《新华日报》。

18日 作《〈苏德战史〉序》。赞扬苏联人民在大战中所作的贡献，并具体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指出，“人民是决不欢迎战争的”。收《天地玄黄》。《苏德战史》，即《苏德战史——苏联怎样战败德国》，焦敏之著，系“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丛书”之一种，本年3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

又 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序》。收《德意志意识形态》，1947年3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又作《序〈王贵与李香香〉》。载1947年3月12日香港《华商报·热风》第134号。收太岳新华书店出版的《王贵与李香香》。

20日 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译者前言》。收《政治经济学批判》，1947年3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22日 作《序〈白毛女〉》。推崇《白毛女》，认为这一剧本，故事动人，有教育意义，是戏剧方面新的民族形式的成功尝试。并就白毛女的“白毛”形成的原因提出质疑，希望具有近代医学知识的人予以解释，以免减弱故事的真实性。载1947年2月《文萃》周刊第2年第21期。收六幕歌剧《白毛女》，1947年2月上海黄河出版社出版，又收《天地玄黄》。

23日 发表诗《这个就叫最民主》。本月9日，国民党特务在劝工大楼事件中打死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次日，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向记者发表谈话，对梁仁达遗族表示“吊唁”，时人谓之“猫哭老鼠”，此诗即记其事。揭露国民党投降美帝，出卖祖国，镇压人民的罪行，辛辣讽刺吴国桢假作慈悲的丑态。载《群众》周刊1947年3月23日第14卷第8期，署名羊易之。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篇名题《猫哭老鼠》。

25日 作《春天的信号——“新思潮”解题》。用散文诗的形式，阐明《文汇报》《新思潮》副刊的宗旨。共六则：一、春天来了；二、我在故我思；三、“不尽长江滚滚来”；四、预防白浊式的点滴；五、理甚易明·善甚易察；六、歌颂人类的青春。载1947年3月1日上海《文汇报·新思潮》。收《文汇丛刊》第1辑《春天的信号》，又收《天地玄黄》。

27日 发表一副对联：“郝鹏，郝鹏举，幸好多此一举。陈诚，陈诚武，真正止戈为武。”载本日上海《文萃》（周刊）第2卷第21期，题为《偶对》。

本月 作挽歌五首——悼梁仁达烈士。由孙慎谱曲，油印

散发。

本月 21日，蒋介石迫使军调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等撤回延安。27日，又迫使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和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彻底暴露了美蒋玩弄假和平的阴谋。

同月 28日，台湾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是为“二·二八”起义。因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而失败。

三 月

1日 作《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阐明《文汇报》副刊的宗旨是：以人民至上的意识为意识，本质上是人民文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并申明这个小小的园地是以培养新作家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载1947年3月3日上海《文汇报》，收《文汇丛刊》第4辑《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1947年《文汇报》馆编印；又收《天地玄黄》。

4日 作《北方木刻》序，题为《论中国新木刻》。序文突出了鲁迅对近代中国木刻运动的贡献，指出木刻艺术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事业中是跑在前面的一门艺术，而“北方的作家们”更是处于“无拘束的空气里面”，处在“被解放了的人民大众的乐天生活”中，因此他们的作品更具特殊的魅力。载1947年4月28日上海《文汇报》。收《北方木刻》，1947年5月高原书店出版。篇名题《〈北方木刻〉序》。

8日 作杂文《青年·青年·青年》。论述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主张必须努力向青年学习。载1947年3月12日上海《文汇报》。收《文汇丛刊》第2辑《救救青年》，又收《天地玄黄》。

又作《〈青春哟，人类的春天〉序言》。载《人世间》（复刊）1947年第2期。收《呼喊》，1947年5月华侨知识社出版。

10日 作《怀冼星海》。介绍冼星海的生平，推崇他在音乐艺术上的伟大成就。称赞《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魂。”载1947年4月1日香港《华商报》，收《天地玄黄》，篇名题《序〈黄河大合唱〉》。

又作《〈行知诗歌集〉校后记》。载1948年3月15日香港《华商报》。见《行知诗歌集》，1947年4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又见《人民经与陶派诗》，新北京出版社1951年出版，题作《人民经》。

11日 作杂文《先驱者田汉》。热情地推崇田汉在新文艺运动史上所起的作用，说他“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是文化界的先驱者”。认为他的工作精神和为人处世也极可称赞。载1947年3月13日上海《文汇报》。

13日 《少年时代》编成，并作《序》。《少年时代》是《我的童年》（一九二八）、《反正前后》（一九二九）、《初出夔门》（一九三六）的合集。序中指出：这书“在内容上是蝉联着的，写的动机也依然一贯，便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它显示着“无意识的时代过去了，让它也成为觉醒意识的资料”，“为比自己年轻的人们领路”。收《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1947年4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又作《〈记不全的一首陶诗〉后记》。补正一首陶行知诗的写作年代及写作地点。收《天地玄黄》。（参见本谱1946年7月30日条）。

15日 作《〈读了陶行知最后一封信〉后记》。收《天地玄黄》。（参见本谱1946年7月30日条）。

又作《〈纪念张一麐先生〉跋语》。收《沸羹集》。

18日 作杂文《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谈怎样正确进行文艺批评。那时，唐弢在编辑《文汇报》副刊《笔会》，较多的强调文艺界的团结，没有注意在文艺界内部展开充分的批评。这时，有个青年在《联合晚报》的副刊上写文章指责巴金和唐弢，说巴金“既不敢明目地卖身投靠，又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只是空洞“叫唤”，写些“哎哟哟，黎明！”之类的散文，应当“捉来吊死”。说唐弢强调“团结”是“拒绝批评”的“挡牌”，不敢“抗击”文艺界的“堕落倾向”，乃是准备“向黑暗欢呼”的先兆，早在“嗤之之列”。对此，巴金和唐弢都作了答辩。接着，此人又写了合骂两人的文章，寄给唐弢，要求在《笔会》上发表，被唐弢拒绝。于是又另写一篇文章，投给创刊不久的《文汇报》副刊《新文艺》。《新文艺》名义上由郭沫若主持，实际上是和杨晦、陈白尘合编的，平时由杨晦编一期，郭沫若和陈白尘编一期，轮流负责。那个青年的稿子在《新文艺》上刊登出来，郭沫若事先不知道。事后郭沫若主动承担责任。3月中旬的一天，他和于立群去唐弢寓所访问，未遇，又写信给唐弢向其作了解释，并写了《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一文。文中论述了如何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的问题，同时，对那个青年提出了批评。郭沫若认为要正确开展批评，“必须建立自己的诚意。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今天我们做人的标准，也就是做批评的标准。”必须“明是非，分敌友，诚爱憎，慎褒贬”，还须“衡轻重，争缓急，别错综，权利害”。而不应该“夹杂丝毫个人的意气”，象华盛顿斫樱桃树那样乱斫一气。载1947年3月24日《文汇报·新文艺》第4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集外”。

20日 发表歌词《月光娘娘》（施正镛谱曲）。载本日福州音乐学习社《音乐学习》第5、6期合刊。

22日 晨，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后案》。认为以石器、铜器、铁器划分先史考古学上的文化的三期，和古代社会进展不一定相符合，“唯蒸汽机的发明与原子能的发现确是划分时代的标石。”并说，“在中国，铁的发现当在春秋年代，当以铁器作为促进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媒介”。“殷代与西周在生产方式与文化水准上并无多大区别。殷代确已使用‘众人’作大规模之农耕。原始公社的破坏当在殷代以前。”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又 作书信《复田楚桥先生——论〈明妃曲〉》。载重庆书简杂志社《书简杂志》（半月刊）1947年5月10日第12期。

25日 作《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一文的《后案》。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26日 发表《还命于民》。愤激地斥责国民党特务捕人杀人的罪行。载本日上海《文汇报》副刊《新社会》第4期《人权保障特刊》。

本月 任《文汇报》副刊《新文艺》、《新思潮》主编。《文汇报》于最近进行全面改革，除原有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外，又增辟《新思潮》、《新文艺》、《新社会》、《新经济》、《新教育》、《新科学》等六个周刊，郭沫若除任总顾问外，还出面和其他人合编《新文艺》、《新思潮》。

同月 《艺术的真实》（马克思作）改版本由群益出版社出版。此书译于1936年2月，同年5月由质文社出版，书名《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不久，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现改版重新出版，译文前有“前言”。

同月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作）改版本由群益出版社出版。本书译于1931年，原名《德意志观念体系论》，1938年11月由言行出版社出版，现经作者重新校订出版，译文

前有“序”。

同月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作)新版本由群益出版社出版,译文经译者重新校订,并加“译者前言”。

本月 国民党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后,又改用重点进攻的方针,向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犯进。

同月 13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次日,国民党军大举进犯陕北解放区。19日,我主动撤出延安,当日,延安被国民党占领。

四 月

8日 复唐弢信。《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一文发表后,使唐弢极为感动,便写信给郭沫若,“说明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的经历、处境和心情,附带提及批评者和我个人的文字纠葛,说明这些事情和《新文艺》编者之一的他(按,指郭沫若)毫无关系。”郭沫若在复信中说:“文笔上的一些小纠纷,不必看重它……一个人总要有些拂逆的遭遇才好,不然是会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的。人,只怕自己倒,别人骂不倒”。(唐弢:《永恒的怀念》,收《悼念郭老》)

10日 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对十七年前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作了自我评价,说:“这在我自己是一部划时期的作品,在中国史学界似乎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并说,“我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但在材料的鉴别上每每沿用旧说,没有把时代性划分清楚,因而便夹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这些错误,已在《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中加以纠正。还特别指出《十批判书》中的《古代研究的

自我批判》一文的见解是比较正确的，郑重向读者推荐。载《文萃丛刊》1947年4月第3期《人权之歌》。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题名为《新订正版后记》。

15日 发表诗《卷起亚细亚的星云——联合晚报之歌》。载本日《联合晚报》。

17日 作《明保之又一证据·后记》、《古金中有称男之二例·后记》、《殷虚无铁的发现·后记》、《夏禹的问题·后记》。均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本月 为郁华烈士作铭文。铭文云：“石可磷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谁云遽然而物化耶？凝血与山川共碧”。郁华，字曼陀，系郁达夫之兄。生前任江苏高二分院刑庭庭长，对敌伪凶犯严厉惩处，执法如山；竟于1939年11月23日被汉奸特务暗杀身亡。（见赵树帆：《记一位以身殉职的法官——纪念郁华烈士被害四十周年》，《战地》1979年5月第3期）。

同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作者校订，改由群益出版社出版新一版。

同月 《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由海燕书店出版。

本月 艾芜的长篇小说《故乡》由上海自强出版社出版。

五 月

2日 作杂文《“五四”感言》。指出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要科学要民主的任务，三十年来，还没有完成，现在是完成它的时候了。载1947年5月4日上海《文汇报》。

3日 始作《中国的浮士德不会死——〈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之一。此篇前半部分作于日本，后半部分作于本月25日。

载《文萃丛刊》1947年6月5日第7期《烽火东北》。收《浮士德》。

同日 下午，参加文协第九届年会，并作讲演，要求以健康和自由为人民服务，但“如需要时，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健康及自由。”见报道：《文协九届年会》，载1947年5月4日《文汇报》。

5日 《文汇报》刊出《联合国文教会人权备忘录》。此系应该会主席赫胥黎要求而写的一篇有关人权的文章。

7日 接见《文汇报》记者王坪，谈人权问题。他认为联合国文教会的那个“人权备忘录”内容“空空洞洞”。指出，“中国人权如果要有保障，只有美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谈话中，郭沫若还揭露了当时所谓“第三方面”的代表人物张君勱，称他“比曾琦还要等而下之”。谈话要点载1947年5月8日上海《文汇报》，题为《郭沫若谈人权》（王坪记录）。

8日 作《〈革命春秋〉序》。说明“在年代和自己的精神活动上，《北伐途次》和《创造十年》却是藕断丝连地衔接着的”。因此，“把这两种合并起来，而名之以革命春秋。”收《革命春秋》；现收《沫若文集》第8卷卷首，系手迹影印。

又 作《〈学生时代〉序》。收《沫若文集》第7卷。

同日 作论文《〈格物〉解》。解释《大学》中“格物”两字的含义，重申自己在《儒家八派的批判》里提出的解释：“格”就是假，“‘格物’者假物，假借于物之意。人心只是一张白纸，要假借于物才有知识，而知识也才能达到尽头。使知识达到尽头是‘致知’，知识达到了尽头是‘知至’”。文中还指出科学研究应有客观的态度和方法。认为“研究古人也应该有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才行。说话要有根据，根据要十分确实，然后才能使自己的断案成为如山的铁案。先存好恶之心而上下其手，事实上那就是唯心论者的态度了”。载成都大学《大学月刊》1947年7月1日第6卷第2期。初收《天地玄黄》，现收《沫若文集》第16卷。

9日 作《〈格物〉解》的《后记》。载成都大学《大学月刊》1947年7月1日第6卷第2期。初收《天地玄黄》，现收《沫若文集》第16卷。

12日 作《人民文艺》。载文艺研究会《新文艺》1947年6月创刊号，代发刊词。

17日 作《〈大众科学丛书〉序》^①。载1947年8月2日上海《时代日报》，收大学科学丛书之一：《宇宙的构造》。

19日 作《〈盲肠炎〉题记》。文章首先论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把帝国主义国家比作为“恶性的癌”，把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比作是帝国主义的“窜走络”，“这个窜走络如不除尽，中国本身的民族资本或独立自主的近代化是没有方法进展的”，而且还“会闹到全殖民地化的地步”。接着论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经过，说：“这部书在我的精神发展上表示着转换点的一个里程碑。在一九二四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当我的思想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之后，我有一段时期是想留在文艺界工作的，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这个转换起了更大的质变，便是使我自己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北伐，我的文艺生活更确实实地告了一个段落。”载上海《创世纪》（月刊）1947年6月1日创刊号。收《盲肠炎》。

25日 译《浮士德》第二部（德 歌德）毕。又，续作《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载《文萃丛刊》第7期《烽火东北》。收《浮士德》。

27日 发表《学潮问答》。载本日《文萃丛刊》第6期《论纸老虎》。

① 《大众科学丛书》系上海中苏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的科学丛书。

28日 致翦伯赞信,并寄上《沸羹集》原稿,望早日出版。函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载《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翦伯赞当时负责大孚出版公司总编工作。

本月 《革命春秋》(沫若自传·第二卷),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六 月

3日 作《〈钓鱼城访古〉追记》。回答某教授的质疑,指出钓鱼山上是有钓鱼台的。

18日 作诗《闻一多万岁》。为纪念闻一多殉难一周年而作。载上海《人世间》(月刊)1947年7月20日第5期《闻一多先生殉难周年祭》一文中。

21日 作《〈今昔蒲剑〉总序》。表示在黑暗浓重的政治气压下,谨以此书纪念诗人节。并针对有些人曲解、否定屈原的言论,指出妄图“证明屈原是弄臣或奴隶出身”,都是找不到证据的。收《今昔蒲剑》。

30日 作散文《韬奋先生印象》。载上海《世界知识》(月刊)1947年7月第16卷第2期。

又 作《〈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论证《考工记》系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收《天地玄黄》。

本月 杂文集《盲肠炎》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本书曾于1928年与《水平线下》合辑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被迫停印。本年由作者将此书重新编定,删去“题记”,收文章十篇,以单行本刊印出版。

七 月

3日 作《〈王安石〉后记》。说明《王安石》一文（参见本谱1945年10月条）记录不全，并有差错，故略加补正，并表示要另写一篇详细的研究，或把王安石的事迹写成剧本。收《历史人物》。

11日 作论文《〈诅楚文〉考释》。考证《诅楚文》的版本、写作年代和文字。载上海《中国建设》（月刊）1947年9月第4卷第6期。收《天地玄黄》。

12日 作论文《〈行气铭〉释文》。考证二种《行气铭》的真伪，并把铭文语译，认为“原物是否为‘剑秘’实属疑问”。载上海《中国建设》（月刊）1947年8月第4卷第5期。初收《天地玄黄》，现收《沫若文集》第16卷。

13日 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所作讲演发表（沈鹏如记录）。载本日上海《国讯周刊》第421期。题为《不会说不敢说不必说》，篇名和内容均未经郭沫若审阅。

21日 作《我的历史研究——序〈历史人物〉》。表明自己研究历史人物的原则是：人民本位。凡是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人物，就肯定他，称赞他；反之，就否定他，批评他。文中，还特别论述了王安石和李岩。认为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他有政见，有魄力，而最难得的是他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而李岩也是“一位怀着人民思想的人”，他主张“均田”，参加农民革命，是“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载北平《骆驼文丛》（月刊）1947年8月15日新1卷第1期。收《历史人物》。

28日 作杂文《消夏二则》。第一则《寻人》，猛烈抨击“人吃

人，人杀人”的黑暗现实。他说：“虎狼虽然是肉食性的猛兽，但它们在同类间是很少自相残害的”。然而，在人类社会，“人吃人，人杀人，而且集体的吃，集体的杀，却是家常茶饭事了”，人比虎狼还残忍。第二则《牛的教训》，记与田汉、力扬访大场育才学校事。收《天地玄黄》。

本月 作诗赠黄裳。诗云：“偶语诗书曾弃市，世间仍自有诗书。周厉当年流彘后，卫巫勉业复何如？”用秦始皇、周厉王钳制人民舆论终究失败的典故，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统治和政治高压政策，预示了这种倒行逆施必然破产的结局。（见黄裳：《关于郭老的两件事》，《战地》1979年11月第6期）

本月 文集《今昔蒲剑》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内收1939—1942年间的散文、论文四十二篇及“总序”一篇。这是《今昔集》、《蒲剑集》的合集。《今昔集》单行本刊行于1943年10月；《蒲剑集》单行本刊行于1942年4月。1959年又经作者重新校订、排次，编入《沫若文集》第12卷。

本月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初 秋

为郭墨林所藏樊季氏孙中鬯鼎题辞，全文为：“此鼎有铭在盖文凡廿一字曰唯正月初吉乙亥樊季氏孙中鬯择其吉金自作石池古鼎铭有名石池者如大师钟伯保鼎即其例此石字稍泐但固无疑也文尚未著录而花纹形制与寿春楚器颇相似时代当属于战国樊季氏如细考之或当有得”（原文无标点）。录自郭若愚未刊稿。

八 月

7日 作《论闻一多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这是为《闻一多全集》所作的《序》。称赞闻一多在学术上“眼光的犀利、考证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文中还论述了闻一多的思想演变过程，热情称颂他的革命精神。载成都大学《大学月刊》1947年8月20日第6卷第3、4期合刊。收《历史人物》。又见《闻一多全集》，题名《〈闻一多全集〉序》。

13日 作《〈龟卜〉序》。收《龟卜》，1948年北平修绶堂等出版。

14日 作《〈赵高与黑辛〉案语》。说明“黑辛”系人名，“是清朝的一位宦官，与李莲英约略同时”。收《沸羹集》。

15日 发表《闻一多的治学精神》。载北平《骆驼文丛》月刊1947年8月15日新1卷第1期。

16日 作杂文《我并未见魏德迈》。本日上海《时代日报》刊出消息，标题是《魏德迈晤郭沫若》，接着，《新闻报》、《大公报》也都登了类似报道。郭沫若在文中申明自己并未见魏德迈，揭露和讽刺了反动派的政治花招。收《天地玄黄》。

22日 作杂文《怀谢六逸先生》。载苏州《文讯》(月刊)1947年9月15日第7卷第3期。

又 作杂文《敬礼呀！小学教师》。载1947年8月27日上海《时代日报》。

23日 作《〈骑士〉后记》。收《地下的笑声》。(参见1930年12月条)。

28日 作《〈沫若译诗集〉小序》。说明此集系楼适夷建议下

编成，并简述所收各辑情况。收《沫若译诗集》。

又作《〈浮士德〉简论》。载《中国作家》1947年10月1日创刊号。收《浮士德》。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集外”。

30日 作杂文《一封信的问题》。对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提及罗曼·罗兰曾将给鲁迅的信寄到创造社一事提出疑问。并回顾创造社与鲁迅的关系说：从种种往事来看，“一方面证明创造社并不‘讨厌’鲁迅，而鲁迅也并不‘讨厌’创造社，只是由于一部分朋友的认识不足，惹起了一场‘笔战’，说遗憾倒也是值得遗憾的。不过我也还要替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说几句公平的话。他们的批判鲁迅即使是出于错误的认识，以为鲁迅代表着封建意识的残余，但他们是事不对人，存心在打击封建意识，并非打击鲁迅。后来那些朋友，一反而推戴鲁迅，不就是很明白的证明吗？”载《人世间》（月刊）1947年10月1日第2卷第1期。收《天地玄黄》。

本月 《历史人物》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内收1941—1947年间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九篇，另有“序文”一篇。1959年经作者重新校阅、调整，编入《沫若文集》第12卷。

九 月

2日 作《〈地下的笑声〉序》。收《地下的笑声》。

6日 作《国画中的民族意识》。从历代画家在国画中所表现的民族意识谈起，强调“民族意识的觉醒，尤其是人民意识的觉醒”的重要性，同时又指出，提倡民族意识，“决不是排外，也决不是复古。”收《天地玄黄》。

12日 为上海文艺青年社出版的《文艺青年》（半月刊）题词。载《文艺青年》（半月刊）1947年10月8日第16期。

15日 发表时评《火山复活的日本》。载本日上海《创世》(半月刊)创刊号。

16日 作《〈民主化的机关管理〉序》。《民主化的机关管理》一书，系黄炎培著，1943年5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本文是为本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增订第一版所写的序言。序文有力地讽刺了国民党和蒋介石，指出不是人民不懂科学和民主，而是由于腐化无能的统治者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因而，“使中国人民的能力，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作充分的施展”，所以显得落后了。收《天地玄黄》。

本月 《沫若译诗集》重新增订后，由上海建文书局出版。此书1928年5月曾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列入“世界名著”第10种。后又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28年5月)、上海文艺书局(1931年4月)出版。这次是在创造社版基础上，增收《雪莱诗集》，《鲁拜集》二种，共计译诗一百四十二首。

本月 13日，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十 月

18日 作《再谈郁达夫》。为了纠正王任叔在《记郁达夫》一文中有关郭、郁之间关系的错误说法，回顾了和郁达夫的亲密无间的友谊；记叙了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四次齟齬，以至绝交、复交的经过。郭沫若对郁达夫的才能、学识、人品予以大力称赞，为他长才未尽，死于异域而悲伤。最后说，“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是“文坛上的三绝”。载苏州《文讯》(月刊)1947年11月15日第7卷第5期。收《天地玄黄》。

30日 自传体散文《跨着东海》，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此篇未完，续篇题名《我是中国人》。

又 作《读了〈俄罗斯问题〉》。称赞《俄罗斯问题》（苏 西蒙诺夫）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并谈到此剧在美国遭到禁演的原因。载1947年12月6日香港《华商报》。收《天地玄黄》。

本月 小说集《地下的笑声》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收短篇小说二十四篇并“序文”一篇；这些小说在这之前，曾分别编入过《塔》、《落叶》、《水平线下》、《橄榄》等集，这次是重新编定出版。1957年编入《沫若文集》第5卷。

本月 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同月 周扬等所著《论文艺工作》由求实社出版，内收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三篇，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聂荣臻《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等。

同月 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在香港《华商报》上连载。

同月 中华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中国作家》（月刊）在上海创刊，共出三期，1948年3月停刊。

十一月

7日 电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电文收《天地玄黄》，题为《全世界心地光明的人都表示由衷的庆贺》。

又 作《〈十月〉感怀诗》。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而作。收《蝴蝶集》。

9日 作《〈沸羹集〉序》。说明《沸羹集》中所收的主要是1942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为止的杂感、随笔之类的文字，“不失为这一大时代的粗糙的剪影”。收《沸羹集》。

11日 作《〈天地玄黄〉序》。说明《天地玄黄》中所收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所写的杂文和学术性论文。关于学术研究，郭沫若说：因缺乏资料，没有研究条件，所以几被“摒除在研究的园地之外了”，但坚信“研究园地的大开放”的时代必将到来，那时，“一切有能力的人”就有“发挥的机会”，真正做到“学术为公，文化为公”。收《天地玄黄》。

13日 离沪前夕，作七律《再用鲁迅韵书怀》。抒发了踏上征途前的满腔革命热情。诗云：“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未丝。五十六年余骸骨，八千里路赴云旗。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收《蜩螗集》。

14日 由上海乘轮船赴香港。当时，解放战争迅速发展，为了保存爱国进步民主力量，根据党的指示，许多爱国人士从上海转移至香港。在上海党组织的安排与有关同志护送下，郭沫若也于本日离沪赴港。（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收《悼念郭老》）

16日 到达香港。于立群亦于22日抵港，暂住九龙公寓。

29日 发表《纪念邓择生先生》。本日是邓择生（演达）（1895—1931）逝世十六周年，作此文以示哀悼。文中说：“每逢择生先生的忌日，总使我增加对于人才的崇敬与对于民贼的憎恨。择生先生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来教训了我们，生与死，是与非，善与恶，民主与反民主，在这中间决没有妥协微温的道路。如有人幻想有这种道路的存在，请睁开眼睛再凝视一次择生先生的血！”载本日香港《华商报》。

30日 自传体散文《我是中国人》，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此为《跨着东海》之续篇。

本月 作七绝《海上看日出》。预示光明即将普照大地，人民就要获得解放。收《蝴蝶集》，1948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2卷。

同月 作《十载一来复》。载香港《野草文丛》第8集《春日》，1948年2月14日香港野草出版社出版。

同月 诗剧《浮士德》(第一、二部)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译于1928年，同年2月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后又由现代书局、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出版；第二部于本年译出，至此，《浮士德》全剧中译本全部问世，前后历时三十年。卷首有《〈浮士德〉简论》，剧后附《题第一部新版》、《第二部译后记》、《第二部译后记·跋语》等。

十二月

5日 致戈宝权信，告以来港简况。署名鼎堂。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郭沫若研究专刊》。

本月 作杂文《尾巴主义发凡》。针对反动派发出的“某某是某某的尾巴”的辱骂，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要怕做尾巴”，提倡知识分子应做人民群众的尾巴，要改变旧士大夫阶级“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的主张，而变为“宁为牛后，无为鸡口”。载《野草》丛刊1948年1月1日第7辑。

同月 作《关于尾巴主义答某先生》。这是与金锋讨论尾巴主义的通信。声明在《尾巴主义发凡》中，“我的主意是要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阶级做人民的尾巴，反过来也就是要人民做我们的头子”，并说“只要是同站在人民的立场，任何不同的群与层的

界限都是可以泯灭的”。载1948年1月1日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自由丛刊》第十种《欺骗必须揭穿》。

同月 杂文集《沸羹集》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除二篇分别作于1940年、1941年外，其余均作于1942—1945年。1961年经作者重新删订编入《沫若文集》第13卷。

同月 杂文集《天地玄黄》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收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1947年间杂文、散文、随笔七十五篇。1961年经作者重新删订，连《序》共六十九篇，编入《沫若文集》第13卷。

同月 所编述《浮士德百三十图》(Fr Anz Staffen绘)，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同月 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本年 平英生。

同年 作时评《要有力量赢得战争，然后才能赢得和平！》坚决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四大家族，及伪装自由民主的官僚政客集团”，指出：“必须彻底发动人民武力，以革命答复榨取，以抗战答复侵略”，“要有力量赢得战争，然后才能赢得和平”。载1948年1月1日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自由丛刊》第十种《欺骗必须揭穿》。

同年 年底，作杂文《自力更生的真谛》。针对某些人把“自力更生”这一口号作为“榨取人民的口实”、“抵制进步的护符”、“专制独裁的掩饰”、“贩卖主权的撇扭”等谬论，指出真正的“自力更生”，应该是指“靠自己的力量来扫弃半生不死的旧中国而

创建一个近代的新中国”，在当前，必须“厉行土地革命以求中国的近代化，对内挖断封建残余的命根，对外抵御帝国主义的咽喉”。载1948年1月1日香港《华商报》。

本年 柳青的长篇小说《种谷记》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同年 3月，《人世间》(月刊)在上海出版，凤子编，出至1948年8月停刊。

一九四八年(五十七岁)

一月

3日 下午，参加中央大学师生的新年团拜会并作了题为《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讲话。载1948年1月7日香港《华商报》。

同日 作《费译〈屈原研究〉序》。《屈原研究》的俄译者为苏联驻华代理大使费德林。载1948年1月11日香港《华商报》。

8日 发表散文《我为什么离开上海》。说明自己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是为了象十年前离开日本回国参加抗战一样，“恢复我的自由替中国人民服务”的权利，并因“由奴隶的屈服恢复到做人的尊严”而感到愉快。载本日香港《华商报》。

15日 发表杂文《怎样研究诗歌与文艺？》载本日上海文化函授学校校刊《文化通讯》第3期。

20日 发表通信《复苏净先生》。载本日香港《华商报》。

同日 发表杂文《对九龙事件之意见》。批判南京政府的无能和无耻，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加速使这个空前绝后的坏政府垮台”。载本日《华商报》。报载篇名总题为《中国各民主党派领袖对九龙事件之意见》。

20日 作论文《迎接批评时代的一个基本问题》。认为要使批评很好地开展，被批评者接受批评的“容量”是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载香港《群众》(周刊)1948年1月29日第2卷第3期。

26日 作评论《当前的文艺诸问题》。回答《文艺生活》编者司马文森的提问。文中就“关于‘马华化’(即马来亚华侨文艺)问题”,“关于方言文学的问题”,“关于批评建立的问题”,“关于文艺统一战线的问题”和关于“题材的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载《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期。

31日 作论文《开拓新诗歌的路》。主张诗歌解放,反对用中国旧式的或外国的格律来使新诗定型化,认为“不定型正是诗歌的一种新型”。强调诗歌必须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感情、要求和行动。至于开拓新诗歌的方法,一是让人民自己写诗;一是诗人努力向人民学习。载《中国诗坛》1948年3月15日第1期《最前哨》。

本月 刘白羽的小说集《无敌三勇士》由华东新华书店出版。

同月 艾芜的长篇小说《山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二 月

10日 作论文《斥反动文艺》。认为,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文中斥责了五种“反动文艺”: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桃红色文艺”;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民的斗争情绪”;二是,宣扬“色情、神怪、武侠、侦探”的“黄色文艺”,这些作品“为害之烈,等于鸦片”,他们消磨人们的斗志,“甚至毁灭人性”;三是,以朱光潜为

代表的“蓝色”文艺；四是，形形色色的“白”色文艺；五是，以《大公报》肖乾为代表的“黑色”文艺，这是标准的买办文艺，起着麻醉读者的消极作用。认为对于这些“反动文艺”，特别是对于“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文艺，必须“毫不留情地举行大反攻”。载香港生活书店《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集外”。

12日 作通信《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复泗水文化服务社张德修先生函》。批判胡适等人。载1948年3月1日香港《自由丛刊》第12种《渡江前夜》。

17日 发表杂文《天天过新年》。载本日香港《飞报》第76、77期合刊。

同日 作论文《说“公”》。载香港《公论》(季刊)1948年3月第2期。

又 作杂文《还要警惕着不流血的“二二八”！》向台湾同胞和全国同胞发出忠告：“我们不仅要纪念着流血的‘二二八’，还要警惕着天天是不流血的‘二二八’”。载1948年2月28日香港《华商报》。

23日 作杂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前此，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作《历史要重演吗？》一文，据国际形势中的事实，指出要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扶植战败的德国以抵制苏联的历史重演。胡适写了一封给周鲠生的题为《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的公开信，为美国扶植德日辩护，并攻击苏联。郭沫若以大量事实驳斥胡适的言论，并揭露他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买办嘴脸。载香港《光明报》(半月刊)1948年3月1日新1卷第1期。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集外”。

28日 在文艺生活社香港分社文艺月会上作题为《文艺活动的总方向》的报告，提出“人民至上，革命至上！生活第一，意

识第一！战友集中，火力集中！”的口号，要求大家“在文艺上来个‘大反攻’，在文艺上来个‘渡过黄河，渡过长江！’来个‘全面大反攻！’集中火力，肃清一切反动的文艺！”认为“现在对敌人客气、宽容就是犯罪！”由陈雅记录。载香港文艺生活社《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1948年3月第1期。

本月 《孔雀胆》(修改本)仍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

三 月

3日 在“蒋美‘和谈’阴谋与‘自由主义’运动”座谈会上发言，揭穿美蒋在美援配合下的和谈阴谋，批判“自由主义”者反苏反共、亲美拥蒋的反动实质。载1948年3月14日《华商报》，题为《“自由主义”亲美拥蒋，“和平攻势”配合美援》。

7日 作《当前的文艺教育——纪念生活教育社廿一周年》，谈文艺教育问题。强调指出当前的文艺教育应“教人怎样把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并运用“这武器来武装自己和人民，以完成人民解放的神圣使命”。载1948年3月14日香港《华商报》；又载《生活教育丛刊》1948年3月15日第1辑，改题为《当前的艺术教育》。

9日 作杂文《提防政治扒手！》批判段锡朋等组织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揭露该会是在“美帝国主义授意之下组织起来的”，还得到国民党政府的“直接支持”，其成员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党棍子”，还有“大小官僚——所谓‘大学教授’其实也都是受了蒋朝命禄的文臣”。载1948年3月15日香港《华商报》。总题《〈社经研究会〉的批判》，同时刊登的还有茅盾等所写的批判文章。

10日 作杂文《屈原·苏武·阴庆》。认为日本投降是他的

“阴谋庆获成就”。提醒人们要防止战后的日本东山再起。并强调指出：“为了打破日本鬼子的阴谋，为了遏止美帝国主义的野心，为了使我们八年抗战的血不至白流，为了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不再受奴役，今天的急务便是迅速使卖国政府垮台”。载香港《光明报》(半月刊)1948年3月15日新1卷第2期。

12日 作论文《为美帝扶日向爱国侨胞呼吁》。揭露美国扶植日本及中国反动派媚美求荣的罪行，呼吁爱国侨胞支持人民解放战争。载1948年4月5日香港《自由丛刊》第13种《美国扶日亡华大阴谋》。

15日 作杂文《打破美帝的扶日奴华计划》。号召侨胞们积极行动起来，打破美帝的扶日奴华计划。载香港《现代华侨》(半月刊)1948年3月20日第1卷第9期。

16日 作《〈蝓螭集〉序》。认为这些诗“可以和《沸羹集》、《天地玄黄》参看”，“作为不完整的时代纪录”。收《蝓螭集》。

17日 作评论《隔海问答》。批判《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与美帝隔海相望一鼻孔出气。载香港《野草文丛》1948年4月10日第9集《论白俄》。

24日 作《〈虎符〉校后记》。说明校阅情况，认为“第五幕实在是蛇足，应该删掉”，以后如果上演“希望毫勿爱惜”。收《虎符》，1948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25日 发表杂文《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补充有关“马华文艺”的意见。载本日香港《文艺生活》海外版第2期。

28日 作《〈筑〉校后记》。说明因出版需要又把剧本“大大地修改了一遍”，特别是第五幕的结尾处，旧稿非常勉强，现在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收《筑》，1949年9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31日 作《〈屈原〉校后记》，说明校改情况。收《屈原》1949年8月群益出版社出版。

春

与林林谈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当时，林林建议郭沫若撰写《中国文学史》，郭沫若谦逊地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拓荒的工作。要是闻一多不死，他来写中国文学史会比我写得更好。并认为郁达夫如不死，他中国文学根底很深，也会写得好，他们都有这方面的学问。当谈到胡适时，郭沫若以轻蔑的语调说：“这个‘过河卒子’^①不会有什么史观，只提供些近乎白话的文学资料”。（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忆郭沫若同志》，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四月

1日 发表杂文《艺术节展望新美术》。指出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美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等各个部门都大倒退。现在，复兴中国美术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以自然为师而有抉择，以社会生活为源泉而施以净化，为民众服务而导引民众，这应是中国艺术家们今天共守的一般原则。”载本日出版的天津《综艺》（半月刊）第1卷第7期。

8日 发表杂文《四月八日》。纪念“四八”烈士死难二周年。指出，“要肃清我们自己的容易受骗，图拣便宜的劣根性，要拿出粉身碎骨的精神来和中美反动派不共戴天！”载本日香港《华商报》。

又 发表杂文《浪与岩头》。以浪与岩头为比喻，说明人类

^① 参见本谱1947年2月5日条。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载本日香港《华商报》。

17日 发表论文《历史是进化的》。批判《大公报》所鼓吹的“中间路线”。载本日香港《光明报》(半月刊)新1卷第4期。

同日 作杂文《谁个能够不奋发》。声援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号召大家“挖尽一切容忍的根，一致起来反抗这个屠民以逞的新军阀，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载1948年4月19日香港《华商报》“声援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专栏。

20日 发表杂文《历史的路只有一条》。载本日上海《国讯周刊》第456期。

21日 作杂文《我再提议改订艺术节》。谈“五四”的重大意义，认为“把五四定为‘艺术节’，认真说是把五四的意义缩小了”，“五四的重大课题，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艺术家也担负不完，不能包办”。因此，提议“改选五三为艺术节”。载1948年5月4日香港《华商报》。

22日 辑《侯玄涵〈夏允彝〉传》。收《南冠草》附录，1948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4卷。

27日 为蔡廷锴(即蔡贤初)五十七寿辰题诗，诗云：

岁次壬辰本属龙，忝在同庚君是兄；

不愿在天愿在田，王土而今尽属农。

载香港《自由》(月刊)1948年6月1日新7号。

本月 致冯玉祥将军书。载香港《自由》(月刊)5月新6号。

五 月

1日 作杂文《庆祝“五四”光复》。指出，必须加紧完成“五四”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科学和民主的历史使命。载1948年5月4日香港《华商报》。

5日 作论文《关于历史剧》。谈历史剧的范围、历史及其现状。认为历史剧就是“把过去的事迹作为题材的戏剧”，以及古代的神话、民间传说等为题材的戏剧，广义地说，“凡是旧时代的戏剧，无论中国的或外国的，可以说都是历史剧”。剧作者如能采取新现实主义的观点，通过剧本，揭发历史的真实，并以此为镜子反映现实，同样能起积极作用。因此，“写当前的题材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写过去的题材也并不一定就是不现实的，主要是要看你是否把握着了发展的必然性这个真实”。载新加坡《风下》（周刊）1948年5月22日第127期。又载《海燕文丛》第1辑。

10日 作评论《〈三无主义〉疏证》。讽刺胡适。胡适自称是“三无主义者”，即“无知”、“无能”、“无为”，郭沫若讽刺道，“‘三无’倒的确是三无，只是内容要另外改定一番”，那便是——“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载1948年5月14日香港《华商报》。

14日 作杂文《屈原的幸与不幸》。通过揭露国民党官僚政客、御用文人对纪念屈原的恐惧心理，预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载香港《中国诗坛》1948年6月15日第2期《黑奴船》。

15日 作评论《看了〈侵略〉》。称赞苏联电影《侵略》（据列昂诺夫的同名话剧改编），说它“结构曲折繁富，而意义深永，耐人玩味”。载香港《群众》（周刊）1948年5月20日第2卷第19期。见《中苏文化之交流》，1949年6月上海三联发行所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集外”。

19日 作《〈白毛女〉何来白毛——答读者黄国贤》。经查阅医书，“知道人因忧劳过度的确有头发翻白的可能和事实，而且翻白了的头发，如忧劳消释，又可以还元。”载1948年5月21日香港《华商报》。

20日 作论文《为新政协催生》。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口号中发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

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具体分析了新旧政协的本质差别，针对某些民主人士的思想顾虑，进行耐心解释和说服。载1948年6月5日香港《自由丛刊》第15种《论新政协》。

23日 发表杂文《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作》。认为《白毛女》是“封建社会里的典型悲剧”，喜儿，实际上就是“整个受苦受难、有血有肉的中国妇女的代表”，是“整个受封建剥削的中国人民的代表”。《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标志着“悲剧的解放”。载1948年5月23日香港《华商报》。

28日 作论文《脑力劳动者对“五一”号召应有的觉悟》。要求知识分子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参加革命的统一战线，为解放全国出一份力量。载香港《群众》（周刊）1948年6月3日第2卷第21期。

六 月

5日 作散文《涂家埠》。回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的第三天，同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由九江去南昌途中在涂家埠车站被乱兵抢劫殴打等情景。载香港《小说》（月刊）7月第1卷第1期。收《海涛集》。

10日 发表杂文《屈原假使在今天》。认为屈原如生在今天，他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诗人。载本日香港《华侨日报》。

17日 作论文《关于青铜时代和黄帝造指南针》。从青铜器、铁器出现的年代，论证“黄帝造指南车”只不过是传说。并据史料证明第一个造指南车的是北宋燕肃等人。载1948年6月26日香港《华商报》。

21日 作散文《南昌之一夜》。回忆1927年除夕之夜与邓择

生(演达)在南昌遇到兵变的情景,揭露蒋介石的阴险毒辣。文章还叙述了自己和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会合,参加“八一”起义部队的经过。收《海涛集》。

28日 参加香港《华商报》召开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纪念七七抗战,抨击美国扶植日本。载1948年7月7日香港《华商报》,题作《美帝扶植日阀,恢复侵略势力》。

七 月

3日 作评论《谁领导了北伐抗战》。从北伐、抗战的历史事实说明领导这两大斗争的,“断断乎不是蒋介石”,而是“人民!人民的政党!人民的武力!”载1948年7月7日香港《华商报》。

又 作杂文《出了笼的飞鸟——看了〈江湖奇侠〉后》。从苏联影片《江湖奇侠》谈起,说明十月革命使乌兹别克得到了新生,它象“出了笼的飞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飞翔。载《正报》1948年7月24日第2年第49期。收《中苏文化之交流》,1949年6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书店出版;现收《沫若文集》第13卷“集外”。

15日 作散文《流沙》。记“八一”南昌起义后,随部队转战福建、广东一带,在汕头附近的流沙向海口疏散撤退时的情景。载《小说》(香港版)8月第1卷第2期。收《海涛集》。

本月 作七律一首并写成条幅赠林林。诗中描绘旧社会诗人贫寒的命运:“未有诗人不太痴,不痴何独苦为诗。千行难易粮千粒,一世终无宿一枝。意入天边云树远,名书水上月华迟。醍醐妙味谁能识,岂是吟成放笔时。”(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忆郭沫若同志》,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本月 东北解放区的重要文艺刊物《文艺战线》在哈尔滨创刊。

八月

5日 作《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答文艺生活社问。文中回顾自己从事文艺活动的三个重要因素是：一、从小时起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的影响；二、生理上的限制；三、时代的觉醒。并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指出：“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有正确的思想领导，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加之以纯熟的写作技巧”。载香港《文艺生活》海外版1948年9月15日第6期。收《创作经验》，1949年11月香港智源书局出版。

又 作论文《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谈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的生平及其思想和自己创作历史剧《南冠草》的意图，最后指出，“现在是更强大的帝国主义侵蚀着我们的时候，而有些人却比洪承畴还要无耻，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强烈，倒依然是值得我们颂扬的”。载香港《青年知识》（半月刊）1948年9月1日第37期。

7日 作诗《水龙吟》。收《蝴蝶集》。

9日 作散文《神泉》。记1927年在神泉候船去香港的一段经历，此文实际上是《流沙》的续篇。载香港《小说》（月刊）9月第1卷第3期，收《海涛集》。

又 作杂文《我的读书经验》，论述读书的种种方法。郭沫若认为读书因目的不同而方法各异。“为学习而读书”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为研究而读书”，是狭义的“真正的读书”。这种读书有三种方法：“（一）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约束，（二）搜罗一切资料尽可能使无遗漏，（三）对于资料毫不留情地，毫不借力地加以清算，必须彻底，绝不放松”。此外，“为愉快而读书”，指工余之暇，读些轻松愉快的书籍；“为教育而读书”，指教育者应该

不断进取，努力学习，等等。载1948年8月19日香港《华侨日报》。

10日 作杂文《日本投降三周年的感想》。认为促使日本投降的，并不是美国的原子弹，而是“由于苏联的参战”及日本施展的诡计。载1948年8月11日香港《华商报》，又载《展望》第2卷第15期。

12日 发表杂文《〈新政协〉和〈旧政协〉在成分上有些什么不同》。载上海交通大学交大生活出版部《交大生活》第38期。

25日 开始在夏衍主编的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上发表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逐日刊载至12月4日止。“所写的是上海、南京失守后，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放弃了大武汉的那一阶段。”（《〈洪波曲〉前记》）大体上是1938年的事。11月21日，在郭沫若离开香港赴解放区的前三天全部写完，“为了掩饰我已经离开香港，又不让文字在副刊上中断”，事先多写了一些留下。（《〈洪波曲〉后记》，1950年10月30日）1958年，经作者修改整理后，在《人民文学》第7至12期上重新发表，定名为《洪波曲》。1959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收《沫若文集》第9卷。

本月 发表杂文《文学和科学》。收太岳新华书店翻印版《中等国文》第2册。

同月 出席香港南方学院师生在六国饭店为邓初民先生举行的六十寿辰庆祝会，并讲话。当林焕平谈到南方学院文艺系拟改编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在港演出时，郭沫若高兴地说：“好，这很好，用艺术的形式介绍新世界的生活，让旧世界开开眼界，很有意义。”并应林焕平的要求为《〈小二黑结婚〉演出手册》题签。（据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收《悼念郭老》）

同月 历史剧《南冠草》（修改本）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

同月 所译《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德·米海里斯原著)改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此书于1929年翻译出版，1931年修改出版，1946年曾再次校订，修改《译者序》，并改题了书名。

本月 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出卖主权的所谓复兴中国农村协定。

同月 东北文艺界对肖军及其主编的《文化报》展开批判。

同月 西北解放区重要文艺刊物《群众文艺》在延安创刊。

同月 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1898—1948)在北平病逝，终年五十岁。逝世前夕，他贫病交迫，仍在“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名，逝世前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国民党政府配给的美面粉，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毛泽东曾在文中赞扬。所著作品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文艺论著《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等。

九 月

3日 应友人许昂若之请，作论诗文七绝六首并注，声明这些诗“统括着我自己对于文艺的看法”。

其一：

载道之文未可非，要看所载道何归。

果能载得民为贵，此道千秋不可违。

古人言“文以载道”，时贤一反旧说，力言“诗言志”，对于载道之主张一概驳斥。但其实要看载者为何道，所言者为何志，不能一概相量也。

其二：

莫谓无文行不远，行能最远厥为言。

楚辞满纸翰轩语，历代何人胜屈原：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前奉为金科玉律。细思言语为物，实较文章更为普遍。脱离语言的死文学，读者能有几人，传世能有几篇耶？

其三：

文章崑合为人民，秦汉而还已失真。

不媚嘉禾媚蠹贼，可怜扬马等灰尘。

古代诗人多诉民间疾苦，且有采诗之官采取民歌谣，以为施政准绳。秦汉以后，诗文乃专对上层歌功颂德，如扬雄司马相如等，今日究竟有何等价值！

其四：

元室文章百代雄，马关郑白不求工。

只缘天子来殊域，笔墨无由媚上峰。

元人杂剧在中国文学中为奇峰特起，因被迫只能以市井为对象，故多用市井俗语，而其妙在于此。明室代元而后，上层所需又使执笔者有歌功颂德之路可走，于是剧曲也变了质。

其五：

辉煌形式出民间，四海咸知施耐庵。

自有敦煌遗典现，变文之变青于蓝。

水浒传殆传诵最广之作，施耐庵如在外国必当被尊如但丁，或莎士比亚。敦煌石室所出遗物，有所谓变文者，即

以白话演变佛典或民间故事，盖平话小说之滥觞也。

其六：

迅翁晚上融欧化，一卷阿Q信足多。

欲自骚坛寻后圣，于今当得数秧歌。

鲁迅阿Q正传信是杰作，其妙处在能参用欧美作风而不脱离民众。近日则秧歌盛行，白毛女一作大受欢迎。源泉虽采自民间形式，然亦善能融化欧化手法者也。

载香港《公论》(季刊)9月20日第4期。

5日 发表祝《文汇报》复刊的题词：“文汇报是人民喉舌，我们应爱护我们的喉舌，让他发出更宏壮的声音”。载本日香港《华商报》。

10日 作《〈三年游击战争〉序言》。热情赞扬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并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三年游击战争》一书系野草所著，记述“新四军前身奋斗史”。郭沫若还为该书题签。“序言”载香港《正报》第3年第13期，收《三年游击战争》，1949年4月东北新中国书局出版。

12日 作电影评论《〈波罗的海代表〉》。称赞苏联影片《波罗的海代表》，指出：影片以鲜明的形象告诉我们：科学、革命、人民是三位一体的，凡是真正的科学家必然走上人民路线，或甚至投入人民解放的大斗争；凡是真正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革命家，必然尊重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及能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工作者；凡是富于斗争性的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必然欢迎革命，欢迎科学，欢迎科学家与革命家。载香港《正报》第3年第7期。

28日 作杂文《撕毁了的“黄金时代”》。记述1945年8月至10月国共谈判的情况，称颂中国共产党为和平竭尽全力，恪守诺言；揭露蒋介石政府破坏和平的罪行，他们“撕毁了一切，把

自己的‘黄金时代’也完全撕毁了”。载1948年10月10日香港《华商报》。

29日 作论文《双十节的三大教训》。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认为从辛亥革命失败这一事实中，可吸收三大教训：革命必须依靠人民，因为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革命必须体现人民的要求，不能和旧势力中途妥协；革命必须独立自主，任何内部的阻力和外来的干涉，要刻不容缓地连根铲除。载香港《群众》1948年10月7日第2卷第39期。

30日 作影评《万家灯火》。高度评价电影《万家灯火》，认为“在蒋管区的上海，竟能产生这样健康的艺术品，实在是如从污泥中标出了一朵莲花”，这部影片“平实地展开出社会生活的深刻的矛盾，而使人觉悟到这矛盾的解决要靠着劳苦大众的友爱和团结，实在是富于教育的意义”。载1948年9月30日《华商报》。

本月 作《序〈中苏文化之交流〉》。《中苏文化之交流》系郭沫若抗战时期有关中苏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章汇集，194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同月 刚从上海来香港的于伶，在“济南解放的喜讯到达那天”去九龙郭老家拜访。据于伶回忆：“这时，郭老的九龙之家早已又成为香港境内我们的‘解放区’了”，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经常在这里聚谈，“郭老比在重庆与上海更忙更多地为人民工作着”。（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见《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同月 作诗《题王晖棺刻画》。收《蜩螗集》。

同月 《蜩螗集》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内收1939—1947年诗作。

同月 散文《抱箭集》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本月 12日起，至11月2日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

沈战役，共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十月

7日 作论文《世界文化战的呼应》。就本年8月在波兰窝赤威克城召开的“世界文化人保卫和平大会”所通过的《致全世界知识分子宣言》发表意见。赞成《宣言》所阐述的原则，但认为这个《宣言》还不“十分够味”，因为它主要针对欧洲的局势而言，尚未包括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和平并不是‘保卫’的事，而是以血肉来‘争取’的事”；不仅是“保卫和平”的问题，而首先是“反对侵略”的问题。载香港生活书店《新文化丛刊》1948年10月第二种《保卫文化》。

10日 参加《华商报》同人举行的旅行野餐，并应邀讲话，题为《革命掌故》，由丘岳记录。郭沫若在讲话中追述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以及1945年《国共会谈纪要》发表时的情景，分析了它们的意义和教训，指出“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三位一体”是阻碍革命成功的反动势力，要集中力量，把它摧毁。最后，充满信心地说：明年的双十节，我们一定会到南京或北平去庆祝了。载1948年10月16日香港《华商报》。

19日 主持文协香港分会在六国饭店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纪念茶会，并作了题为《继续走鲁迅的路》的讲演。关于鲁迅的思想，他认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包括了鲁迅先生的整个思想和精神”，“表现了他的战斗精神和他的爱”。关于鲁迅的文学思想，认为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适逢当时的浪漫主义潮流，因之受到影响，在文章中强调天才、主观、热情，尚停留在旧罗曼蒂克的阶段”，但回国后，“他听到了祖国人民的呼声，使他跟着时代，因此由人道主义而发

展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郭沫若希望大家学习鲁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反动力量永不妥协的精神，自我批判，自我教育的精神”，并把纪念鲁迅的活动扩大到各阶层中去，“本着鲁迅精神，坚强地作反法西斯的斗争”。讲演由如茹记录，载10月20日香港《华商报》。

本月 为上海韬奋图书馆成立题词，词云：“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

同月 出席《新文化丛刊》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漫谈美国电影与苏联电影》的发言，指出：“苏联片以为为人民服务为主，它是教育人民的有力工具，所以品质极高，合乎人民的需要”，而美国电影却“走上反人民的路线”，内容好的片子，为数极少，它“在技术上面和在机械方面，确有一日之长”，但演出技巧“太纤细、太肤浅，而有时太无理性，成为不正常、不健康的東西”。讲演由黎舫记录，载本月出版的《新文化丛刊》第2种《保卫文化》。

本月 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成立，该校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部分同志和东北长白学院美术系，吉林师大美术系合并而成，设美术、音乐、文学三个部。

十一月

21日 作《抗战回忆录》毕，并作《告读者——〈抗战回忆录〉后记》，记述写作经过。载1948年12月5日香港《华商报》，收入《洪波曲》时，作为“后记”之一。《抗战回忆录》共十余万字，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连载三个多月；1958年由《人民文学》杂志重新发表，定名《洪波曲》。

22日 作杂文《岁末杂感》，表示“决心摒除一切的矜骄，虔诚地学习、服务，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载香港《文艺生活》海外版1948年12月25日第9期。

23日 乘海轮秘密离开香港，赴东北解放区。当晚六时顷，郭沫若和于立群赴冯裕芳家，八时顷郭沫若登舟，于立群送行。在冯家看到有养金鱼的玻璃方柜，忽有所感，因作诗一首，以表达自己将去自由天地的愉快心情。诗云：

平生作金鱼，惯供人玩味，
今夕变蛟龙，破空且飞去。

题为《咏金鱼》，见《沫若佚诗廿五首》，（郭平英、郭庶英、张澄寰、王廷芳辑），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23日至12月初 在船中。作诗《金环吟》一首。收《蜩螗集》。

又 作七绝《舟行阻风》三首，记叙途中风情。收《蜩螗集》。

又 作五言古诗《渔翁吟》：记舟行途中以白米同渔翁易鱼的事。收《蜩螗集》。

26日 舟中，马叙伦以所作诗二首见示，以其妻女未能同行为憾。

晚，和马叙伦诗，题为《和夷老二首》。云：

栖栖今圣者，万里赴鹏程。
暂远天伦乐，期平路哭声。
取材桴有所，浮海道将行。
好勇情知过，能容瑟共鸣？

揽辔澄清志，才疏苦未酬。
重遭党锢祸，终负少年头。
北伐空投策，抗倭媿运筹。
新民欣有庆，指顾定中州。

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夷老，即马叙伦。

29日 本日，系邓演达遇难十七周年，同行的丘映芙（即丘哲）作诗二首以为纪念，郭作七绝二首和之，诗云：

解放高潮暨印尼，神州牛耳岂容辞？
当年谈笑曾相许，共扫东南民族悲。

独夫罪恶岂胜诛？载鬼一车豕负涂。
猷馘汤山先告墓：艰难建国暗中扶。

题为《和丘映芙二首》，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本月初，在香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应邀去南方学院演讲。他勉励同学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最后，他“以伟大诗人的语言和情感，以高昂的声调，象诗朗诵一样说：‘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举起双臂，欢呼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全体师生的爱国热情为他鼓动起来，鼓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响应他的号召。（据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见《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同月 作五言诗《赴解放区留别立群》，共十首。这组诗作于离开香港前夕，因此次系独行，诗中反映了与于立群依依惜别之情，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全国解放的渴望。收《潮汐集·汐集》。

本月 6日起，淮海战役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五天，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余，取得伟大胜利。

十二月

初 作七绝《船泊石城岛畔杂成》四首。收《沫若文集》第2卷。

3日 船泊大王爷岛外。

4日 与同行者连贯、宦乡、翦伯赞等告别，他们将赴大连。临别时，翦伯赞颇郁郁，郭沫若作诗相送，诗云：

又是别中别，转觉更依依。
中原树桃李，木铎振旌旗。
瞬见干戈定，还看锤铤挥。
天涯原咫尺，北观共良时。

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又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5日 抵丹东。

6日 自丹东抵沈阳。晚，在铁路宾馆与许广平等交谈，阎宝航来访。阎以诗一首见示，众人请郭和之，遂作诗《和阎宝航》。诗云：

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
五十七年徒碌碌，八千里路甚堂堂。
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
君候老妻我笑少，今宵一梦谅无妨。

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8日 为刘澜波题手册，诗云：

一、三十五年弹指过，鸭绿江头我再来。
化作新人履新地，于今方觉眼才开。

二、烟筒林立望安东，畅浴温泉跨五龙。
东北人民新汗血，化将地狱作天官。

三、五年计划开鸿业，一片春光到海嵎。
沿路农家小儿女，穿红着绿甚欢娱。

四、雄师百万入榆关，底定中原指顾间。
它日重来观建设，齐声共唱凯歌还。

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22日 作《〈苏联五十天〉序》。《苏联五十天》即《苏联纪行》的改排本，1949年8月，大连新中国书局出版，改排时作了删节。

本月 接受侯外庐所赠从古玩店购得的一枚图章，章上刻有“公生明，偏生暗”六字，郭沫若见后很喜欢，还以此配成联一副，书赠侯外庐，上联是“公生明，偏生暗”，下联是“智乐山，仁乐水”。侯外庐后来回忆说：“这里用的虽然都是古人的话，但也体现了他的治学精神。他做学问不孤守一说，偏执己见，常常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自己认识的提高，不断修正自己的结论。他不但勇于创新，而且敢于坚持真理。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习惯势力怎样顽固，他总是坚毅沉着，在原则问题上一步不让。”（据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见《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本月 上旬，平津战役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攻克张家口、天津，北平和平解放。

本年 与茅盾等六十多位文化界人士共同签署纪念“五四”

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据李门：《泰山之神永生》，载1978年6月26日《广州日报》）

同年 应马宁之请，为新加坡龙岩会馆会刊《龙潮》月刊题字。见《龙潮》第1卷第1期。（据马宁：《学郭老学到老》，载1978年6月28日《福建日报》）

同年 为云南大学附属中学《附中报》题词。当时，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昆明地区学生运动又趋发展，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企图解散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为了团结师生，附中学生会出版了油印的《附中报》。郭沫若为之题写报头，并题词如下：“非洲有一种蚂蚁，当他们在大群行进的时候，如遇小溪阻隔，前头的蚂蚁便逐一跳下水去，搭成一座蚁桥，让后续的大群渡过。这种蚁命，真可说是重于泰山了。”（见王鄂生：《追忆郭老给云大〈附中报〉题词》，载《滇池》双月刊1979年7月25日第3期）

本年 丁玲所作反映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出版。此作后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同年 周立波所作描写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出版，此作后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

一九四九年(五十八岁)

一月

上旬 在沈阳，作诗《北上纪行》。记述从香港赴东北的情景，表达自己获得解放的愉快心情。共十首。载《华北文艺》1949年第4期，初收《新华颂》，编入《沫若文集》时改收《嫫蟾集》。

13日 把所作寄赠于立群的诗《此身篇》(即《赴解放区留别立群》)录赠李初梨。手迹影印件见《诗刊》1978年7月号。

20日 发表《鲜明的对比》。载本日《人民日报》。

21日 作诗《寄立群》(“漫道心何忍”)。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22日 作《书为李一氓联语》，云：

国有干城扶赤帜，民之喉舌发黄钟。

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又 作《题灯罩诗三首》。前二首分别作于上午及晚上。夜，闻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再题第三首。诗云：

一、华灯明烨烨，对此忆司空。
磨电传千户，流光烛万官。
若非劳力苦，何以济时穷？
领导期坚决，红星万古红。

二、一分潜势在，要发一分光。
明暗随开阖，阴阳共弛张。
能教城不夜，坐致福无星。
功绩谁居者，电强人更强。

三、窗前人独坐，夜境寂无哗。
俯仰如神意，招挥若定夸。
域中逃祸首，关外建红牙。
已见春冰解，寒梅谅已花。

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又 作诗《题木偶半身像》（“半身此木偶”）。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同日 为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条件，撤出北平市区，和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并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争取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25日 作诗《为周铁衡题印草第二集》（“齐翁有入室”）。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29日 作诗《吊冯裕芳》。冯裕芳和郭沫若同自香港来东北解放区，于27日夜病逝于沈阳，本日郭沫若参加冯的入殓仪式，归来作此诗。诗云：

等是在疆场，一死正堂堂。
后有冯裕芳，前有冯玉祥。
献身无保留，不用待协商。
历史开新页，领导要坚强。
视死咸如归，百万若国殇。

何为学儿女，泪落沾襟裳。
死贵得其时，二冯有耿光。
不忘人民者，人民永不忘。

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又 为李初梨所藏《芭蕉图》题诗（“挥毫窗下拂诗笺”）。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30日 为李初梨所藏《梅花图》题诗（“出人意外者”）。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本月 以《舟行阻风·三》题赠徐寿轩。见《吉林文艺》1978年第8期徐寿轩：《怀念郭老》。

同月 为东北图书馆题词。见《图书馆学刊》（辽宁图书馆学会主编）1979年第1期。

本月 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

同月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歼敌五十二万一千余人。22日，傅作义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守敌开始撤出市区。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二 月

3日 作诗《为谭平山题画马》，此画原题为《春风得意》。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5日 作诗《龙凤喜瓶》。郭沫若在沈阳得三龙笔洗与三凤瓶，戏称之为“龙凤喜瓶”，作诗以志。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10日 作题画诗一首（“画上题诗非作俑”）。这是以一张日本画作为诗笺，题诗其上。见《沫若佚诗廿五首》，篇名《题画》，

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21日 作诗《赠中国医科大学》(“一堂济济来多士”)。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25日 自沈阳抵北平，住北京饭店。在车上曾作诗一首，题为《抵北平感怀》。诗云：

多少人民血，换来此矜荣。

思之泪欲堕，欢笑不成声。

见《沫若佚诗廿五首》，载1979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本月 月底，应邀出席北平各界欢迎民主人士大会，并讲话。载1949年3月1日《人民日报》。

三 月

5日 作短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载1949年4月7日《人民日报》；又载《中国青年》1949年3月30日第5期。

12日 发表在北大学生自治会学生部所作讲演。载本日《人民日报》。

17日 发表在座谈会上的谈话。载本日《人民日报》，总题《座谈文物保管使用，痛斥国民党盗运古物》。

22日 出席华北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聚会，共同商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的筹备工作，在会上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

24日 中国各人民团体所选出的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立，郭沫若被推选担任代表团团长。

25日 发表讲话《要把人民的光荣扩展到华南、华西、海南岛、台湾！把毛泽东的旗帜插遍全中国！》载本日《新华日报》专刊。

同日 去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来到新解放的文化故都——北京。

29日 率领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离京前往巴黎，任代表团团长；副团长为刘宁一、马寅初，团员有徐悲鸿、郑振铎、程砚秋、邓初民、翦伯赞、曹靖华、洪深等。

本月 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至23日结束。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还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

四 月

7日 作《在落实的基础上，争取科学的更大跃进》。载《科学通报》第9期。

11日 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得悉因法国政府限制代表团入境人数，大会决定改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举行，中国代表团部分代表前往布拉格。

20日至27日 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开幕第一天，被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23日，正当会议进行之时，解放南京的消息传来，在巴黎、布拉格两地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全体代表一致起立欢呼：新中国万岁，毛泽东万岁！

27日 在大会上讲话，载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题为《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演》。

参加会议期间，领銜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写信给正在英国博恩默思海边疗养的李四光，请他早日返国。（据徐迟：《地质之光》，

《人民文学》1977年第10期)

本月 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遵照这一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五 月

1日 自布拉格返国途中,经过莫斯科,作诗《在莫斯科过五一节》,共四首。载1949年5月27日《人民日报》。收《沫若文集》第2卷。

4日 发表《〈人民科学丛书〉序》。载本日《人民日报》。收《人民科学丛书》。

15日 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后回国途中,在哈尔滨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和平大会胜利召开的意义,表示应当“本着大会的宣言和决议的精神,用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和全世界人民密切合作,争取民主和平阵营的最后胜利”。载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报载篇名题《郭沫若在哈市欢迎会上的讲演词》。本年5月26日《群众》第3卷第22期刊载时,题作《中国人民的胜利与世界和平》。

19日 致电于立群,告以24日晨抵天津。

20日 致电法国居里先生,抗议法国反动派对他的迫害。电文载194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25日 返抵北京，即去天安门参加欢迎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归来大会并在会上致词。载1949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又载《群众》1949年第3卷第22期。

26日 上午，黄克诚、阿英（钱杏邨）来访。

27日 晚，阿英等来寓漫谈。

29日 分别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国会，对在世界和平大会期间的热情招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月 在哈尔滨期间，瞻仰哈尔滨烈士馆，作诗一首《题哈尔滨烈士馆》。初收《新华颂》，编入《沫若文集》时改收《螭螭集》。

同月 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题诗》二首。见门瑞瑜：《风华常在——记郭沫若在东北烈士纪念馆》，载《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1期。

本月 3日，杭州解放。17日，武汉解放。20日，西安解放。22日，南昌解放。27日，上海解放。

六 月

1日 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常委会总书记辣裴德致函郭沫若并附“国际和平奖金”章程一份，通知常委会地址已择定巴黎香爱丽榭街，征询代表团回国后的活动和人民争取和平运动的情况，并告知将出版《和平战士》半月刊。

4日 晚，阳翰笙、阿英等来访。

5日 访阿英，并同游东安市场，以购得之琉球瓶一只赠阿英。

6日 发表《人民的普希金》（节录旧作）。载本日《人民日报》。

同日 晚，阿英来访。

7日 出席北平文艺界为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诞辰一百五十周年而召开的纪念大会，会议在建国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还有林伯渠、茅盾等七百余人。郭沫若在会上致开幕词，说明诗人之伟大是因为在一百多年前，在沙皇暴政下，就站在人民方面，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朋友，用人民的语言来写作，这是值得文艺界学习的。

15日 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周恩来致开幕词，发言的还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产业界民主人士陈叔通、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等。郭沫若在发言中说：“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毛主席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照耀之下，我们将要永远走着上坡路，而永远不会下降”。会议推举毛泽东为筹备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郭沫若还被推举为第五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宣言。筹备会全体大会至19日结束。

同日 晚，阿英来访。

19日 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作讲演。载1949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同日 接见《人民日报》记者访问，并发表谈话。内容载6月20日《人民日报》，报载总题为《访问新政协筹备会代表》。

24日 和林伯渠等到车站迎接从上海来京的民主人士张澜等。

25日 作短论《向军事战线看齐！》要求“拿笔的军队，必须向拿枪的军队看齐”。载7月2日《人民日报》，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

28日 就文代会的目的与任务所作的谈话发表。载本日《人民日报》，报载篇名为《文代会开幕前夕，郭沫若先生发表谈话，说明大会的主要目的与任务》。

30日 上午出席第一次文代会预备会，会议在怀仁堂举行，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九十六人）并大会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

下午，出席主席团会议及主席团常委会议。

本月 《中苏文化之交流》一书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出版，收《中苏文化交流》等文章十九篇，另有序文一篇，附录二件。

七 月

1日 晚，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参加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各界人民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纪念大会，在大会上讲话并充满激情地朗诵诗篇，歌颂党和人民的胜利。全文载1949年7月3日《人民日报》，题为《郭沫若先生讲词》。

同日 出席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发起人会议并被推为筹备会常委会主席。

2日 和朱德、林伯渠等参加本日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任大会总主席，致开幕词，庆贺各路文艺战士“集中在毛主席的胜利的旗帜之下，会师北平”，要求大家学习“工农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只有和工农密切联系，才能“了解工农，表现工农，更进而教育工农”。最后，他号召：“一切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起来，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打击并消灭一切有形无形的敌人，使

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获得全面胜利！”载1949年7月3日《人民日报》，篇名题《郭沫若先生开幕辞》，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

3日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他首先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基本观点，回顾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指出：“三十年来的新文艺运动都是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左翼文艺运动是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这个运动以鲁迅为旗手……”，在这一运动中，“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曾经采取狭隘的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抗战爆发后，“有一部分人在某些阶段上又忽略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原则斗争和严肃批评，产生了右倾的倾向”。三十年来，“中国文艺界的主要论争是存在于这样两条路线之间：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而后者逐步取得了胜利。“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一切过去没有卷入革命的人们。这就是文艺统一战线也可能取得比过去更广泛的基础”。郭沫若指出今后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团结，深入现实，加强学习，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艺残余，反对新文艺内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文艺和中国封建文艺的影响，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而奋斗。载1949年7月4日《人民日报》，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

5日 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作广播讲话，题为《实现日本的民主化》。载1949年7月6日《人民日报》，题为《郭沫若先生广播讲实现日本的民主化》。

6日 文代会第五天，主持会议。下午二时，周恩来作报告，晚上七时二十分毛泽东也亲临大会。散会前，郭沫若说：“我们诚恳的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并向毛主席鞠躬，毛主席也还了礼。（据1949年7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

同日 为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新政协筹备会各党派团体联合发表宣言，郭沫若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宣言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宣言上签字。（据1949年7月7日《解放日报》）

7日 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大会，代表全国文艺工作者在会上发言。载1949年7月9日《人民日报》，总题为《北平“七七”大会上的讲辞》。

11日 和周恩来等参加张西曼治丧委员会。

13日 出席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员会会议并致词。

14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并在会上致开幕词，指出建立真正社会科学的使命“落到大公无私的世界的真正创造者——无产阶级的身上”。载1949年7月15日、16日《人民日报》，题为《郭沫若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上的开幕词》。在15日会议上被推为大会常委会副主席。会议于18日闭幕。

15日 出席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民盟北平支部在北京饭店礼堂联合举行的纪念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黄竞武、曾伟六烈士会议。

16日 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苏友好协会发起大会。大会发起人共六百九十八人，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

若等领衔。大会推举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为主席团成员，并由郭沫若致开幕词。开幕词说，成立中苏友协是为了“加紧进行对于苏联的学习，吸收苏联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并揭破一切反动派对苏联的蒙蔽与诬蔑，以增进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当然，我们也应“把我们的经验和智慧贡献给我们的朋友”。载1949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会议决定成立中苏友协筹备委员会，郭沫若和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等被选为筹备委员。筹备会由宋庆龄任主任，周恩来、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黄炎培等任副主任。

17日 出席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筹备会议的闭幕式。

19日 出席中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式并作结束报告和闭幕词。指出：这次大会加强了文艺界的团结，使大家更充分地认识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建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统一机构。结束报告载194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

大会历时十八天，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等八十七人当选为委员，另有候补委员二十六人。

同日 和周恩来等参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招待文代会代表盛会。

23日 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茅盾、周扬、丁玲等二十一人被选为常务委员，并被推选为文联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沙可夫、黄药眠、周巍峙为秘书长。

23至24日 出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和丁

玲、茅盾、赵树理、艾青等六十九人被选为委员。茅盾任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席。

本月 《棠棣之花》(校订本)由群益出版社出版。

本月 1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同月 2日，保加利亚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季米特洛夫(1882—1949)逝世。

八 月

8日 抱病出席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华北各大学毕业典礼并讲话，会上赠给同学们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据1949年8月9日《人民日报》《北平新闻》第9期报道：《钱俊瑞号召大学毕业生深入农村工作，郭沫若勉活到老学到老》)

9日 访阿英。

11日 发表时论，题为《谴责美国白皮书》。载本日《人民日报》。美国的白皮书，即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一个文件，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时的中美关系。其中内容多系为美国政府反共反中国人民革命的政策辩解。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评论，予以揭露和驳斥。

14日 为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四周年，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发表讲话，题为《中苏同盟四周年》。载本日《人民日报》。

同日 为纪念“八·一五”东北解放四周年，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内容载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题为

《郭沫若等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

17日 针对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代表全国文联所作谈话发表。痛斥美国白皮书所暴露的美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捣乱到底的阴谋计划。载本日《人民日报》，总题《各界谴责美帝白皮书》。

25日 接毛泽东主席信，嘱与茅盾、马叙伦审议关于文字改革事，并附来吴玉章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信。（据郑林曦：《郭老热心文字改革的二三事》）

26日 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讨论揭露美国白皮书。

28日 与茅盾、马叙伦一起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就文字改革一事，发表意见。以答复8月25日来信的征询。书面意见主张：一是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主要用拉丁字母拟订中国的拼音文字，不赞成搞方言拉丁化而主张普及以北方语为基础的“国语”，“拉丁化的研究者似应注其全力于北方话的拉丁化方案，使其更完备”，同时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二是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据郑林曦：《郭老热心文字改革的二三事》，见1978年7月15日《光明日报》）

同日 参加“苏联建设图片展览会”开幕式。

同日 下午，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到车站迎接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邀请来北平的宋庆龄。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到达。

本月 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于长沙举行起义，湖南和平解放。

同月 17日，福建省会福州解放。

同月 26日，甘肃省会兰州解放。

同月 上海《文汇报》就小资产阶级是否可以作文艺作品主角的问题展开讨论。讨论延续两个多月。

九 月

1日 和李济深、宋庆龄、周恩来等出席冯玉祥遇难周年追悼会。在会上讲话说，要学习冯先生接近人民、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勇于改正自己错误的优良作风。（据1949年9月2日《人民日报》：《追悼冯玉祥先生》）

6日 出席中苏友协总会筹委会全体会议，并欢迎该会主任委员宋庆龄。出席会议的还有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等。

7日 和刘宁一、马寅初联名电贺全美洲和平大会召开。电文载1949年9月8日《人民日报》。

同日 和毛泽东等到车站迎接程潜到京。

8日 作《读了〈新儿女英雄传〉》。称赞这部书“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和《水浒传》、《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的读者了”，它写出了解放区平凡的、但又是集体的英雄，“人物的刻划，事件的叙述，都很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也非常纯熟”，这是遵照毛泽东文艺讲话而获得的成功。载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后收入该书，作为序。该书系孔厥、袁静著，此前曾在《人民日报》连载，1949年9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13日 和茅盾、周扬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

17日 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把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同日 发表《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载《新华周报》第3卷第1期。

20日 作诗《新华颂》。歌颂新中国。载10月1日《人民日报》。收《新华颂》。

21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

郭沫若以满腔热情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各项活动，他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组的召集人，在大会上，经常慷慨陈词，歌颂党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功勋，他那热情的语言，使听者无不动容。（赵泐：《铁翼乘风逐太阳》，见《欢呼春天的诗人》）

24日 作诗《四川人，起来！》载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收《新华颂》。

25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对政协大会通过的文件表示无条件的接受，并表示：决不做美帝国主义所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也不做自以为站在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者”。载1949年9月26日《人民日报》。报载篇名题《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郭沫若发言》。

30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本月 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六百六十二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选举了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并选举毛泽东为全国委员会主

席。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为副主席，选举了陈毅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四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元，通过这个决议的一年为1949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

同月 5日，青海省省会西宁解放。19日，董其武、孙兰峰在绥远率部起义，绥远解放。23日，宁夏省省会银川解放。25、26日，陶峙岳、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本月底，中国大陆除少数省份外，已大部解放。

同月 10日，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分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

同月 25日，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正式创刊。（在文代会筹备和召开期间，该刊曾试版发行过十三期）

十 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郭沫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宣布就职。

同日 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

同日 和周恩来等到车站欢迎由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并致词。载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题《郭沫若欢迎词》。

2日 和朱德等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报告，题为《为粉碎新的侵略战争阴谋而斗争》。载

1949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3日 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

5日 就本月2日苏联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文章。载本日《人民日报》，总题《各党派团体负责人发表书面意见，感谢苏联承认新中国庆贺中苏建立新邦交》。

同日 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副会长。

9日 和毛泽东等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副主席。

13日 作论文《继续发扬韧性的战斗精神》。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而作。指出：鲁迅先生生前所渴望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正在逐步实现。但是，我们的工作正在开始，“我们还当继续发扬韧性的战斗精神，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将建设工作发展到最高阶段”，不但要继续“冷对”敌人，而且，还要为新中国“热斗”，“要和一切落后的现实斗，和自然的威力斗，和技术的顽强性斗”，要发扬孺子牛精神，医好战争创伤，“把落后的农业中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中国”。载《文艺报》1949年10月25日第1卷第3期。

同日 出席全国文联邀请有关团体共商纪念鲁迅事宜会议。

14日 为《河北教育》创刊题词：“学习毛泽东活用马列主义的思想，使后一代青年都成为建国的基石和栋梁。”手迹载《河北教育》1979年第10期。

17日 作诗《鲁迅先生笑了》，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而作。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鲁迅先生“平常的那苦涩的‘脸色’”“和暖如春地

豁然而有内涵地在笑”了。载 1949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收《新华颂》。

19日 主持首都各界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大会，并致词。

同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被任命为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20日 就美国政府迫害美共领袖所作的书面发言发表。载本日《人民日报》，总题《中国人民愤怒抗议》。

同日 为首都体育大会题词：“新民主主义的体育应该建立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使劳动艺术化，不仅要使青年有健壮的体魄，而且要养成尊重劳动的精神。”手迹载1949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21日 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号召全体委员迎接新中国文化建设高潮。讲话内容见1949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政务院所属四委员会昨举行首次会议》。

同日 出席政务院成立大会，并报告文教委员会成立经过。

25日 出席政务院第二次会议。

28日 和刘少奇等出席苏联大使欢迎苏文化代表团酒会。

同日 欢送苏联代表团的短文发表，题为《再见！》载本日《人民日报》。

29日 出席欢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代表团大会，并致欢送词。

30日 发表短论《电影是很好的教育工具》。载本日《人民日报》。

本月 于《新建设》发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掌握近代技术，切实地从事新的建设，但要首先放下一个大包袱，便是知

识分子的妄自尊大。”载《新建设》1949年10月第1卷第3期，总题为《政协代表对于〈新建设〉读者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两句话》。

本月 1日，开国庆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有三十万群众参加。

同月 14日，广州解放；17日，厦门解放。

同月 北京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建议人民政府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鲁迅铜像和鲁迅纪念馆，整理鲁迅故居。北京图书馆举办鲁迅作品及生活展览会。《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纪念特辑或纪念文章。

同月 “文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月刊)在北京创刊。

十一月

3日 作散文《十月革命，普天同庆》，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载1949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又载《中苏友好月刊》1949年创刊号。

6日 作论文《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收《论大众文艺》(王亚平编)天下图书公司1950年10月出版。

7日 出席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大会并演说。载1949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16日 复张羹梅信。见《党的生活丛刊》1979年11月第3辑，张羹梅：《国尔忘家，公尔忘私——追记郭老的一封信》。

21日 向全印职工大会复电。此前该会邀请他参加全印和平大会，因两国尚未建交，不便参加，兹答复。载194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同日 电贺全印和平大会。载1949年11月23日《人民日

报》。

本月 作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见《新华月报》1950年1月15日第1卷第3期。收《新华颂》。收入《沫若文集》第2卷时，删去首尾二句，题名改为《集体力量的结晶》。

同月 所译《生命的科学》(英·H·G·Wells著)第三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郭沫若译。此书第一册、第二册的译本分别于1934年10月、1935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石沱译。

本月 北京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赵树理等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十二月

4日 作短论《光荣属于胜利的负担者》。拥护《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号召大家积极响应，负担起这由于战争胜利而来的“光荣的负担”。载194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10日 出席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开幕式并致祝词。载194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题为《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祝词》。

13日 发表诗《斯大林万岁》，载本日《人民日报》。此诗系为中国文艺界人士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所制纪念册而作，并亲自题书其上；纪念册上并有齐白石等的诗画。

18日 所作散文《“灵魂工程”的工程师——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而作》发表。略论斯大林对文艺工作和文艺理论问题的贡献。载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又载《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7期。

同日 和刘少奇等出席中苏友协总会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盛会并致词。内容摘要载1949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题为《我们要做好中国革命作为祝寿的最好礼物》。

27日 作诗《史无前例的大事》。贺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会见斯大林。载195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又载《新华周报》1950年1月14日第4卷第6期。收《新华颂》。

本月 毛泽东主席一行前往苏联访问，16日到达莫斯科。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见。

本年 作《黄热病的故事》。载《中国儿童》1949年创刊号。

同年 出席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并在会上发言。

同年 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同年 《屈原》(校订本)由群益出版社出版。

本年 解放区优秀文艺作品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五十三种全部出版。这套丛书包括戏剧二十三种、小说十六种、通讯报告七种、诗歌五种、说书词二种。